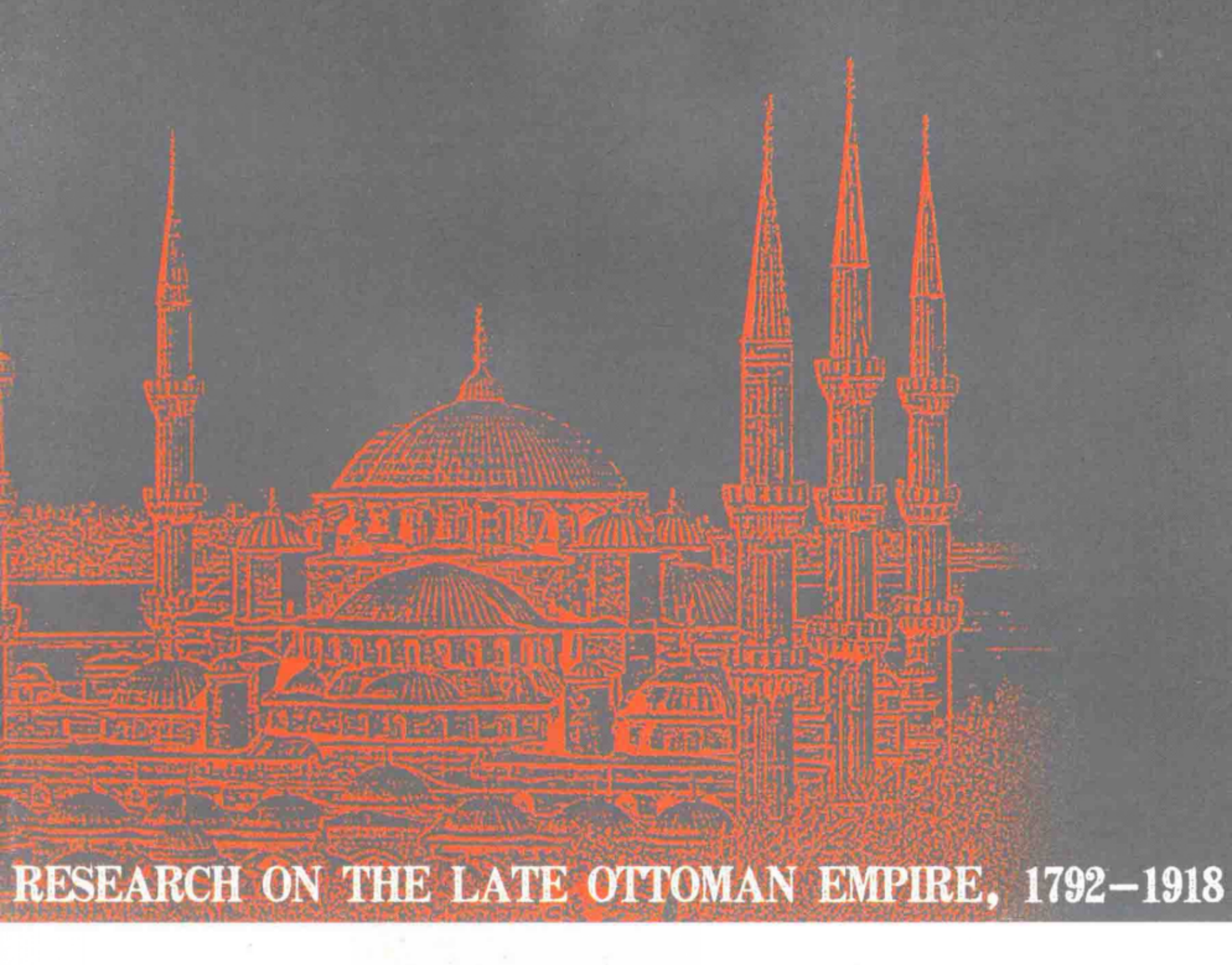


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
（1792—1918）

王三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SEARCH O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792-1918

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

（1792—1918）




ISBN 978-7-5161-6193-7

定价：69.00元

RESEARCH O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792-1918

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

（1792—1918）

王三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 / 王三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61-6193-7

Ⅰ.①晚… Ⅱ.①王… Ⅲ.①奥斯曼帝国—历史—研究—1792～1918 Ⅳ.①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7593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卢战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69千字
定　　价 6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目　　录

导 论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首先，这个帝国存在的时间长，从1299年建立国家到1918年帝国解体，前后620年；其次，这个帝国疆域辽阔，拥有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非洲北部的大片土地；再次，这个帝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人口占少数的土耳其人，统治着人口众多的阿拉伯穆斯林以及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几十个少数民族。从世界历史看，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一般寿命短，不是很快分裂就是迅速亡国，而奥斯曼帝国是例外。

奥斯曼帝国依靠征服不断壮大，从小亚细亚西北角的草原国家到地跨三洲的大帝国，用了220年时间。[①] 从开始征服东地中海，到帝国军队围

---

① 奥斯曼国家的建立者奥斯曼（1299—1326年在位）继承的封地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北角，中心是今天土耳其埃斯基谢希尔城北面的瑟于特，处于塞尔柱突厥王国的边区。经过奥斯曼和奥尔汉（1326—1359年在位）两代君主的扩张，到14世纪中期完成对小亚细亚的征服。这时奥斯曼国家的领土包括了自爱琴海到黑海的整个小亚细亚西北角。此后奥斯曼土耳其人进入欧洲。1362年，穆拉德一世（1359—1389年在位）率军队夺取亚德里亚堡（埃迪尔纳），进而侵入马其顿平原。奥斯曼国家的首都从布鲁萨迁到埃迪尔纳。1384年攻占索非亚，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138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摧毁塞尔维亚帝国。巴耶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率军队占据马其顿、保加利亚的部分地区，入侵匈牙利。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征服特拉布宗（黑海南岸）的希腊人王国；征服波斯尼亚王国；夺取热那亚人在黑海的殖民地；兼并克里米亚；征服阿尔巴尼亚，把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纳入帝国的统治范围，也把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地区纳入帝国。到1481年为止，奥斯曼国家的领土已经比1354年的疆土扩大了10倍以上，达到约100万平方公里。谢里姆一世时期（1512—1520年在位）从波斯人手中夺得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1516年攻占了大马士革，征服叙利亚；1517年征服埃及，使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延伸到红海、东地中海和北非地区。

攻维也纳失败，大约180年时间。[①] 从开始衰落，到最后解体的过程也持续了220年（1699—1918年），衰而不朽，弱而不亡，“生命力”极强。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阶段：1299年至1517年为一个阶段，奥斯曼从草原国家发展为帝国；1517年至1699年为一个阶段，帝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霸权；1699年至1792年为一个阶段，主要特点是出现军事失败和政治腐败；1792年至1918年为一个阶段，帝国走向衰落和瓦解。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1792—1918年），是疆域辽阔的奥斯曼帝国从衰落走向瓦解的历史，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为挽救危亡而不断改革的历史，也是帝国境内少数民族争取自治和独立的历史。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奥斯曼帝国经受欧洲资本主义的冲击，卷入欧洲大国政治斗争的旋涡，成为欧洲外交家们口头“保护”、暗中瓜分的对象，所以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也是半部欧洲国际关系史。

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昔日的辉煌遮掩不住最后百余年的衰弱颓败，表面的宗主权挡不住属地和行省的分崩离析。对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和北非属地而言，奥斯曼帝国的衰弱是它们独立的机会，但欧洲大国插手又使它们变成利益争夺的牺牲品。对欧洲国家而言，奥斯曼帝国扩张称霸是威胁，奥斯曼帝国突然崩溃也是灾难。从整体来说，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标志着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的终结，而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前百余年的政治经济变动，重构了东欧、西亚和北非的政治地图，影响了东地中海20多个现代国家的历史走向。

（一）

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是引人入胜的。奥斯曼自称“埃米尔”并宣布建

---

① 1520年登上素丹宝座的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取得对外征服的重大胜利。1521—1526年占领贝尔格莱德、罗得岛、莫哈奇、布达、佩斯，进入匈牙利。1529年9月围攻维也纳。苏莱曼大帝还向波斯和两河流域用兵，一度占领波斯的大不里士，南下占领巴格达，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波斯湾；还征服非洲北部的沿海地区。到1566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比1481年的疆土扩大了4倍以上。后来塞利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继续扩张，向西占据塞浦路斯、突尼斯、摩洛哥，向南占领阿拉伯半岛西南沿岸（直至也门），向东控制高加索地区，向东南控制波斯湾南岸地区。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1697年军事失败，丧失了匈牙利等地。

立奥斯曼国家时（1299年），正值安茹王朝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统治英国，卡佩王朝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统治法国，元成宗铁穆耳（1295—1307年在位）统治中国。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时，英法百年战争终于结束，中国则是明朝景泰四年，明代宗朱祁钰（1450—1457年在位）当政。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等国签订《卡洛维茨条约》时，西欧无大事，中国是康熙三十八年，也是太平年。然而，1699年《卡洛维兹条约》的签订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前奥斯曼帝国向外扩张，此后转入防御；奥斯曼帝国从此开始丧失领土，疆域逐渐萎缩。由于"奥斯曼帝国无力反抗欧洲国家对自己领土的蚕食，此后被欧洲强国视为一个日渐衰落的国家"。[①] 尽管奥斯曼政治精英人物一直没有放弃挽救危亡的努力，还是未能阻止帝国的衰退。

提起奥斯曼帝国，有许多问题令人迷惑不解。[②] 其一，奥斯曼帝国是从草原国家发展起来的，这个帝国不同于其他草原帝国的地方是什么？奥斯曼帝国长期延续的生命力何在？其二，奥斯曼帝国在强盛时期统治着西亚、北非和东欧等广阔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那么多民族统一在一起，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奥斯曼帝国在解决民族冲突和应付极其复杂的边界冲突方面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其三，奥斯曼帝国距离欧洲很近（一部分领土在欧洲），但它接受欧洲的新文明为什么那么迟缓？某些极其落后甚至野蛮的制度（例如继承王位的新素丹要杀死自己众多的兄弟）在奥斯曼帝国竟然保存那么久？其四，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为什么认识到改革必要性的人相对来说那么少，改革的阻力那么大？其五，奥斯曼政府改革多次受挫，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精英还要不断改革，以适应历史发展，他们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其六，最高统治者素丹为什么会失去对旧军队的控制？旧军队竟然能轻易地阻挠改革，迫使素丹放弃颁布的新法，甚至废黜素丹。素丹重要的助手大维齐（*Veziri âzam*）[③] 为什么在改变军队地位和特权方面没有作为？是不想有所作为，不愿意改变现状，还是习惯或传统

---

① Alan R. Taylor, *The Super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1981, p. 7.

② 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加丰教授在给译著《奥斯曼帝国》（许序雅等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撰写序言时，提出过一连串的问题。本书中提到的疑问大多数是王加丰先生提到的。笔者后来见到王加丰先生，提起他在序言中所写的这些问题，他谦虚地说："我对奥斯曼帝国史没有研究，了解也不深，只是直观地想到了这些问题"。王加丰先生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并不在奥斯曼帝国史，但他提出的问题很深刻，对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人有很大启发。

③ 大维齐在土耳其语中有两个词：Veziri âzam；Sadrazam。后文有详细解释。

的限制使他们难以做到？政府首脑大维齐的地位如此脆弱，说明政治制度有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儿呢？其七，奥斯曼帝国衰落过程很长，迟迟未崩溃的原因，是不是如欧洲学者认为的那样，由于欧洲各大国希望在近东“保持现状”？可见，对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的研究，应有客观的判断。

从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来看，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当代西亚、北非和巴尔干地区许多问题的根源，不得不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晚期（1792—1918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改写了近东地区的历史，因而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其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涉及地缘政治因素和近代国际关系变迁。解剖式地分析晚期奥斯曼帝国与西欧大国关系的演变，除了揭示奥斯曼帝国从经济依附到国家解体的过程，还揭示殖民主义者为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如何处心积虑，使得奥斯曼政府把主权维系当作比发展经济更紧迫的目标。另一方面，研究这个横跨三洲的大帝国发生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特点，对于揭示现代以至当代大国政治的某些特殊问题，可以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本书研究的范围是从1792年塞利姆三世改革、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被协约国占领，即重点探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至瓦解的过程，并分析其根本原因。

(二)

尽管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从国内的情况看，对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显得冷清，两者形成鲜明对照。目前没有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专著。读者能见到的书，一是许序雅、张忠祥翻译的《奥斯曼帝国》[①]，二是“世界帝国丛书”之一的《奥斯曼帝国》[②]。前者是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及现代土耳其史》[③] 的上卷，后者属于通俗读物。中国读者要了解奥斯曼帝国，主要的参考书是三本汉译著作：伯纳德·刘易斯的《现

① ［美］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许序雅、张忠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黄维民：《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代土耳其的兴起》[①]、伊兹科维兹的《帝国的剖析》[②]、戴维森的《从瓦解到新生》[③]。此外还有一本适合大众口味的《奥斯曼帝国闲史》（杰森·古德温著）。[④] 前辈学者杨兆均著《土耳其现代史》和柳克述的《土耳其革命史》都是从奥斯曼帝国写起，有一定参考价值。由于这两本书成书年代早，旧版本的图书搁置于图书馆的角落，不大引人注意。

近年来，对晚期奥斯曼帝国史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有不少学者涉猎，其成果大致在三个领域：

第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瓦解。曹宏举的《利用外资须固守主权——西方资本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⑤]，从外国投资或铁路建设角度，探究奥斯曼帝国经济依附的过程。邵永灵、时殷弘的《地缘政治经济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⑥]，则从近代国际关系角度，宏观地看奥斯曼帝国的演变和最后结局。

第二，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杨增耀的《浅论奥斯曼帝国近代的三次改革》[⑦]、钱乘旦的《奥斯曼帝国自我改造的失败及其原因》[⑧]、姜明新的《略论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⑨] 等论文，不同程度地分析每次改革的内容和影响，试图探究改革失败的根源。还有涉及教育改革的论文，如王莉的《浅析近代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世俗化》。[⑩]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国内学者的基本结论是：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之

---

① ［英］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② ［美］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美］戴维森（Roderic H. Davison）：《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Turkey），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杰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奥斯曼帝国闲史》，罗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⑤ 曹宏举：《利用外资须固守主权——西方资本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西亚非洲》2000 年第 6 期，第 36—40 页。

⑥ 邵永灵、时殷弘：《地缘政治经济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世界历史》1998 年第 3 期，第 47—54 页。

⑦ 杨增耀：《浅论奥斯曼帝国近代的三次改革》，《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4 期，第 66—71 页。

⑧ 钱乘旦：《奥斯曼帝国自我改造的失败及其原因》，《历史教学》1999 年第 10 期，第 22—26 页。

⑨ 姜明新：《略论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西亚非洲》2008 年第 10 期，第 29—35 页。

⑩ 王莉：《浅析近代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世俗化》，《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1 期，第 157—158 页。

后的“救国图强”举措，但“图强”的愿望并未实现；奥斯曼帝国在走向衰弱和边缘化的同时，也在经历着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缓慢转型。

第三，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朱瀛泉的《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学术价值高，书中详细分析了1875—1880年列强围绕“东方问题”而发生的矛盾与冲突、最后达成的各种协定（该书并不涉及1880年之后列强与奥斯曼帝国关系）。赵军秀曾以“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为题得到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研究成果最后出版，即专著《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①] 赵军秀的研究主要涉及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纵向发展脉络，以海峡政策为切入点。不过，国内还没有涉及“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等著作。

笔者近几年所做的研究，涉及奥斯曼帝国的边疆变迁、军事改革、少数民族地位、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帝国的政治改革等问题[②]，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晚期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轨迹及根源。

国内学者以往的研究，起初着眼于一些宏大的选题，如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东的影响，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行省改革的性质等，故而对导致奥斯曼帝国衰落和瓦解的细节问题研究不够，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更为欠缺。至少目前还没有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分层、民族关系、利益集团、对外政策的系统研究。

西方学者对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很深入，成果非常丰富。主要原因是，奥斯曼帝国史与欧洲史不能截然分开。奥斯曼帝国史是欧洲史的一部分，欧洲史也与奥斯曼帝国史紧密相关。奥斯曼土耳其人从14世纪中叶开始攻打欧洲城市，威胁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安全；到了18至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又主动寻求欧洲人的帮助，学习英法等国的先进技术，试图赶上西欧强国；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与英、法、俄为敌，在世

---

① 赵军秀：《英国对土耳其海峡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笔者已发表的论文：《奥斯曼帝国移动的边疆与脆弱的霸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土耳其的近代化：一般道路与特殊问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少数民族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世界民族》2011年第6期）、《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改革评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关于奥斯曼素丹哈米德二世的评价问题》（《中东研究》2011年第1期）、《晚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演变及其特征》（《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奥斯曼帝国政治改革的困境》（《读书》2013年第4期）。

界大战的战场上兵戎相见。奥斯曼土耳其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关系总是扯不断、理不清。当欧洲人发现这个帝国衰弱不堪时，想占据这个帝国所辖的广阔领土，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吞，一个多世纪的外交大多都是针对奥斯曼帝国的。也就是说，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往昔的威胁不能忘怀，对奥斯曼帝国近世的崩溃不能视而不见，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能不深入探究。

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西文著作，数量多、涉及面宽。马里安·肯特等合著的《欧洲大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终结》[①] 一书，按国别讨论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德国与奥斯曼帝国、法国与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参与撰述的作者主要论述：在奥斯曼帝国从衰弱、改革到瓦解的过程中，对欧洲大国产生多大影响。艾伦·帕尔默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②] 也是同一题材，但着力点不同，重点讨论和分析的不完全是奥斯曼帝国衰亡的外因。

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③]，上卷叙述奥斯曼国家建立到塞利姆三世统治结束的历史（1299—1808 年），下卷叙述马哈茂德二世执政到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 50 多年的历史（1808—1975 年）。在下卷里，改革的内容占到一半篇幅。著者把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08—1839 年）看作现代奥斯曼改革的开端，把坦齐马特（1839—1876 年）看作一个时代——“现代改革时代”，把哈米德二世的统治（1876—1909 年）看作“改革的顶峰”。在大多数有关奥斯曼帝国的著作中，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是专制时代，而斯坦福·肖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定位，发前人所未发，具有独创性。著作中详细叙述哈米德二世时期经济、军事、教育等改革的措施及成效，把这一时期当作坦齐马特的延续和“高潮”，为奥斯曼帝国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被其他研究者所重视。

---

①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ank Cass, London, 1996. 撰稿人分别为：Feroz Ahmad, F. B. Bridge, R. Bosworth, Alan Bodger, Ulrich Trumpener, Bruce Fulton and Marian Kent。

② Alan Palm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2.

③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威廉·米勒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后继者（1801—1927）》[1] 一书，大致按照时间顺序，以历史事件为单元，从拿破仑入侵中东讲起，到土耳其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先后建立以及土耳其与希腊领土分割等事件为止，把这120多年的历史详细梳理一遍。由于作者的着眼点之一是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继承者，所以著作中的大量篇幅叙述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民族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土耳其的革命、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化等重要方面没有深入分析。

关于奥斯曼社会的少数利益群体，主要论著有：布鲁斯·艾伦·马斯特的《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世界的基督教徒与犹太人》[2]、本杰明·布劳德和伯纳德·刘易斯的《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与犹太人》[3]，莫莉·格林的《共享的世界：近代地中海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4]，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及土耳其共和国的犹太人》[5] 等。其中，布鲁斯·艾伦·马斯特的《奥斯曼帝国时期阿拉伯世界的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一书专业性很强，先用两章篇幅对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世界的非穆斯林人口、他们的社会地位、各地发展的不均衡（或多样性）等层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接着按照时间顺序，叙述17世纪西方入侵后非穆斯林商人的状况，18世纪遇到的挑战以及19世纪不同社团的矛盾，最后是对帝国瓦解之前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社团的扫描。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及土耳其共和国的犹太人》专门研究犹太人的历史变迁，所以按照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17—18世纪、19世纪至20世纪初、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这样四个阶段，勾勒犹太人社团在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的兴衰。取材范围更广一些的著作，包括加布里埃尔·贝尔的《中东的费拉赫（农民）与城

---

① William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 1801—192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② Bruce Alan Master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Benjamin Braude and Bernard Lewi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Function of a Plural Societ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2.

④ Molly Greene, *A Shared World: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 Stanford Shaw, *The 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里人：社会史研究》[1]、贾斯廷·麦卡锡的《穆斯林与少数民族：奥斯曼帝国安那托利亚的人口与帝国的终结》[2]，唐纳德·卡泰尔特的《工人、农民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变革：1730—1914》[3] 等。

关于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的关系，常见的著作有：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与西方》[4]，约瑟夫·赫勒的《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政策（1908—1914）》[5]、吉布与鲍恩合著的《伊斯兰社会与西方》[6]、凯杜里的《英国与中东》[7] 等。流传极广的是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与西方》。该书分为“历史肖像的轮廓”、“西方的冲击”、“寻找自由”、“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伊斯兰的反抗”、“国际事务中的中东”六篇，言简而意赅，通俗易懂，线索清晰。

关于奥斯曼帝国经济、军事、改革等内容，也有不少重要论著。如：卡萨巴的《19 世纪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8]、哈里尔·伊纳尔杰克和唐纳德·卡泰尔特的《奥斯曼帝国经济与社会史》[9] 等。弗基尼亚·阿克桑的《1700—1780 年的奥斯曼战争：一个被围困的帝国》[10]、韦斯曼·伊茨查克和弗鲁玛·托克斯的《奥斯曼改革与穆斯林的新生》[11]、苏莱亚·法

---

① Gabriel Baer, *Fellah and Townsmen in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1982.

② Justin Mc 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Donald Quataert, *Workers, Peasant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1730—1914*, Istanbul, 1994.

④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4.

⑤ Joseph Helle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4.*, Frank Cass, London, 1983.

⑥ H. A. R. Gibb, H.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Parts. 1, 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57.

⑦ E. Kedourie, *England and Middle Ea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21.*, London: Bowes., 1956.

⑧ Re 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⑨ Halil Inalcık & Donal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⑩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Pearson Longman, Harlow, London, the U. K., 2007.

⑪ Weismann Itzchak, Fruma Zachs, *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 B. Tauris,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5.

罗奇的《奥斯曼帝国及周边国家》[①]、伯纳德·刘易斯《伊斯坦布尔与奥斯曼帝国文明》[②]、韦恩·乌西尼奇的《奥斯曼帝国的文献与遗产》[③]、M. E. 亚普《现代中东的形成：1792—1923》[④]、道格拉斯·霍华德的《土耳其史》[⑤]、埃弗斯利的《土耳其帝国（1288—1914）》[⑥] 等，其中一些是通史性质的著作，有的是断代史，有的是专题著作，总体上着眼于宏大的主题。土耳其学者的英文著作，如埃里克·祖舍尔的《土耳其现代史》[⑦]、舒克鲁·哈尼奥卢的《晚期奥斯曼帝国简史》[⑧]、穆尔萨奥卢的《土耳其：从帝国到共和国》[⑨]、谢夫凯特·帕穆克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资本主义（1820—1913）》[⑩] 等，也有较大影响。舒克鲁·哈尼奥卢的《晚期奥斯曼帝国简史》简要叙述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重点内容是改革和现代化，认为哈米德二世实行绝对专制，改革事业终结，所以书中有一章的题目是"坦齐马特的黄昏与哈米德的统治"。穆尔萨奥卢的《土耳其：从帝国到共和国》叙述 1789 年到 20 世纪中叶的土耳其历史，自成体系，分五个部分共 33 章。涉及奥斯曼帝国只有 14 章，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土耳其文的大量专题论著、论文多不胜数，涉及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方方面面。关于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论著就有很多，如哈立德·阿斯兰的

---

① Suraiya Faroqhi,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2004.

② Bernald Lewis, *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3.

③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④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⑤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⑥ Eversley, *The Turkish Empire, from 1288 to 1914.* Howard Fertig, New York, 1969.

⑦ Erik Jan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⑧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⑨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⑩ Şevket Pamuk,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 1820—1913: Trade,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7.

《坦齐马特时期改变宗教信仰的运动（1839—1876）》[①]、比拉尔·艾尔耶尔马兹的《坦齐马特与行政管理现代化》[②]、尤达居尔·穆罕默德奥卢的《坦齐马特之后的学校宗教教育（1838—1920）》[③]、哈利尔·伊纳尔杰克等的《坦齐马特：变革时期的奥斯曼帝国》[④] 等。其中，《坦齐马特：变革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一书的学术价值很高，这是一本长达826页的论文集，由研究奥斯曼帝国的知名专家哈利尔·伊纳尔杰克（Halil İnalcık）、穆罕默德·塞伊特达勒奥卢（Mehmet Seyitdanlıoğlu）、恩维尔·齐亚·卡拉尔（Enver Ziya Karal）、谢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等人撰文，分七个专题讨论坦齐马特及其与此相关的问题。第一部分讨论1839年的古尔汗法令，第二部分讨论改革的实践及其产生的反响，第三部分讨论奥斯曼政府的外交，第四部分讨论坦齐马特与现代化，第五部分讨论改革派（坦齐马特派），第六部分讨论城市生活与社会结构，第七部分讨论坦齐马特时代的经济与工业发展。这些学者在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前，分析了针对坦齐马特的各家观点，几乎就是一本“坦齐马特研究成果汇编”。

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税收和外债，也有大量的论著。常见的著作就有：哈克·耶尼亚的《新编奥斯曼土耳其债务史》[⑤]、阿·杜·维拉伊的《土耳其财政史》[⑥]、艾敏内·克拉依的《奥斯曼土耳其的经济结构与外债》[⑦]、勒法特·昂索伊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债务》[⑧]、萨义德·阿彻巴的《奥斯曼政府的外债》[⑨] 等。其他各类专题著作，如费伍兹·德米尔的《奥斯曼国家第二宪政时期议会的议员选举（1908—1914）》[⑩]、穆斯

---

① Halide Aslan, *Tanzimat Döneminde Din Değiştirme Hareketleri, 1839—1876*, Türkiye Diyanet vakfı yayınlar, Ankara, 2010.

② Bilal Eryılmaz, *Tanzimat ve Yönetimmde Modernleşme*, işaret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6.

③ Yurdagül Mehmedoğlu, *Tanzimat Sonrasında Okullard Din Eğitimi, 1838—1920*, Vakfı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1.

④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⑤ Hakkı Yeniay, *Yeni Osmanlı Borçları Tarihi*, İstanbul, 1964.

⑥ A. du Velay, *Türkiye Maliye Tarihi*, Ankara, 1978.

⑦ Emine Kıray, *Osmanlı' da Ekonomik Yapı ve Diş* Borçlar, Istanbul: İlestişim, yayınları, 1995.

⑧ Rıfat Önsoy, *Osmanlı Borçları*, Turhan Kitabevi Yayınları, Ankara, 1999.

⑨ Sait Açba, *Osmanlı Devletinin Dış Borçlanması*, Vadi Yayınları, Ankara, 2004.

⑩ Fevzi Demir, *Osmanlı Devleti' nde II Meşrutiyet Dönemi Meclis-i Mebusan Seçimleri, 1908 - 1914*, İmge Kitabevi Yayınları, İstanbul, Ankara, 2007.

塔法·楚拉克的《恩维尔帕夏：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联盟》[①]、哈伊莱丁·尼德姆·古彻的《奥斯曼土耳其与欧洲》[②]、奥拉尔·桑德尔和库尔坦·费谢克合著的《一百年间（1829—1929）土耳其和美国的军火交易》[③] 等。

土耳其文献包括资料集、通史和断代史，也有回忆录、人物传记。通史著作主要有：恩维尔·齐亚·卡拉尔的《奥斯曼土耳其史》（多卷本）[④]、亚沙尔·于杰尔的《土耳其史》（3—5 卷为“晚期奥斯曼帝国史”）[⑤]、穆罕默德·马克苏德奥卢的《奥斯曼土耳其史（1289—1922）》[⑥]，罗伯特·曼特兰（著）、塞维尔·塔尼里（译）的《奥斯曼帝国史》（两卷）[⑦] 等。回忆录性质的书籍，如阿里·哈伊达尔·米德哈特的《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回忆（1872—1946）》[⑧]，奥默尔·赛伊芬丁的《巴尔干战争回忆录》[⑨]、《素丹阿卜杜·哈米德的政治回忆录》[⑩]，谢伯奈姆·皮施金的《敬爱的阿卜杜·哈米德素丹（汗）》[⑪]、内支梅丁·萨希尔·瑟兰的《第二宪政及宪政后的回忆》[⑫]，加里普·瓦尔达尔（口述）、萨米赫·纳菲兹·坦苏（笔录）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归国成员》[⑬] 等。

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存在的问题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太多。不

---

①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② Hayredin Nedim Göçen, *Osmanlı ve Avrupa*, Selis kitaplar, İstanbul, 2008.

③ Oral Sander, Kurthan Fişek, *Türk-ABD Silah Ticaretinin İlk Yüzyılı*, İmge Dağitim, İstanbul, Ankara, 2007.

④ Enver Ziya Karal, *Osmanlı Tarihi*, Vol. Ⅴ—Ⅸ,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5.

⑤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Ⅲ—Vol. Ⅴ,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⑥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⑦ Robert Mantran, Çeviren: Server Tanilli,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Ⅰ—Ⅱ),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⑧ Ali Haydar Midhat, *Osmanlı' dan Cumhuriyet' e Hatıralarım*, *1872—1946*, Bengi Kitap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8.

⑨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⑩ *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ıratım*, Hareket Yayınları, İstanbul, 1974.

⑪ Şebnem Pişkin, *Sevgili Abdülhamit Han*, Topkapı, İstanbul, 2011.

⑫ Necmeddin Sahir Sılan, Ⅱ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⑬ Galip Vardar (Anlatan), Samih Nafiz Tansu (Yazan), *İttihad ve Terakki içinde Dönenler*, Inkilap Kitabevi, Istanbul, Ankara, 1960.

仅仅土耳其本国和中东其他国家有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学术机构，英国、美国、法国、俄国都有研究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的学术机构，每年有大量的论著问世。客观地说，翻译和介绍外文书籍的难度已经很大，要深入研究谈何容易。奥斯曼帝国时期官方通用的文字是阿拉伯文（即借用阿拉伯文字表达土耳其语言）。当时，在阿拉伯行省流行不同方言；在巴尔干半岛，使用希腊语、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等几十种语言；晚期奥斯曼的官方文件，除了阿拉伯文，也使用英文和法文。细究起来，要把疆域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几百年的历史资料都弄清楚几乎没有可能。好在土耳其国内外的学者用现代土耳其文（1928 年创造并推广）和英文、法文写出了多种奥斯曼帝国的通史、断代史、专门史；那些经历晚期奥斯曼帝国的退位素丹、退役将军、离开政坛的政治家，留下了不少回忆录；有的土耳其专家花费很大功夫对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文献做了土耳其文翻译（形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对照本），为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三）

本书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历史，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危机；行省和属地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开端；奥斯曼帝国的内部调整和持续改革；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对外关系以及行省和属地的丧失；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和帝国的西化；从第二次宪政到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涉及的基本问题有：第一，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停滞、军事失败与边疆危机；第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腐败及其根源；第三，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及其受挫的原因；第四，穆罕默德·阿里治理埃及行省以及挑战素丹权威；第五，马哈茂德二世推行全面改革的成效；第六，希腊的独立及其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第七，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进程；第八，克里米亚战争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意义；第九，“近东危机”与巴尔干问题的实质；第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领域的西化；第十一，“土耳其革命”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得失；第十二，从“波斯尼亚危机”到两次巴尔干战争；第十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斯曼帝国。

晚期奥斯曼帝国史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本书重点探讨以下

问题：

第一，关于帝国经济和军事的衰落。

如果以1699年的《卡洛维茨条约》作为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而帝国的瓦解则是在1918年被协约国占领（法理上的“亡国”是1922年穆罕默德六世退位），奥斯曼帝国从开始衰退到最后灭亡，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衰退”的过程。在如此“漫长衰退”的过程中，这个军事帝国经历了哪些军事失败？这个帝国的经济衰退有哪些特征？

第二，关于行省和属地分离的开端。

法军入侵埃及行省给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统一埃及的机会；然而穆罕默德·阿里两次挑战奥斯曼素丹的权威，埃及成为第一个半独立的行省。希腊人掀起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斗争，演变为持续10年的独立战争，希腊最终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阿里为什么要挑战奥斯曼素丹的权威？两次埃土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如何？希腊独立战争对奥斯曼帝国有何影响？

第三，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

粗略地看，统治阶层中长期以来真正了解西欧的人，真正想要学习西欧的人占少数，面临危机时，奥斯曼帝国国内认识到改革必要性的人并不多。奥斯曼帝国的改革遭受挫折，几乎每次改革都没有达到目标，改革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但换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前仆后继：阿卜杜·哈米德一世的改革受挫，塞利姆三世接着实行改革；塞利姆三世被废黜了，马哈茂德二世接着进行更坚决的改革；马哈茂德二世去世，阿卜杜·麦吉德和阿卜杜·阿齐兹的改革和整顿范围更广、力度更大；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处置改革家米德哈特帕夏，但并没有停止改革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他统治的33年里在引进外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改革的过程是艰难的。推行改革时最高统治者也会受军队挟持，遭到乌勒玛反对，被迫废除改革法令，甚至被军人从君主宝座上推下来。然而，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精英总是认准西方文明可以挽救帝国，不论成败，奥斯曼帝国上层面对西方的冲击采取了积极应变措施，变革的努力总是坚决的、强劲的。为什么会这样？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围绕“东方问题”，欧洲大国在奥斯曼帝国展开的争夺。

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属地的问题本来是内政，却屡屡遭受欧洲大国干

涉，变成“国际问题”。欧洲大国的干预，加快了这些属地脱离奥斯曼帝国的进程。而且，奥斯曼帝国与西欧关系的微妙变化，呈现出不同于“国际关系通例”的特征。如何看待这些差异？从“东方问题”产生之日起，几乎每一次危机都涉及地缘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变迁，最后的结果如何？

就在巴尔干属地的叛乱引起国际效应，听任欧洲大国安排的时候，帝国的北非属地和行省也不安宁，法国扩大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并占领突尼斯，英国吞并埃及行省，北非大片土地不再归奥斯曼帝国所有。仅几年之内（1874—1882 年）奥斯曼帝国的版图陡然缩小，内政恶化、外交失利，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需要仔细探讨。

第五，关于哈米德二世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领域的西化。

通史中把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描述成暴君、独裁者，突出了他屠杀亚美尼亚人、放逐改革派大臣等劣迹，几乎不提当时西化改革的成果。其实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当政的 33 年（1876—1909 年）里做了许多事情，有大事有小事，有政绩也有劣迹，有残暴也有忍让。哈米德二世政治上专制，但他并没有停止西化改革，也没有向西方国家一味地妥协退让，尤其在发展经济、改善交通等方面做了较大努力，取得了成效。如何评价哈米德二世，需要尊重历史事实。

第六，关于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宪政时期的内政外交。

奥斯曼社会的危机最终导致 1908 年“土耳其革命”的发生，素丹被迫恢复 1876 年的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从 1908 年到 1918 年被称为“第二次宪政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后，为什么内部权力斗争不断？这一时期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被奥匈帝国吞并，意土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失败，巴尔干同盟国挑起战争，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失败，巴尔干地区几乎完全脱离奥斯曼帝国。一年后当政者为什么错误地选择与德国结盟？

对于晚期奥斯曼帝国史一些具体问题，本书坚持这样几个原则：首先，不纠缠于“外因为主”还是“内因为主”的分歧。其次，把晚期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症结归之于基本的社会矛盾，具体到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历史阶段，分析统治政策或改革措施的实际效果（看其是否理顺了各种利益关系）。最后，不主张用现成的“边缘——中心”理论去“套”奥斯曼帝国与西欧关系。分析不同阶段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不同国家的关系，肯定

奥斯曼素丹在处于弱势时所做的外交努力。

研究奥斯曼帝国时，还涉及一个“立场”问题。比如，奥斯曼帝国少数民族的反抗，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看，是民族解放，是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正义行为；站在奥斯曼帝国的立场看，就是“叛乱”或“暴动”，政府考虑的是如何镇压这些叛乱分子。对于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而言，如何客观地叙述和评价这些历史事件，需要慎而重之。外国的插手和政治阴谋一定要谴责，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站在“第三方”的研究者，很难在“民族解放”和“叛乱”之间找到一个中性词，只能在具体情境下选择用词。对那些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欧洲大国，本书所持的立场是：指出它们以武力和外交手段并用，打压和欺瞒弱国的行径，但在概念上，尽量选择中性词，对充满控诉口气的反侵略反霸权的“革命话语”引用不多。这样处理，仅仅是出于客观历史研究的需要，特此说明。

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中叶攻陷君士坦丁堡，到16世纪初占领叙利亚和埃及，通过一连串的辉煌胜利，在东部地中海建立起霸权，并一度威胁到中欧国家，尤其苏莱曼大帝时期（1520—1566年）达到极盛。苏莱曼大帝时代的辉煌过后，奥斯曼帝国出现衰退迹象，而军事扩张并未停止。到1699年之后，不再有大规模征服战争，帝国基本上采取守势了。这个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一旦失去通过掠夺获得财富的途径，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衰弱是不容置辩的事实，而学术界长期讨论并且争议不断的倒是16至17世纪是否衰落。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有西方学者目睹奥斯曼帝国出现衰落的征兆，指出"奥斯曼帝国已经进入一个衰落阶段"。到了20世纪有一大批学者探讨16—17世纪奥斯曼衰落的问题。[①] 传统观点是：自苏莱曼大帝之后奥斯曼帝国就进入一个长期的军事日益退化、政治日益腐败的过程。近年有一些研究者提出：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衰退，所谓"奥斯曼帝国衰落"只是一个神话。这样一来，各种说法反倒妨碍了我们弄清楚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②]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问题，真正讨论起来就得弄清楚以下内容：第一，判断奥斯曼帝国衰落与否，是对帝国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欧洲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如果是前者，就要探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倒退？如果是后者，就要探究奥斯曼帝国没有赶上西欧发展步伐的原因，或者差距究竟

---

① 如 Mehmet Öz, Bernald Lewis, Linda Darling, Gábor Agoston, Daniel Goffman, J. Hathaway, Karen Barkey, Dina Khoury, Leslie Peirce, Gabriel Piterberg, Madeline Zilfi 等等。

② Baki Tezcan, "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3, May 2009, pp. 490 – 496.

在何处。第二，16—17 世纪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削弱？如果政府权力弱化，是由于地方势力强大，或由于旧军队将领操纵，或由于乌勒玛宗教界反对力量的强大，导致素丹的权威受限，政府权力弱化？第三，如果说16—17 世纪是全世界范围的危机和衰退时期，奥斯曼帝国毫无例外，出现衰落也不奇怪，深究奥斯曼帝国自身发展的问题有没有必要？这种情形如何把握？第四，由于 17 世纪以来的衰落和腐败所以不得不实行改革，这是西化主义者的一贯看法，长期以来被接受。如今有人提出 16—17 世纪没有衰落。既然 16—17 世纪没有衰落，那就只有 18 世纪出现衰退，奥斯曼帝国改革的理由就只是解决“新问题”，为什么改革的难度那么大？后世的改革派一直是为 19 世纪的改革唱赞歌的，因为 19 世纪的改革旨在救治并解除长期以来存在的痼疾。①

不管怎么说，各类看法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在 16—17 世纪错过了发展的历史机遇。不管 16—17 世纪衰落与否，奥斯曼帝国到 18 世纪后期已经不具备保持霸国地位的实力；横向对比，奥斯曼帝国此时已经与欧洲国家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军事失败与边疆危机

在 1683 年时，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领土范围包括安纳托利亚、色雷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黑山（门得内格罗）、希腊、高加索地区、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汉志、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大陆，以及爱琴海诸岛、塞浦路斯岛等。② 今天西亚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保加利亚、马其顿、希腊、阿尔巴尼亚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腹地，而沙特阿拉伯汉志地区、也门西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匈牙利、摩尔多瓦、乌克兰南部、阿尔及利亚北部，历史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边疆行省或属地。这样广阔的

---

① 按照新观点，19 世纪改革的意义就大打折扣，那些穆斯林民主派就可以批评从马哈茂德二世到坦齐马特时代的“独裁式现代化”。因为，提出新观点的学者认为，16—17 世纪奥斯曼政府已经是“有限政府”，相比之下，19 世纪的改革者总是加强中央权力，以改革的名义推行独裁。详见：Baki Tezcan, “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3, May 2009, p. 499。

② Enver Ziya Karal, *Osmanlı Tarihi*, Vol. Ⅴ, Türk Tarih Kurumu Basimevi—Ankara, 1995, s. 1.

领土并非连成一片，而是被爱琴海、亚得里亚海、黑海、马尔马拉海、红海等隔开，形成类似章鱼的不规则形状。安纳托利亚连同两河流域、叙利亚构成一整块，巴尔干地区是一整块，而北非从埃及向西至阿尔及利亚北部，像一条伸出去的长腕；沿着红海伸展到也门，形成另一条长腕；从波斯湾西南岸延伸到今阿联酋边界是一条短腕。

奥斯曼帝国向欧洲逐步推进时，几乎所向披靡，曾对欧洲构成极大的威胁。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候，"基督教欧洲正在开展海外扩张，这座城市的失守，使欧洲人一下子感觉到自己处于屈辱的最危险的防守地位"。[①] 到苏莱曼一世时期，奥斯曼帝国拥有辽阔的疆土（约 450 万平方公里）和 1400 万人口，而这时的西班牙仅有 500 万人，英格兰仅有 250 万居民。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在全盛时期拥有 50 万以上的人口（1600 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②] 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陆上和海上对欧洲造成的军事压力，使欧洲人对穆斯林产生普遍敌意，欧洲的反土耳其恶意宣传不断增加。西欧渲染土耳其人反基督教文明的暴行，西欧知识分子制造舆论，说"土耳其人把异教伊斯兰的威胁带到了基督教西方的大门口"。[③] 各种耸人听闻的文学书也在欧洲流行。这表明，奥斯曼帝国被看作一个要称霸的危险国家。

但不得不承认，奥斯曼帝国依赖军事优势而拓展疆土，在征服地区所建立的统治并不稳固，有的地区只是名义上接受了素丹统治，连原有的管理机构也没有更换。而且，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彻底夺得摩洛哥、直布罗陀，没有取得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也未能主宰地中海。在东方，奥斯曼帝国未能征服波斯。有波斯这样一个无可逾越的"障碍"，土耳其人无法取得通向印度和印度洋的据点。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虽然疆域辽阔，横跨三大洲，但是土耳其人既不能走向大西洋，也不能进入印度洋，仅仅是在西亚、北非和东欧的三块陆地上活动。奥斯曼帝国拥有黑海、地中海、红海，却不是海洋国家，占据欧亚非三洲的连接处，却不是哪一洲

---

① H. G. Koenigsberger, *A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Medieval Europe 400—1500*, Longman House, Harlow Essex, England, 1987, p. 340.

②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13 页。

③ David Nichol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1300—1600*,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80 - 281.

的霸主。

一　17世纪晚期的对外战争及领土丧失

奥斯曼帝国疆域1683年达到最大，而丧失疆土也从这一年开始①。1683年围攻维也纳失败，损失严重。1684年和1685年，佩斯城以及匈牙利北部的大片地方被奥地利军队占领。1686年6月，布达城也被奥地利军队攻占。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中军粮不足，军服和武器短缺，军饷拖欠，士兵发生多次哗变，大维齐和高级将领从前线跑到贝尔格莱德。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南部的军队难以守住阵地，溃败并后撤。奥地利军队把奥斯曼军队驱逐出匈牙利。

随着领土的大片丢失，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涌向帝国境内。从战场上溃败的士兵，或者临阵脱逃的士兵，一路抢劫，给巴尔干地区的民众带来灾难。奥斯曼政府大量征兵，又不断增加战时税，导致反抗情绪上升，国内政治形势严峻。

1684—1687年，波兰人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越过德涅斯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奥斯曼军队打败了波兰军队。1696年，亚速城的守军向俄国军队投降，俄军占领亚速。

1685—1687年，威尼斯人进攻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奥斯曼帝国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战斗中失败，但打败了进攻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军队。

1687年，威尼斯人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上，于9月25日占领雅典，破坏了帕特嫩神庙等古典建筑。不久，威尼斯舰队占领勒班陀。

同年，奥地利军队向奥斯曼帝国守卫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军队发起攻击，奥斯曼军队溃败，四散逃走。奥地利军队从莫哈奇（*Mohaç*）一路杀向贝尔格莱德。1688年9月8日，奥地利军队占领贝尔格莱德，打

---

①　说明：奥斯曼帝国在对外征服所向披靡的时代也有惨重失败，如1571年土耳其海军在勒班陀（Lepanto）被西班牙等国的联军打败。土耳其人后来重建海军，恢复对地中海的控制权。1606年奥斯曼军队被奥地利打败，在锡特瓦图卢（Sitvatorok）签订条约。这个条约使奥地利免除了每年向素丹缴纳的贡金，关键是，“土耳其人第一次被迫平等而非蔑视地对待欧洲的统治者”。不过，这几次军事失败之后没有丧失领土。详见：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80。

开了通向巴尔干半岛的门户。[①] 1688—1689 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发生起义，反抗奥斯曼政府，等于是援助了奥地利军队。奥斯曼帝国寻求和谈未成。1689 年 6 月，奥地利军队进入波斯尼亚。7 月至 11 月，奥地利军队先后占领尼什(Niş)、维丁（Vidin)、斯科普里（Skopje)、普里兹伦（Prizren)。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的奥地利军队与当地的贵族达成协议。按照协议，这两个公国表示愿意承认奥地利的宗主权，奥地利允许这两个公国拥有自治权，享有宗教自由。[②]

1690 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收复尼什和贝尔格莱德。1691 年，奥斯曼军队从贝尔格莱德出发，跨过多瑙河，准备袭击奥地利军队，但在斯朗卡门（Slankamen）遇到埋伏，损失惨重，奥斯曼军队统帅被射死，军队溃散。自斯朗卡门遇袭之后，奥斯曼帝国军队未能组织反攻，奥地利人也忙于中欧的事务，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1695—1697 年，奥斯曼素丹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 年）发动了三次战争。最后一次（1697 年)，奥斯曼军队在桑塔（Zanta）与奥地利军队激战，发生了有名的桑塔战役，奥斯曼军队被奥地利军队彻底击败，从此彻底失去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以北的大片土地。[③] 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国内也出现政治危机，再也没有能力发动战争，只能寻求和谈。1699 年，奥斯曼帝国与荷兰、俄国、奥地利、威尼斯、波兰在贝尔格莱德以北的卡洛维茨（Karlowitz）谈判，并签署《卡洛维茨条约》[④]。

根据《卡洛维茨条约》，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归奥地利，泰梅什堡(Temesvar）归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以蒂萨河（Tisza)、萨瓦河（Sava）和翁纳河（Unna）一线为新的边界。达尔马提亚、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上的重要岛屿归威尼斯，勒班陀和艾因纳马夫拉

---

①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Ⅲ,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218.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20.

③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Ⅲ,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226 – 228.

④ 英文名 The Treaty of Karlowitz。地名 Karlowitz 被译为“卡洛维茨”或者“卡尔洛维茨”，条约名称相应也有两个。而土耳其文的条约名称为 *Karlofça Antlaşması*（《卡尔洛夫察条约》），或者 *Karlofça Barış Antlaşması*（《卡尔洛夫察和平条约》）。

(Aynamavra) 归奥斯曼帝国。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划归波兰。[1] 根据《卡洛维茨条约》和 1700 年的俄国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单独条约，俄国取得了亚速海和德涅斯特河地区。

一般认为,《卡洛维茨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此前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采取攻势，此后转入防御；此前占据欧洲大片领土，奥斯曼帝国的前哨在匈牙利北部，此后退到多瑙河一线。奥斯曼土耳其人在 1699 年之后的几乎所有战争中都不同程度地丧失土地，他们被动地保卫着剩下的领土，素丹控制的领土越来越少。后世的历史学家把 1699 年作为帝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是有道理的，不过，《卡洛维茨条约》只是 1683—1697 年的几次战争失败的结果，而奥斯曼帝国衰落，应从 1683 年的维也纳失败算起。

二 18 世纪军事上的失败及边疆危机

历史进入 18 世纪，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强敌主要是崛起的俄国，因而，奥斯曼帝国与外国的战争主要是与俄国的战争，而且大都以失败告终。

俄国早在沙皇伊凡四世（1533—1584 年）时期就尝试南下扩张，与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和北高加索地区公开冲突。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俄罗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卷入哥萨克人和鞑靼人之间的边界争端，大大小小的纠纷和武装冲突没有间断。从彼得大帝（1682—1722 年）时代起，俄国把南下夺取黑海作为战略目标，奥斯曼帝国的厄运就来了。[2] 在尽力抵抗俄国入侵的同时，奥斯曼帝国还与威尼斯、奥地利、波斯等国交战，帝国的边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18 世纪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奥地利、威尼斯、波斯之间发生的主要战争。

（一）1710—1713 年与俄国的两次战争

战争的起因是俄国打败瑞典（1709 年 7 月），瑞典王查理十二世越过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24;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Ⅲ,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236 - 237.

② 俄国从 1696 年占领亚速，到 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十几次战争。1696—1812 年的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几乎都是失败的。俄国起初是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后来单独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

波兰逃到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庇护查理十二世。俄国于1710年12月20日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煽动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民众反抗土耳其人统治。奥斯曼帝国也在同一天对俄宣战。鞑靼人和哥萨克人于1711年2月订立联盟，合力反抗俄国人，打乱了彼得一世的军事计划。奥斯曼帝国军队跨过瓦拉几亚向摩尔达维亚进攻，俄国军队北撤。俄国提出和谈，并答应归还已占有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双方于1711年7月23日签订《普鲁特条约》。[1] 根据条约，俄国归还先前得到的奥斯曼帝国领土，答应拆除边界堡垒，承诺不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奥斯曼政府同意俄国商人在帝国境内自由贸易。奥斯曼帝国内部有一派主张乘机向奥地利发起进攻，夺回失去的土地；另一派主张发动对俄国的新的战争。法国、瑞典、波兰等国也鼓动奥斯曼帝国对俄一战。1713年4月30日，素丹艾哈迈德三世向俄宣战，但这场战争匆匆结束，双方于6月5日签订了和平条约。

（二）1714—1718年与威尼斯和奥地利的战争

与俄国签订条约一年后，1714年12月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的战争爆发。1715年5月，奥斯曼帝国军队顺利地夺回被威尼斯占领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然后北上，准备向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进军。奥地利不会坐视不管，于1716年4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统率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大维齐过于轻敌，采取分兵出击的办法，结果主力部队被奥地利军队打败。第二年发生在塞尔维亚北部的几次战役中，奥斯曼帝国军队连吃败仗。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的战争1715年获得小胜利，而与奥地利交战时于1717年遭到失败。[2] 奥地利军队不但占领泰梅什堡，而且于8月攻占贝尔格莱德。奥斯曼帝国军队数万人做了俘虏，大炮、火药、军用物资全部丢弃。塞尔维亚北部的领土被奥地利占据。威尼斯军队从另一方向攻击波斯尼亚的奥斯曼军队，夺占普雷韦扎（Preveze），登陆达尔马提亚。不过，奥斯曼帝国军队守住了伯罗奔尼撒半岛。英国和荷兰的外交官出面调解，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于1718年7月21日在帕萨罗维茨（Passarowitz）签订条约。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30.

②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Pearson Longman, Harlow, London, the U. K., 2007, p. 83.

（三）1723—1746年与东部邻国波斯的三次战争

1723—1725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先后攻入伊朗高原和高加索，一度占领提弗里斯（Tiflis）、库里（Kuri）等地。根据1724年7月签订的协定，奥斯曼帝国控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1732年又签订条约，规定高加索由奥斯曼帝国控制而阿塞拜疆归波斯管辖，奥斯曼帝国和波斯都对条约的规定不满意，1733年波斯军队攻入高加索，占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①] 1742—1746年，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之间发生第三次战争，这次战争中没有哪一方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1746年9月双方签订条约。按照条约划分边界线。奥斯曼帝国同波斯的战争时断时续，战争规模有大有小，但奥斯曼土耳其人未能保持在波斯战场上获得的土地。

（四）1736—1739年与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

俄国与奥地利签订秘密的协定，然后指责奥斯曼帝国违背了《普鲁特条约》。奥斯曼素丹在法国怂恿下持强硬态度。于是，1736年5月爆发了与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俄国对战争有充分准备，奥斯曼帝国则军事准备不足，战争开始就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俄国军队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亚速，后来又撤出。1737年，俄军越过德涅斯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奥斯曼军队坚决还击，俄军后撤。奥地利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尼什、萨拉热窝，占据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军队一度击败奥地利军队，夺回尼什。[②] 1738—1739年，奥斯曼帝国军队与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展开多次激烈争夺战，从奥地利军队手中夺回贝尔格莱德等城市，但俄国军队占领雅西，控制摩尔达维亚。总体来说，这场战争中，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争夺黑海以北地区，与奥地利争夺巴尔干西北部，尼什、贝尔格莱德、亚速等城市几次易手。而且，1737—1739年发生了瘟疫，病死的士兵比战死的士兵多。1739年签订《贝尔格莱德条约》后，俄国从摩尔达维亚和克里米亚撤军。俄军和奥斯曼帝国军队损失都很严重，俄军死于战争和疾病的人数大约6万，而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伤亡则无法估计。[③]

---

①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Ⅳ,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4–5.

②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Ⅲ,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14.

③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Pearson Longman, Harlow, London, the U. K., 2007, p. 112.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1740—1768 年之间有 20 多年的“和平间歇”，帝国没有受到外敌入侵。当时恰逢欧洲人忙于战争（1740—1748 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奥斯曼帝国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是马赫穆德一世（1730—1754 年）、奥斯曼三世（1754—1757 年）和穆斯塔法三世（1757—1774 年），这几位奥斯曼素丹政绩平平，但统治期间奥斯曼帝国边境是安宁的。[①]

（五）1768—1774 年与俄国的战争

这次战争的起因是 1764 年俄国占领波兰，波兰求助于奥斯曼素丹。奥斯曼素丹在法国支持下要求俄国军队撤出波兰，俄皇叶卡特琳娜（1762—1796 年在位）拒绝，1768 年 10 月双方爆发战争。

战争涉及的范围广，给奥斯曼帝国造成的损失大。当时奥斯曼帝国军队人数达到 40 万，[②] 可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穆罕默德·艾敏（Mehmet Emin）不懂军事，没有制定出恰当的作战计划，再加上奥斯曼帝国后勤保障不足，军队纪律涣散，战斗力很差。对手俄国军队装备良好，军队士气高，而且还采用攻心战术，煽动鞑靼人内讧，并支持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1769—1770 年，俄国军队攻入摩尔达维亚，挺进瓦拉几亚，于 1770 年 2 月占领布加勒斯特。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军队交战，处处被动，8 月 1 日在卡尔塔尔（Kartal）战役中，三分之一的奥斯曼军人死在战场上，另三分之一的士兵在溃逃时淹死于多瑙河里。[③]俄国军队以凌厉的攻势占领多瑙河两岸的公国，兵锋直指保加利亚。同时，俄国和奥斯曼帝国舰队在地中海作战，奥斯曼帝国舰队受到重创。在克里米亚地区，俄国赢得胜利，当地的王公投降俄国。在高加索地区，俄国取得绝对优势，奥斯曼帝国军队也吃了败仗。此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方寸大乱。在 1773 年科兹卢扎（Kozluca）战役遭受严重失败后，奥斯曼素丹被迫求和。

俄国要不是 1773 年爆发普加乔夫起义，叶卡特琳娜不会同意谈判。

---

① 没有外敌入侵，也没有对外战争，但奥斯曼帝国国内腐败凸显，社会上物价上涨，食物短缺，失业人数剧增；同时，盗贼横行，贵族犯上作乱；瘟疫流行。详见：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Cambridge Univ. Press，1976，p. 246。

② Virginia H. 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Harlow，London，the U. K.，2007，p. 49.

③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Cambridge Univ. Press，1977，p. 248；Yaşar Yücel，Ali Sevim，*Türkiye Tarihi*，Vol. Ⅲ，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1992，s. 50. 说明：在各种资料中，关于奥斯曼帝国军人伤亡的数字差异较大。

1774 年 7 月 21 日，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在保加利亚境内的库楚克—凯纳尔扎（Küçük Kaynarca）签订条约，这就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又一个屈辱条约《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①]。在这场持续六年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损失惨重，而《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使奥斯曼帝国失去更多权益。

根据条约，奥斯曼帝国同意俄国占据基尔布伦恩（Kilburun）、顿河河口的塔甘罗格（Taganrog）、亚速海进入黑海的刻赤海峡（Kerch）和耶尼卡莱（Yenikale），还有黑海南端的大卡巴尔达（Greater Kabarda）和小卡巴尔达（Lesser Kabarda），俄国由此控制了第涅伯河河口，黑海北部海岸不再为奥斯曼素丹所控制。奥斯曼素丹收回奥扎科夫（Ochakov）、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阿基尔曼（Akkirman）等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恢复原来的地位。[②] 黑海向俄国开放，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俄国商船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条约规定，俄国有权“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奥斯曼素丹名义上还是克里米亚地区的宗主，但这一地区已被俄国控制。

《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为俄国以保护基督徒为名进入巴尔干地区铺平了道路，打开俄国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大门。[③] 俄国把领土扩张到黑海，黑海从此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在 18 世纪所有对外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在 1768—1774 年战争（及战后条约）中的损失最严重。

就在结束与俄战争的这一年（1774 年），波斯人偷袭安纳托利亚东部，并一度占领伊拉克地区的城市巴士拉（1776 年）。哈米德一世从伊拉克派兵抵制波斯人的入侵，费了好大劲才把占领巴士拉的波斯军队赶出去。

（六）1779 年俄国吞并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可汗统治区的版图包括克里米亚半岛、黑海以北的广袤草原以及从比萨拉比亚延伸到北高加索的范围。克里米亚可汗统治区是奥斯曼帝国黑海地区的一个屏障。整个 15 至 18 世纪，克里米亚可汗统治区（受

---

① The 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 这个名称，在国际关系史文献中被译为好几种，如《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等。如果按照土耳其文的含义，Küçük Kaynarca 作为地名可以译为“小凯纳尔扎”。

②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Harlow, London, the U. K., 2007, pp. 158 - 159.

③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55.

到奥斯曼帝国支持）构成东欧政治的一支主要势力。在18世纪沙俄帝国的扩张计划中，就有消灭克里米亚可汗并获得克里米亚领土的想法。克里米亚半岛是扩张主义者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理想阶梯。克里米亚具有明显的战略、军事、经济重要性，致使沙皇制度下的独裁政治家梦想得到这块半岛及半岛以北的腹地。[①] 在1768年的战争发生时，奥斯曼帝国期望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支持帝国军队，但俄国人挑拨鞑靼人发生纷争，鞑靼人未能帮助奥斯曼帝国。在70年代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再次发生战事时，俄国人入侵克里米亚。奥斯曼帝国试图恢复素丹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但俄国先发制人，1778年俄国军队迅速进入克里米亚，屠杀叛乱者，占领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②] 奥斯曼帝国妥协，承认俄国支持的沙欣·吉拉伊为克里米亚可汗，俄国暂时撤军。

1779年1月，俄皇叶卡特琳娜实现自己的愿望，俄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这是历经十几年战争和流血冲突之后，俄国获得的成果。1784年1月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条约，承认俄国兼并克里米亚的事实。克里米亚被俄国所吞并，对于克里米亚鞑靼人来说，不仅仅标志着丧失了独立，也是鞑靼人向奥斯曼帝国移民的开始。此后几十年，克里米亚大量穆斯林移居奥斯曼帝国境内。俄国统治者认为，移民是有好处的——将会使得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上没有不受欢迎的人口。俄国统治克里米亚后，鼓励斯拉夫人（或者至少是基督教移民）在半岛上殖民。[③]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失去克里米亚有唇亡齿寒之感。北方屏障消失，必然与俄国为邻，虎狼在侧，难有安宁之日，帝国边疆的危机加重。

（七）1787—1792年与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

吞并克里米亚刺激了叶卡特琳娜的野心，她决定拓展对外扩张的范

---

① Hakan Kirimli, "Emigrations from the Crimea to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08, p. 751.

②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Harlow, London, the U. K., 2007, p. 159.

③ 虽然克里米亚大部分鞑靼人在奥斯曼帝国被给予亲属般的同情。据记载，战争中他们从没有出现过叛乱，但在许多次战事中，俄方用非常严格的手段去控制这个潜在的“不可靠”因素。在18至19世纪，俄国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几乎每20年就会发生一次，在此类移民过程中，战争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在俄国统治克里米亚的70年（1784—1853年）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受到极大的压迫，后来，在半岛上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鞑靼人实际上演变成第二等级的臣民。详见：Hakan Kirimli, "Emigrations from the Crimea to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08, pp. 751－752。

围，并给予奥地利和威尼斯等国补偿，于是形成了一个“希腊计划”，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由俄国人主宰的“希腊人”帝国，把奥斯曼帝国从巴尔干驱逐出去。补偿方案是：把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等地划给奥地利，把伯罗奔尼半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划给威尼斯。俄国很快采取具体行动，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和第涅伯河河口的赫尔松建立海军基地，鼓励希腊海盗在爱琴海袭击奥斯曼帝国舰队。

俄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激起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愤怒，1787 年 8 月 14 日，奥斯曼素丹向俄国提出，俄国应该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撤军，否则就要兵刃相见。欧洲大国调解失败，三天后（9 月 17 日）俄国宣战，两国战争爆发。[①] 1788 年 2 月奥地利参战。

其实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准备都不充分，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斗起初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奥地利军队先后占领波斯尼亚和摩尔达维亚北部，1789 年打开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的通道，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俄国军队乘机进入瓦拉几亚。从当时的战争形势看，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完全可能彻底打败奥斯曼军队，似乎要向伊斯坦布尔进军了。此时欧洲局势出现新问题，法国革命不断扩大，瑞典入侵芬兰，欧洲大国主张尽快结束在东方的战争。[②] 1791 年 8 月，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签订条约，奥地利从已经占领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摩尔达维亚等公国撤军，等于是维持了原来的领土边界。奥斯曼素丹承诺改善国内基督教民众的地位，同意接受奥地利对这些基督教臣民的保护。1791 年 4 月，俄国军队击溃了奥斯曼帝国驻守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军队，奥斯曼帝国再也无法组织抵抗，塞利姆三世被迫接受欧洲大国调解，1792 年 1 月 8 日与俄国签订《雅西和约》。

《雅西和约》认可 18 年前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的主要条款，在条约中奥斯曼帝国承认俄国拥有对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的主权，也同意两国以德涅斯特河为新边界，俄国同意从多瑙河公国撤出军队。[③]

---

①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Ⅲ,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85.

②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Harlow, London, 2007, pp. 163 - 165.

③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60.

这次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战场上严重失败，但战后的条约为奥斯曼帝国挽回了一些损失，比如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仍归奥斯曼帝国，俄国暂时放弃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等公国的控制。欧洲大国的干预起到有效作用，否则，这场战争的后果不堪设想。[①] 重要的是，尽快结束战争，给奥斯曼帝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就是在《雅西和约》签订后展开的。

（八）1798 年法国拿破仑军队入侵埃及行省

奥斯曼帝国北方边疆的战事停止只有六年，位于帝国西南的埃及行省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1798 年 7 月，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很快攻克亚历山大和开罗，占领埃及全境。这一消息让奥斯曼素丹和高级官员非常震惊，因为奥斯曼帝国与法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早在 1535 年两国就签订过通商条约，1740 年又签订新条约，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拥有许多特权。比如，法国人可以在黎凡特地区扩大贸易，从事宗教活动；法国的耶稣会士、天主教修士在这里从事传教活动受到奥斯曼政府保护。黎凡特地区的城市里建有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学校和教堂。[②] 奥斯曼土耳其人无论如何想不到，法国会直接侵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素丹一怒之下没收帝国境内的法国商业资产，羁押政府中亲法的大臣，并与英国和俄国结盟以示抗议。拿破仑军队试图攻占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奥斯曼帝国地方守军奋起抗击，拿破仑阴谋并未得逞（后文详述）。尽管法国军队很快被赶出埃及，但奥斯曼帝国的埃及行省从此不再安宁。

三 军事失败引起的严重后果

很显然，1683—1798 年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不断经受失败，帝国疆域也在缩减。不过，单从领土和人口的减少来看，情况并不严重。1800

---

① 在 18 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奥斯曼素丹几次失去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等地区的有效控制。奥斯曼帝国全力抵制俄国向南的扩张，毕竟力量有限。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把俄国的扩张看作对自己近东利益的威胁，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使俄国的野心未能实现。其实，俄国政策的小目标是使自己面对来自巴尔干地区和海峡地区的攻击能保证自己安全，大目标是控制巴尔干地区以至君士坦丁堡，完全控制土耳其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详见：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Mayflower，London，1959，p. 54。

② Wayne S. Vucinich，*The Ottoman Empire*，*its Record and Legacy*，Princeton，Van Nostrand，1965，p. 83.

年前后的奥斯曼帝国，从表面看“领土仍然辽阔，从阿尔及利亚到也门，从波斯湾到高加索，从厄立特里亚到巴士拉；人口达到3000万”。[①] 问题是，一个庞大的靠征服而存在的帝国，停止征服本身就是倒退。而领土丧失，军事力量衰弱，带来连锁反应。

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停止了对外扩张，也就失去了优势，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面临新的考验。奥斯曼帝国原来依靠征服发展和壮大，例如：通过征服开辟新土地，蒂玛（采邑）制度得以顺利实行，农业生产得以扩大；通过征服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获得大量劳动力；当帝国的“事业”越来越大时，官僚政治和宗教活动随之扩大，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职位；帝国的领土范围越大，服兵役、服劳役的人力补充越不成问题。如今对外征服的这一条路断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动摇。

第一，要想得到蒂玛，就只能等待蒂玛持有者死亡才有机会。由于大片土地丧失，给军人授以蒂玛已经有困难。

第二，不断扩大的宗教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在行业萎缩的社会里找不到就业机会，宗教机构也面临危机。政府需要钱，各级官员就放手勒索民众。

第三，持续的战争而引起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经济本来已经衰退的奥斯曼帝国出现财政枯竭。

第四，到18世纪末，奥斯曼政府能有效控制的只有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等地。由于帝国军事力量的减弱，也由于素丹威信的下降，一部分“素丹领地”处于半独立状态。

第五，为了应付战争，必须购置武器，必须扩编军队，必须支付薪饷。为此，政府就得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税收的措施，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加深了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混乱。

第六，领土大片丧失，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精神也受到挫伤。16世纪晚期以来的失败和衰弱，与帝国崛起过程中的辉煌和荣耀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创业时条件艰苦，但奥斯曼土耳其人具有好战尚武的精神。君主们亲临战场，身先士卒；战士吃苦耐劳，英勇无畏。在良好的社会风气

---

① M. S. Haniog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

下，从军打仗是年轻人的追求。但一个多世纪的军事失败，挫伤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尚武精神，浇灭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斗志。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看来，军事上的失败，主要是武器不先进、军队战斗力不强，所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很早就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下功夫。其实加尼沙里军（叶尼契里军）[①] 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战斗力。加尼沙里军本来是早年组建的新军队，是一支让统治者信赖的军队。17 至 18 世纪，加尼沙里军队管理混乱，战斗力极差，远不是欧洲军队的对手，屡次败于俄国、奥地利和威尼斯军队。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看到欧洲军队的优势，逐渐认识到欧洲武器先进，于是缩减封建军队，通过引进现代火炮，进行欧式训练等办法，试图改革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

问题在于，军队的建设涉及多方面的条件。比如经济条件：购买武器需要资金，更换装备需要资金，招募新军、增加兵员需要资金，要保障充足的薪饷需要大批源源不断的资金，平时训练需要资金。国家财政空虚，没有资财养兵。又如政治条件：首先要政治稳定，有完善的征兵制度和服役、退役制度，要有良好的军官选拔机制，良好的奖惩机制等。又如社会条件：青壮年的文化教育和道德品质的普遍水准，决定着兵员的素质。奥斯曼帝国强盛时期可以掠夺财富，衰落时期只能搜刮本国农工商各劳动者阶层，据史料记载，帝国财政经常入不敷出，军队薪饷经常拖欠，正常军事费用不能保证。至于帝国政治的稳定、政策的连续性、制度的完整性，兵员的素质都不能与同一时期的欧洲国家相比。所以，奥斯曼帝国历代政治精英的理想，总是不能变为现实。军队变得越来越差，战争一次接一次失败，帝国庞大肌体上的“溃疡”便难以救治。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衰退

一　商业优势的丧失

奥斯曼帝国在商业方面曾占优势，帝国境内各族商人的足迹，远及伏

---

① 英文名 Janissary，译为“加尼沙里”；土耳其文 Yeniçeri，译为“叶尼契里”（一译“耶内恰尔”）。“叶尼契里”（Yeniçeri）本来是奥尔汉于 1362 年组建的土耳其精锐的正规步兵的名称，其含义是“新军”或“新正规军”。后来这支军队逐渐腐化，失去战斗力，到 18 世纪晚期实行军队改革时，这支军队已被称为旧军队。Janissary 也被意译为“禁卫军”、“近卫军”。按照土耳其文 Yeniçeri 译为“叶尼契里”是合适的，但汉译著作中大多按照 Janissary 译为“加尼沙里”军，本书随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尔加河、里海、也门、苏门答腊等地，控制着从也门至印度的贸易，商品和原料顺畅到达奥斯曼帝国各个城镇。但大西洋经济崛起后，欧洲人取得贸易主导权，奥斯曼帝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①] 奥斯曼帝国商业地位的下降，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冲击的结果，这一点，经济史家已有详细的论述。横越大西洋、跨过南非进入南亚水域的贸易路线形成，转口贸易的方向和地点转移，使得东地中海的商业地位降低。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与东方诸国的贸易也发生倾斜，黄金和白银慢慢流入波斯和印度。奥斯曼帝国商人贸易逐步削弱的另一标志是，俄国人取得商业特权，绕过奥斯曼政府直接进行民间贸易，其他列强也取得同样的权力，共同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市场。

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的国际贸易中，不但土耳其人被排除在贸易之外，就是以善于经商闻名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商业活动也在萎缩，无法与欧洲商人竞争。奥斯曼帝国境内经营商业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也逐渐失去商业上的主动权。欧洲人有雄厚的资本，有丰富的商业经验，经营水平高出奥斯曼帝国的商人。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失败后不得不与欧洲国家签署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给予欧洲商人许多特权，打击了奥斯曼帝国的商人——比如犹太人（犹太人就没有得到免税等特权）[②]。17 世纪犹太人逐渐从直接进行贸易活动的个体商人，转变成了包税商或政府的供应商。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而下降，18 世纪时，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商业中所起的作用已无法与以前相比。欧洲大国在波斯等地争夺原料产地，对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商人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亚美尼亚商人无力与欧洲的商人竞争，因为他们通往东南亚和俄国的贸易日趋衰落，他们运送的货物在数量上根本无法与欧洲商人的海洋贸易相比，于是最终失去对原产地的控制。

商业受到冲击以及主动权被外国人控制，帝国境内商贩收入减少，生活贫困化。在政治混乱时期，过往商品关税增加，市场营业税增加，商人的负担沉重。而帝国境内各阶层民众的生活水准下降，消费能力减弱，影

① Re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p. 40 – 48.

② Stanford Shaw, *The Jews of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20.

响了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也影响了商品档次的提高。而且，交通运输方式落后，也制约着商业的发展。政府疏于治理，许多港口和河道淤塞，商船触礁或搁浅的事时有发生，对商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再加上商人在运货途中经常被劫掠，他们不得不等待结伴的商队，否则，商人遭受损失。整个地区的商业受到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①]。

到 18 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贸易全面衰落，不仅在出口贸易方面受损（奥斯曼帝国的海外市场缩小，出口锐减），国内市场也受到外国竞争带来的损害。西方的廉价产品充斥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市场，甚至连原来从近东出口到西方世界的许多产品，也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生产，再由西方的商人卖到这里来。由于东地中海贸易的主动权被西欧人控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贸易逐步削弱。例如，俄国人先取得了商业特权，绕过土耳其首都直接进行民间贸易，其他列强也得到同样的权力，控制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商业市场。奥斯曼帝国面临的现实是：在西方的竞争下本地产业衰退，帝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受国际贸易协定和条约的限制。[②] 奥斯曼帝国商业萧条，商人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二　财政陷入困境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主要财政收入是国内的税收，而税收以土地税和人头税为主要税种。国家的直接税征自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帝国有相对稳定的税收制度，有专门的管理王室和政府财政收支的机构，并能依据一定的法规或原则取得收入、管理开支。这个大帝国是一个军事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实现国家统一，并以武力来强化帝国控制，所以，财政开支中最大的份额之一是军费。财政为军事需要服务，国家税收也相应地服务于这一目标。[③] 帝国晚期失去扩张的能力，但防御性质的战争和维护帝国统治、防止属地分裂的军事行动从未间断，财政服务于军事的性质没有改变。

---

① 有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法禁止高利贷，反对重利盘剥，所以银行贷款业务缺乏，商人的流动资金受限，制约着贸易的规模和范围。尽管埃及等行省允许商人借贷，商人可以想法拥有大量资金，但仍不能和那些欧洲来的商人相比。详见：H. A. R. Gibb，H. 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part 1，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57，p. 301。

② Irvin C. Schich，Ertugrul Ahmet Tonak，*Turkey in Transition*：*New Perspectiv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 9.

③ 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Routledge，London，1998，p. 51.

奥斯曼帝国在处于军事强势并大规模对外征服的阶段，帝国的财政收入依赖掠夺，奥斯曼帝国通过征服获得财富，然后对各种形式的战利品进行分配。自1699年《卡洛维茨条约》之后，奥斯曼帝国军事上节节败退，也就意味着土耳其人失去特有的生财之道，政府只能依赖税收，财政管理不得不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勉强维持，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形可想而知。况且，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管理存在问题：帝国的国库分为公共金库（或国家金库）、王室金库（或内部金库）两部分，实际上这两部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机构，国家财政收支与宫廷财政收支的界限并不严格。原则上，王室金库积储现款和各种财宝，公共金库管理各种税收收入，实际运作中，经常出现混乱。比如，某些应直接归入王室金库的收入，却是由国家财务官征收的；某些后宫的消费性开支和宫廷服务费用应由王室金库支付，但财务官可能从国家金库中支付。[①] 奥斯曼政府实行包税制，当帝国政府效率低下、素丹权威下降时，包税人与地方官吏勾结，中饱私囊，国家财政收入严重受损。

在16—17世纪，奥斯曼帝国经常出现财政危机，奥斯曼素丹们经常会面对财政困境。为增加关税收入，战时防止敌对的一方得到战略物资，以及保证国内主要商品的稳定流通，国家多次对所有贸易路线实行管制；同时，政府严密监控市场，度量衡、物价、利润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定，例如实行市场价格和国家价格两种价格标准等等。此外，人头税不断增加，原来紧急时期才征收的特别税，到17世纪变成向所有臣民征收的年税。尽管如此，国家财政赤字仍在上升，通货膨胀率很高。在国民普遍贫困的情况下，政府向生产者加税，只会加剧社会矛盾。另外，当政府对生产和税收的控制越来越弱时，行省首脑和地方实权人物却有了扩展自己势力和影响的广阔空间。[②] 地主或部落首领控制的区域扩大了，城市直接控制下的农村地区缩小，奥斯曼政府征税的难度增加，国家税收收入减少。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经济衰落，中央政府缺乏对诸行省的控制，不能从行省的获利中征税来改善自身财政状况。[③] 所以奥斯曼政府的岁入难以增加，财政困境一直未见好转。

---

① H. A. R. Gibb, H.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57, p. 1.

② Re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p. 14 - 15.

③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9.

还必须看到，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北部边境不断受到来自俄国的侵略，奥地利试图吞并巴尔干。战争的威胁使奥斯曼帝国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由此增加的军费，加大了奥斯曼政府的财政负担，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三　农业和手工业衰退

一个基本情况是，奥斯曼帝国的农业技术没有进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奥斯曼帝国以及整个中东地区，耕作技术没有改进，简陋的生产工具几百年没有变化。中东地区缺少的是受过教育的农民，这里几乎不具备农作物培育等生产技术改良的条件。[①]

在奥斯曼帝国的农村，包税商任意勒索农民，农民得不到政府保护。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上埃及，有些地方仍保留村社公有土地，而且征收实物税。在伊拉克南部，村民耕种的是小块土地，耕种土地的是半农半牧的牧人或农民。奥斯曼帝国的官僚机构与社会生产脱节。

在奥斯曼帝国，许多游牧民也从事农业，但并非每个部落都转变为农业村落。奥斯曼政府每隔一段时间推出措施，试图使这些游牧民定居。最早的方案产生于17世纪90年代，当时计划要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建立定居区，这项计划并未实现。定居安置往往出于军事需要而非农业生产需要。结果，许多原来的游牧民和半游牧民生活于固定的牧场，却没有获取新的生存手段，只能频繁劫掠村庄和商队。[②] 巴尔干地区还有以军事方式被组织起来的游牧民。在18世纪，奥斯曼政府增强对地方的统治，向伊斯坦布尔移民是不允许的，奥斯曼帝国的农民没有当地政府的许可不能离开村庄。有些地方设置路障以检查行人，即使农民们想进城也受到很大限制。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钻空子，从乡村或小镇中来的移民进入城市，他们随后带来他们的亲戚。在伊斯坦布尔的市场中，尤其是在园艺业工人中，有相当数量从巴尔干乡村来的移民，从农村来的

---

① ［英］伯纳德·刘易斯：《中东：自基督教兴起到二十世纪末》，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68页。

② Suraiya Faroqh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79 – 381.

奴隶的数量也不断增加。[1] 问题是，农业没有任何发展，原来的经济结构没有大的改变。

奥斯曼帝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和牧民人口有多少，没有确切的数字。在安纳托利亚、希腊地区、巴勒斯坦，17 世纪初的政治困境和不正常的气候使人口缩减。基督教徒尤其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人口的减少，具体原因并不清楚，可能是瘟疫、伤寒等传染性疾病造成的。根据奥斯曼帝国各地的人口变化，研究者也发现，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末，埃及等地人口增加，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地人口减少，安纳托利亚等地人口变化不大。人口增长的地区，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主要是由于灌溉系统的维护，或者从国外引进了优良品种，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产品增加。人口减少的地区，农业生产严重下降，主要由于自然灾害频繁，或者农村安全形势恶化，游牧民族不断侵扰，大量土地抛荒。[2]

奥斯曼帝国境内游牧半游牧业占较大比重的地区，牧民生活方式差异较大。在整个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部分地区的牧民，与定居的村民进行物品交换，或者依靠骆驼运输货物，在城里交换和消费，与城市经济建立了紧密联系。居住在沙漠腹地的部落居民与外界的联系有限，仅有的联系是奥斯曼政府管辖范围外的小村庄和绿洲之间的联系，但这里经常受到强势的贝督因人的掠夺。多数情况下，奥斯曼政府为了确保朝觐沿线的安全，尽量与交通沿线的贝督因部落保持良好关系，哪怕是做出一些必要的让步。[3] 但部落居民面临的安全形势并没有根本的改变，生活没有保障。

在叙利亚，除北部外，其余土地都为阿拉伯封建贵族所控制。宗教上层人物和封建贵族剥削农民和佃户。在伊拉克，北部的大量土地掌握在库尔德贝伊手中。库尔德贝伊是典型的封建主，他们要向奥斯曼政府提供兵源，并缴纳贡赋，而土地上的农民和佃户则完全受他们控制。在伊拉克南部仍保留着宗法关系，土地属阿拉伯部族集体所有。许多部族既耕种土

---

① Suraiya Faroqh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78.

②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Methue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1, pp. 4 – 5.

③ Suraiya Faroqh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79.

地，又从事畜牧业。奥斯曼统治者试图消除土地部族所有制，宣布村社土地为国有土地，但遭到抵制，游牧和半游牧的部族拒绝缴纳赋税，所以部族土地所有制没有大的变动。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如巴尔干地区，原来的土地所有制发生转变，蒂玛制度从 17 世纪开始瓦解，有些采邑成了私有财产，有些变成了瓦克夫[①]，奥斯曼素丹也从公用地产中划出新的瓦克夫。包税人和地方官吏设法大量兼并田产，土地分配和占有出现混乱。有些地方农民无田可耕，有的地方由于重税或由于战乱导致土地荒芜。[②]

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丧失，常常是债务造成的。农民负债，往往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庄稼歉收。据记载，17 世纪初的某些年份，安纳托利亚等地气候异常，不是持续干旱，就是持续降雨。因为庄稼歉收，某些地区征收固定的货币税，而人口流动较为严重，税收难以保证。[③] 在巴勒斯坦，政府不再保护村民免受贝督因人的攻击，使得靠近沙漠的村落等于被抛弃。相反，海岸地带的人口增加了。这些海岸地带自马穆路克时期以来由于安全因素导致人烟稀少，如今逃离巴勒斯坦内地的居民到海滨定居。居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央地带的居民，许多人也选择离开，迁移到海滨地区和伊兹密尔。[④] 奥斯曼帝国农民的生活是否稳定，取决于能否避开游牧民族劫掠，接近城镇市场。总体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农民没有摆脱生活困境。

在城镇，首先，自 17 世纪起政府不能为手工业者提供资金保障，对手工业部门的控制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其次，因为农村经济衰退，大批农民无法维持生活，纷纷涌入城市谋生，做搬运工、船夫、手工匠人等（有些无地农民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在城乡之间抢劫）。城市人口剧增，治安混乱，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⑤] 事实上，17 世纪以来长期的战乱对经济的消耗，削弱了城镇市场的稳定性。到 18 世纪，奥斯曼政府在

---

① 瓦克夫，伊斯兰教法用语，即宗教捐献。

② Hamilton Gibb, Harold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part* 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53.

③ Suraiya Faroqh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Cambridge Universsity Press, 2006, pp. 383 - 384.

④ Suraiya Faroqh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pp. 376 - 377.

⑤ Re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p. 14 - 15.

保证伊斯坦布尔居民的粮食充足供应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城市管理部门想办法阻止日益增加的移民，但未能奏效，城市人口依然较快地增加。由于农民抛弃了耕地，粮食减产，使城市的供应更加短缺，相应地，粮价不断上涨。[①] 重要城市如伊斯坦布尔、布鲁萨、阿勒颇、大马士革等，物价大幅度地波动，尤其面包和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城镇居民生活艰难。

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一个主要的特征是手工业技术没有进步。从中世纪直到 18 世纪，不仅代代相传的手工艺人的地位变化不大，手工业行会和手工技术也是中世纪的延续。一些小村庄的手工业，多年来就靠少数手艺人为当地生产一些陶器、木制厨具，烧制一些砖；农村的纺织业，也是部落或农村中的妇女完成的，有些产品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但未能形成规模。大多数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主要对原材料进行加工，从附近地区购进材料，加工后再把制成品出售到这些地区。

行省各城镇的工业产品主要供当地消费，一些大城市或工业中心生产的产品供出口。在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行省有几个工业中心，棉纺织、毛纺织、丝绸业是重要产业，也有一些其他产业。例如，油料加工在埃及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手工业者把芝麻、亚麻籽、菜籽等加工成油，供当地消费，也销往阿拉比亚。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橄榄大面积种植，为制皂业提供原料。一些专业性强的手工艺一般在大城市里，如埃及亚历山大和开罗的木器加工和金属制造业，叙利亚的珠宝业（几乎被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垄断)。按传统的工商业组织形式，每一种手工业都集中在城镇划定的区域。

城镇的手工业要比农村手工业有优势，规模、产出都要超出农村手工业许多倍，销量较大，但数百年没有技术突破。城镇的各种小规模企业，在行会制度下，生产发展受到限制。行会大都维护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业标准，比如拥有严格的等级体系和相应的规则，不开发新产品，阻碍了手工业者主动性的发挥，限制了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活力。[②] 而且，以家庭为单元的手工业者为工艺保密而对精深的手工技术不外传，偶有单个家庭衰败，专业性很强的传统手工艺逐渐失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政府

---

① Hamilton Gibb, Harold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36 – 37.

②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7.

足够的鼓励和支持，手工业作坊就越来越不景气，匠人们无以谋生，生活处境日渐恶化。

就是这些没有技术改进的手工行业，18 世纪遇到外来的挑战。欧洲商品大量进入奥斯曼帝国市场，在外来产品（如纺织品）与当地产品的竞争中，当地手工业产品处于劣势地位，帝国的手工制品受到西方机器制造品的排挤，有的行业便逐渐萎缩。此外，战争和自然灾害使奥斯曼帝国的农业经济衰退，贸易路线转移使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受损，农业和商业的衰退反过来使得手工业者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手工业出现倒退。

四　社会两极分化

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按照宗教信仰可以划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按照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可划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民众。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人口由两部分组成：统治阶级（声称效忠素丹并遵守奥斯曼帝国习俗的穆斯林）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负责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并分配和享用帝国的财富，被统治阶级负责创造财富以供统治阶级享用。[①] 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地区，作为统治阶级的土耳其人居住在城市，而基督教徒居住在乡村。对于被统治者而言，城市是压迫者、纳税人、警察的领地，而乡村是被压迫者、受剥削者、纳税人、生产者的家园。在西亚和北非的穆斯林地区，以阿拉伯行省举例，乡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区别不在于种族，而在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富人和统治阶层生活在城市，农民生活在乡村。[②] 在小亚细亚，手工业者、农民以及城市中的普通劳动者，与基督徒一样受到土耳其统治阶级的剥削。穆斯林农民的生活水平完全不在基督徒农民之上。奥斯曼帝国的剥削是不分种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的。[③] 农民和牧民构成奥斯曼帝国最大的社会阶层，信仰基督教的农民在奥斯曼帝国是受压迫的群体，以暴力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运动中，农民阶层是主要力量。

在奥斯曼社会的变动中，一名基督教徒可能变得富有，一名穆斯林可

---

①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53.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53 – 54.

③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25.

能变得贫穷。尽管奥斯曼帝国没有世袭贵族[1]，但有不同的特权阶层。官僚机构和军队中的特权者逐渐增多，不仅加大了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增加了这些寄生基层对社会下层民众的盘剥。奥斯曼帝国各地的部落首领也是享有特权的。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也有富裕阶层。改信伊斯兰教或者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合作的贵族被允许保留财产和地位。其他享有特权的基督教群体，其特权要么来源于奥斯曼统治者的赐予，要么通过获得财富进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穆斯林当中，地方宗教教员和法官的经济实力和个人威望比地方官员低得多，而与基督教低级牧师差不多。[2] 奥斯曼帝国的剥削者还包括高级教士以及基督徒中产阶级群体，他们通过高利贷，投机生意以及其他的手段来获得财富。穆斯林和基督教下层民众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削，造成普遍的贫穷。[3]

奥斯曼帝国社会没有坚实的中间阶层。少数特权阶层、富裕阶层垄断社会资源，享有社会财富，广大下层民众处于贫困、无权、缺少受教育机会的状态。甚至是贫穷者越来越贫穷，富有者越来越富有，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出身高贵者与出身寒微者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土耳其统治阶级与其他臣民之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似乎总是存在一道道的藩篱，而奴隶、妇女、不信教者是政治上的“下等人”，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这就是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基本情况。

本章的基本结论是，奥斯曼帝国衰落，表现在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衰退两方面，前者为后者之因，但又紧密联系。不过，奥斯曼帝国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衰退，都是奥斯曼帝国衰落的表现，而不是根本原因。比如经济衰退的原因，除了对外扩张的停止，还包括生产技术的停滞，价值观念的落后，以及制度因素，社会结构的不合理等，原因是复杂的。

---

① “帝国内没有稳定的、世袭的贵族，因为没有财产保障，自然就不能形成拥有财产和地位的贵族阶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0—393 页。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56.

③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25.

第二章　挽救帝国危亡的努力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集中表现为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衰退，但也绕不过政治因素。18 世纪末期进行改革，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军人不能抵御外侮，官员不能处理内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不进行改革就可能亡国。最初的改革，并不是当政者认识到西欧国家先进，本国相比落后所以急起直追；相反，由于 16—17 世纪以来的经济衰落、政治腐败，被欧洲国家侵略的压力驱使，使其到了不得不改弦易辙的地步。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政治根源

从 16 世纪后期到 18 世纪末，无论是经济上的衰退还是军事上的失败，都能从国内政治中找到问题的症结。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是长期以对外征服为目标而掩盖着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缘故，一旦停止大规模扩张，各种政治势力把争权的目标集中于国内利益，帝国的宫廷和政府管理中的问题、中央机关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不同阶层和民族群体之间的矛盾，一一显露出来。

一　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

传统的王国（或帝国）衰败时，政治层面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君主昏庸，则政出多门，或吏治腐败，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君主和王室奢侈淫靡，则国库空虚，或管理者巧取豪夺，民众不堪忍受；国家的兵制紊乱，或军纪废弛，军队变成耗费国家资财却不能保家卫国的寄生阶层。奥斯曼帝国衰落，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而腐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奥斯曼素丹软弱昏聩，执政能力低下

在苏莱曼大帝时代（1520—1566 年）的后期，奥斯曼帝国已出现政治上的衰败和管理的混乱，而苏莱曼大帝去世后这种情形更加明显，一代又一代软弱的奥斯曼素丹统治着走下坡路的庞大帝国。从 1566 年至 1703 年共有 13 位素丹，其中有一位被谋杀，三位被废黜[①]，正常更替的君主中，有执政能力的仅仅有两位：一位是穆拉德四世（1623—1640 年），另一位是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 年）[②]，其余要么性格懦弱，要么能力不够，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有的甚至智力不健全。从 1703 年到 1789 年有五位奥斯曼素丹，其中两位是政绩明显的，一位是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 年），另一位是阿卜杜·哈米德一世（1774—1789 年），其余三位素质不高，政治上没有作为，勉强维持统治。

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奥斯曼素丹继承制度难辞其咎。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有一种做法：皇位继承人中登上奥斯曼素丹宝座的一位，要杀死其他兄弟。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夺权斗争发生。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出现过皇子夺位引发的长期混战，如 1402—1413 年，巴耶济德一世的几个儿子夺权的战争长达 11 年，后来穆罕默德一世时期（1413—1421 年）悲剧重演，而穆罕默德二世王位失而复得（1444—1446 年，1451—1481 年），宫廷斗争非常激烈。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不能继位的皇子几乎都被剥夺生存权，而且成为一种制度[③]。穆拉德三世（1574—1595 年）拥有 40 个妻妾，生育了 103 个子女，但他勒死自己的 5 个弟兄[④]。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 年）继承皇位后处死了自己的 19 个弟兄[⑤]，这位残酷的君主在 1603 年去世时发现，皇族中的直系男性亲属只剩下他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

---

① 被废黜的三位奥斯曼素丹，指穆斯塔法一世（1617—1618 年）、奥斯曼二世（1618—1622 年）、易卜拉欣（1640—1648 年）。实际上，穆斯塔法一世 1618 年被废黜后，1622 年复位，1623 年再次被废黜，是两度被废黜的素丹。奥斯曼二世先被废黜，后被谋杀。易卜拉欣 1648 年被废黜后关在禁宫中，变得更加暴躁易怒，经过大教长裁决后，被绞死在宫中。此外，穆罕默德四世也是被废黜（1687 年），并囚禁在宫中的。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78.

③ 奥斯曼新素丹杀死同胞兄弟的做法，可能早于这一时期，14 世纪就开始了，只是起初没有成为制度。专家对此意见不一。

④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78.

⑤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m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78.

艾哈迈德一世继位后，没有杀死他唯一的弟弟穆斯塔法。奥斯曼新素丹对同胞的处置，从此用软禁代替杀害。[①] 1617 年，艾哈迈德一世的弟弟穆斯塔法接替皇位，开创“兄终弟及”的先例，此后皇位不一定是父子相传，有时由皇族中最年长的男子来继承。经过连续几代对皇子的“清除”，导致素丹家族人丁不旺，有时候没有直系皇子继承皇位。

由于长期在深宫后院里生活，与外界隔绝，皇室子弟缺乏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接触政务的机会，当政后没有料理朝政的经验。皇宫是封闭的由妇女、奴隶、太监和皇室成员构成的独立单元，皇子们与那些奴隶、太监、宫女在一起长大，身心的健康很难保证。结果是，有的幼年登基，没有执政能力；有的即使成年，也是过惯了享乐生活，身体虚弱或精神萎靡，对处理繁杂政务力不从心；有的奥斯曼素丹精神失常，如穆斯塔法一世（1617—1618 年在位）[②]。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奥斯曼素丹们已经失去了前辈军人的特质，不会或不敢领兵打仗。有的奥斯曼素丹除了一些庆典场合出来象征性地主持仪式外，从不出席政务会议，不接见大臣，不询问国事。

最典型的是苏莱曼大帝的继承人塞利姆二世（1566—1574 年在位），他不但懒惰、愚钝，而且放荡、嗜酒如命（被称为“醉鬼塞利姆”）。塞利姆二世亲自处理朝政的时候不多，偶尔处理政务，也是招数古怪，比如，他讨好加尼沙里军团，无原则地赏赐，分给采邑，发放额外津贴，目的是换得加尼沙里军团的忠诚[③]；对待乌勒玛，他也大量给予赏赐，试图用金钱换取宗教阶层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奥斯曼帝国皇室子弟在行省任职

---

①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张增建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5—66 页。

② 穆罕默德三世 1603 年去世时，穆斯塔法才 3 岁，由他 13 岁的哥哥艾哈迈德继位，称艾哈迈德一世。艾哈迈德一世没有杀死穆斯塔法，而是把穆斯塔法和他的生母送往耶尔德兹旧宫。艾哈迈德一世于 1617 年死于伤寒病，唯一的继承人是穆斯塔法，称穆斯塔法一世。穆斯塔法在旧宫中和宫女、太监一起长大，生性怯懦，非但没有任何管理事务经验，几乎就不具备处理政务的素质。被扶上素丹宝座后，他整日担心被杀害。一年后就被废黜（废黜的理由是穆斯塔法精神失常）。

③ 塞利姆二世笼络军队的方式是，向加尼沙里军团的每个军人发放各种名目的额外津贴，确保其愿意接受新的统治。他这样“慷慨”的结果是加尼沙里军团的胃口更大。加尼沙里军动辄以哗变、叛乱的方式迫使奥斯曼素丹提高军饷和额外津贴，奥斯曼素丹的安抚手段还是增加大量薪金，赏赐采邑。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的军人直接卷入王位继承的斗争中，甚至操控帝国政治。详见：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176。

并接受行政和军事训练的常例，皇子们不再出门，只能在后宫成长，以宫女和太监为师。由于塞利姆二世大部分时间不理朝政，待在后宫里玩乐，后宫的嫔妃们干预政治，与大臣勾结，弄权惑政。

奥斯曼素丹不能正常执政，权力必然被后妃或大臣所操控，这是历史上常见的。在缺少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大维齐和军事将领的任命，往往由能够支配素丹的某位后妃指派。从 1566 年塞利姆二世执政到 1687 年穆罕默德四世被废黜，这 120 多年中，后宫嫔妃多次操纵奥斯曼傀儡素丹，通过委任亲信担任高级官员等方式，控制帝国的政治权力，搜刮帝国财富，满足她们的私欲。这样一来，宫廷和政府重要职位的取得，就不依靠处理政务的能力，而要通过关系和门路。于是，宫内和朝堂的拉帮结派，勾心斗角，行贿受贿，成为普遍的现象。比如在穆罕默德四世时期（1648—1687 年），后宫和整个朝廷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穆罕默德四世六岁即位，少不更事，成年之前是后宫掌权的女人和大维齐手中的傀儡。成年之后，这位奥斯曼素丹大部分时间在狩猎以及与嫔妃的娱乐中消磨时光。所以，穆罕默德四世统治期间宫廷阴谋层出不穷，官员的任免权由后宫操纵，奸佞之徒行贿邀宠，打击、排挤甚至谋杀持不同政见的大臣。有能力的大维齐和要害部门的官员不是被免职、流放，就是遭受杀身之祸，在上层的斗争中“丛林规则”盛行。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的混乱，社会矛盾激化，叛乱和暴动也非常频繁。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奥斯曼统治者的素质下降是非常明显的。在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初，奥斯曼素丹个个都勇敢、果断，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奥斯曼素丹也注重子弟的培养，皇子们自幼学习伊斯兰经典和行政管理知识，18 岁到行省任职，实践中锻炼和提高。素丹知人善用，赏罚分明，不论血统和信仰，有才能的人必能被重用。相反，1566 年之后的奥斯曼素丹大都不具备军人素质，也没有处理复杂事务的魄力，甚至缺少基本的管理能力。众多奥斯曼素丹中，沉湎酒色者有之，生性懦弱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这些素质不高、能力不济而又贪图享乐的人物“君临天下”，还要给穆斯林臣民树立榜样（奥斯曼素丹也是哈里发），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政治腐败，纲纪废弛

当最高统治者软弱、昏聩、腐化时，奥斯曼帝国内部各机构各部门的大小官员任人唯亲，行贿受贿，甚至卖官鬻爵，出现严重腐败。

这里需要简要回顾奥斯曼帝国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是“Sublime Porte”，这是法文和英文文献中对奥斯曼帝国最高行政机关的称呼。自 1453 年把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皇宫和政府便建在这座后来称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里。大维齐[①]和他的下属即管理内政外交的高级官员办公所使用的建筑物，被称为“Sublime Porte”（英文文献也用 the High Gate）。这里的“Porte（或 Gate）”究竟指哪一座宫殿或哪一幢建筑的大门，含义并不确定，但它相当于“詹姆斯的内阁”，即英国人眼中的英国政府，那么“Sublime Porte”无疑是指“土耳其人的政府”或“奥斯曼政府”[②]。政府中职务最高的官员，在素丹之下就是大维齐，相当于内阁首席大臣。当大维齐负责战事或因其他事务不在首都的时候，要任命九位维齐暂时代理大维齐负责专门事务。这些维齐常常在皇宫里一座圆顶的会议室碰头或议事，故而又被称为“圆顶会议室的维齐”。15 至 16 世纪奥斯曼政府中除了大维齐之外最重要的政府官员是两名司法官，两名财政官。一名财政官负责帝国的亚洲财产，另一名负责帝国的欧洲财产。当时还有一个政务会（或委员会），名称为迪万（divan）。这个政务会 16 世纪后具有了高等法院的职能，由大维齐负总责。

奥斯曼帝国被划分为由首都直接管理的若干行省、纳税区和享有特权的地区[③]。1517 年之前奥斯曼帝国被划分为两大块：亚洲的军事行政区和欧洲的军事行政区。随着帝国扩张，新的行政区不断增加，或以军区形式，或以省级建置，或是帕夏辖区，并有不同的行政单位名称[④]。16 世纪时有九个军区，每个军区的首长是奥斯曼素丹任命的军区长或者大总督。

---

① 大维齐这一职务，在土耳其文中有两种表达法，一是 Sadrâzam，一是 vezir azam，英文有时用 the grand vezir 来表示。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26.

③ 例如，欧洲部分的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是属国，拉古萨是一个共和国，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公国；门得内哥罗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公国，阿索斯是一个基督教共和国。而巴尔干的大部分行省和阿拉伯行省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由奥斯曼政府的官员们进行直接管理。各省每年要向素丹缴纳赋税，其中阿拉伯行省是定期征收的。克里米亚汗国是不受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麦加的谢里夫也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详见：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27 – 28。

④ 一般有贝勒贝伊辖区（beylerbeylik）、行省或总督辖区（vilayet）、帕夏辖区（paşalık）。

军区最高长官负责自己辖区内的军政大事，拥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子①。地方法官（kadi）拥有广泛的权力，是行省政府机构中最受尊重的官员之一。各省司法上被划分为由一个或多个乡镇（nahiye）构成的法官辖区（kadilik）②。地方上最小的行政单位是市（Şehir）、镇（kasaba）、集市（pazar）和村庄（kariye）。市和镇又以不同教派或不同职业划分为不同的居民区，外国人通常住在分隔开的居民区。

奥斯曼帝国的地方政府因客观形势和特殊需要而呈现多样化。最有特色的两种制度，一是蒂玛（Tima）制度，二是米勒特（Millet）制度。蒂玛（Tima，又译“提马尔”）是付给服兵役者的报酬，是从各省农业税收入中划拨给军人的部分，或直接授予的土地份额。蒂玛制即军事采邑制，蒂玛的分配权由中央政府掌握，具体分配依据地方的地籍调查。蒂玛制主要的功能，一是军事管理（素丹通过蒂玛的分配可以掌握可调动的兵员总数），二是在地方管理中发挥作用（在村一级由蒂玛持有者协助收税，维持治安等）。米勒特制度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早期扩张进程中采取的针对非穆斯林的政策。穆罕默德二世于 1454 年任命金纳迪乌斯（Gennadius）为希腊东正教的宗教领袖，负责管理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人的事务（据说这是米勒特制的开端）③。1461 年穆罕默德二世允许在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中建立同样“自己管理”的区域。到苏莱曼大帝时期（1520—1566 年），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社区也组建类似的社区。奥斯曼政府把这种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或社区称之为米勒特，本意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有特殊信仰的集团或民族”④。在米勒特制度下，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群体只要承

---

①　按照惯例，大总督被允许得到最大的采邑之一，占据军区长或大总督职位的人，一般拥有帕夏头衔，甚至被授予维齐头衔。军区最高长官的行政人员班子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地方财政官，叫德夫特达尔（*defterdar*）。实际上，每个军区又被划分为桑贾克（sanjak），由桑贾克贝伊（sanjakbeys）管辖，桑贾克贝伊对军区长负责。详见：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28 – 29。

②　每个法官辖区的负责人是一位穆斯林法官（kadi）。在欧洲地区的一些法官辖区，也派基督教代表（knez）。

③　Daniel Goffm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70.

④　米勒特制（Millet System），又译为“米莱特制”，Millet 是土耳其语，涵义是“民族”、“人群”、“国民”，从阿拉伯语 milla 转化而来。《古兰经》中指“宗教”，后引申为“宗教社团”，奥斯曼帝国时期指东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等有组织的、得到法律认可的宗教团体。

认素丹的权威，缴纳人头税，就可以建立自治社区。民族成分和宗教信仰复杂的奥斯曼帝国，能够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和形式上的统一，得益于米勒特制度下的宽容政策和非穆斯林自我管理。

然而，从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出现政治腐败[①]，纲纪败坏，政令不行，制度受损的严重局面。

首先，官员贪污腐化。官员的贪腐，一方面是受宫廷影响，“上梁不正下梁歪”，“腐鱼发臭从头起”。奥斯曼素丹软弱无能，宫廷内部勾心斗角，不能有效地约束各级官员，反倒树立了拉帮结派、行贿受贿的榜样。另一方面是选官用人的途径和方式上出现腐败。奥斯曼素丹或掌权的后妃任人唯亲，担任官职的只能是见风使舵、见利忘义的人。既然选用的是善于行贿、邀宠的不学无术之辈，自然败坏官场风气，卖官鬻爵的事情就难以杜绝。用钱买到官位的人，当官的首要目标就是设法把花的钱捞回来，并为升迁积攒更多的钱。对这样晋升的官员来说，只考虑如何榨取额外钱财，不考虑如何履行管理职责。官场的腐败一旦形成气候，有才干的官员、廉洁的官员会被逐渐淘汰。腐败风气迅速渗透，反过来导致权力斗争更激烈，行政效率更低下，帝国的政治更为黑暗。从具体的方面可以看到，“奥斯曼政府机构的行政人员在16世纪时还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办事效率高，但到了17世纪已经漫不经心；到18世纪，无论最高行政机关还是地方政务机构和宗教组织，都变得效率低下，信誉度不高。关键是，各机关的公职人员道德水准也在下降”。[②] 从大的方面看，由于奥斯曼素丹大权落入后妃或者宠臣手中，这些人多次勾结禁卫军发动宫廷政变，干预国家政治，帝国出现“纪纲废弛”的局面。

其次，蒂玛制变成了一项恶政。一方面，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通货膨胀，政府无法增加蒂玛持有者的固定收入，蒂玛持有者的经济地位下降，有的不再服兵役，有的自动放弃蒂玛。另一方面，蒂玛授予过程中出现不正常做法。例如政府收回的蒂玛封授给宫廷近臣，这些人压迫和剥削民众，却又逃避服兵役，吃空饷，蒂玛制彻底丧失原来的意义。本来是一项

---

① 政治腐败，通常指国家公职人员为了个人目的违反国家的法律，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卖官鬻爵、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是腐败的表现形式。滋生腐败，主要由于不良的行政体制，使官员缺乏约束和监督所致。

②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

有利的制度，很快变成了有害的制度。

其三，米勒特制度逐渐变质。从18世纪起，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日趋衰弱，偏远行省的领土被外国占领，非穆斯林往往受到迫害，甚至被驱逐出去。而奥斯曼帝国此时已经无法为非穆斯林商人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到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衰弱，传统的社会结构松动，穆斯林的支配地位削弱，非穆斯林的影响力增大。相当数量的从事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业的非穆斯林臣民，寻求欧洲的保护，享有一定特权，土耳其人用传统手段管理非穆斯林臣民已经相当困难。[①]

总体来说，上层腐败很快蔓延到整个帝国统治阶级，宫廷阴谋和帝国政治腐败，造成政治不稳定。蒂玛制度的瓦解，使官员对劳动者的剥削加剧了。民族和宗教矛盾引发的社会动乱频繁发生，使得帝国的米勒特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衰落中腐败，腐败导致进一步衰落。一般通史都像讲故事一样介绍奥斯曼素丹的暴政和多次的宫廷政变，对奥斯曼帝国政治危机或政治腐败的深入分析较少。可以说，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腐败是典型的个案，研究政治腐败的现有成果并没有触及这些内容。

（三）军队内部的腐败

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由封建军队、新军、辅助军队组成。16世纪末叶以前，奥斯曼帝国主要的军事力量是封建军队，即蒂玛持有者必须提供的兵源。蒂玛持有者所供养的封建骑兵中，最有名的是西帕希（sipahis）。而加尼沙里军是步兵，属于常备军。加尼沙里军起初是每四年一次征募基督教青年，后来变成不定期多次征募基督教青年组成常备军。这些入伍的青年中最有出息的人要被挑选出来，在宫里接受训练，受训后变成素丹个人卫队的成员。有的历史书中把“Janissary”直接译为“禁卫军”或“近卫军”，就是由此而来。实际上，充当禁卫军的只是加尼沙里常备军中挑选出的一部分士兵，不是加尼沙里军的全部。加尼沙里军的正式组建是在15世纪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时期。加尼沙里军队和平时期驻扎在城市中心以维持治安，职责是巡逻、安全保卫、守护城镇要塞的主要门户。战时加尼沙里参加作战，在正规战役中加尼沙里军占据核心位置，职

①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6.

责是保卫奥斯曼素丹的安全。加尼沙里军队享有许多特权，许多人甚至在奥斯曼政府里担任要职。[①]

在加尼沙里军队建立之前，奥斯曼帝国就有常备军，由六个骑兵师组成。据估计，苏莱曼大帝时期常备军骑兵比加尼沙里军的规模大得多。在和平时期，骑兵队的人数也不少。奥斯曼帝国还有专门兵种的部队，15世纪时建立消防部队，此后产生了三个专门兵种：军械管理兵、炮架运输兵、军械技术兵。其中军械技术兵主要负责装备的制造和维修，他们还承担运输和补给守卫部队的任务。奥斯曼帝国也有许多辅助部队，充当执行特殊任务的骑兵、步兵、要塞守军、侦察兵、军火运输兵，或是游牧民武装人员。辅助部队最初征自基督教徒。基督教徒组成的部队在16世纪之后大部分被解散。[②]

17—18世纪，政治腐败也渗透到军队中，从军队成分、纪律和奖惩、军官晋升，到征兵制度、军事训练，整体出现严重问题。军队从保家卫国、忠诚于素丹的力量，蜕变成危害国家安全、挟持素丹的力量。

第一，加尼沙里军的成分发生变化。从塞利姆二世（1566—1574年）时期开始，加尼沙里士兵的子弟可以进入父辈服役的卫队。加尼沙里军中原来没有穆斯林，后来有了穆斯林士兵。加尼沙里军人想尽办法把自己的子弟纳入加尼沙里军，力图独占这个特殊的位置，军官的职位往往由军官子弟和朝廷大臣的子弟把持。加尼沙里军变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且是寄生性的集团。

第二，由于受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战功和荣誉已经起不到激励军人的作用。要鼓舞士气，只能大量发放薪金，许以官阶。加尼沙里军自恃特权，耽于享乐，军纪松弛；其他部队也缺乏纪律，战斗力下降，彻底失去军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在帝国的某些偏僻省份，军事将领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地方部队往往糟蹋国家资财，坑害下层人民。他们不能从战争中夺取战利品，就在国内肆意掠夺。数量膨胀的加尼沙里步兵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经常滋生事端，向政府索要薪饷，甚至发动兵变，操纵奥斯曼素丹的废立。从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开始，加尼沙里军经常逼宫，

---

①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30 - 31.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31 - 32.

要求素丹清除他们所不喜欢的大臣，或满足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17 世纪初几位素丹软弱，奥斯曼政府几乎控制在加尼沙里军人的手中。例如奥斯曼二世（1618—1622 年）试图约束军队，打击加尼沙里军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但没等他付诸行动就被觉察。这位年轻的素丹先被废黜，后被杀害。到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职能不是保卫国家和人民，而是威胁和祸害本国政府及人民。

第三，17 世纪末期非军人出身的官员进入军界，担任要职，把持军政。到 18 世纪，一些乌勒玛和笔吏当上帕夏，掌控地方军政大权。后来征兵制也被废除了。

第四，加尼沙里军初建时 1 万人[①]，到 17 世纪中期人数多达 20 万。后来大量裁减，不久又重新增加。随着兵员数量的增长，军队战斗力在不断减弱。有些加尼沙里军士兵不执勤，不出征，要他们去打仗，他们就开小差，到时候只是凭手里的军人证件领饷。加尼沙里军的“领饷证”也变成可买卖的一种商品，外人可以出钱买下来，然后按季度凭证领饷，就像凭息票领钱一样。有许多加尼沙里军身份的人实际上只是持有“领饷证”的手艺人。[②] 无论是加尼沙里军人还是西帕希骑兵，原来规定不允许娶妻，但这些规定后来失去约束作用，甚至被取消。已娶妻生子的军人随时会离开军队，从事商业、手工业，或经营其他产业。他们保留着军人身份，享受着军人的特权，但不去履行军人职责。

第五，蒂玛制破坏后，军事采邑向世袭个人封地转化。由于采邑世袭，采邑持有者变成地主，但他们拒绝向政府提供军队和负担战争开支，削弱了帝国赖以存在和一度强盛的军事基础。蒂玛落入加尼沙里首领、政府官员、宫廷得势者中；或者被富人通过贿赂非法取得。还有一些蒂玛被变成私有财产。

第六，平时训练流于形式，因而战斗力逐渐丧失。即使训练，也是使用陈旧不堪的训练方法，因而骑兵部队已经退化到毫无用处的境地。有的

---

① 加尼沙里军在穆拉德二世（1421—1451 年）时期组建时，由 196 个连队组成，被划分为 3 个师，最大的一个师由 101 个连队组成，最小的师由 34 个连队组成。15 世纪后半期加尼沙里军队大约 1 万人，苏莱曼大帝时增加到 1.2 万人。详见：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31。

②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8 页。

地方部队配备的是陈旧的武器，而加尼沙里军即便配备了新式武器，但已不习惯打仗，士兵没有很好地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长期没有海战，海军严重蜕化，不但未能及时把单层甲板划桨船改换成大型挂帆战船，而且连旧式战船的操作方法也不够熟练。

本质在于，随着政治风气的腐蚀，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人已经逐渐丧失原来的尚武精神。因为军队内部的腐败，奖惩制度和军事纪律废弛，平日养兵的军费从各个渠道白白流失，武器和技术的更新成为空话，军队只能变成“纸老虎”或“病老虎”。

二　朝廷权威下降与地方割据形成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教派多，当时交通落后、信息不畅，加上各地缺少统一的经济联系，这个依靠武力联合起来的多民族混合体，缺少牢固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大规模对外扩张的鼎盛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帝国全境有效的统治主要依赖强大的军队和奥斯曼素丹的个人魅力。奥斯曼帝国统治前期，可以维持在国内的法律和政令统一，能够维护社会秩序，消除地方贸易障碍，保持贸易路线通畅，维持与邻国的关系。从 16 世纪晚期开始，奥斯曼素丹软弱昏聩，宫廷生活奢侈无度，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朝廷的权威和信誉一落千丈，帝国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大大削弱。

在 17—18 世纪，地方割据势力逐步形成和壮大。首先，欧洲领土上的一些行省总督和地方官员不再忠实于奥斯曼素丹，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最高长官”。其次，西亚、北非地区的封建主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取得更大的自主权，有不少成为独立、半独立的诸侯。[①] 到 18 世纪后期，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半岛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奥斯曼政府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很微弱，有些地方首领只是名义上服从朝廷权威。埃及、两河流域由当地马穆路克封建主所控制，北非马格里布属地的总督事实上已经独立。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控制仅限于首都及附近的省区。奥斯曼帝国经济衰退愈严重，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愈激烈，奥斯曼政府的号令在地方上愈难以通行。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力量用于抵御外来侵略，进行对外战

①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6 - 47.

争，还要镇压各地不断发生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无暇梳理朝廷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地方脱离中央控制，出现割据局面不可避免。[①]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情况是较为复杂的。

第一，有的行省总督和地方长官不服从帝国政府，甚至蔑视朝廷的权威。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除了伊斯坦布尔及附近地区外，许多行省脱离中央的实际控制，无论是行省总督还是统治行省的军事集团，他们有独立的财政权力，在有些行省，总督职位以世袭方式继承。在奥斯曼帝国的边远地区，一些当地部族首领向素丹的权力发出挑战。地方总督、酋长等实权人物拥有军队，推行自己的管理方式。如埃及的各级机关几乎被马穆路克控制，出现事实上的割据。

第二，地方世袭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与中央政府对抗。例如埃及，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后并没有铲除曾与奥斯曼素丹合作过、也曾反对过素丹的马穆路克势力。1769年，在阿里贝伊（Ali Bey）的领导下，马穆路克把奥斯曼帝国的帕夏赶出埃及，宣布埃及独立。阿里贝伊一度征服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但他统治不长久，被他的下属推翻，并于1773年去世。[②] 黎巴嫩和库尔德斯坦山地的领主，接受朝廷任命，进入政府机构。但他们是封地持有者，或者是一个地区的收税人和治安维持者，他们确立了对地方的统治，政府不能过问这些地方的事务。18世纪，其他行省的地方贵族不断闹独立，他们企图脱离中央政府管辖，直接威胁到奥斯曼素丹的权威。奥斯曼政府采用严厉的手段镇压各地的反抗活动，还颁布了法律，甚至禁止吸烟、酗酒或喝咖啡，禁止穿金线绣制的丝绒衣服和用银装饰的鞋子。严格的条例张贴在小旅馆、咖啡屋、烟草商店、理发店和洗浴室等场所。流浪汉和“无用的人”被驱逐，处死或者被迫害[③]，但并未从根本上加强政府对地方的管理。

第三，游牧和半游牧地区，民众效忠于部落酋长，朝廷的管辖历来是松散而薄弱的。奥斯曼帝国的山区居民主要生活于阿尔巴尼亚、东安纳托

---

①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1.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84.

③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83.

利亚、库尔德斯坦和黎巴嫩，游牧民生活于高原和沙漠地区。如何对待这些社区和群落，统治者应当花费时间去考虑解决，但奥斯曼政府做得不够。奥斯曼政府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阿拉伯边疆行省，往往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例如，库尔德斯坦、约旦河东岸地区、也门、北非地区，游牧部落与城镇交错分布，历史时期这些边疆地带时而"开放"，时而"封闭"。所谓"开放"，是指外来部族不断进入，呈现出松散、混乱的状态；所谓"封闭"，是指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权力强化，完全控制这些地区。[1] 边疆地带处于部落组织和国家管理的交界，奥斯曼政府通过向当地的生产者和商人征税来扩大直接统治。"边疆地区的部落和酋邦形成的秩序，是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最大障碍，部落军事力量也向帝国的高压统治提出挑战。奥斯曼政府试图使用武力使边疆的部落屈服，但付出代价而收获甚微。边疆可能就不需要国家管理，而奥斯曼帝国需要对边疆进行直接管理。"[2] 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阿拉伯沙漠的疆界，直到 18 世纪后半期才出现有限的管辖，此前几乎处于无政府的松散状态。

第四，并非所有穆斯林都从精神上服从奥斯曼素丹，统治者的宗教号召力不强。奥斯曼土耳其人皈依伊斯兰教，其国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素丹必然受所有穆斯林的拥戴。奥斯曼素丹拥有"哈里发"头衔，只是表明奥斯曼素丹在形式上是"穆斯林世界的共主"，哈里发头衔可以强化他统治穆斯林臣民的合法性。历任奥斯曼素丹只是偶尔让哈里发称号发挥作用，有时在自己的头衔中省略不提。直到后来（19 世纪）为了抵制西方的巨大压力，奥斯曼素丹才郑重地声称自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以此来增强穆斯林团结御外的凝聚力。[3] 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当地民众对酋长的忠诚超出对奥斯曼素丹的效忠。奥斯曼素丹名义上统治着整个阿拉伯半岛，实际上只对汉志、也门实行统治，而且是通过麦加谢里夫的支持才实现的。18 世纪中叶，阿拉比亚腹地产生瓦哈比教派，创建人穆罕默德·伊本·瓦哈比号召穆斯林回归原始伊斯兰教

---

① Eugene L.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0—1921*,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9, pp. 5 – 6.

② Eugene L.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0—1921*, Cambridge University, p. 9.

③ Albert Hourani,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981, p. 8.

义，得到阿拉比亚实力派人物伊本·沙特的支持。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统治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瓦哈比教派的影响迅速扩大，而纳季德的沙特家族接受了瓦哈比教，形成了与麦加谢里夫相对抗的势力。[①]

第五，米勒特制度本是半自治的形式，这种形式稍有变动，基督教徒生活的区域就成了独立的政治区。早在征服时期，希腊城市由东正教领袖管辖内部事务，亚美尼亚地区也由东正教领袖管理当地事务，大拉比负责犹太社区的事务，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这些宗教领袖的决定具有威慑力。所谓米勒特制度，本来是政府对这些非穆斯林臣民采取宽容政策，允许这些社区的民众信仰自由，向政府缴纳人头税，忠实于奥斯曼素丹及其朝廷就足够了。后来奥斯曼帝国素丹威信下降，奥斯曼帝国政治腐败，基督教社区受到一些迫害，便寻求外国人的保护，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是一种离心力。基督教臣民与欧洲的联系日益密切，基督教徒往往把社会经济问题与民族或宗教上的不满情绪联系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

总之，17—18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内外形势发生的变化，加上奥斯曼素丹软弱无能，整个国家自上而下的腐败，酿成政治混乱和分裂，腐蚀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基础。素丹的实际控制力逐渐弱化，地方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

三　社会矛盾尖锐

从16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蒂玛制度的破坏，以及通货膨胀影响奥斯曼帝国各地，失去蒂玛的军人心怀不满，逃往城市，或参加日益壮大的土匪队伍，到乡间进行抢劫。在叙利亚等行省，地方官员不仅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税款，而且不定期征收，有时征用农民的牲畜、谷物，也不给农民任何补偿，让农民不堪忍受。由于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统治者征税频繁，勒索无度，黎凡特等地大批农民逃亡。为了生存，有的青壮年被人雇佣，替人卖命；有些干脆干起打家劫舍的行当。有一些农民逃往城市，当仆人，当清洁工，有的成为流浪者。几乎所有奥斯曼帝国史资料提到：自16世纪后期开始，奥斯曼帝国被频繁的内部反抗和叛乱所困扰。

---

① M. Şükrü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 12.

武装叛乱的力量来自全社会各民族群体。如果说基督徒是为宗教权利和社会公正而反抗政府，那么，穆斯林反抗奥斯曼政府则是对政治腐败不满，对伊斯兰教掺杂外来教义不满。许多基督徒在无法忍受土耳其人的压迫或他们的传统权利被剥夺时，就加入公开的反抗组织。另一些人因为经济贫困而入山为盗，靠打劫维持生活。这些反抗活动有的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有的得到外国的援助。阿拉伯穆斯林不忘他们中世纪时的强大，希望取得独立。而各地的农民希望摆脱封建剥削。在统治阶层中，一些人试图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秩序，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改变这种秩序。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17—18 世纪发生多次叛乱和反抗活动，其中大规模的反抗有以下几次：

（一）1598—1608 年的杰拉勒叛乱

这次叛乱的主要参与者是脱离正规部队的军人。在对奥地利的战争取得几次成功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试图整顿军队，但不合理的整军法令逼走了几万士兵，他们逃到安纳托利亚。这里原来就有小股反抗力量，这批正规军的加入，使安纳托利亚的叛乱成为扑不灭的烈火。叛乱首领叫“杰拉勒（Celâlî）”，土耳其语中“Celâlî”成了一个专门的名词，指“杰拉勒叛军”[①]。在此期间（1603 年）伊斯坦布尔发生西帕希部队支持的暴动，迫使奥斯曼素丹艾哈迈德一世答应了暴动者的要求，结果引起驻扎贝尔格莱德的加尼沙里军的不满，他们开进首都，包围西帕希营地并焚烧物资，屠杀暴动领袖，镇压了西帕希军。许多西帕希军人逃到安纳托利亚杰拉勒的叛乱队伍中。杰拉勒叛乱持续 10 年，直到 1608 年夏天奥斯曼政府出动大规模的军队，才消灭了叛军，恢复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秩序。[②]

（二）1629—1632 年的士兵暴动

穆拉德四世时期（1623—1640 年），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爆发了多次叛乱和起义，其中 1629 年由大维齐胡斯莱夫（Husrev）帕夏解职一事引发的士兵暴动带来极大破坏。当时安纳托利亚和其他各省的加尼沙里军、西帕希军几乎都以恢复胡斯莱夫帕夏的职务为借口而叛乱。1631 年

---

① 英文资料中有一个术语 Celali Revolts，译为“杰拉勒叛乱”，也译为“杰拉里叛乱”，是指这次叛乱。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p. 185 - 186.

11月，数千名放纵的士兵和匪徒涌进伊斯坦布尔，他们在首都随意抢劫、杀人，要求朝廷满足他们的要求。穆拉德四世为了安抚这些暴动的士兵，把十几位大臣撤职，换上了新的大维齐，这些进入首都的士兵也被安置住在首都。但这些无法无天的士兵们在首都街头游荡，勒索财物，酗酒闹事，杀人放火，有胆大者窜入皇宫要求给予他们官职。叛乱者还产生过废黜穆拉德四世的打算，只是没有得逞。不久，叛乱者内部发生分化，新的叛乱者进入伊斯坦布尔，与居住于首都的暴动者冲突。1632年5月，奥斯曼素丹穆拉德四世镇压了这些叛乱者和暴动者，恢复了首都的秩序。①

（三）1651年8月伊斯坦布尔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

这场抗议活动持续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通史记载不详。

（四）1655—1656年的首都兵变

1655年加尼沙里军团和西帕希骑兵在伊斯坦布尔发动兵变。起因是反对政府用贬值的铜币给他们支付薪饷。叛乱者迫使政府交出30名重要官员，在清真寺前处死了这些官员，并强迫全城商家关闭店铺。② 1656年威尼斯舰队打败奥斯曼帝国舰队，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引起全城居民恐慌。伊斯坦布尔城内食物短缺、物价飞涨，直到穆罕默德·科普卢吕（Mehmet Köprülü）被任命为大维齐，才慢慢恢复了首都正常秩序。③ 就在伊斯坦布尔发生兵变时，安纳托利亚也有起义发生。

（五）1658—1659年的阿巴扎·哈桑起义

先是1656年发生特拉西瓦尼亚大公的叛乱，奥斯曼政府军队出兵镇压叛乱。阿巴扎·哈桑于1658年7月18日发动起义，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民众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壮大，一度逼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大维齐穆罕默德·科普卢吕急忙从特兰西瓦尼亚前线回到首都，部署镇压起义军。阿巴扎·哈桑的起义军队败退至阿勒颇附近，提出和谈。1659年2月，阿巴扎·哈桑被诱杀于阿勒颇，起义军全被屠杀。

（六）1687年伊斯坦布尔的叛乱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p. 196 – 197.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06.

③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34.

1687年苏莱曼二世上台之初，奥斯曼帝国首都就发生叛乱。这些叛军占据私人房舍，任意逮捕拷打官员，并纵火、盗窃，无恶不作。首都的恐怖气氛持续了5个月。苏莱曼二世采取严厉镇压的措施①，全城捕杀叛乱者。由于首都工商业者深受叛军的蹂躏和伤害，他们积极响应和配合奥斯曼素丹，彻底平息了这次叛乱。

（七）1688—1689年巴尔干地区的起义

1688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地区发生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起义。当时奥斯曼政府军队正在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交战，起义者支援奥地利军队，使奥斯曼政府军队遭受很大打击。

（八）1703年叛军占领伊斯坦布尔

在穆斯塔法二世统治（1695—1703年）的最后几年，大教长费祖拉赫（Feyzullah）专权，而奥斯曼素丹退往居埃迪尔纳的皇宫中，听任专权者为所欲为，伊斯坦布尔的士兵和工商业者对这一动向担忧。1703年7月，各地的加尼沙里军士兵拒绝接受出征格鲁吉亚的任务，而是要求政府付清拖欠的军饷。请愿行动发展为暴动，士兵涌向皇宫，普通市民和乌勒玛、学生也加入其中。暴动的士兵很快占领皇宫，并于7月21日控制了首都伊斯坦布尔。住在埃迪尔纳皇宫的奥斯曼素丹穆斯塔法二世组织军队向伊斯坦布尔进发，而占领首都的暴动士兵准备攻打埃迪尔纳，8月21日双方相遇并发生战斗。② 素丹穆斯塔法二世的军队临阵倒戈，埃迪尔纳城外的一场流血冲突就避免了。其结局是，穆斯塔法二世（Mustafa Ⅱ）被废黜，费祖拉赫被处死，艾哈迈德三世（Ahmed Ⅲ）于1703年8月22日即位。③

（九）1730年的帕特罗纳叛乱

1730年10月，加尼沙里军人帕特罗纳·哈里尔（Patrona Halil）发动叛乱。叛军来势迅猛，奥斯曼政府中掌权的官员也支持叛军，素丹艾哈迈德三世措手不及，不得不宣布放弃奥斯曼素丹职位，传位给马哈茂德一

---

① 苏莱曼二世生于1642年，在后宫与世隔绝中成长并生活了45年之后被推上素丹宝座（1687年），他时常担心会被谋杀，神经紧张，怀疑哪些人对自己不忠诚，宁可枉杀，绝不留情，并声称要杀掉任何一位他不喜欢的人。他在位仅仅4年。

② 这次叛乱是素丹要把宫廷迁到埃迪尔纳引发的，所以也称"埃迪尔纳事件"（The Edirne Event）。事件经过详见：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6, pp. 227-228。

③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Pearson Longman, Harlow, London, the U. K., 2007, p. 37.

世（Mahmud Ⅰ）。[①] 叛乱延续，暴力、恐怖事件不断，直到 1731 年 11 月 24 日，叛乱才被平息。

（十）1791—1808 年鲁米利亚山区的农民叛乱

18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不稳定，本来帝国境内已经出现社会秩序混乱、盗匪猖獗的状况。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变成流民，一部分加入匪帮。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有大股的匪帮联合起来掀起叛乱，如 1791—1808 年鲁米利亚山区农民的暴动声势较大。[②] 奥斯曼政府组建了专门的部队镇压叛乱。靠近奥地利和威尼斯的边界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保持军事禁区，边境附近有部队驻扎，以利于快速对叛乱做出反应。这些守卫部队享受特权，但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运输线、关隘、桥梁、渡口的任务。整个乡村由警察负责治安，打击犯罪行为。[③] 但是，叛乱和反抗活动此起彼伏，暴力、匪患随处都有，不稳定因素遍布整个奥斯曼帝国。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反抗表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难以缓和的程度。

第二节　阿卜杜·哈米德一世的改革尝试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始于何时？不同的通史和专题著作有不同的说法。要追本溯源，在签订《卡洛维兹条约》（1699 年）之后不久，奥斯曼帝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考虑改革问题。最早的改革是在“郁金香时代”（1703—1730 年），即艾哈迈德三世统治的时期。据说，赞成改革的易卜拉欣帕夏 1718 年担任大维齐时，一份呈递给奥斯曼素丹的奏折中指出赶上西方军事的必要性，建议实行改革。于是 1718 年被看作“西化”的起点年代。[④] 艾哈迈德三世在位时期有两位易卜拉欣担任过大维齐，一位是

---

①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Ⅳ,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1 – 2.

②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6.

③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82 – 83.

④ 戴维森等人持这种看法（见《从瓦解到新生》第 81 页）。也有学者说，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改革是在穆拉德四世时代（1623—1640 年）发起的，17 世纪中期也有大维齐柯普卢吕在技术和军事组织方面引进新方法，没收非法所得的财产，试图根除腐败（见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88）。但是，当时只停留于保持旧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一些技术性的变革，整个 17 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学习西方和改进技术方面并无进展（关键是那个时候欧洲军事和科技优势并不明显）。

卡普丹·霍扎·易卜拉欣（Kapdan Hoca Ibrahim,）帕夏，另一位是尼夫塞舍里·达马德·易卜拉欣（Nevsehirli Damad Ibrahim）帕夏，前者在1713年担任大维齐，后者在1718—1830年担任大维齐。[①]那么，与改革建议有关的就是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

艾哈迈德三世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西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土耳其人与西欧的联系加强，尤其是土耳其人与法国人的联系加强。大维齐达马德·易卜拉欣帕夏派使团去维也纳，杰出的政治家耶米塞基兹·穆罕默德（Yirmisekiz Chelebi Mehmed）赴法国路易十五的宫廷，学习西方政府和社会的管理方法。从法国回来后，耶米塞基兹·穆罕默德撰写了著名的《使节报告》，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自己所见所学。[②]也有记载说，1727年，奥斯曼帝国已经引进欧洲式的军事训练方法。其实，艾哈迈德三世增强海军力量，也是1699年之后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所迫。说达马德·易卜拉欣任大维齐期间"开启了现代化"，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从艾哈迈德三世起，整个18世纪都有改革的提议或打算。18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的大多数改革家都是温和派，例如大维齐科扎·纳吉布帕夏（Koca Raghib，1757—1763年任大维齐），在坚持不改变奥斯曼帝国制度的情况下，情愿接受从欧洲引进技术等改革。[③]由于决心不大，努力不够，改革也没有结果。当时的措施不外乎建立培训学校、技术院校之类。[④]

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落后于欧洲，而且国内出现社会冲突、政治混乱。此时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落后，军队纪律涣散，丧失战斗力；政府的公务人员既无能又不忠诚；对外事务方面主要依赖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些人有经济地位却谋求相应的政治地位，在统治者看来这些少数民族靠不住。面临危机的帝国，确实需要改革，最急迫的是军队的改革和加强政府的权力。阿卜杜·哈米德一世（Abdül

---

① Selçuk Akşin Somel,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Lanham, Maryland and Oxford, 2003, pxxiv.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89.

③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89.

④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0.

Hamid Ⅰ，1774—1789 年在位）当政后，不得不推行改革。

阿卜杜·哈米德一世是艾哈迈德三世的儿子。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宫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登上王位时已经 49 岁了。正因为年长，他表现出道德高尚的长者气度，任命大维齐全权负责政府事务，自己以顾问和仲裁人的身份而不是以绝对权威的身份处理国事。[①] 阿卜杜·哈米德一世掌权时已经是俄土战争（1768—1774 年）接近尾声。不过，他统治时期还是一直受到俄国的军事和政治威胁。

如何对付外来的威胁，奥斯曼政府内部出现两派。主战派以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总司令盖兹·哈桑帕夏和后来担任过大维齐的科扎·尤素福帕夏（Koca Yusuf Pasha，1787—1790 年任大维齐）为代表。在 1770 年抵抗俄军的战役后，盖兹·哈桑帕夏成为一位英雄人物，担任奥斯曼帝国舰队总司令。尤素福帕夏提出积极抗俄的主张（当时俄国于 1783 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向高加索渗透）。主和派以大维齐赛伊特（Seyyit）帕夏和哈利尔·哈密特（Halil Hamit）帕夏为代表，提出实行改革并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稳定的主张。当主战派占上风时，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交战(1787—1792 年)，意在收复克里米亚。此外哈桑帕夏还远征叙利亚和埃及，镇压当地的叛乱。[②]

尽管两派在对外政策上有分歧，但在仿照西方模式实行军事改革这一点上，认识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引进西式的武器。为此，奥斯曼素丹聘用了外国的军事顾问，并且，不要求这些顾问们皈依伊斯兰教，不要求这些教官在生活习俗方面与奥斯曼社会一致。在聘用的军事顾问中，巴隆·德·托特（Baron Francois de Tott）发挥的作用较大。巴隆·德·托特为奥斯曼帝国创建了一支新式的炮兵部队。这支部队使用轻型加农炮，进行现代大炮的技术训练。在哈斯柯伊建立起现代化的大炮铸造厂，生产满足军队需要的大炮。巴隆·德·托特还在炮兵营地创建了数学学校。

阿卜杜·哈米德一世时期为改革做出贡献的人物是哈利尔·哈密特帕夏。1782—1785 年在哈密特帕夏主持下，帝国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

---

① Gά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6.

② Gά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6.

改革。

第一，军队的现代化。哈利尔·哈密特帕夏恢复巴隆·德·托特创建的新式炮兵部队（速射炮兵部队），扩大对加农炮部队、投弹手部队和布雷工兵部队的技术改造。新式炮兵部队本来有一定规模，只是被遣散，哈利尔·哈密特帕夏掌权后，这支部队得到恢复。这一时期，担任奥斯曼帝国海军总司令的盖兹·哈桑（Gazi Hasan）帕夏政治上是反对哈密特帕夏的，但他支持军事改革，积极推进海军现代化。在金角湾、黑海、爱琴海建造新的造船厂，聘请法国工程师来指导船舶的制造。尤为重要的是，他创建了职业海军服役制度。从乡村中招募海军士兵，让士兵在军营里统一接受经常性的训练，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使之成为训练有素的新式军人。

第二，为了培养舰队的军官和指挥人才，盖兹·哈桑将原来巴隆·德·托特创建的数学学校发展为一所海军工程学校。这所海军工程学校主要由法国技师管理和指导，法国军事专家讲授现代军事技术，出版土耳其语的法国教科书。据记载，当时还建立了一所“防御工程学校”，成为后来建立军事工程学校的基础。[①] 此外，还建立印刷机构（18 世纪 30 年代易卜拉欣·穆特费利卡创办过，可能没有延续，这一时期重新开办印刷厂）。

第三，加固边塞，充实边塞的军火及物资供应，在靠近俄土边境的地方加强防御工事。防御的重点是高加索地区、土耳其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加利波利半岛。[②] 在埃迪尔纳、索菲亚、伊萨克奇（Isakçi）建立物资供应和人员储备。

第四，整顿加尼沙里军。主要措施是加强纪律，严格奖惩制度，削减加尼沙里军团的人数，对加尼沙里军团和西帕希部队进行欧洲战术训练，使其掌握新式武器的使用方法。努力消除旧军队（加尼沙里军团、西帕希骑兵）与新军队之间的差距，尽量使两类军队协调，建立共同的组织纪律，配备一样的武器装备。

在这次改革中，主要针对的是海军现代化建设，套用现代术语就是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57.

②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6.

"硬件建设"。到1784年时，奥斯曼帝国舰队已经拥有22艘新式战舰，15艘小型快帆战船。而"软件建设"几乎没有多大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军官的指挥水平和士兵的素质并未提高，尤其军官的任命总是通过"行贿"等腐败方式，难以把真正优秀的军官放到指挥岗位上，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并未实现。

阿卜杜·哈米德一世时期，其他方面也有改革。如经济方面，改革币制，稳定物价，鼓励复兴奥斯曼帝国的造船业。社会习俗方面，进行服饰改革等（效果有限，记载不详）。此外还有一些城市建设措施。1777年、1782年、1784年和1787年伊斯坦布尔城遭受多次火灾，城市受损严重。阿卜杜·哈米德一世为城市恢复和修缮做了许多努力。他派专人负责监督城市的供应；在城内建立公共机构和慈善机构，比如图书馆、学校、施粥所；还建立哈米迪耶图书馆——这是第一个不属于清真寺的独立的图书馆，东方学者和外国旅行家频频来此参观。[①]

阿卜杜·哈米德一世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实行有效统治，但并未达到目的。地方贵族势力的膨胀，已经是长期存在的事实，而18世纪后期，由于奥斯曼帝国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必须依赖地方贵族的帮助，不得不笼络贵族，给他们安排各种官职，甚至给予极大的物质方面的好处，以换得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这样一来，更助长了地方贵族的势力。一些贵族建立了自己的财政和司法机构，拥有独立的军队，除了形式上承认奥斯曼素丹的宗主地位，实际上已经不愿服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在埃及，马穆路克占据了行政和军事上的重要职位，地方政权几乎被当地实力派控制，奥斯曼总督所能做的，就是唆使这些地方实权人物相互争夺，以便于自己能维系统治权。有的实力派在消灭反对派之后，会独立掌控埃及，奥斯曼总督的管辖权名存实亡。1786年，那位推动海军改革的盖兹·哈桑帕夏亲自率军队征讨埃及马穆路克，但并未达到铲除马穆路克势力的目的，只是迫使其重新服从中央政府。而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马穆路克领袖建立了对当地的有效统治，公然对抗中央政府，不向政府缴纳赋税。[②]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6.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53.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所谓的技术引进，并没有把技术引进到奥斯曼帝国。相反，倒是把西方的建筑风格、家具、装潢等技术引入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土耳其人仿照欧洲时尚，请人给他们制作肖像。[①] 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把学习西方语言当成当时的时尚。从消费方式和享乐方式看，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到18世纪晚期已经具有欧洲风格了，欧洲的消费方式，自然流行开来，用不着政府倡导和指示。至于哈利尔·哈密特帕夏的改革理想，阿卜杜·哈米德一世富国强兵的愿望，只能等待后来者去实现了。

哈利尔·哈密特帕夏推行改革，一度受到统治阶层中较为广泛的支持。无论奥斯曼素丹，还是那些通过打击保守派势力来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人，基本上支持改革。至于那些出身于新军的官员，以及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才俊，更是支持帕夏的改革。不过，保守势力还是强大的，那些既得利益受到影响的人，那些宗教界的重要人物，还有不希望改变传统工商业的人，构成强大的反对力量。说到底，支持哈利尔·哈密特帕夏的人，并不是全部乐意改革，而是帝国面临生存危机，感到非改革不可。一旦危机稍有缓解，反对改革的力量就会超过支持改革的力量。而且，国外势力的插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例如，奥地利和俄国就不希望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而强大，英国、法国、荷兰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垮掉而被俄国和奥地利肢解，因而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当然，最后毁掉改革的，还是奥斯曼政府内部的斗争。哈利尔·哈密特帕夏被解职，并于1785年4月27日被处死。1787年法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人员，改革未能继续下去。1789年阿卜杜·哈米德一世中风而死。

第三节　塞利姆三世的改革

虽然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进行过改革尝试，尤其阿卜杜·哈米德一世时期的军事改革，明确地把建立西式军队和引进西方技术作为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改革取得的成效不大。一般认为，奥斯曼帝国真正改革的开端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

---

①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89.

一 塞利姆三世受命于危难之际

1789年（伊斯兰历1203年）8月，塞利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上台执政。这位塞利姆，是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一世的哥哥穆斯塔法三世的儿子，阿卜杜·哈米德一世因中风而突然病逝，塞利姆被推上奥斯曼素丹宝座，在托普卡帕宫（*Topkapı Sarayı*）门前举行登基仪式之后，正式成为托普卡帕宫的主人。[①]

塞利姆三世上台时国内面临着两个严峻的问题，一是地方分裂势力对中央政权的挑战，二是加尼沙里军队已经变成奥斯曼帝国的负担。就前一个问题而言，那些行省的军事贵族达到他们权力的顶峰，整个社会都由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控制，而且，他们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加尼沙里军队的情况是：随着征服战争的停止，军队的重要性降低，因而军队建设被忽视；士兵缺少训练，纪律涣散，装备也没有更新，军队几乎失去战斗力。[②]

当时国际环境极为不利，等待塞利姆三世的是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塞利姆三世刚一上台就采取了行动（事后证明是错误的行动），撤了尤素福帕夏（Yûsuf Paşa）的大维齐职务，任命哈桑帕夏（Hasan Paşa）为大维齐。哈桑帕夏的首要任务是军事上取得进展，然而，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很快击败了奥斯曼帝国军队。俄军攻克阿基尔曼和本德（Bender）城堡，奥地利军队占领贝尔格莱德。[③] 不久俄军攻击伊斯迈尔城，哈桑帕夏率领的军队在该地区大败。

这场战争从1787年9月15日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将近五年。最后接受英、普、荷三国的调停，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了《雅西和约》[④]（1792年1月9日）。《雅西和约》使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也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宗主权。俄国还获得了奥沙科夫

---

①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82.

②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20 – 21.

③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82.

④ 土耳其文名称：Yaş Barış Antlaşmasi；英文名称：Jassy Treaty。

(Oşakof)[1]港以及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Dinyester）之间的土地（俄国在此建起敖德萨港）。[2] 但欧洲其他国家对俄国的抵制，使奥斯曼帝国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等地的利益未受到损失，而且，沙俄同意从巴尔干东部的公国撤军，也从多瑙河的主要港口撤出。关键是，《雅西和约》的签订，使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奥地利之间恢复短暂的和平，塞利姆三世得以趁此机会推行改革。

现有的研究表明，塞利姆三世虽然生长在皇宫，但并不缺乏改革意识。早年他的父亲穆斯塔法三世允许塞利姆见过巴隆·德·托特和其他外国军官训练的新式炮兵和滑膛枪部队。穆斯塔法三世死后，塞利姆没有登上王位而是由他的叔叔继位。塞利姆一度被软禁在宫中。表面上看他与外界隔绝，实际上他能够通过身边的仆人、朋友，还有他的威尼斯医生，继续了解宫廷外面的情况。尤其那位威尼斯医生，本是法国和奥地利使馆的雇员，能够获得很多关于本国和西方世界的信息。[3] 也就是说，塞利姆早已对帝国国内的政治状况有所了解，对西方世界的发达也有耳闻。据说他作为王子被幽禁在宫中时，就与路易十六通信，表示自己要成为一个开明君主，希望得到法国帮助，重建奥斯曼帝国军队，收复先前被俄国割占的领土。一种说法是，给路易十六写信请求帮助时，塞利姆三世已经登基，写信时间大致是在 1789 年，这一年塞利姆三世即位。[4] 正因为塞利姆对国内和国外的情况有所了解，所以他对奥斯曼帝国衰落和腐败的状况有大致的认识。他的判断是，帝国正处于困境中：各种传统政治机构不能良好运作，官员目无法纪、滥用职权，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各种机构的服务职能欠缺；尤为严重的是，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足以使行省和属地的实权派人物服从；而且军事力量太弱，不足以抵御外敌。

不过，塞利姆三世刚即位的最初三年时间里，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打赢或尽快结束战争，还无法制订任何改革计划。从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塞利姆三世发现，奥斯曼帝国的加尼沙里军团和骑兵已经退化到

---

① 土耳其文 Oşakof（奥沙科夫）、英文 Ochakov（奥扎科夫）是指同一个地方。

② Enver Ziya Karal, *Osmanlı Tarihi*, Vol. V,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5, p. 20.

③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60.

④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32.

实际上毫无用处的地步。据记载，塞利姆三世也比前几任奥斯曼素丹博学多闻，他上台的那一年 27 岁，年轻，也希望有所作为。在他的政府中，有一批颇具改革思想的官员，还有一些愿意参加到改革运动中来的前朝旧臣。这些热心改革的人准备了有关帝国形势的报告，并提出了如何挽救帝国的设想，他们等待时机将自己的改革思想付诸实践。报告所涉及的内容，有的远远超出塞利姆三世的最初打算。比如，这些支持者们建议：既然要改革，就不能仅仅是军事改革，建立现代化军队，还要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不仅要得到上层的支持，征询他们的意见，还要与那些接受改革影响的人们进行磋商；当然，还要努力发展国家的经济，这样才能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有人在报告中直接指出，旧的军事制度已经无法改变，必须废除旧制度，确立新的军事制度。①

尽管富国强兵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塞利姆三世本人和改革支持者们还是认识到，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军队的改革。旧军队纪律涣散、战斗力很差，如何改造这些旧军队，使之恢复往日的威力？如何配备欧洲新式武装，掌握新的战术，使其有能力战胜俄国和奥地利军队？或者组建新式军队，但如何组建？这些问题摆在改革者面前。

回顾奥斯曼帝国军队发展的历史可以知道：奥斯曼帝国在 15 世纪才发展海军，而最初征收海军士兵，是从希腊、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征收的。这些海军士兵没有得到训练，也不够忠诚，不领军饷，只是分享战利品。后来，加尼沙里军、封建西帕希军、特种步兵都可以在海军中服役。到了 16 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海军仍然雇佣其他兵源的士兵，还包括免税的和有特权的游牧民。奥斯曼帝国海军在苏莱曼大帝时一度扩张、壮大。苏莱曼大帝死后，奥斯曼帝国海军衰落。1571 年在勒班陀（Lepanto）与欧洲舰队的战役中被击败，遭受重创。16 世纪奥斯曼帝国海军由 10 艘大型舰、40 艘中型舰、1 艘海军司令指挥舰和许多小艇组成。大型舰每艘有 600 名海军士兵，中型舰每艘有 300 名海军士兵，指挥舰有 800 名士兵。就这个规模的海军舰队，炮没有安放在有效的位置，军械储运无序，后勤供应混乱，军官缺少培训。② 17 世纪和 18 世纪几乎每次与俄国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p. 260 – 261.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34 – 35.

的战争都以失败告终。[①]所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奥斯曼帝国改革的迫切任务，也是核心任务。1792 年塞利姆三世召集各界要人共同商讨改革事宜。当塞利姆三世征询意见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军事改革势在必行。塞利姆三世下令仿照欧洲式样建立新军，也建立陆军和海军学校，聘请法国教官，给土耳其青年讲现代军事科学。[②]

1792 年 5 月，尤素福帕夏被任命为特拉布宗（Trabzon）的总督和阿纳帕（Anapa）部队的司令，迈勒克·穆罕默德帕夏（Melek Mehmed Paşa）被任命为大维齐。迈勒克帕夏认为自己勤奋履职，但受到的限制较多，与素丹塞利姆三世的直接沟通较少。许多事务需要迈勒克帕夏处理，他着手改善陆军，并筹划海军建设，成为塞利姆三世改革初期有影响的人物。两年半之后，即 1794 年，塞利姆三世组建新军队，修造海军船坞，而迈勒克帕夏于 10 月离开大维齐职位。伊宰德·穆罕默德帕夏被任命为大维齐，继续推行改革。[③]

二　厉行改革的举措

塞利姆三世的改革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研究发现，塞利姆三世当政期间的军事改革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改革“加尼沙里军”和“西帕希”骑兵，同时建立新军。

首先，大幅度地缩减加尼沙里军人数，军团人数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大约只留下 3 万人）。对军团的士兵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配备欧式的来复枪，配发充足的弹药。专人负责教导士兵使用新式武器。为缓和矛盾，增加了军饷，增设了军职。建立后备军，随时补充兵员。允许蒂玛（采邑）持有者把蒂玛传给儿子中有才能的一位，条件是让其子履行相应的军事职责。

接着是建立新军队。1794 年塞利姆三世建立新式步兵，命名为“新正规军”（Nizam-ı Cedid）。塞利姆三世尽量小心，不至于引起加尼沙里军

---

① 说明：不仅仅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对俄战争，整个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奥斯曼帝国军队多次被俄国军队打败，尤其土耳其海军屡战屡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元帅林普斯（Limpus）帮助奥斯曼帝国军队建设海军，收效甚微。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32 – 33.

③ Mehmet Maksudog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84.

队的不满。建立的新军起初规模不大，大约1万人。[①]有的资料记载，到1797年，新正规军9200人，军官27人；1802年达到22685人，军官1590人。[②] 组建新军后，出现新军队与旧军队并存的局面。

第二，士兵选拔和培训，军官任用和考核。

军官和士兵都要经过考试选用。对于西帕希部队，塞利姆三世建立检查委员会，淘汰那些缺乏能力、缺少忠诚、办事不讲效率的官兵。对任命军官也做了严格的规定。不过，为了减少贿赂和人情因素的影响，军官晋升还是依据资历。新兵优先招募军官的子弟和现役士兵的子弟，也从非正规部队中挑选高素质的士兵，作为替补兵。对所有军官和士兵进行教育和训练。新建军队的士兵，以省区总督、地方官员和贵族选送来的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农家子弟为主。

组建新军时，塞利姆三世把任务交给一位叫奥马尔的军官（土耳其人，曾在沙皇陆军中任中尉），组建了一支全副欧式军服的兵团，用新的战术进行训练和演习。当然，一般资料中只是笼统地说，奥斯曼素丹聘请法国、英国和德国教官进行欧洲式的军事训练。[③] 值得一提的是，塞利姆三世在1796年就得到法国的新武器。当时法国督政府派杜白耶将军为驻奥斯曼帝国大使，送给塞利姆三世几种新式大炮和新式枪械作为礼物。杜白耶将军的随行人员中掌握新式武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人，还有从法国军队中抽调的教官，共同帮助素丹组建和训练新军。[④]

第三，军队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制度化。

将每支部队的军事职能和行政职能分开，这是基本的改革内容。专门委任高级督察处理行政事务，原来拥有全权的指挥官阿加只保留军事指挥权。建立新的组织机构，确立军阶制度。同时，确立军饷定期发放的制度。对西帕希部队，设计了一套轮换制度：同一地区来的10名西帕希士兵中，选择一人回家管理自己和其他人的采邑，其余人继续服役。还规定：不允许士兵结婚，服役期间不允许回家。

---

①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21 – 22.

②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Çeviren Server Tanilli,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14.

③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14.

④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8页。

塞利姆三世建立新军花费大量资金，为了保障新军队的薪饷供应，专门设立了独立的财政部门——“新税务司”，相当于建立军用财库，使资金有独立的来源，也有专门的用途，不受其他环节的影响。其实，这项资金源于额外追加的税收收入——向已经不堪重负的纳税人多收了税。[①]

在海军改革中，为了保证军官晋升的公正、有效，颁布了相关的法令，强制性地留用或选拔有才干的军官，依据能力晋升军职。同时，派出督察人员检查海军管理状况，防止舰长以职权谋取私利，确保舰艇上的食物、设备、薪金公正地分配到各级海军军官和士兵手中。严明纪律，严格管理，鼓励水兵向职业化发展。

塞利姆三世海军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建立海军医疗服务机构，给每艘舰配备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这些医生都是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在公共医院或兵工厂医院实习过。在海军中建立独立的医疗机构的举措，是其海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②] 后世西方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第四，军事技术的引进和军事学校的建立。

引进军事技术，对旧军队进行技术改造，提供现代武器，掌握现代武器的使用方法，这是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在不具备制造枪炮能力时，直接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聘请法国和英国的技术人员，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不过，塞利姆三世改革的目的是要自己生产现代武器，自己培养军事人才。于是，一方面使已经建立的旧式铸炮厂和弹药制造厂现代化，另一方面建立军事学校，尤其是技术学校。原来的军校是盖兹·哈桑创建的海军工程学校，还有塞利姆三世本人在战争时期建立的素丹工程学校，当时只是为了让年轻的侍从人员学习算术和几何知识，所以规模较小。塞利姆三世计划中的高级技术学校，直到 1795 年才建立起来，名为陆军工程学校。学校的目标主要是培养军事指挥官，学习科目有大炮、防御、布雷、工程等，有理论学习也有实践。陆军工程学校毕业的学生，除了留在学校从事教学的一部分，其余均分配在加农炮部队、迫击炮部队、布雷部队，得到相应的职位。

此外，在哈斯柯伊等地也设立海军学校，开设几何、算术等基础课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14.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6, p. 264.

程，也开设船舰驾驶、航海技术等方面的实践课。塞利姆三世建立的学校聘用欧洲教官，从英国购置舰艇，并进行水兵训练，充实帝国海军。边境防御系统采用现代化方式，也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技术方面的革新，尤其是炮兵建设以及建立著名的托普坎尼（Topkhane）枪炮铸造厂。[①]

概括起来，塞利姆三世旨在建立西式军队的具体措施包括多方面：建立新式正规化军团；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新式兵团的士兵全部采用欧洲新式的来福枪；学习和采用新的战术，完全按照欧洲战术科目进行训练；建立了几所陆军和海军学校，聘请法国军官做教练和顾问，在军校开设炮术、防御工事、海战等内容的课程；改建炮兵工厂、枪械厂等，试制新式武器；在帝国境内实行普遍征兵以代替直到那时还沿用的募兵制；士兵穿欧式军服；全体官兵一律实行薪给制。

此外，塞利姆三世试图加强中央集权，改组奥斯曼帝国的国务会议，国务会议中的 12 位大臣有权对所有重要政策法规进行讨论，以此削弱大维齐的权力。塞利姆三世曾于 1791 年派艾布·巴克尔（Ebu Bakir）去维也纳学习奥地利的政府管理和军队管理方式。塞利姆三世明白，真正的改革不能依赖传统的政府机器来实现，他建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以便在他的主持下商讨改革方案。1792 年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土耳其外交队伍中囊括了一批进步人士。[②]

像这一时期东方国家的所有改革者一样，塞利姆三世试图改革行政、经济和社会习俗，但考虑到轻重缓急，他的改革自始至终以军事和财政为主要领域。[③] 由于主要精力和决心用于军事改革，财政方面也是围绕着给军事改革提供资金，并没有在社会经济方面花费多大的功夫。关键是，没有找到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比如，财政和金融混乱，缺少全面的预算，没有财政监督，非生产性的开支过大等问题，塞利姆三世和改革者们未能拿出改革方案。又如，许多农民逃离原来的村庄涌入城市，究竟是什么原因，改革者并不去追究，而是颁布法令强

---

① Alfred Bonne,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1998, p. 10.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90 - 91.

③ Alfred Bonne,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1998, p. 10.

制农民返回家乡。办法是关闭旅馆、客栈、饮食店，使这些流动人口无处解决食宿，被迫离开城市。至于这些农民有没有土地，能否生存下去，则无人查究。由于经济困难引起不同阶级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紧张，塞利姆三世的法令则是强化身份地位，穿传统服装，有意标明各自的地位和身份。面对财政困难，解决的办法是贬低币值，没收富商的财产，强行增加税收。[①] 这些办法等于是“用药不对症”，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三　未完成改革大业

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半途而废，因为他本人被废黜，新军被解散，其余改革措施也没有继续执行。

从 1804 年塞尔维亚发生革命，到 1806 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军事冲突，塞利姆三世在国内和国外都遇到了一连串的麻烦。1805 年塞利姆三世颁布法令，要在埃迪尔纳也建立一支新军，鲁米利亚行省的贵族发动叛乱。当塞利姆三世准备派兵镇压叛乱时，色雷斯也发生了叛乱，不得不命令军队撤回，对付色雷斯的叛军。[②] 在这前后，国内还爆发了瓦哈比教派的叛乱，使局势变得更加严峻。此时，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与巴尔干地区的实权人物、加尼沙里军、伊斯坦布尔的乌勒玛联合起来，构成反对素丹的力量，并阴谋推翻塞利姆三世。通史著作中提到的“埃迪尔纳事件”，是指塞利姆三世 1806 年准备在巴尔干建立他的新军时，当地反对派不同意在此组建新军，也不允许已有的新军进入埃迪尔纳。塞利姆三世期望或者估计巴尔干地区的贵族和官员支持这项事业，结果出乎意料，新军改革在巴尔干地区遭到抵制。[③] 后来决定塞利姆三世命运的事件，是发生于 1807 年的加尼沙里军队叛乱。起因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要塞的守军拒绝穿戴欧式军装。这支部队向伊斯坦布尔挺进，形成逼宫之势，最终迫使塞利姆三世下台。[④]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65.

②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2.

③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Çeviren Server Tanilli,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14.

④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15.

一般的说法是，塞利姆三世举措失当，被叛军废黜，新军被解散。当时的详细情形是：1807 年 5 月下旬伊斯坦布尔附近地区发生了骚乱，塞利姆三世听从大教长的建议采取安抚策略，然而，驻守博斯普鲁斯要塞的部队（加尼沙里军的附属部队）向伊斯坦布尔挺进，城内的保守派势力——加尼沙里军团、乌勒玛、宗教学校的学生，与各类对塞利姆三世不满的人纠结一起，加入叛乱者行列。当叛军到达王宫时，塞利姆三世被迫答应解散新军，并把新军军官交给叛军处理，并对保守派成员委以重任。但叛乱者提出更高的条件，要宣告改革为非法，废黜塞利姆三世。叛乱者最终达到目的，塞利姆三世被迫退位，由他的堂兄于 5 月 29 日继位，称穆斯塔法四世（Mustaf Ⅳ）。

塞利姆三世被废黜后，新上台的素丹穆斯塔法四世不支持改革，取消了塞利姆三世的多项法令。穆斯塔法四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①]，能力有限，被支持他的人推上素丹宝座，因此受拥立他的那批人的摆布。他首先解散新军，废止新式学校，在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恢复改革前的制度。已经没收的蒂玛发还原主，已罢免的加尼沙里军官被重新起用。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内搜捕新军军官，屠杀支持改革的人，制造新的恐怖。好在反对改革的一派的胜利并不持久。穆斯塔法四世和他的同盟者很快认识到，所谓的帝国政治，仅仅限于首都及其附近地区，政府向其他地区课税和征募士兵都有困难，更不要说行使其他权力。穆斯塔法四世想拉拢某一两个有权势的行省贵族，马上引起其他实力派人物的强烈反对。新政权中得势的集团，为分享胜利果实而相互争斗，军队中更是一片混乱。

这时，试图恢复塞利姆三世王位的力量，以及支持改革的人物，逐渐汇聚到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Alemdar Mustafa）帕夏麾下。[②] 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控制着从多瑙河到首都坦布尔之间的广阔地区，与马其顿的统治者塞勒兹里·伊斯玛仪（Serezli Ismail）建立了重要的同盟。塞

---

①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93.

② 这次政变中的重要人物阿莱姆达·穆斯塔法（Alemdar Mustafa）帕夏，在一些著作中的名字是贝拉克达·穆斯塔法（Bayrakdar Mustafa），汉文著作中也译为“贝拉克坦·穆斯塔法”或“拜拉克塔尔”。关于阿莱姆达·穆斯塔法帕夏的军事势力，也有各种说法，不过，一般都肯定，他是西式新军改革的支持者，在抵抗俄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被提升到省级职位，在东鲁米利亚（或仅仅在埃迪尔纳）有一定影响力。详见：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94。

勒兹里·伊斯玛仪不是军阀，没有实质上的军事力量，但他赢得当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一致的拥戴。由于他鼓励当地的非穆斯林自由从事农业和商业，在非穆斯林中的威望更高。有塞勒兹里·伊斯玛仪的支持，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在东鲁米利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有一支受过训练、装备精良的军队，约3万人，是当时帝国内最强的一支军事力量，而且直接“威胁”首都的安全，这一点新素丹穆斯塔法四世是清楚的。[①] 1808年7月19日，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率领一支军队（大约1.6万人）进入伊斯坦布尔，迅速控制了局面。在军队围攻皇宫时，穆斯塔法四世派人在宫中杀死了塞利姆三世。王子马哈茂德（Mahmud）[②] 设法逃出王宫。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宣布拥立马哈茂德为奥斯曼素丹（1808年7月28日），这次政变取得成功。新上台的素丹即马哈茂德二世。

关于这次政变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说法一，加尼沙里军叛乱，是由于加尼沙里军的军饷被拖欠。说法二，塞利姆三世被废黜的“罪状”是，执政多年还没有子嗣（马哈茂德是穆斯塔法四世的胞弟）。说法三，马哈茂德是藏匿在宫中的一只空炉子里才侥幸逃命，并不是设法逃出皇宫去投奔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的。说法四，发动政变的军队是由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领导者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是鲁斯丘克（Rusçuk）的总督。说法五：逃出来的改革派或者支持改革者汇集到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的驻地鲁斯丘克，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率军队行进至伊斯坦布尔，意在支持塞利姆三世复位。而塞利姆三世却被新素丹穆斯塔法四世杀死，只有马哈茂德王子躲过追杀，在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的支持下，当上奥斯曼帝国的素丹。[③] 关键的是，在军队围攻皇宫前后，皇宫之内还有激烈斗争，塞利姆三世试图夺回政权，穆斯塔法四世则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果断地杀死了塞利姆三世。[④] 不管马哈茂德王

---

① M. Şükrü. Haniog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55－56.

② 这位马哈茂德王子的名字，土耳其文是Mahmud，英文文献中出现Mahmoud、Mahmut两种，汉文译文有“默罕默德”、“马哈穆德”、“马哈茂德”。

③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2.

④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94.

子是在皇宫内躲藏，还是出逃，算是作为仅有的皇室血脉留存下来。

总之，自从塞利姆三世在政变中被废黜，改革事业就中断了。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说短论长时，感到惋惜的是塞利姆三世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不是能力不够或运筹有误，而是当时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非常恶劣。

就国内而言，反对塞利姆三世改革的力量，来自加尼沙里军队，来自乌勒玛，也来自因改革而触动了利益的其他人。有些原本支持改革的人，担心世俗主义观念会摧毁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转而放弃对改革的支持。此外，改革中贬低币值，政府过度开支，导致物价不稳，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于是人们把经济的困难归咎于素丹的改革。有的学者认为，塞利姆三世被废黜，主要是加尼沙里军与乌勒玛联合，后来马哈茂德二世取得成功，主要是控制了乌勒玛，至少乌勒玛不得不向奥斯曼素丹妥协。[①] 有的研究者认为，推行改革之前的奥斯曼政府就是一种“有限”的君主制，因为奥斯曼帝国名义上或理论上宣称素丹拥有无可争辩的君主权，现实中奥斯曼素丹们的统治权有限，地位也不稳固，不时地被废黜。[②] 这些说法各有其道理，不过，应该看到奥斯曼帝国当时的“外患”。塞利姆三世的改革未能顺利进行，客观的干扰因素缺失很多。为了尽快结束对外战争，1789 年与瑞典结盟，1790 年与普鲁士结盟，目的是抵制俄国和奥地利，结束战争，营造对国内改革有利的外部环境。1793 年任命第一位驻伦敦的常设大使，1795 年往柏林、维也纳、巴黎派出大使。[③] 当法国于 1798 年入侵埃及行省时，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和俄国结盟，公开反对法国。但 1805 年拿破仑打败了奥地利和俄国，拿破仑劝塞利姆三世与法国结盟，塞利姆三世于 1806 年又与法国结盟（当然，这一阶段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总体上还是亲英的倾向明显，或者说与英国的关系较为稳定）。1806 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又发生战争。塞利姆三世这位有抱负的素丹，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多变的外部局势。

---

① Albert. Hourani, Philip S. Khoury,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Reader*, London, New York, 1993, p. 39.

② Tezcan, Baki, “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3, May 2009, p. 477.

③ Gά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15.

四　后世的评价

客观地说，塞利姆三世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达到，改革措施发挥的直接效用不大。史书中说的塞利姆三世改革失败，也就是指改革法令被取消，军队改革未完成。本来塞利姆三世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强兵”，确实引进了一些欧洲新式的军事武器，学习和采用新的战术，建立了几所陆军和海军学校，改建炮兵工厂、枪械厂等，试制新式武器。从军事设施看颇具现代军事特色，问题的关键是，整体上距离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很远。因为军事管理没有改善，军人的素质没有提高，战斗力并未增强；对旧军队的改造几乎是失败的，加尼沙里军和西帕希部队仍是老样子；部队各级长官滥用职权，损公肥私，隐瞒军队内部的实际情况，塞利姆三世派到各省的督察也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加尼沙里军的管理仍旧混乱；减少加尼沙里军和西帕希骑兵规模的措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所以精简军队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达到。

塞利姆三世并未把力量花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上，有些改革计划并没有真正推行，但一些局部的并不引人注意的改革措施，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增加城市的食物供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和食品短缺引起的通货膨胀；又如减少维齐等级的人数，使职位与待遇相符；重组文书服务机构，解雇行政部门中缺少能力或不服管束的文员；遏制行贿和利用裙带关系谋职等官场不正之风。塞利姆三世改革时，鼓励创设学校，重新开办印刷厂，翻译和印刷西方书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等欧洲城市派遣使节或领事，选送学生去西方留学等，这些措施也起到积极作用。

其实，多数研究者并未一概否定塞利姆三世改革的意义，故而把这次改革当作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的真正起点。例如，斯坦福·肖的著作用较多篇幅描述改革的详细内容，并指出这次改革为后来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他认为，尽管改革的影响不明显，但它为取得更广的更有意义的突破做了准备，为几十年后的现代土耳其奠定了基础。[①]

一个基本的信息是：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方的知识、观念以及西方的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65. 说明：《奥斯曼帝国》中把这句翻译为：“它确实是为几十年后现代土耳其的建立奠定了更广泛更有意义的渗透性的基础工作”。见［美］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上卷的中译本），许序雅、张忠祥译，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33 页。

生活方式，通过多种渠道进入奥斯曼帝国。欧洲军官、欧洲技术人员，尤其是法国军官和法国技术人员对奥斯曼帝国影响最大。倘若把西方科技文化传入奥斯曼帝国归结于塞利姆三世改革，也不无道理。至少塞利姆三世继承前任奥斯曼素丹的改革，倡导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对输入外来文明是有利的。欧洲教官和欧洲技术人员来到奥斯曼帝国介绍军事技术，介绍新式武器的使用方法，都是塞利姆三世和前任素丹阿布杜·哈米德一世所欢迎的。这些军官和技术人员也构成奥斯曼社会一个特殊的外国人团体，他们和外来的商人团体、外交使团一样，有机会接触当地人，而奥斯曼帝国的居民可以随时随地观察和模仿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处世方式。

当然，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对欧洲文明传入奥斯曼帝国的推动作用不能拔高。因为，无论前任奥斯曼素丹阿布杜·哈米德一世还是塞利姆三世本人，改革的目的都是希望尽快“强兵”，扭转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局面，带有极强的功利性，所谓引进西方科学，改变社会面貌，只是理想。西方文明快速进入奥斯曼帝国，大概欧洲人的主动性高得多。塞利姆三世上台的那一年法国发生了大革命，而奥斯曼帝国的居民中有多少人完全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真实含义，确实不好判断。据说塞利姆三世支持推翻波旁王朝后的法国政府，可见他也没有弄明白“革命”就意味着颠覆皇权、处死皇帝，他还以为革命对皇权有利。奥斯曼帝国中还是有一些人主动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再向本国人民介绍西方文明。比如驻外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去西方的旅行者、在欧洲做生意的商人等等，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沟通和交流的作用，只是塞利姆三世当政的时期这样的文化传播并不普遍。[①] 实际的情况是，法国革命的支持者把法国革命的信息带到奥斯曼帝国，法国革命的反对者也把相关的信息带进奥斯曼帝国。当时宣传法国革命的小册子被译成奥斯曼帝国通用的文字，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散发，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向奥斯曼帝国传播。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国家比邻而居，想闭关锁国也办不到。在欧洲文明向全世界强势渗透的大趋势中，衰弱不堪的奥斯曼帝国风雨飘摇，改革图强则存，抱残守缺则亡。塞利姆三世能洞察帝国的忧患，明白敌强己弱之势，是富有政治远见，也具有实践精神的统治者，其改革的举措值得称赞。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66.

第三章　法军入侵与埃及行省的半独立

奥斯曼帝国于1517年征服埃及，埃及变成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

征服之前，埃及有马穆路克王朝，征服之后，奥斯曼帝国对埃及制定了特殊的政策。除了派遣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担任的埃及总督，还在埃及派驻1万人的加尼沙里军，并没有消灭埃及的马穆路克势力。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并不稳固，到18世纪中叶，马穆路克首领阿里贝伊一度控制埃及，废黜了帝国派来的埃及总督，并拒绝纳贡。虽然阿里贝伊被杀，但马穆路克内部派系林立，埃及行省出现割据局面，大小头目争权夺利，混战不休，埃及社会动荡，下层民众生活艰难。就在这个形势下，埃及第一次遭遇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征服了埃及，但没能长久统治，倒是给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统一和治理埃及的机会。

第一节　拿破仑入侵埃及及其影响

一　拿破仑入侵埃及行省

1798年4月，法国督政府任命拿破仑为东方军司令，派遣他率领大军远征埃及。一般认为，法国的目标是占领埃及，建立法国在近东的殖民地，然后控制红海，向东扩张，截断英国通往印度的运输线。当然，后世有人对法国的真实意图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法国远征埃及并非是针对英国，而是冲着俄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1] 拿破仑大军于5月19日从土伦

---

① 法国为什么要派拿破仑远征埃及？拿破仑远征要达到什么目的？学者们对此有争议。一般认为，拿破仑远征埃及是英法矛盾的结果，法国远征埃及是为了切断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运输线。多数学者持这样的观点。不过，费希尔《中东史》中则说："波拿巴真正的目的直到今日仍被神秘之幕遮盖着……鉴于拿破仑对伊斯坦布尔的重要性有着众所周知的关心，也许他打算先攻取埃及，然后进逼伊斯坦布尔、巴尔干地区和奥地利。"（参见费希尔《中东史》上册，第339页）。

港出发，各类战舰共计350艘，军队3.5万人①。6月10日占领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奥斯曼土耳其人1522年占领罗德斯岛，把马耳他岛交给绰号“骑士圣约翰”的海盗管理）。7月1日到达亚历山大港。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布防，但错误判断了法国军队的行军方向，一度赶在拿破仑军队之前抵达亚历山大港，没有发现法国舰队，急忙折向克里特岛。拿破仑的军队则顺利到达目的地。拿破仑军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很快攻陷了亚历山大城。然后分兵南下，直取开罗。7月21日，法军开始攻击开罗，24日进入开罗。

拿破仑进入埃及后，宣称他崇敬先知穆罕默德，表示要皈依伊斯兰教。他缠着头巾，穿着长袍，到清真寺做礼拜，真正的目的是笼络当地人。埃及人在看到拿破仑定期颁布的阿拉伯文公告时，心里明白，这位侵略者在作秀和欺骗他们，但他们只能屈服于这位带着武器的新主人。拿破仑登陆后的第一份公告指出：“埃及人民，也许有人会说我来此是为了摧毁你们的宗教，请不要相信！我来此是要恢复你们的权利，惩罚篡权者。我比马穆路克更加敬重先知和古兰经……荣耀归于素丹，归于他的朋友法国军队！诅咒马穆路克，幸福属于埃及人民！”②

在亚历山大，法军与奥斯曼土耳其军人联合巡逻，共同维持秩序，主要是为了避免摩擦。开罗的分区管制则不那么容易。虽然有不少禁令，但开罗居民还是不断诋毁法国人，谣言四起，骚乱日益增长，一些怀着仇恨的人化装成农民秘密进入开罗。当时治安问题严峻，拿破仑决定成立由奥

有的学者指出：（1）拿破仑远征埃及和叙利亚，是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一次国际冲突，是“东方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2）拿破仑远征主要矛头是指向沙皇俄国的，并非指向英国；这次战略计划的主要敌人是俄国而不是英国；拿破仑行军的目标不是印度，而是想控制君士坦丁堡、黑海。（3）拿破仑远征埃及和叙利亚，是为了称霸地中海，夺取君士坦丁堡，从欧洲的南面来打败反法同盟君主国，进而确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参见林贤报、陈瑜《俄法矛盾与拿破仑远征埃及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第97—102页）实际上，要是拿破仑彻底占领埃及，并进一步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既能达到打击英国的目的，也能达到北上对付俄国的目的。况且，法国远征埃及也有商业意图。因为埃及是谷物产地而法国南部需要从埃及购买谷物；埃及处于重要地理位置，地中海贸易中大小商船必经埃及亚历山大港。详见：Bill Williams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Change in Egypt and Turkey*, Macmillan Press, 1987, pp. 61 - 62。

① 土耳其文的奥斯曼帝国通史中，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军队6万人，有300余艘运输船，5艘战舰。详见：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85.

②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103 - 104.

斯曼军人组成的治安联队，维持公共秩序。

拿破仑占领开罗的第二天（7月25日），马上召开行政会议，两天后（7月27日）召开各省行政会议。10月5日拿破仑召集过一次大约200名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类似于制宪会议。九名常设委员会的成员由拿破仑信任的马加龙（Magallon）等人挑选，按照拿破仑的意图，只挑选土耳其人，不要马穆路克。常设委员会负责实现拿破仑交给他们的四项任务：一是组织外省行政会议，并向行政会成员发放薪水；二是建立民事和刑事司法制度；三是拟定继承法；四是提出改善财产制度和税收征收的建议。[①] 召开全埃及的国务会议，目的是把埃及的上层人士网罗进这些机构，充当法国殖民的工具。10月下旬开罗爆发了起义，被拿破仑镇压了。为防止新的反抗活动发生，采取了高压手段。到12月25日，行政会议的常设机构迪万（Diwan）[②] 才真正建立。

为了实现有效占领，拿破仑建立起军事管理体制。设立财务总署（Trésorerie générale）管理整个埃及的支出，包括民事机构官员的薪水；另设军事专员数名。总署和专员为军队筹资，只对总司令负责。拿破仑坐在他的司令部里控制着埃及的行政、财税、司法。面对埃及出现的局面，拿破仑想在这里长期统治，不得不调整行政管理方式，依靠地方势力，维持奥斯曼帝国对埃及行省的控制。拿破仑让埃及科普特人和基督教少数派、穆斯林，都参与到法国的管理体制中。为了应付局势，拿破仑附设了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其成员是他信赖的三个人：蒙热（Monge）、贝尔托莱（Berthollet）和马加龙，所有民事官员由他们三人提名任命。此时法国军队已缺少薪饷，但大部分埃及官员都带着文件和钱款逃跑了，原来的管理机构完全瘫痪。拿破仑仍维持基层机构，派科普特人征税。不得已，只能强制性捐纳。要建立正常的财政体制，新机构碰到的困难很多，比如，当地词汇中混杂着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法国人是没办法沟通的，只能依靠奥斯曼地方官协助。控制铸币权也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拿破仑占领期间将埃及铸币权收归己有，其实这侵犯了奥斯曼素丹的

---

①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 110.

② 开罗的行政会议实际上相当于拿破仑的咨询机构。所谓国务会议也没有定期召开。起初行政会议成员每天开会，由法国兵和土耳其军人担任警卫。旁听会议的人越来越少，一个月后行政会议成员也不去开会了。

主权。当时在开罗城内建起铸币机构，有近300名领薪职员，这是重要的公共机构。负责造币的是一位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人，而雇工大多数是科普特人。[①]

由于不少马穆路克封建主逃亡，他们的财产便被没收，或被占领者当局变卖，成为当局的收入。为此法国人设立了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清点马穆路克的财产。奥斯曼地方政府的官员易卜拉欣（Ibrahim）参与登记工作，有力地协助了没收财产的专门委员会。财产登记管理处有职员40多名，管理者中有3名欧洲人和2名埃及人。法国人把进行强制性登记看作一项新举措，甚至认为这是一项旨在"迅速开化埃及"的重大措施。[②]实际上，这项行政措施不久就被废弃了。

拿破仑控制埃及全境后，也试图健全地方管理机构。本来埃及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大省，各地分为不同的区或州，拿破仑把各个州当作省级建制，设立省行政会议，取代临时管理委员会。参加各省行政会议，是当地名流、伊斯兰学者和在埃及的法国商人。行政会议的议员领取固定薪水，而不是像奥斯曼体制那样从税款收入中支取。亚历山大、达米埃塔（Damiette）和罗塞达（Rosette）几个重要城市的行政会议可以管理其他各省。每个地方行政会议推选三名代表，参加开罗的"全埃及国务会议"。国务会议的九名常任委员，由拿破仑亲自任命。外省的实权人物是司令官（或省长），他在省内的权威，相当于拿破仑在全埃及的权威。省级单位的重要性在征税工作中就能体现出来。省长任命的科普特督办，负责征收税款，清查马穆路克的财产。不过，这些督办的工作由法国人来监控，少不了翻译人员的协助。到了乡间，税务督办和法国监督人员都有土耳其军人和法国士兵护卫。[③] 无论是开罗还是各州，管理者面对的最大难题，一是征税的问题，二是安全形势。沙漠里的阿拉伯人随时袭击文职人员，各省不得不派军人协助。法国殖民当局强行征税和摊派，引起埃及人强烈的反抗情绪。拿破仑和他的继任者花很大力气镇压和清剿反抗者，为

---

①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 108.

②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 115.

③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116 - 117.

此不惜大开杀戒[①]。

然而，外部形势也在变化。拿破仑入侵埃及，本来就是与奥斯曼政府为敌，同时，法军在地中海上也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②] 就在拿破仑占领开罗不到10天，英国将军纳尔逊率领的地中海舰队在亚历山大港附近歼灭了法国舰队（1798年8月1日），拿破仑海军的船舰只剩15艘。1798年年底，英国、俄国、奥地利、奥斯曼帝国等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在英国支持下，奥斯曼政府派遣艾哈迈德·吉扎尔帕夏率军队攻打驻守埃及的法军，海军也在罗德岛待命，准备开赴埃及北部港口。拿破仑面临英国舰队和奥斯曼帝国海陆军队的攻击，决定铤而走险，于1799年2月率1.3万军队离开埃及。拿破仑的目标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经过激战，法军占领阿里什，不久又占领加沙，还于3月7日占领雅法，3月18日占领海法。拿破仑连续占领几座城市，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因为统治巴勒斯坦的阿哈迈德帕夏非常残暴，当地人痛恨这位奥斯曼素丹任命的总督。拿破仑善于利用攻心术，号召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笼络安抚阿哈迈德帕夏统治时期的受害者。在基督徒和黎巴嫩山区的一些居民中间，拿破仑也找到了支持者。然而，拿破仑还是大肆屠杀，制造恐怖。攻克雅法城时，屠杀2000多人；在一次战役结束后，曾找借口枪杀了2500名战俘。[③]

看似势如破竹的拿破仑军队，在围攻阿克城时严重受挫。阿克城坚守了一个多月，仍没有被攻克。英国舰队切断了法军一部分围城炮兵的后援。没有强大的炮兵，法军的进攻注定要失败。从攻占雅法以后，法军遭受重大伤亡。更为严重的是，法国军队遭受瘟疫、热病和坏血病袭击，在

---

① 1799年6月底，拿破仑在三天之内枪决了30多人。有的未必是反叛分子，枪决他们的理由是，这些进入开罗的马格里布人、麦加人和马穆路克没有任何证件。后来枪决频繁，有人建议采用砍头的方式以节省子弹。法国人也设立过军事法庭，亚历山大就有一个常设的海军军事法庭，各部队也有军事委员会，负责对犯有抢劫、强奸和谋杀罪的法国士兵宣判死刑。1800年6月，接替拿破仑担任东方军司令的克雷贝尔被暗杀，凶手苏莱曼·哈拉比（Sulayman al-Halabi）被判处极刑（一种最残酷的处决方式）——他的右手被焚烧，随后刺穿身体挂在柱子上，让枭鸟啄食。他的三名同谋者被砍头，只有一名逃逸。详见 Patrice Bret, *L' Egypte au temps de l' 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122 - 123。

②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86.

③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259 - 260.

亚历山大、达米埃塔（今杜姆亚特）、开罗已经传播的传染病，也袭击雅法、加沙等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期间，法国军队死于瘟疫的人数占总兵力的10%，相当于战死的人数。[①]

1799年5月10日，法军最后一次进攻阿克城，仍没有战果，拿破仑决定撤退。在筹划返回开罗的时候，阿克城里清真寺的尖塔上挂起缴获的敌军军旗，城里响起了胜利的欢呼。5月21日拿破仑撤除对阿克城的包围（阿克城被围困62天）。6月14日，拿破仑回到开罗。拿破仑在从叙利亚返回开罗后，在各处张贴公告，一方面宣称"波拿巴将军热爱伊斯兰，敬畏先知，尊重古兰经……，决心建造一座宏伟的独一无二的清真寺"[②]；另一方面编造谎言，说"阿克的城墙已被击毁，城堡被夷为平地"。

这次东征叙利亚，法军付出沉重代价：士兵死亡2200人，伤病达3300人。随军来到埃及的3名法兰西学院研究人员，尤其是东方学家旺蒂尔·德·帕拉迪（Venture de Paradis）也死于这次战役。7月14日，英国舰队运送奥斯曼帝国穆斯塔法帕夏指挥的2.5万土耳其人登陆。阿布基尔（Aboukir）要塞的法国守军很快投降。随后，拿破仑集结2万步兵，3000骑兵，60门大炮，奥斯曼军队损失惨重，死伤和被俘1.8万人，穆斯塔法帕夏也当了俘虏。[③] 不过，阿布基尔的陆地战的胜利，不能掩盖法军海战的惨痛失败，这同时也表明，法国人在埃及的统治岌岌可危。

1799年7月底，拿破仑获悉法国国内局势变化，督政府在与反法联盟的战争中遭受失败。拿破仑决定离开埃及。8月18日，拿破仑带领一

---

① 从远征一开始，瘟疫就开始了。1798年秋天，达米埃塔和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士兵就有死亡病例。1798—1799年冬天，450名法军死于瘟疫。1801年春天，开罗瘟疫大爆发，每天城里都有30—40名法军死去。3年占领期间，法军总计因瘟疫损失2500人。上埃及的瘟疫可能比任何地方都严重。拿破仑远征期间，除了瘟疫还有其他传染性疾病。比如，战斗中的伤口感染有时引起致命的破伤风；可能还有天花。热病出现于1800年年初，可能是曾驻扎印度的英军登陆苏伊士后带来的。1801年亚历山大爆发坏血病。此前，达米埃塔一度疟疾肆虐。详见 Patrice Bret, *L' Egypte au temps de l' 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270－272。

②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 104.

③ 关于法军数量和奥斯曼军队伤亡的数字，各种资料差异较大，此处依据：Patrice Bret, *L' Egypte au temps de l' 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 262。

批亲信，说是前往三角洲地区旅行。23 日，拿破仑一行离开亚历山大，留给克雷贝尔（Kleber）一封信，将东方军团的指挥权交给他。不久，拿破仑在雾月政变中上台执掌法国政权。拿破仑标榜的“通过改革创建一个阿拉伯国家，恢复历史上阿拉伯人的光荣，摧毁奥斯曼帝国，纯洁伊斯兰教”[①] 的使命，便成为一段空话。

面对拿破仑留下的烂摊子，克雷贝尔任命一个委员会对所处的状况（包括财政状况）进行了评估，他并不打算留在埃及。克雷贝尔和军政官员们都觉得拿破仑的秘密离开背叛了他们，所以一边等着返回法国的机会，一边展开行政和财政改革，并竭力弥补财政亏空。既然不做长久占领埃及的打算，他们能从埃及榨取多少财富算多少。克雷贝尔的信中也有这样赤裸裸的表示：“此刻我们应该像柠檬水工人压榨柠檬一样取得埃及的所有金钱和实物。”[②]

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尤素福率领大军抵达加沙，准备进攻在埃及的法国军队。英国舰队控制雅法至亚历山大一线。法国的克雷贝尔的残兵败将缺少战斗力，不是奥斯曼帝国军队和英军的对手，于是他寻求与奥斯曼帝国和谈。1800 年 1 月 24 日，克雷贝尔与奥斯曼帝国军事首领在阿里什签订协定。协定的要点是：法国军队在 3 个月内分阶段撤出埃及；奥斯曼帝国承诺不进行袭击，保证法军安全撤离；法军撤离后，埃及仍归奥斯曼帝国统治。英国不愿看到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单独和谈，竭力破坏。

法军开始回国的准备工作，偏远的要塞已经撤离。机械工厂迁往亚历山大，以便装备舰队。由于各种因素，使得撤离工作拖延。法国人未能兑现撤离的协定，双方战事又起。3 月 20 日，克雷贝尔集结 1 万军队，进攻艾因舍姆斯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奥斯曼帝国军队败退。次日，比尔拜斯（Bilbays）再次被占领。就在这个时候，开罗人再次发动起义，这次起义组织得十分严密。达米埃塔、塞曼努特等地也有响应。3 月 31 日，奥斯曼帝国首领和埃及贵族接受克雷贝尔几次提出的和平要求，但他们已经没有威信。克雷贝尔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把起义镇压下去。4 月 26 日，法军再次占领开罗。克雷贝尔决定继续留在埃及，并采取改革措施，但 6 月

---

①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Pearson Longman, Harlow, London, the U. K., 2007, p. 230.

②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263 – 264.

14 日克雷贝尔被暗杀。梅努（Menou）继任东方军司令，此时法军已经陷入困境。1801 年 3 月 8 日，奥斯曼帝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在阿布基尔登陆。梅努判断失误，分兵迎击，贝利亚德（Beilliard）留守开罗，梅努自己则率军赶往亚历山大。3 月 21 日，他在卡诺普（Canope）战败，困守亚历山大。奥斯曼帝国军队和英国人奔赴开罗。6 月 27 日，贝利亚德求降，签署协定，撤离开罗。8 月 31 日，坚守亚历山大的梅努宣布投降。10 月，法国东方远征军残余被遣送回法国。

二 拿破仑军队入侵造成的影响

首先，拿破仑入侵埃及行省，严重破坏了法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

早在 1528 年，法国就和奥斯曼帝国订立了同盟条约。1535 年，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与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签订了一项条约，法国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通商的特权。1740 年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又签订了新约，重申以前所订立的条约，并承认法国大使和领事对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法国人有领事裁判权。18 世纪中叶，法国与近东贸易占欧洲与近东贸易总额的将近一半。法国人和奥斯曼帝国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土耳其人没料到的是，第一个入侵的西欧大国竟然是法国。

拿破仑占领埃及后，首先运用外交手段安抚奥斯曼素丹，希望继续保持与帝国的友好关系。把奥斯曼帝国的埃及帕夏请回来，在开罗继续主政。但奥斯曼素丹塞利姆三世在英国和俄国的怂恿下，于 1798 年 9 月 2 日向法国宣战。法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局面。

拿破仑入侵埃及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国内采取严厉的措施，如没收帝国境内的法国资产，关押亲法的大臣。在外交上，为了对付法国，塞利姆三世于 1798 年 9 月与英、俄结成联盟，允许俄国舰队通过土耳其海峡，在亚得里亚海直接与法国舰队对抗。当然，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联盟维持时间并不长久。

1801 年法国结束对埃及的占领，拿破仑愿意恢复与奥斯曼帝国旧有的联盟。奥斯曼帝国各派主张不一：主张联英以抗击法俄的一派，与主张恢复与法国联盟的另一派互不相让。英国和俄国努力阻挠奥斯曼帝国与法国修约。塞利姆三世最终还是决定恢复与法国的联盟，于 1802 年 6 月 25 日与法国签订了和约。拿破仑占领埃及引发的外交冲突，就算暂时平息

了，法国重新在黎凡特地区取得优势地位。

其次，拿破仑军队的入侵，改写了埃及的历史。

埃及从1517年以来没有独立的历史，可是从1798年拿破仑军队占领，突然有了单独的历史内容。“不是埃及人意识到外部世界，而是外部世界注意到埃及的存在，并开始逐步利用埃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尼罗河河谷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一直延续到1952年”。[①]

其实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一些政治学者就对马穆路克人控制的埃及感兴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Leibnitz）曾建议“太阳王”路易十四征服埃及。路易十五时期，舒瓦瑟尔（Choiseul）曾设想在埃及发动一场战争，以打击和牵制已经在印度立足的英国。1786年托特（Tott）男爵的《关于土耳其和鞑靼人报告》被译成英文，表明欧洲人对“土耳其地带”感兴趣，而伏尔泰的小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一千零一夜》的翻译，都表明了这种兴趣。托特男爵受法国政府派遣，前往奥斯曼帝国调查，以判断是否有可能成为法国的殖民地。[②] 不管是在西方观察家眼里，在随军到达埃及的法国学者笔下，还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的笔下，埃及昔日的辉煌与18世纪晚期的衰败和荒凉、埃及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埃及内部的争斗，都逐渐地被描述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

不过，直到1798年，埃及的问题只是生活品昂贵、饥荒、知识分子的争吵、商人行会的争斗。埃及社会保持着独有的生活方式。阿拉伯史学家嘉巴鲁蒂认为法国人的风习和行为是不道德的、荒谬的，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对妇女的殷勤和他们对被征服的人民是虚伪的。在法国史学家看来，拿破仑到来前，埃及处于复杂的局面，权力斗争激烈，而拿破仑征服之后，打击了马穆路克势力，使得土耳其人和马穆路克退出埃及政治舞台；拿破仑推行了西方式的改革，将各省代表组成国务会议，专人负责财产登记和户口清查等，也尝试确立土地税制。[③] 不过他们也承认这些旨在“保障人权”的措施引起强烈不满，导致了1798年10月21日的开罗

---

① M. C. Aulas, J. Besançon, *L' Egypte D' Aujourd' hui, Permanence et Changements*, 1805 - 1976,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7, p. 85.

② 相关的记载和描述不少。详见：M. C. Aulas, J. Besançon, *L' Egypte D' Aujourd' hui, Permanence et Changements, 1805—1976*,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7, p. 85。

③ M. C. Aulas, J. Besançon, *L' Egypte D' Aujourd' hui, Permanence et Changements, 1805—1976*,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7, pp. 86 - 87.

暴动。

在殖民者占领一个地区之后，是否准备在被征服地区建立长久统治，这决定着殖民统治的政策和手段。拿破仑带着一个科学家团队（包括科学家、考古家、测绘制图专家、技术人员等）去埃及，表明要长期控制埃及，开发埃及。他刚到埃及时，也打算使用怀柔政策，笼络埃及民众，换取民众的臣服。但是，面对埃及人民的反抗，他又没有耐心从长计议，而是采取严厉惩戒的办法，试图让埃及人害怕法国的武力而不敢反抗。其结果激化了矛盾。同时，为了解决军队的薪饷、随军文职人员的薪水、行政管理费用等，他采取强征和加派赋税的办法，结果变成了搜刮。拿破仑的殖民政策被大大扭曲了。后来，外部形势变化，法国海军舰艇被毁，东征叙利亚失败，拿破仑回国，继任者克雷贝尔和梅努只是困守埃及，收拾残局，建设性的措施只能变成空文，况且法国占领埃及总共才三年。

尽管如此，从拿破仑到梅努，都有一个使埃及西方化、现代化的设想和初步实践。在后世史家对拿破仑入侵的评价中，指出这次侵略对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也肯定法国人在埃及科学和教育方面的积极影响。拿破仑带来的科学家团队，在埃及成立“科学和艺术委员会”，建立埃及研究院（Institute of Egypt)。前者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埃及资源，后者主要是传播科学知识，指导政府工作。“科学和艺术委员会”在埃及初步勘查了埃及的矿产资源，做了人口调查和水资源供应状况的调查，建立了化学分析实验室，引进了考古发掘。① 法国人在埃及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罗塞达石碑，为解开古埃及文字提供了钥匙。法军撤走了，而埃及研究院被保留下来。法国科学家勘察埃及可利用的燃料、水力、原材料等，也研究埃及的司法、民事、刑罚等问题以及教育状况，可能实行的改革，还有农业生产项目如小麦和葡萄的培育、沙漠中打井等。法国专家也研究动植物，研究可开采的矿产、土壤、绿洲和湖泊的地理构造，同时，这些专家们绘制出埃及的地形图和其他各类地图。② 埃及研究院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埃及志》（1828 年出版)。这部《埃及志》多达 37 卷，涉及埃及历史、地理、农业、手工业、贸易、动物、植物、矿藏、风土人情、伦

① Bill Williams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Change in Egypt and Turkey, a Stud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8 – 59.

② P. J. Vatikiotis,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1*),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69, p. 40.

理道德、文学、音乐等。此外，法国人还在埃及创办了兵工厂、印刷厂、机械厂、火药厂、呢绒厂等。

法国人曾计划在埃及建立学校，由于占领时间短，没来得及对埃及人进行教育。不过，法国学者的活动让埃及人接触到了自然科学，或者说，为欧洲观念进入埃及创造了条件。从法国引入埃及的有两样东西对 19 世纪的埃及产生了大的冲击：一是阿拉伯文印刷机的引进；二是官方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刊物的出版。同时，法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改善公路条件、建设军械库和工厂等辛勤地工作。拿破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法国利益使埃及殖民化，实际上未达到目的。[①]

法国人梅努[②]试图把埃及变成第一个现代殖民地，实现两个民族和两种文化的妥协。埃及人的适应能力不差，梅努相信他们正在建设一种共享的文化，当然法国的影响占支配地位。在梅努担任东方军司令之前，已经推行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确立法国式的制度；让埃及年轻人学习法国的习俗、服装、语言；在呢绒工厂招募埃及劳工。埃及的乌勒玛也曾认真讨论过拿破仑改宗伊斯兰教的问题。[③]

法国人也计划实现埃及司法的现代化，前提是尊重并起用当地人。拿破仑没有触动当时的司法制度的根基，维持习惯性诉讼程序，仅对某些细节进行改动。像所有地方一样，司法费用之高，限制了最贫苦人的诉讼，但一般埃及人还是愿意上法庭。在开罗这样的城市，法庭在传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少数教派也经常到自己的宗教当局那里打官司。尽管有不可避免的腐败和文书错误，但司法这部运转良好的机器相对来说还让人民满意。[④] 多数学

---

① P. J. Vatikiotis,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1*),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69, p. 42.

② 一般的评价是：法国的梅努将军不受下属爱戴，作为军官他很平庸，但作为殖民地管理者他水平很高。尽管当时的政治军事局面十分困难，他打算按法国的模式设立一套公共管理机构。他下令进行土地清查，以便为彻底的财税改革奠定基础。他的行政和财政工作经常没有时间来完成，但还是改善了局面，为军队提供了装备和薪饷，并得到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拥护，尤其是在农村。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267 - 268.

③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269 - 270.

④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124 - 125.

者认为，拿破仑在埃及的制度、教育等方面的成果还是明显的。[①] 在叙利亚战役失败之后，拿破仑打出“埃及化”这张牌，任命一名埃及人担任开罗最高司法长官（此前是由奥斯曼政府官员担任），并表示开罗的伊斯兰学者充满智慧和学识，完全有能力处理法律事务。到1800年8月，法国人梅努决定进行深入的司法改革，以便“在法国政府和在埃及施行司法的法官之间确立稳定正常之关系”。他设立了司法改革筹备委员会。10月，梅努决定修订民事和刑事诉讼法典。[②]

后世的史学家对拿破仑入侵的描述和评价，是不一致的。有的侧重于揭露和控诉法军的暴行，讲述法国人侵略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有的较为客观，既反映出拿破仑的屠杀、搜刮，也指出法国人的某些政策带来了好处。就是嘉巴鲁蒂主编的《编年史》，早期的版本和后来的修订本对法国的态度也有不同。从埃及的《编年史》可以看出，法国人到来之前马穆路克的暴行累累，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回来后又出现这类暴行，相比之下，法国人占领的几年不那么严重。[③]叙利亚编年史家塞隆·尼古拉·图尔克（Selon Nicolas Turc）则客观地分析了哪些阶层在法国人入侵后是得益者，哪些则是受害者。[④]

拿破仑远征埃及最后失败了，但法国还是获得了益处。它至少促成法国在黎凡特利益的复兴，也变成此后法国外交政策永久的、主导性的特色。黎凡特的战略和商业重要性，在蒸汽船发明后就变成革命性的了。[⑤]

当然，其最重要的影响还是促成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此后埃及

---

① Bill Williams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Change in Egypt and Turkey, a Stud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9.

②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 127.

③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 279.

④ 按照记述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叙利亚编年史家塞隆·尼古拉·图尔克的说法，法国占领期间获得好处的是下层人。基督徒虽然税收负担沉重，但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和安全，他们通常会同法国人紧密合作。最初为了“绥靖”而进行的屠杀过后，农民也更多地认可了法国人，因为他们不像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马穆路克那样经常凌辱别人，法国人甚至减轻了农村的税收压力，特别是有可能保护他们免受贝督因人的抢劫。谢赫和乌勒玛也有各自的理由怀念法国人，埃及化政策让他们受益，有时他们也对治安和公共卫生政策表示赞许。他们中间有些人同官员、学者保持联系，赞赏后者带来的零星文化，至少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是这样。详见 Patrice Bret, *L'Egypte au temps de l'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pp. 278 – 279。

⑤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 41.

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区域。

第二节 穆罕默德·阿里治理埃及

法国军队在1801年从埃及撤离后，给埃及留下权力真空，各派力量之间的斗争逐渐升级，社会陷入混乱。在混乱局面和复杂的斗争中，一个人物脱颖而出，此人就是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这是一位阿尔巴尼亚人，他原来是奥斯曼帝国的军官，被派往埃及抵抗法军的入侵。阿里出生于色雷斯的卡瓦拉，与拿破仑同岁，他比埃及当地人的观念更欧洲化。[①] 他聪明大胆，善于抓住机会，利用各派别之间的争斗，将对手各个击破，在角逐中取得成功，迅速成为埃及最有实权的人物。

当时，在驻埃及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有土耳其人，有阿尔巴尼亚人，还有其他民族的士兵。他们由于军饷拖欠而充满怨言，起来反叛。埃及总督胡斯劳（Khusraw，土耳其人）逃往达米埃塔，由阿尔巴尼亚部队的统帅塔希尔（Tahir）帕夏继任埃及总督，但几周后被杀。最后由胡尔希德（Khurshid）继任总督（但任职时间不到一年半），而穆罕默德·阿里成功地从塔希尔手中接过阿尔巴尼亚部队统帅的职务。[②]

穆罕默德·阿里注意到，埃及宗教领袖和贵族不愿意失去在法国占领期间获得的权力，他们动员人民起来反抗马穆路克和奥斯曼总督的部队。穆罕默德·阿里于是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野心寻找合法依据。阿里向他们保证，他的军队是埃及最有组织、最有效的部队，以此来博得他们的支持。[③] 另外，法国军队撤出后马穆路克也极力想恢复他们在埃及的地位，但当地民众尤其是贵族和宗教领袖不愿看到马穆路克势力卷土重来。穆罕默德·阿里决定顺应埃及民众的意愿，打击马穆路克势力。此时马穆路克中势力最大的是埃尔菲贝伊（Elfi Bey）和巴尔迪西贝伊（Bardisi Bey）。

---

① M. C. Aulas, J. Besançon, *L'Egypte D'Aujourd'hui, Permanence et Changements, 1805—1976*,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7, p. 87.

②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50.

③ M. C. Aulas, J. Besançon, *L'Egypte D'Aujourd'hui, Permanence et Changements, 1805—1976*,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7, p. 87.

穆罕默德·阿里接近巴尔迪西贝伊，以谋取他的支持，一起反对埃尔菲贝伊。接着，穆罕默德·阿里引导民众把憎恨转向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马穆路克，尤其巴尔迪西贝伊。穆罕默德·阿里使民众相信，这个国家的混乱主要是由于土耳其人总督管理不力。穆罕默德·阿里此时也获得乌勒玛、商人、普通民众的支持，共同反对两类“压迫者”——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埃及马穆路克。[①] 接着，穆罕默德·阿里煽动开罗民众反对巴尔迪西贝伊的贪婪，因为巴尔迪西贝伊试图向城市居民征收重税，这些重税习惯上被看作由耕种者承担的税收，如今摊到城市居民的头上了。巴尔迪西贝伊很快失败，逃往沙漠地区。在除掉埃尔菲贝伊和巴尔迪西贝伊之后，埃及的统治者只剩下总督胡尔希德帕夏。当穆罕默德·阿里对付那些马穆路克领导人时，胡尔希德帕夏在锡塔代勒（Citadel）无所作为。民众反对巴尔迪西贝伊，自然把矛头指向胡尔希德帕夏。如今，民众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就把胡尔希德帕夏赶下台。[②] 1805 年 5 月 13 日，埃及的长老会议宣布废黜奥斯曼帝国的总督胡尔希德帕夏，拥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

胡尔希德帕夏的负隅顽抗没有结果，穆罕默德·阿里迅速平定了各地的叛乱势力，成为受拥戴的一方之主。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施展政治抱负，把埃及从混乱和落后的泥淖中拯救出来。

一　建立和完善统治机构

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统治者之后，首要的任务是结束混乱，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残余，建立政府对全埃及的统一管理。

在穆罕默德·阿里取得埃及的统治权后，奥斯曼政府想把阿里调离埃及，拟派他到萨洛尼卡的帕夏辖区去任职，但奥斯曼政府的企图没有达到。奥斯曼政府试图鼓动马穆路克反对阿里，但也没能成功，素丹不得不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统治地位。1805 年 7 月 9 日，奥斯曼素丹塞利姆三世被迫承认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行省总督。英国不愿看到埃及

---

①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p. 50 – 51.

②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p. 31 – 32.

被穆罕默德·阿里统一，派军队远征埃及。[①] 1807 年 3 月，由弗雷泽率领 5000 人的英国舰队在埃及登陆，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亚历山大港。英国远征埃及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推翻穆罕默德·阿里政权。此时上埃及的马穆路克残余分子发动叛乱，不过这些叛乱很快停止了。弗雷泽试图攻占罗塞达，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打败，退守亚历山大港，这年 9 月撤出亚历山大。弗雷泽离开的一年内，穆罕默德·阿里彻底铲除了马穆路克残余，控制了锡塔代勒。[②] 埃尔菲贝伊和巴尔迪西贝伊都在 1807 年死了，穆罕默德·阿里不再有政治上的对手，成为无可争议的埃及统治者。恰在这前后，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宫廷政变，塞利姆三世被废黜，接着是短时间的局势动荡，马哈茂德二世被拥立为新素丹。由于马哈茂德二世受制于加泥沙里军队，一时没有大的作为，直到 1826 年才消灭加泥沙里军，有效地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政局。就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无暇顾及埃及行省时，穆罕默德·阿里趁机巩固了自己在埃及的政权。

经过较长时间的动乱，埃及的社会治安（尤其城市治安）很差。穆罕默德·阿里采取严厉的措施，整顿社会治安，清除盗匪。在开罗市，他任命一名警官负责治安，赋予该警官处置犯人的权力。警察部队在城市里昼夜巡逻，严厉的管制措施类似于时常实行宵禁。经过大力整治，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减少，埃及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穆罕默德·阿里对原来的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政府起初设立陆军部、海军部、贸易及对外事务部、教育部、建设部、公共工程部，1833 年设立外交部，由亚美尼亚人博格豪斯（Boghos）负责。1837 年设立内务部，由基督教徒哈比卜（Habib）负责；同时，设立财政部、工业部，改建教育部、陆军部、外事与商务部、海军部。不过，各个部门的首脑实质上相当于穆罕默德·阿里的私人秘书，穆罕默德·阿里控制和监督“国家”的所有重大事务。[③]

穆罕默德·阿里仿效欧洲国家的行政制度，在中央设立高级“国务

---

① 当时正值拿破仑横扫欧洲，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奥地利和俄国被打败，奥斯曼帝国投向法国一边，英国非常担心法国会第二次远征埃及。英国政府认识到，在埃及恢复马穆路克的势力来对抗穆罕默德·阿里已经不可能了，但为了阻止埃及被法国占领，英国派遣了远征军。

②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p. 33 - 34.

③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63.

会议"，"国务会议"由一位副帕夏主持，领导政府各部的工作。1829年成立了咨询会议，议长由穆罕默德·阿里的长子易卜拉欣（Ibrahim）担任，是一个咨询机构，主要讨论改革所涉及的问题，审议一些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咨询会议的成员有156人，包括政府官员、宗教学者、地方豪绅。这个机构存在时间不长。

在地方管理中，他简化行政区划，把原来的16个区归并为7个省，每个省分为若干县，基层单位是乡和村。每个乡由多个村组成，每村有村长、土地测量员、税吏、全权证人。[①]由于他建立了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埃及基本结束了马穆路克时期四分五裂的状态。

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管理方式是绝对的集权化。与以前那些由奥斯曼素丹任命的埃及总督不同，穆罕默德·阿里的权威建立在全埃及范围各个权力机关公职人员绝对服从的基础上，而且没有政治对手。无论军队还是政府要害部门，他都安排自己的儿子和亲信负责。图松（Toussun）、易卜拉欣、伊斯梅尔统率陆军，小儿子赛义德（Said）指挥海军，孙子阿巴斯（Abbas）负责开罗的总督辖区。其家族的其他成员如侄子、侄孙都被安排到征服地区如叙利亚和汉志等地，担任军事和行政部门的领导职务。[②]

为了实行财政改革，1844年，他聘请法国财政部的官员卢赛到埃及任职，推行简单而精确的法国式财政收支计算法，对埃及财政进行管理，也对各部门实行监督。1846年他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用来改善财政管理，帮助国家摆脱财政上的混乱。由于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使用的是土耳其货币，但市场上也流行其他各类货币，极为混乱。货币价格的波动常常引起物价上涨，投机盛行。为稳定物价，穆罕默德·阿里曾于1834年颁布货币法令，决定确立埃及货币和其他国家货币的固定比值，以发行20皮亚斯特的金币和银币为基础，兑换率为1:15.5。[③]由于军事开支和政府管理费用空缺很大，完善财政制度是他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解决财政问题的过程中，他才意识到现存的税制及相关的制度需要改变。

---

①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②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62.

③ ［埃及］拉西德·阿里·巴拉维，穆罕默德·哈姆查·乌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枢原、申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0页。

政府下令取消包税制，简化征税手续，以确保绝大部分税收收入直接流进国库。[1]在逐步建立机构、确立制度之后，埃及的社会呈现出稳定局面。

二　恢复和发展经济

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时，埃及经济十分落后，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穆罕默德·阿里坚信，埃及要富强起来，就要尽可能地发展农业，建立现代工业，开展对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如果不能实现经济上的自主，就不可能抵制西方的渗透和侵略。1809 年穆罕默德·阿里颁布新土地税法，接着推行农业改革，1810 年以后颁布了多项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穆罕默德·阿里的农业政策，主要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税改革，鼓励种植经济作物，而这些措施通过“国家垄断”的手段实现。

要发展农业，首先需要扩大可耕地，增加种植面积。

穆罕默德·阿里的主要举措是没收土地，没收的范围包括宗教地产、包税人占有的地产、马穆路克占有的土地等。穆罕默德·阿里在铲除上埃及马穆路克势力后，全部没收了他们占有的土地，但允许下埃及地主保留私有土地。[2] 政府掌握大量可供重新分配的土地之后，进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先分给农民土地，农民在缴纳了规定的税款后就有权使用这些地段（但没有转让或继承权）；政府把不适宜耕种的土地交给某些贵族、军事首领、大官吏掌握，这些土地免除土地税。关键是，政府按照作物生长条件和特征把所有的土地分类，并确立按不同类型统一征收的土地税额。不过，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中后期，政府强化了对农村的控制，土地分配和税款追缴的措施大范围实行[3]，不利于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并非每个普通农民都能满意地得到土地，贫困农民还是没有自己的土地）。

穆罕默德·阿里鼓励和支持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允许把土地交给外国人，尤其是在埃及定居的希腊人。许多希腊人做生意积累了资金，他们投资于土地垦殖。对那些没有资金但有生产经验的希腊人，穆罕默德

---

① Helen Anne B Rivlin,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of Muhammad Ali in Egyp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53 - 54.

② Kenneth M. Cuno, *The Pasha's Peasants: Land, Society, and Economy in Lower Egypt, 1740—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7 - 108.

③ Kenneth M. Cuno, *The Pasha's Peasants: Land, Society, and Economy in Lower Egypt, 1740—18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7 - 148.

·阿里给予资金援助，如提供牲畜、农具和种子等。[①]穆罕默德·阿里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当时英国工业正在发展，纺织工业对棉花的需求很大。埃及大面积种植棉花，换取经济收入。穆罕默德·阿里也关心种植其他农作物和各种果树，如种植蓝靛，栽种桑树、橘子树、橄榄树等。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对灌溉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穆罕默德·阿里政府努力改变旧的灌溉系统，并在尼罗河新建大型灌溉设施。政府的政策重点扶持经济作物种植，种植阿拉伯胶树都予以免税，后来又扩大到种植各类经济作物均免税。农产品的运输、仓储保存以及出售，各个环节都由政府部门统筹和管制，国家从中获得大量收入，也促进了埃及商品农业的发展。埃及农民非常穷困，政府为他们提供购买种子、农具、牲畜的费用，在农民收获后以农产品抵税。穆罕默德·阿里政府发展农业的政策注意到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政府禁止地主向农民征收附加税，只征收常规的土地税；对寺院土地和其他宗教名义占有的土地不再免税。但是，农业税还是过重，有的农民抛弃了自己的土地，离开原来的村庄。

总体上看，穆罕默德·阿里的农业政策取得成效。灌溉系统的修复，改良水车的推广，闲置土地被重新开垦，使得耕地面积扩大，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②]由于棉花等经济作物的产量有较大提高，作物出口量也有较大增长，为埃及政府换取了大量外汇。反过来，政府也有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医治多年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创伤。从制度方面看，废除旧土地制度，取消包税制，没收宗教地产，消灭了阻碍埃及社会发展的马穆路克势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穆罕默德·阿里有一套实现工业化的构想，也部分地付诸实践。埃及本土有一些工业基础，据拿破仑入侵埃及时所带的科学考察团做的调查(1799—1800年)，埃及一些地区的乡村谢赫已办起初级水平的工业，如尼龙制造、瓷器制造、榨油、酿酒、制皂、制糖等。[③]只是埃及丰富的自

---

① Helen Anne B Rivlin,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of Muhammad Ali in Egyp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62.

② 1821年耕地面积有200万费丹，1840年增长到385.6万费丹。埃及的长绒棉广泛种植，棉产量有较大提高。从1821年起，棉花成为埃及主要出口商品，当年出口量944堪他尔（每堪他尔折合44.928公斤）。甘蔗、靛青等经济作物也有大幅度增长。1849年，棉花出口量达到251511堪他尔。

③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59.

然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穆罕默德·阿里仿效西欧模式，要在埃及建立现代工业。不过，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只创办了军事工业和部分民用轻工业，如纺织工业、制糖工业等。他花费资金最多的是军事工业，如建立兵工厂、造船厂、火药厂。纺织工业起步晚但发展较快，技术工人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请来的，到1829年时，埃及棉织工厂已达到一定规模。这一时期埃及也建立起数家制糖厂，还有其他工业。穆罕默德·阿里积累大量资金后，从西方购置了机器设备，聘请技术人员。但埃及工业基础薄弱，刚起步就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对欧洲国家产生依赖。

穆罕默德·阿里还改善交通，发展对外贸易。政府抽调人力和物力，修复原有的道路，开辟新的道路，使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同时发展河运和海运，大量制造帆船，创办尼罗河航运公司，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贸的发展。在贸易中，由于政府控制了工农业生产，无论本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都不能从生产者手中直接收购产品，只能向政府购买，因而出口贸易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最初将产品卖给在埃及经商的、得到穆罕默德·阿里信任的外国商人，由他们转销外国市场。为了谋求更大的利润，政府在国外开设商馆，经办进出口贸易。穆罕默德·阿里通过贸易垄断，把货币资金集中到政府，再用这些资金实现自己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计划。

三　建设现代化军队

穆罕默德·阿里决心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具体措施有三方面。

第一，整顿旧军队。他自己的军队主要由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组成，大约1万人，而且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纪律松弛。豪强和贵族们拥有的武装，总数约1万人，更缺乏战斗力。1815年穆罕默德·阿里开始着手整顿军队，但很快遭到长老和守旧军官的反对，他们在开罗发动叛乱，被穆罕默德·阿里镇压。从1820年起，穆罕默德·阿里改变策略，决意建立新军。具体的措施是：在阿斯旺创办步兵学校，从法国、意大利等国聘请教官，培养军队所需的人才。步兵学校的负责人是苏莱曼帕夏（法国军官塞夫上校），他还长期担任穆罕默德·阿里的军事顾问。

第二，招募新军队。新军的兵源，穆罕默德·阿里起初准备从苏丹俘虏来的黑人中选拔，未能如愿，于是他招募埃及的土著居民，先组成6个

营，加紧训练，很快成为一支远胜于旧军队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到1825年时，埃及的陆军人数达到4.1万人，其后人数猛增，到1839年达到23万余人。[①]

第三，建立现代海军。穆罕默德·阿里从1810年开始筹建海军，用了十几年时间建立了两支舰队：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战舰大多数是从国外购买的，也有一少部分是开罗造船厂制造的。在建设海军时，他受到英国的百般阻挠，穆罕默德·阿里还是设法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寻求大国援助，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不幸的是1827年的纳瓦里诺战役使他的地中海舰队几乎被全歼。穆罕默德·阿里决定从这一年起重新建立地中海舰队。他修建亚历山大造船厂，靠本土的力量制造战舰。1829年，埃及自己制造的巨大战舰驶入地中海。到1839年，埃及拥有的战舰达到32艘，海军人数有1.5万余人，成为地中海东部最强大的一支海军力量。

四 发展教育事业

埃及的教育非常落后，只有在清真寺和私塾开展的宗教教育，没有世俗教育。法国人曾计划在埃及建立学校，由于占领时间短，尚未开始实践。不过，拿破仑入侵也为欧洲观念进入埃及带来机会——尽管直接给埃及文化、知识和学术的影响极为有限。埃及本土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与现代科学和技术没有多少联系，而且被宗教界人士所垄断，普通民众大多数是文盲。真正为现代教育打下基础的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②]

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培养管理人才、技术人才，首先建立专科学校，如工程学校、炮兵学校、步兵学校、兽医学校、医学院、农学院。这些学校属陆军部管辖，实行免费教育，学生食宿在学校，还能领取少量津贴和配发统一的服装。1816年穆罕默德·阿里在锡塔代勒建立军事学校。1826年法国人帮助穆罕默德·阿里在阿斯旺建立一所军事学校，主要是为了培训军官。当时急需教官，就向法国聘请。从这时起，穆罕默德·阿里得到更多法国教官的帮助，为埃及训练军事人才。自从拿破仑帝国1815年崩溃后，法国有许多军官失业，穆罕默德·阿里从法国聘用一批

---

①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② Bill Williams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Change in Egypt and Turkey, a Stud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9.

退役军官，其中最有名的是科罗内尔·塞夫，他为军事学校的建设和军官的培训做出了贡献，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被称为“法国人苏莱曼帕夏”。[①] 为了给军队培养医生，提供医疗服务，1827 年在法国医生克洛（Clot）博士和一批翻译人员的协助下，建立了一所医学学校。为了帮助学生快速进步，克洛博士开办了附属学校。从 1827 年起建成一所兽医学校。1829 年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一所药学学校。在建立的军事学校中，有一所骑兵学校，还有炮兵学校、步兵学校和海军学校。此外，穆罕默德·阿里还建立了矿业技术学校、工程技术学校、应用化学技术学校，还有农业学校、灌溉技术学校等。穆罕默德·阿里也建立了文官学校，为的是改善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②]

穆罕默德·阿里同时开设世俗的中学和小学，为专科学校输送生源。到 1836 年，世俗小学办了 50 所，学生 5500 人，中学 2 所，学生 2000 人。中学和专科学校以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人员、管理人员为目标，课程设置涉及医学、药学、军事、工程、工艺、艺术、外语等。

穆罕默德·阿里还开办了一所语言学院，培养自己的翻译人员。有了翻译人员，把外国科技书籍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愿望得以实现。1821 年，他建立政府的印刷厂，1826 年出版埃及第一份报纸。为了尽快培养出人才，穆罕默德·阿里一面聘请外国专家来埃及讲学、授课、进行学校管理，一面选送留学生到国外学习。1809 年穆罕默德·阿里首次派埃及学生到意大利学习，1818 年又有 23 名埃及学生赴欧，1826 年又派 44 名学生赴巴黎。[③] 派往意大利和法国的留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军事科学、印刷技术、船舶制造技术。1813—1847 年共派遣留学生 319 人[④]。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中担任要职，逐渐取代了聘用的外国人。

除了为军队培养人才，穆罕默德·阿里还投入大量资金，想造就一批本土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他要在埃及建立欧洲式的教育系统。在这个教育系统中，起初由欧洲人承担各级教育和管理工作，然后逐渐由埃及人自己

---

①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57.

② Bill Williams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Change in Egypt and Turkey, a Stud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2.

③ Rernal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9.

④ 一说：1813—1849 年共派往欧洲留学的学生 311 名，为此花费了 27 万埃镑。

当教师，自己当管理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国家教育系统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一大批受过正式教育的公职人员、教师、技工、管理人员取代了那些以传统手段获得职位的公职人员，受欧化教育的本土精英充实到各个工作岗位。[①]

穆罕默德·阿里的“教育战略”具有长远意义，至少是一个进行专门人才培养的系统计划，与他的现代化整体方案是配套的。当然，穆罕默德·阿里关注的是精英的现代化而不是大众教育的发展。[②] 穆罕默德·阿里也有教育普及的设想，但从轻重缓急考虑，为军队和工厂培养所需的人才，是迫切要做的；至于普及教育，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并没有实现，适龄儿童入学率不高。后来的学者批评穆罕默德·阿里忽视大众教育，实际上是苛责他。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培养急需的人才，已经算是教育的成就了。据统计，到 1837 年，埃及大约建起 41 所学校，由于师资短缺，特别是缺少懂现代科学知识的教师，不得不让宗教学校毕业生给新学校当教师。因此，许多学校只能达到教学生识字、教学生读写阿拉伯语的程度，无法给学生传授科学知识。[③]

五　穆罕默德·阿里治理埃及的成就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的几十年里，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穆罕默德·阿里的土地政策，改变了埃及农民的地位，农民经官方登记后分得土地，从土地上得到收获，并确切知道自己应该缴纳哪些农业税。在埃及当时的条件下，把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是困难的，实行彻底的私有化也不可能，但穆罕默德·阿里的土地政策与以往相比是进步的。

为了快速地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埃及政府对各个生产部门实行监管，特别是对农业的监督和对农产品的垄断。而垄断政策动员了一切力量，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在当时特殊情况下有利于取得经济成效。穆罕

---

①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58.

② Bill Williams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Change in Egypt and Turke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87, pp. 61 –62.

③ Bill Williams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Change in Egypt and Turke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87, p. 63.

默德·阿里的工业强国计划未能实现，但发展工业的措施也有一定的成果。军工发展较快，如亚历山大造船厂制造的战舰，可与欧洲国家制造的战舰媲美；工业产品能满足和部分满足国内需求。穆罕默德·阿里时代进口了大量机器、原料和燃料，进口总额增加了将近6倍，但埃及并未因此而大举外债；相反，由于发展经济作物而增加了出口。

穆罕默德·阿里的建“国”方略具有整体性。他从发展农业入手，改变土地所有制，旨在鼓励农业生产，提高生产率，增加埃及的财富。他建立西方式的行政管理机构，为的是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他在埃及建立工厂，是为了自制武器和工业品，使他的军队在装备和给养方面自足。引进先进的教育制度，是为了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有技术的劳动力，尤其是军事人才。①穆罕默德·阿里时代掌握了新生产技术的工人，成为埃及生产领域的基干队伍。后世学者评价：穆罕默德·阿里是伊斯兰世界第一个着手大规模发展经济的统治者。他不仅要增加农业生产，兴建制造业，增大商业竞争能力，而且要增加税收收入，以保证埃及的经济独立。他没能支持自由贸易或欧洲式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而是以“国家垄断”方式，实行他的经济发展计划。②

穆罕默德·阿里被拥立为埃及总督时，埃及处于衰竭状态，他治理埃及要完成旧制度改造和新秩序构建的双重任务。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建立在极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在强权政治下实现工业化，把一种崭新的工业生产制度“强加于”原始农业和行会经济之上，一些宏大的计划没有成功，但他毕竟拯救了埃及。他在发展埃及经济时，维护了埃及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西方资本未能大规模渗透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大量进口西方机器，聘请欧洲技师，但他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也在国内仿制，一旦试制成功，便减少出口。他尽力保护国内市场，开辟国际市场，使西方资本的渗透受到限制，民族工业迅速发展。

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建立了事实上独立的王朝，为现代埃及奠定了基础。他建立的现代政府机构，能够以有组织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西式教育打开埃及通向现代科学和艺术之路；为现代埃及国家的兴起准备了体

---

①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50.

② P. J. Vatikiotis,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56.

制的基础和干部队伍的基础。穆罕默德·阿里治理埃及是成功的，使埃及人近距离与欧洲接触，把埃及推向现代世界。

第三节　埃及“半独立”地位的形成

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追求独立、追求进步的观念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埃及的改革比奥斯曼帝国政府的西化改革起步晚，但成效显著。穆罕默德·阿里认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由于他在埃及掌握全部权力，没有政治对手，社会各阶层中阻碍他的政策的因素较少，各项具体措施能够顺利推行。

不过，穆罕默德·阿里的富国强兵计划并未实现，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没有达到目标。① 穆罕默德·阿里想为统治集团及其个人谋求利益，加之他本人好大喜功，使他不能清醒地认识埃及自身所处的位置，走上扩张之路，损耗了几十年建设所积累的社会财富。

一般认为，穆罕默德·阿里野心膨胀，不满足于埃及范围的统治权，所以走上了扩张道路，尤其两次与奥斯曼政府的战争。不过，从客观情况看，在穆罕默德·阿里挑战素丹权威之前，奥斯曼素丹需要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帮助，而且不止一次，却未能兑现给穆罕默德·阿里的承诺。穆罕默德·阿里应马哈茂德二世的请求，于1811年出兵阿拉伯半岛镇压瓦哈比教派的起义。统帅图松花费一年时间，武力和金钱收买的手段并用，把瓦哈比教派及沙特家族的势力赶出麦加和麦地那，但埃及士兵伤亡很多，而且面临瓦哈比教派的再度围攻，处境艰难。穆罕默德·阿里亲自出征，

---

① 主要的原因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没能确立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穆罕默德·阿里采取强制手段，逼迫农民劳动、缴租、服徭役，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农民没有人身自由，生活处境未能改变。穆罕默德·阿里兴办的工厂就其规模、设备、分工而言，有些同欧洲的工厂相差不大，但就其生产方式而言，不是资本主义的。穆罕默德·阿里所建的工厂，既非商办，也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而是封建政府一手包办的。工人虽领微薄的工资，但他们的地位不同于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而像封建社会的农奴。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官僚制度的腐败，穆罕默德·阿里在经济改革时遇到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是资金匮乏，其次是管理不善，生产混乱。同时，西欧资本主义强国加紧掠夺，不容许埃及经济上强大。欧洲大国还强迫阿里接受不平等条约，使埃及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处处受阻。战争的消耗使埃及财政亏空更多，不停地征税超出了纳税人的承受能力。阿里制定的政策中有一些脱离埃及的实际，不利于埃及的长远发展。

又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迫使沙特家族屈服，承认汉志地区归埃及管辖，并保证随时听从奥斯曼素丹的差遣。1815 年 5 月穆罕默德·阿里回到埃及。第二年沙特家族再次起义，直接把矛头指向埃及统治者。阿里派易卜拉欣领兵征讨，易卜拉欣采取毁坏房屋、破坏水井、屠杀无辜百姓的残酷办法，清除和瓦解起义队伍。至 1818 年 9 月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起义的领导人阿卜杜拉·伊本·沙特被素丹处死，易卜拉欣成为汉志的总督。[①] 穆罕默德·阿里实现了自己的野心，但为此付出代价，这场持续多年的征服战争使埃及丧失数万兵力，财物损失也不少。

为了扩充军队，穆罕默德·阿里招募奴隶充实他的新军；为了寻找矿产资源，穆罕默德·阿里决定征服埃及的南邻苏丹。苏丹地区当时不是奥斯曼的省份，他的扩张不必担心奥斯曼素丹的反对。而且，这里是马穆路克反对派藏身之地，对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构成威胁，必须剪除这股势力。[②] 1820 年穆罕默德·阿里派两支军队进入苏丹。穆罕默德·阿里在苏丹寻找象牙、砂金和奴隶[③]，并于 1822 年在占领地区的尼罗河支流汇合处建立喀土穆城。1830 年他派遣埃及官员担任苏丹总督，埃及人完全主宰了苏丹。从此，苏丹的命运与埃及捆绑在一起达一个多世纪。不过，穆罕默德·阿里进一步向南扩张，引起了英国的警惕。[④] 其实，穆罕默德·阿里参与奥斯曼素丹镇压瓦哈比教派时，就引起英国的注意，在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苏丹时英国人也看在眼里，假如穆罕默德·阿里不再往阿拉伯半岛沙漠和非洲丛林以外扩张，英国可能不会干预。当他进一步南侵或北上，就与英国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当希腊独立运动高涨，奥斯曼帝国军队无法镇压希腊起义军时，马哈茂德二世再次求助穆罕默德·阿里。1824 年 7 月，阿里派易卜拉欣率领 1.7 万名步兵，跨过地中海，抵达希腊。1825 年年底占领摩里亚半岛的大部分，然后继续前进，占领雅典城。1827 年 7 月俄、英、法三国决意消灭埃及海军，10 月 27 日爆发了纳瓦里诺海战，埃及舰队和奥斯曼政府的

---

①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8 页。

② M. C. Aulas, J. Besançon, *L' Egypte D' Aujourd' hui, Permanence et Changements, 1805—1976*,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7, p. 88.

③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 36.

④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64.

舰队大部分被击沉或损毁。易卜拉欣于1828年10月率残余部队返回埃及。

埃及在从出兵镇压希腊起义到兵败纳瓦里诺的四年里，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不计其数，尤其是地中海舰队被全歼，穆罕默德·阿里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下一步的出路何在？穆罕默德·阿里把目光移向叙利亚。他出兵叙利亚，等于是公开挑战奥斯曼素丹，行省和帝国政府的战争爆发，史称"埃土战争"，而且前后有两次。

第一次埃土战争于1831年10月开始，1833年4月结束，第二次埃土战争于1839年4月开始，1841年1月结束。穆罕默德·阿里在第一次战争中获利极多，埃及军队占领了阿克、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大马士革、阿勒颇、阿达纳等大城市，阿里的势力扩展到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但第二次战争惨败，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退守埃及（他仍然是埃及行省的总督，领土只拥有埃及和苏丹）。

埃及经过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本来出现稳定和繁荣，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后，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加剧，再也没有力量抵制西方的侵略和渗透。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发展生产，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增强后本来有能力抵御外来入侵，维护民族独立，但他的向外扩张把埃及的建设成就毁了。由于连年作战，加赋加税，抓丁拉夫，埃及下层人民深受其苦。后世学者的评价是：穆罕默德·阿里穷兵黩武，导致埃及兵连祸结。

穆罕默德·阿里对外作战的时候，埃及的自然灾害频繁。例如，1831—1835年霍乱在埃及流行，人口减少，作物收成也大幅缩减。不过，埃及人民遭受的主要灾难还是战争，比如1831—1833年是进行第一次埃土战争的三年，埃及农民的收成减少，生活困苦。1839—1840年由于政治危机，在宗主国奥斯曼政府和英、俄等国的政治压力下，穆罕默德·阿里政府经受了外交上的严重挫折，既毁灭了他的帝国梦，也把埃及人民拖向苦难的深渊。1841年的条约限制军队数量，不准建造军舰，堵塞了埃及"强兵"的道路。这些失败对穆罕默德·阿里打击很大，此后他的进取心大减，不如以前那样关心工业计划了。而且，埃及的工业品不能在国内市场上与欧洲货竞争，政府必须采取保护政策，但又遭到英国的反对，埃及的保护政策无法实行，商业受损。

在19世纪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穆罕默德·阿里本来可以利用奥斯曼帝国衰弱的机会，努力发展埃及，建设埃及，他统治的早期也是这样

做的。埃及积极地吸收英法各国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思想，仿照欧洲工业化模式创办了一些工业企业，运用学校教育推广和培养本土科技人才，对某些落后的传统进行变革等等，是卓有成效的。尤为明显的是，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埃及陆军装备新式来复枪，建造新型战舰，组建现代化的海军，大大提升了埃及对外防御的能力。可是自从出兵阿拉伯半岛以后，战争接二连三。帮助奥斯曼素丹镇压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得到好处——穆罕默德·阿里一度成为阿拉伯半岛的实际主人；入侵苏丹收获颇丰——把埃及疆域向南扩展。但是，镇压希腊民族起义导致列强干涉，埃及海军建设的成果化为灰烬；两次挑战奥斯曼素丹权威，入侵叙利亚导致严重后果，根据《伦敦条约》和 1841 年奥斯曼素丹所做的补充规定，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崩溃，埃及的发展陷入困境。

穆罕默德·阿里治理下的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至少是半独立。这种状态是改变近东力量均衡的开端。从穆罕默德·阿里开始，埃及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既不甘心成为俯首听命于奥斯曼素丹的行省总督，又不愿彻底依附于欧洲强国。埃及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开始处于半独立状态，成为欧洲国家渗透和争夺的目标。

第四章　马哈茂德二世的政绩与困境

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1808—1839年在位）是在奥斯曼宫廷政变中侥幸得到皇位的，他的素丹宝座来之不易。马哈茂德二世在位31年（1808—1839），既有外患（如俄国入侵），也有内忧（行省和属地的反抗），有时席无暇暖，有时食不甘味，享受君王的奢华和悠闲的日子确实不多。马哈茂德二世是一位雷厉风行、运筹帷幄的君主，也是一位忍辱负重、心力交瘁的君主。他推行改革的意志坚决，改革的措施涉及各个领域，而且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成效。改革的同时，马哈茂德二世还要抵御外界压力，维护国内的秩序，困难重重。在众多的难题中，使马哈茂德二世陷入困境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希腊人在外国的支持下闹独立，打了多年仗，最后希腊脱离了帝国。二是埃及行省的穆罕默德·阿里对奥斯曼素丹权威的挑战，发生两次战争，在埃及军队的步步紧逼中，马哈茂德二世病逝，未能亲眼目睹埃及军队撤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第一节　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成就

马哈茂德二世1808年执政后，任命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为大维齐，恢复塞利姆三世所拟定的改革计划。阿莱姆达尔手握兵权，有自己的军队，是一位有威慑力的大维齐。他准备创建一支像塞利姆三世所建的“新正规军”那样的新军。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召集最有影响力的地方贵族到伊斯坦布尔开会，公开商谈如何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许多地方实权人物接受邀请，并带着私人武装汇聚到首都。[1]阿莱姆达尔·穆斯

①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 57.

塔法帕夏的意图是，给予地方贵族一定的官位，产生一项针对地方贵族权利和义务的法规，以此限制地方贵族的权力。会议是有结果的，1808 年 10 月地方贵族与政府签订一份书面“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地方贵族要对奥斯曼素丹忠诚，但有权反对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

第二，在国家需要时，地方贵族帮助征募士兵，组建新的军队。

第三，必须承担税收义务；赋税定期征收；税收中那些归国家征收的部分不得由地方征收；经过地方贵族和政府的协商之后，将确立新的税制。

第四，政府官员和地方贵族一样免受责难和惩罚，除非明显犯了罪。[①]

这项书面“协议”有重要意义。假如“协议”中的内容能付诸实践，地方贵族的政治地位会得到官方公开认可，而这项协议会变成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甚至有人说，这项“协议”的某些方面类似于 1215 年国王约翰与英国贵族之间签署的《英国大宪章》，对国王和地方实力派之间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划分。[②]尽管“协议”的主要条款在于维护封建贵族利益，但其中那些与税收和司法有关的限定性条款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斗争的开端。不过，土耳其史学家对这一协议持否定的看法。理由是，在 19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版图内建立封建秩序，与欧洲的发展大趋势相悖。马哈茂德二世在当政几年后发现，要不是欧洲的帮助自己就无力镇压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叛乱——比如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挑战。既然奥斯曼政府不得不依赖西方大国的支持，中央与地方的力量不对等，所谓的与地方势力的平等协商根本不可能。[③]

这份书面“协议”当时勉强被奥斯曼素丹批准，但没有来得及变成行动。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当了三个半月的大维齐，就被叛乱的加尼沙里军队所杀，这位鲁斯丘克的显要人物，就这样成了贵族权力斗争的

①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3.

②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23 – 24.

③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23 – 24.

牺牲品[1]。事情的经过是：大维齐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组建了一支新式陆军之后，允许他率领的部队中的波斯人士兵和阿尔阿尼亚士兵返回家乡，加尼沙里军乘此机会叛乱，杀死了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首都街头出现混乱，建筑物被焚毁，已经退位的穆斯塔法四世也在混乱中被处死。[2]

加尼沙里军的这次叛乱，给马哈茂德二世造成威慑，马哈茂德二世不得不暂时向旧军队妥协，同意取消新军，军事改革计划暂时搁置。据记载，马哈茂德二世也有被废黜的危险，但他是皇室中仅有的一位王位继承人，这才保全了性命，也保住了奥斯曼素丹的宝座。当政之初的许多年，马哈茂德二世尽量避免因军队改革而引起加尼沙里军的不满。他尽量任命忠实于自己的将领来控制加尼沙里军队。要实现军事改革，只能等待时机。

一　马哈茂德二世改革措施及实践

马哈茂德二世计划的改革，首要的是军队改革。他也想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加强中央权力；改革财政和税收，增加政府的收入；在教育、社会习俗方面也试图改革。

（一）军事领域

马哈茂德二世对军队改革采取谨慎态度，但在镇压希腊人独立运动的战争（1821 年开始）中，加尼沙里军和西帕希骑兵威风丧尽，废除旧军队势在必行。1826 年马哈茂德二世下令建立一支现代军队，类似于阿卜杜·哈米德一世和塞利姆三世建立的新军。5 月 26 日马哈茂德二世迫使国务会议通过法案，将加尼沙里军按照新军的方式接受训练[3]。大穆夫提（chief mufti）和乌勒玛（ulema）是赞成改革军队的。在素丹法令执行之前，加尼沙里军队于 6 月 15 日掀起叛乱，一些贵族、官员参与其中，结果被新整编的忠实于素丹的炮兵团打败。马哈茂德二世乘胜追击，消灭了首都的加尼沙里军，并对省区的加尼沙里军进行追捕，加尼沙里军或被击

---

①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94.

②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43 页。

③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400.

溃或消灭。[①] 新军集训扩编后，马哈茂德二世计划组织和训练一支 4 万人[②]的军队。

成功地镇压加尼沙里军叛乱并彻底解除加尼沙里军的事件，就是改革派所谓的“吉祥事件”。《中东史》著作中说，马哈茂德二世摧毁了加尼沙里军，算是大快人心的事，因为加尼沙里军在奥斯曼帝国“狂妄不羁”已经 300 年了[③]。从 17 世纪初期起近卫军团干预朝政，否决国家政策，大维齐也能被他们下令斩首。18 世纪有好几位奥斯曼素丹试图改革军队，提高军团的战斗力，但每次的计划都因遭到反对而作罢。塞利姆三世本来为改革旧军队做了最大的努力，并创建了新式军队，但最后被废黜，改革法令被取消。马哈茂德二世终于完成了一项不寻常的历史使命。有的学者评价说，解除了加尼沙里军队，不仅是奥斯曼帝国改革史上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也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史上的转折点。在取缔加尼沙里军的同时，马哈茂德二世也取消了长期附属于加尼沙里军队的贝克塔希军（Bektash），拆除贝克塔希军的营地，流放了为首的贝克塔希，强迫其余的贝克塔希成员放弃他们的信仰，接受逊尼派的教规。[④] 1826 年消灭加尼沙里军，等于是铲除了阻碍奥斯曼帝国改革进程的阻力，为后来全面西化改革的坦齐马特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⑤]

关于马哈茂德二世解除旧军队，有多种评价。有人说，马哈茂德二世在 1826 年完成了塞利姆三世在 1793 年开始的军事改革，因为军事改革最大的阻碍就是加尼沙里军队。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加尼沙里军队的消灭，意味着数百年不变的王朝统治的终结，下一个阶段便是欧式的行政管理方式的开启。不过，这也导致了脆弱的社会秩序被完全打乱，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更不稳定，更不公正。”[⑥]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还表

---

①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401.

② 关于新军队的人数，各类文献记载很不一致。

③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53 页。

④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9.

⑤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346.

⑥ Suraiya Faroqhi,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12.

明：军队出现腐败，要通过改造的方式使其变好，几乎没有可能。唯一的办法是解散原有的腐败军队，重建新的军队，并控制新的军队。奥斯曼帝国的加尼沙里军、西帕西骑兵，腐败之后就像中国晚清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不可救药。

过去每次改革总是受到加尼沙里军的反对，如今可以自由地组建一支新的欧洲式军队了。马哈茂德二世建立的新军称“穆罕默德常胜军”[①]，由步兵和骑兵两部分构成。“穆罕默德常胜军”驻扎在伊斯坦布尔，各行省逐渐组建新式军队。在那些封建骑兵中，一部分有实战能力的士兵被编成现代骑兵的四个中队；许多原先的蒂玛持有者，也被吸纳到新建的行省警察系统中，成为领薪水的警察。[②] 1826 年年末制定了一项有关新军的组织条例，其中规定军队总数为 1.2 万人，驻扎在伊斯坦布尔，分成 8 个大队。此外，还发布有关在各省招募新军的命令。规定士兵的服役期限为 12 年。1834 年建立后备军，后备军分布于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行省。1838 年成立军事委员会，负责讨论与帝国安全相关的所有军事事务。至此，奥斯曼帝国拥有了接受统一领导的单一的军事组织，结束了行省军队威胁中央政府的历史，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主要成果之一。[③]

同时，马哈茂德二世在军队中实行文官管理制度，使练兵、调兵和军事指挥的职权分离，防止军队为将领所控制，发生军事政变。建设这支新军队需要欧洲人的指导和帮助。在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中，起初一直是聘请法国教官、顾问和技术人员的，也信任英国人。但法国和英国对希腊起义表示同情，还帮助过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素丹便与法国和英国疏远，不愿意再聘用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于是马哈茂德二世求助于普鲁士。1835 年赫尔姆斯·冯·莫尔塔克（Helmuth von Moltke）上尉，即后来的菲尔德元帅（Field Marshal）和一个由普鲁士军官组成的团队接受邀请，来奥斯曼帝国指导军队改革，使军队实现现代化。[④] 为了培养军事人才，马哈茂德二世于 1830 年开办了一些军事学院和医学院；

---

① 全名为：Victorious Troops of Muhanmmad.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51.

③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9.

④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33.

还选派土耳其军官去国外学习。

（二）政治领域

马哈茂德二世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权力，对地方实行有效管理，同时仿照欧洲国家的方式健全行政机构。

奥斯曼帝国原来只有各种衙门式的机构，行政机关隶属于皇室，服务于皇室。如今实行改革，就是将原有的帝国行政机构改换成西欧模式的政府部门，设立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外贸部、公共工程委员会，各部分别设立内务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等职位，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开创之举。原来宫廷有负责内务和负责对外事务的衙门，1836 年将旧衙门分别改为"内务部"[①] 和"外交部"[②]，成为中央政府的两个独立部门，办公地点不变，但职能发生了变化。1837 年，将原有的负责财政的衙门（Defterdar）改为"财政部"[③]，内务部这一年又改为"内政部"[④]。1838 年取消大维齐的称号，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改称首相，大维齐的办公室改为首相官邸。本来已经有顾问委员会存在，但马哈茂德二世需要听话的一个班子，所以组建大臣会议，由首相主持大臣会议。1836 年和 1837 年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最高司法委员会。1838 年设立农业、贸易、工业、公共事务等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最高司法委员会是执行机构，对后来改革计划的执行起到重要作用。在健全咨询和审议机构的同时，对文职、军职、神职人员的头衔与称谓，也做了新的规定，并依此对迅速增加的政府机构进行改组。[⑤] 政府部门配备有办事效率高的文职官员，马哈茂德二世设法改善文职官员的待遇，提高薪俸，但对他们的办事能力和廉洁程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同时致力于打击贪污受贿，改变官场恶习。总之，政治领域的改革中，仿照欧洲国家建立起现代官僚体系的基本部件，可算是对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进行的

---

① 奥斯曼帝国"内务部"的土耳其文 Nezaret-i Dahiliye；英文名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② 奥斯曼帝国"外交部"的土耳其文 Nezaret-i Hariciye，或者 *Hariciye Vekâleti*；英文名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③ 奥斯曼帝国"财政部"的土耳其文 Nezaret-i Umur-u Maliye；英文名 the Ministry of the Finance。

④ 奥斯曼帝国"内政部"的土耳其文 Unur-u Mülkiye Nezaret；英文名 the Ministry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Affairs。

⑤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2.

结构性改革。

马哈茂德二世花费功夫最大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在他执政后的若干年里，尝试用各种办法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但1820年他遇到了一个强硬人物，杰尼纳的贵族特伯德勒里·阿里（Tepedelenli Ali）帕夏。马哈茂德二世用兵围剿，17个月的围困后才迫使这位帕夏屈服。正在与这位对手较量时，摩里亚（Morea）的希腊人发动起义，而这场起义演变成1821年希腊人寻求独立的战争的开端。[①]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则逃脱了被除掉的命运，穆罕默德·阿里私下与奥斯曼政府之间订立了一项官方的协定，因而保持了他在自己行省的统治权。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不能够镇压希腊独立运动时，马哈茂德二世于1823年得到埃及军队的帮助。[②]

马哈茂德二世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把多数行省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从1812年与俄国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到1820年与伊朗冲突（1820—1823）之前，有一个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他把精力用于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贵族，马哈茂德二世使用奖赏和惩罚两种手段。对那些忠于奥斯曼素丹的贵族给予奖赏，允许贵族们的子弟继承父辈的权力，条件是接受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例如，谢廖扎地区的伊斯玛仪贝伊（Ismail Bey）死后，政府让他的儿子代替父亲的职位。忠于奥斯曼素丹的贵族，他们的子弟也可能被任命到政府重要部门担任公职，于是贵族子弟变成了政府官员。[③] 对那些与中央政府不合作的贵族，马哈茂德二世采取威吓和惩治的方式。他会指示行省的管理者压制不服从的贵族，对他们造成威慑。有些不忠诚的贵族，马哈茂德二世会毫不心慈手软，把他们处死。为了切断地方贵族之间的相互支持，马哈茂德二世把一些大家族强行迁徙到另外的地方。如把安纳托利亚的贵族大家族迁至鲁米利亚重新安置，把鲁米利亚的大家族迁到安纳托利亚，一度主宰铁克（Teke）和安塔利（Antaly）的铁克利奥卢（Tekelioğlu）家族，被重新安置到萨

---

①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 24.

②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346.

③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0.

洛尼卡。到 1820 年时，中央政府已经控制了全部安纳托利亚和东鲁米利亚。

尽管少数地方的贵族与中央政府偶然有冲突，但地方贵族不得不面对现实，重点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再与中央政府对抗。中央政府也抓住一切机会，加大对边远地区的控制。1831 年，结束了马穆路克在巴格达的统治，奥斯曼帝国把两河流域纳入有效管辖。在司法方面，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处决犯人前要将案卷呈报首都的司法机关；总督不能随意宣判死刑。1835 年推翻了卡拉曼里王朝在的黎波里的统治。那些表现出不服从或有自治愿望的总督被处决；对于大的行省，政府不惜发动战争，迫使行省总督屈服。[①]当然，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有精良的军队，也有外国人的支持，马哈茂德二世没有什么办法对付，除非他也寻求“国际支持”。再说，他无情地镇压地方贵族，但他不能完全无视起初与贵族之间的那份“协定”。他有时也采取温和的办法，通过不断地在帝国范围内调整地方贵族职位的办法，使大多数地方贵族服从。

马哈茂德二世在剥夺那些军队独立、财政和司法独立的贝伊和帕夏的权力的同时，也努力削弱宗教势力，从根本上提高对行省的控制，重申奥斯曼素丹对全国的统治。当年塞利姆三世改革时曾遭到乌勒玛的反对，这次改革中马哈茂德二世惩办了其中一部分顽固者，也打击了苦修士教团，流放了贝克塔希教团的领袖，没收了教产。当然，这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应归功于军事改革。因为解除加尼沙里军队，也触动了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构成和力量对比。以前乌勒玛得到加尼沙里的支持，反对宫廷和行政官僚，与加尼沙里军将领一道操纵奥斯曼素丹的废立。如今失去加尼沙里军队的支持，乌勒玛被迫采取调和的立场，不敢强烈反对改革。宗教阶层构成的反对力量弱化，无疑增强了素丹和他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力量。从 1826 年一直到 1908 年，奥斯曼帝国政治博弈中只有两个主要角色：奥斯曼素丹的宫廷和政府官僚机构。[②] 马哈茂德二世想尽办法增强个人的权力，并想办法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要取得改革的成功，他要建立对帝国所有领土上的绝对权威。在实行改

---

①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p. 60 – 61.

②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9.

革时，为了得到非穆斯林臣民对新政策的支持，马哈茂德二世以官方的形式访问瓦尔纳（Varna）。他在那里强调，他的所有臣民会受到同等的待遇，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宗教派别。通过抚慰和调解的政策，争取非穆斯林的支持，换得非穆斯林臣民对素丹的忠诚。马哈茂德二世在改革中想尽办法取得与乌勒玛之间的合作，他要调和“伊斯兰法则”与“理想社会、理想国家的原则”。[①]

为了鼓励和支持中央政府控制边远地区，马哈茂德二世试图把中央与行省管理之间的联系和对地方管理制度化。1832 年，他设计了一套邮政制度。除了邮政制度，马哈茂德二世还在交通方面做了改进，修筑了新的道路。为了便于管理流动人员，加强安全，开始采用检疫制度（何时采用，时间不详）。马哈茂德二世加强中央集权的工作，基本上取得成果，只有两处失败：一是在埃及，他被迫让那个军事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取得自治地位；二是在摩里亚，在欧洲各国的干涉下，他被迫承认当地的希腊人取得自由。[②]

（三）经济领域

马哈茂德二世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进行了人口普查。

出于中央政府控制边远地区的需要，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情况获取准确信息。1829 年马哈茂德二世实行人口普查，为此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全国人口普查。1828—1829 年与俄国的战争使人口普查受到影响，1830—1831 年他得以完成人口普查工作，以及相应的土地测量（埃及和阿拉伯半岛没有实行）。较为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报送中央政府，这是奥斯曼帝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有了统计数字，中央政府就可以设计一套切实的税收制度。有了居民财产的确切数据，政府就能事先对征税日期和应征税额进行估算。[③]

1831 年废除了蒂玛制度，宣布不再分封采邑或授免税田。在人口普查和土地测量、财产登记的基础上，政府完善税收制度，派专人负责征收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347.

②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2、84 页。

③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p. 61 - 62.

直接税。在马哈茂德二世改革中，废除蒂玛制度，没收封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削弱封建主阶级，使得改革道路上的深层障碍被拆除。[①] 由于实行改革尤其是军事改革耗费的资金巨大，政府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增加收入，充实金库。自 1826 年以后，大量来自租税、宗教地产和没收的财产、新增税的各项收入都被划拨给军用金库。为了有资金支持军事改革，他控制了帝国所有的盈余资金，重新集中大税项的税收收入，充实到军事专用财库，并由中央政府派税吏到各地直接征税，逐步取代了包税人。不久他又确立新的市易税。政府设法约束地方贵族的军事权和征税权，加强对行省的管理，并通过改善行省交通条件，引进邮政制度等办法，控制国家税收收入。向瓦克夫征税等方式，触及了传统的瓦克夫制度。同时，他还鼓励发展商业和外贸，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播下了种子。

政府鼓励发展农业和工业，为了建立工厂，不惜向国外借债[②]。最初建立新型工厂的目的是为军队生产军服和武器装备。原来就有的纺线厂、制革厂、铸炮厂、造枪车间，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用蒸汽动力取代了畜力，同时增设新的铸炮厂、冶铁车间和纺织工厂，在伊斯坦布尔西部形成新工业区。不久又从国外购进新式机器，从欧洲招收技术工人和手工匠人，并设法保证原材料的充足供应。[③] 但发展工业的成效不明显，其作用不如人口普查、邮政制度、道路的修筑等。这些措施对后来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仍有作用。[④]

（四）文化教育方面

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设立各类学校，开展西式教育。1827 年在伊斯坦布尔开办了一所医学院，目的是为新军训练医师。新成立的医学院还附设一个预科，进行相当于普通初等及中等学校程度的教育。这一时期重新招生、恢复办学的有 1773 年建立的海军工程学校和 1793 年建立的军事工程

---

① Alfred Bonne,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 1998, pp. 10 - 11.

②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1981, pp. 60 - 61.

③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1981, p. 62.

④ Suraiya Faroqhi,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30 - 131.

学校。1831 年和 1834 年分别建立军事音乐学校、军事专科学校。[1] 由于国内兴办世俗学校受到宗教势力反对，政府采取变通的方式，在宗教学校开设非宗教课程，如外语、数理、生化等课程，聘请懂西方科技的乌勒玛任教。马哈茂德二世建立新学校或者使旧学校重新开办，恢复活力——例如医学院、外科医生培训学校、军事科学学校、军事工程学校。当然，这些学校主要是进行专门技术人才的培养，为的是充实各个急需的部门。这些西式学校的毕业生，成为后来现代化所需的知识分子。

马哈茂德二世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毅然仿效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于 1827 年向欧洲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其中主要是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军官），学习军事，学习科学技术。不过，马哈茂德二世只想让留学生学到科学技术，不愿意他们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感染。为了限制法国文化对土耳其青年学生的“危险”影响，他指示留学机构：尽量让留学生不要学习法语，仅仅学习法国的科学技术，保持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让留学生住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使其不受法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2]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功利的盘算。当奥斯曼帝国走下坡路时，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抵制西方的观念。虽然很早他们就留意改革，但他们对引进欧洲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是保持警惕的。其实西方观念的影响无论如何是挡不住的。早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移民，后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裔犹太人，把医学和其他科技方面的新方法、新观念早已带到奥斯曼帝国。欧洲文明也被外交官、旅行者、商人传播到帝国境内，紧跟着欧洲观念的传播，是奥地利、威尼斯、俄国军队每隔一段时间会侵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奥斯曼帝国随时都和欧洲人打交道。而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尤其是基督教臣民，比穆斯林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新思想，他们也影响着穆斯林。[3]

为了学习外国科学知识，提供对外交流的机会，奥斯曼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立使馆等机构。1834—1836 年，恢复了一度放弃的常驻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等城市的使馆，在使馆工作的青年外交人员和翻译人员就可以直

---

①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34.

②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3.

③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88.

接与西方人打交道，提高了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而这些在驻外使馆任过职的才俊，成为后来的改革领导人物和著名政治家。如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中坚人物雷希德帕夏、阿利帕夏、富阿德帕夏，先后在巴黎、伦敦、维也纳当过大使。①

在教育和整个改革实践中，缺少的是教员和翻译人员，语言障碍成为很大的问题。奥斯曼帝国境内讲欧洲语言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和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等。法语或英语教材，经过亚美尼亚翻译或希腊翻译转述，变成了让土耳其人没法听懂的古怪语言。语言的障碍不仅体现在教育方面，而且在处理公事，尤其是处理外交事务方面，缺乏熟练掌握外国语言的本国翻译人员，造成的困难可想而知。以前这类工作被希腊人垄断，但希腊人发动起义、闹独立，奥斯曼土耳其人很快对希腊人不信任。培养懂得欧洲语言的穆斯林，成为刻不容缓的事。而这类专门人才的培养，却不容易速成。1833 年，马哈茂德二世认真地抓西方书籍的翻译和翻译人员培训，在国内设立翻译局。在翻译方面做出贡献的人物如沙尼扎德（Shanizade，1769—1826 年），翻译国外的哲学、植物学、医学著作，以及大量的技术书籍。数学学校的教师、犹太人埃芬迪（Hoja Ishak Efendi，1774—1834 年）撰写了四卷数学研究的著作和相当数量的科技论文。②

此外，马哈茂德二世还鼓励开办印刷厂，出版书籍，发行报纸。19 世纪 20 年代伊兹密尔创刊发行法文报纸；1831 年土耳其语报纸在伊斯坦布尔创刊。1838 年，政府开始给出境的奥斯曼帝国臣民发放护照。内务部负责发放国内旅行许可证。为了加强奥斯曼帝国各地的联系，除了邮政系统改革，还有一个象征中央统治力量到达全国的标志——全国的文职官员和军官的办公室张贴奥斯曼素丹的肖像。③

（五）社会习俗方面

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社会习俗的计划中，落到实处的就是服饰改革。1826 年在军队推行服饰改革，1829 年，服饰改革推广到文职人员。对各

---

①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94 页。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92.

③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 62.

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如何着装，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各地文官一律戴费兹帽，穿齐膝的罩袍、斗篷、长裤和黑色皮鞋，不准穿长袍和便鞋。费兹帽是一种源于北非摩洛哥的红色帽子，被用来当作本国国民的头饰，取代传统的叫舒巴拉（Shubara）的毛边的帽子。1829 年之后，只有乌勒玛被允许穿黑色僧袍，戴长头巾。这一时期还引进了欧洲的马鞍——尽管遭到一些反对。[①] 在政府倡导下，欧式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堂而皇之地摆在市民的家里。欧洲的社交方式和礼仪也开始采用，马哈茂德二世以身作则，用欧洲的仪式来接待客人。

社会习俗改革是困难的。在伊斯兰社会，每个穆斯林的服饰、习惯都关系到宗教信仰，服饰本身就是穆斯林与异教徒的区别，服饰是代表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不能随意僭越。为了预防头饰改革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马哈茂德二世下令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并准备在必要时动用武力应对抗议行为。结果，一些表面的东西还是逐步改革了，而实质性的问题，如财产继承、婚姻、妇女地位、奴隶地位等，改革中几乎没有触及。

二　马哈茂德二世改革评价

1839 年 7 月 1 日马哈茂德二世病逝，皇位由 16 岁的儿子阿卜杜·麦吉德继承。马哈茂德二世没有完成他的改革，他去世的那年爆发了奥斯曼帝国与埃及行省之间的战争（第二次埃土战争），他亲手组建的新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马哈茂德二世已经病得很厉害，但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的是，他准备迫使掀起叛乱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完全屈服。[②]在评价马哈茂德二世改革时，首先要考虑到客观因素，即他是在一种多么艰难的环境下开始改革的。

马哈茂德二世在政变中上台，当政后的几个月内发生了旧军队叛乱、大维齐被杀等一系列事变，反对派施加的压力使他不得不暂时停止改革。瓦哈比运动在帝国境内再次掀起，希腊人起义引发战争，而强敌俄国的威胁始终存在——1809—1812 年就与俄国发生战争。希腊起义扩大为一场延续 10 年的战争，由于列强的干预，希腊于 1831 年脱离奥斯曼帝国。

---

①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92.

② Cyrus Hamlin, *My Life and Times*, Boston, The Pilgrim Press, Chicago, 1893, p. 189.

1832 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被埃及穆罕默德 · 阿里的现代军队打败，奥斯曼帝国不得已求助于列强。宿敌俄国在关键时刻帮助奥斯曼帝国抵制了埃及军队，但乘机从奥斯曼帝国攫取了利益。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马哈茂德二世坚持改革，而且，只要有喘息的机会，马哈茂德二世立即回到改革的轨道上来，这是极不容易的。[①]如果考虑到当时帝国内外交困的严峻情形，马哈茂德二世能够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本身就值得肯定和赞许。

据记载，马哈茂德二世所受的教育，仅仅是一位王子在宫廷里所能得到的那种教育。他学习了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读过伊斯兰经典著作、主要宗教著作，还有法律、诗文、历史等。他没有学过西方语言，对西方文化缺乏直接的了解。[②] 但他励精图治的决心坚定，改革的方向明确，对本国国情的认识也是深刻的。

从改革的结果看，有以下几点成效：第一，彻底解除了旧军队，解决了前几任素丹未曾解决的问题。第二，马哈茂德剥夺了威胁中央政府的地方贵族的权力，维护了国家行政的统一。从军队改革的成功和重要权力的加强这两点看，马哈茂德二世堪称铁腕人物。第三，仿照欧洲模式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内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农业部、外贸部等政府部门的设置，为奥斯曼帝国初步准备了政治现代化的基础。第四，实现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第五，废除蒂玛制，为后来的改革铺平了道路。第六，税收改革的大思路是正确的。第七，从总体来看，到 1839 年马哈茂德辞世时，帝国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大的变化。在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措施中，如完善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倡导信仰自由、鼓励发展商贸、学习西方技术等，尽管在当时没有实现目标，但确实为后来的许多改革播下了种子。后世学者评价，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的"西化"，与以前奥斯曼帝国的上层人物试图消极应对欧洲挑战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在马哈茂德二世执政期间，"西化"首次作为与机构改革相关的正式政策，强力推行。此外，新式学校校培养了不少人才，政府的报纸支持西化的宣传，这些改革对新一代有持久的影响，也为后来坦齐马特时代的改

---

①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33.

② ［英］伯纳德 · 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83 页。

革准备了干部基础。[①]

不过，马哈茂德二世改革中未能落实的计划、失误的方面、产生负面影响的方面，也能列举出许多条。故而有的通史和专著中说，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

经济方面，由政府派领薪的收税员直接征收，本意是增加政府的直接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实际后果是农民负担没有减轻，有的地方反而增加了。税收改革尤其是废除包税制的措施，在农村推行的成效并不大。后世学者分析原因，主要是政府派不出能完全胜任的税收官，况且遇到传统势力的阻碍——如当地掌握包税权的显贵故意破坏新税制，加上中央与行省间的信息不能准确传达——正因如此，实行直接征税后非但未增加国家的收入，反而使国家税收收入减少了。[②] 还有，马哈茂德二世羡慕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但他没有像穆罕默德·阿里那样积极发展工农业、建立工厂，增强国家物质基础，这就使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基础不牢固。由于在组建新军中无节制的花费，结果军费开支庞大，给奥斯曼帝国财政造成很大压力。马哈茂德二世改革中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缺口大，财政形势严峻，物价不稳。马哈茂德二世通过改革货币名称和降低币值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危机，结果，皮阿斯特（piastres）币值从 1814 年的 23 皮阿斯特兑换 1 英镑，下降到 1839 年的 104 皮阿斯特兑换 1 英镑。[③]

政治方面，“西化”改革在原则上就是引进西方的制度，限制君主的权力，可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时期拒绝限制自己的权力。以往改革受到反对派抵制而前功尽弃的教训是深刻的，马哈茂德二世尽量克制不进行大幅度、实质性的政治变动，直到彻底控制了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旧的威胁解除了，新的威胁出现了，如何掌握和运用权力，比改革本身更要紧。从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起，国内加尼沙里军的威胁被解除，但穆罕默德·阿里的挑衅，社会各方面对政府改革的反应，迫使马哈茂德二世采取新的办

---

①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3.

② Erik, J.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p. 62 -63.

③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92.

法增强他的权威。现存的一些文献表明，马哈茂德二世进行军事和内政改革时获得了来自乌勒玛和奥斯曼社会上层相当大的支持；但同样有资料表明，马哈茂德二世也遇到了相当多的反对——反对派指责他 1829 年败给了俄国，指责他没有阻止希腊的独立。尤其帝国各地加尼沙里的残余，得到职位较低的乌勒玛和地方贵族的支持，不断进行反对改革的宣传。[①] 所以，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是在完全不利的氛围中艰难进行的。据外国使节的回忆录记载，1838—1839 年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整个缺少安全感，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外国人时常担心遭受袭击。帝国境内的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人、希腊人随时随地感受到敌意，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人把不满发泄到他们头上。而巴尔干地区的外国人也受到俄国人的无理对待。美国使团的哈姆林（《我的生活与时代》的作者）等人非常焦虑，遇到威胁只能求助于美国驻伊斯坦布尔的外交机构。因为奥斯曼政府明确表示，不能保证美国使团的安全。[②]

从改革结果看，马哈茂德二世管理机构改革并未达到目的。改革后的机构只是换了门面，如大维齐和同僚们都被称为“大臣”，穿着统一的大礼服，有自己的办公室，服务人员也是穿着整齐的西式服装，但是，官僚机构的传统习惯和作风、办事方式、等级和特权，依然没什么变化。从另一个方面看，“马哈茂德二世的臣民们，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极大地承受了他的集权政策带来的恶果：成百上千的应征入伍者，有的未上战场就死于军营中的流行病；成千上万的士兵在镇压起义的战斗中死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塞尔维亚、瓦拉几亚、阿拉伯半岛、埃及”。[③] 马哈茂德二世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为此不惜一切手段打击和削弱地方实力派，故而有人批评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说他开创的是“独裁式的现代化”。[④] 因此，马哈茂德二世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

① Itzchak, Weismann, Fruma Zachs, *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 B. Tauris;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5, p. 23.

② Cyrus Hamlin, *My Life and Times*, Boston, The Pilgrim Press, Chicago, 1893, pp. 195 – 196.

③ Gά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347.

④ Tezcan, Baki, “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3, May 2009, pp. 477 – 478.

第二节　希腊的独立及其对帝国的影响

希腊独立战争，也称希腊独立运动或“希腊革命”[①]，是希腊为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它始于1821年，结束于1830年（取得独立）。这次战争的动因是复杂的，时机选择带有偶然性，战争过程一波三折，最后的结果并非取决于希腊人反抗力量的强弱，而取决于欧洲大国的干预程度。因此，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在英、法、俄等国的帮助下最终建立了希腊王国”。[②] 希腊人之所以要通过战争方式，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是因为希腊人自15世纪中叶就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③]，经历奥斯曼帝国400年统治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会自愿放弃对希腊人的统治，不允许希腊人独立。

一　希腊独立战争考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权威

希腊人是信仰东正教的民族之一，在奥斯曼帝国米勒特制度下生活了四个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并未强迫希腊人改宗伊斯兰教，希腊人作为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群体中的一个民族，除了向奥斯曼帝国纳税，接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宗教、文化甚至经济生活方面都有一定自由。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除了希腊本土生活着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在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安纳托利亚都有希腊人。很多富裕的希腊商人定居于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萨洛尼卡等大中城市，过着优裕的生活。历史时期本土希腊人曾发生过叛乱——如1585年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和埃托利亚叛乱，1611年亚尼纳附近的希腊民众叛乱——都被奥斯曼政府镇压。

---

① 关于希腊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史料中有多种称谓，如“希腊独立运动”（the Greek Movement of Independence）、“希腊独立战争”（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希腊革命”（the Greek Revolution）、“希腊起义”（the Greek Insurgence, the Greek Insurrection）、“希腊人民解放斗争”（Struggle for Liberation of the Greeks）等。

②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240.

③ 1446年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率领军队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攻占科林斯等城。1456—1458年，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扫荡爱琴海诸岛，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也叫摩里亚半岛）的北部。1459年占领雅典，1460年占领半岛的南部，至此，整个希腊都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17 至 18 世纪，希腊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较快，纺纱、丝织、染纱、制皂等行业的规模生产，促进了对外贸易，希腊产品行销奥斯曼帝国各地，也远销国外。从 17 世纪中期开始，希腊商人利用他们在航海方面的优势，逐渐支配了奥斯曼帝国的海洋运输和贸易。在许多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城镇，商业交易由希腊代理人控制。进入 18 世纪，希腊商人达到了他们商业上的全盛时期。希腊地区海运业发达，在奥斯曼帝国同法、俄、德等国之间的贸易中，希腊船主比其他非穆斯林海运业主更具有优势，尤其在奥斯曼帝国西部。希腊人也是伊斯坦布尔主要的银行家，他们还占据着东正教主教的职位。[①] 在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和萨洛尼卡这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希腊人参与当地的制造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主导作用。例如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制鞋业的 1/4 份额由希腊人控制，其他手工行业也有希腊人在其中大显身手。[②]但希腊商人和作坊主、船主，既要向奥斯曼政府缴纳赋税，也遭受地方管理者的敲诈勒索，生命和财产并无保障。在希腊农村，人均土地本来就少，但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农民占有耕地极少，生活艰难。

希腊人尽管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之下，却一直没有中断与西欧的联系和交流。希腊教徒表面上对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保持忠诚，但实际上保留着本民族的教育、文化传统。一部分希腊人进入奥斯曼帝国服务，从事外交工作或管理工作。一些希腊人经商、当船主，不仅与威尼斯等商业城市有联系，也在俄国、奥地利、法国有自己的商站。[③]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其后的法国革命对希腊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1793 年，第一份希腊报纸在维也纳创办，宣传法国革命的观念。其后，法国革命的观念在全希腊传播，自由、平等思想通过信件、演讲等方式，唤醒了希腊民众的民族意识。一部分希腊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改变生存状态。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希腊人看到取得民族解放的可能性。在

---

① Re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 28.

②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2.

③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 1.

希腊人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阿达马提奥·科莱斯（Adamantios Koraes，1748—1833 年）、布尔加莱（Boulgarês，1716—1806 年）、福蒂亚德斯（Fotiadês，1750—1805 年）、杜卡斯（Doukas，1760—1845 年）、热内迪奥（Gennadios，1786—1854 年），以及诗人雷加斯·费拉伊奥（Rêgas Feraios，1754—1798 年）等。[1] 阿达马提奥·科莱斯是一位学者、政治思想家，他致力于复兴希腊语言，出版古典希腊著作等活动，也对建立希腊国家充满渴望。[2]

希腊民族意识逐渐增强，19 世纪初民族主义在希腊已经成为一股力量。希腊人此时看到，奥斯曼帝国政治腐败，地方势力已经形成割据之势，这对希腊人的独立运动是有利的。1814 年希腊商人在敖德萨（Odessa）建立起一个秘密团体，叫"友谊社"[3]。这个组织纪律严明，宗旨是团结同胞，发动起义推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其实早期还有一些类似的团体，但无一例外都是文化团体。"友谊社"是第一个明确追求政治目标的组织，明确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实现"解放祖国"的愿望。[4] 1818 年之后，类似的团体在奥斯曼帝国基督教臣民中建立起许多个。这些团体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争取自己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宣传教育民众，同时秘密联络，筹划起义。

在希腊独立运动前的政治宣传活动中，"友谊社"的宣传活动最有成效，但"友谊社"的规模并不大。到 1821 年发动起义前的几个月，"友

---

①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p. 2 - 3.

② 阿达马提奥·科莱斯有一整套关于复兴希腊教育、建立代议制政府的主张。他坚信教育的影响力，尽管他没有忘记教育所起的作用是缓慢的。他认为希腊教育是第一个武器，它能使希腊人走向独立道路；代议制政府是第二个武器，它能使希腊人保持他们的自由。科莱斯认为，希腊应当不设国王，应当制定宪法，建立代议制政府。1823 年，阿达马提奥·科莱斯写信给希腊独立运动领导人马弗罗戈达托，希望希腊人借用英美国家的制度，建立希腊共和国。他坚信，如果希腊采取代议制，保持信誉，推行教育改革，实现宽容，希腊就会成为欧洲的样板。阿达马提奥·科莱斯关于建立代议制和共和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复兴希腊教育，为希腊革命铺设道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详见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pp. 8 - 11。

③ 名称为 *Philiki Etairia*，英文 Friendly Society，一般译为"友谊社"。

④ Richard Clogg,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6, pp. 47 - 48.

谊社”成员还没有超过 1000 人。[①] 后来的研究表明，“友谊社”成员的成分也较复杂，其中大约 54% 是商人，13% 是医生、教师、律师、学生等；12% 是行省贵族，以伯罗奔尼撒半岛[②]的贵族为主；另外 10% 是教士（没有高级教士）；有 9% 的人是握有武器的人，但以匪帮为主，还有为数不多的农民和手工艺人等（约占 2%）。[③]

希腊人的民族自决要求，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信念之上的：“其一，希腊人是与土耳其人不同的一个民族；其二，土耳其统治者给希腊臣民增加了不少义务，却没有给予希腊臣民应有的权利；其三，希腊人臣服于土耳其人的武力，与他们的宗主土耳其人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土耳其人对他们的统治是不合法的；其四，土耳其人是占据欧洲土地的外来者，他们应当放弃欧洲土地；其五，希腊人有权利重返继承古典希腊遗产的欧洲民族的大家庭。”[④]

听起来似乎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统治不满，其实希腊人并没有经受比其他民族更严重的压迫。客观地说，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中是生活最为稳定的少数民族之一，至少比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经济状况好得多。希腊的高级教士和世俗社区领导人的社会地位较高，并且拥有较大的权力。只是在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之后，希腊社会精英们认为他们应当独立，应当自由，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生活是不正常的。

1821 年的反抗活动开始后，几个地区的秘密团体才建立联合。从 1820 年起，担任“友谊社”负责人的亚历山大·伊普昔兰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⑤] 主持召开几次重要会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821 年 3 月 5 日（一说 3 月 6 日），伊普昔兰提斯率领“友谊社”部分成员，和他

---

① 关于“友谊社”成员的人数，各种资料差异很大，有的数据是“不超过一千人”（见 Richard Clogg 的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p. 48），有的数据是“到 1820 年参加‘友谊社’的有 20 万人之多”（国际关系史著作大多是这一数据），不知道 20 万的数字从何而来？

② 英文文献中也称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摩里亚（Morea）半岛。

③ Richard Clogg,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6, p. 49.

④ John S. Koliopoulos, *Modern Greece, a History since* 1821, Wiley-Blackwell, Oxford, 2010, p. 16.

⑤ 英文文献中伊普昔兰提斯的名字有几种，如 Hypsilantis, Ypsilantis, Ypsilanti, Ipsilantis 等。

组织的4500人的军队跨过普鲁特河（Pruth），进入摩尔达维亚，在雅西城宣布起义。不过，这次起义没有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归附他的人寥寥无几。另有资料说，伊普昔兰提斯组织的“神圣军团”有5000人，当然，这支队伍没有战斗经验。[①]到夏季，他们遭遇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镇压，这支由希腊学生组成的队伍几乎全被摧毁（伊普昔兰提斯跨过边界逃往奥地利控制的地区，在穆加茨被捕）。[②] 起义就很快失败了。

1821年4月6日（公历3月25日），其他政治团体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发动武装起义，在希腊本土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起义者在佩特雷城（Patras）的圣乔治广场宣誓，成立“革命指挥部”，宣布希腊革命开始。此后的两个多月里，卡拉梅城、普萨拉岛、伊德拉岛、阿提卡半岛、迈索隆吉翁都宣布起义，公开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起义范围从伯罗奔尼撒半岛扩大到爱琴海诸岛和中部希腊。其中，迈索隆吉翁城于6月1日成功地赶走土耳其人，成为革命中获得解放的第一个城市。

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阿利帕夏，他掀起了一场反对马哈茂德二世的“叛乱”。阿利帕夏有“爱奥尼亚的狮子”的称号，曾被任命为特利卡拉（Trikala）的帕夏，不久他占据伊庇鲁斯，后来成为爱奥尼亚的统治者，并让他儿子维利（Veli）统治色萨利（Thessaly）。阿利帕夏建立起一个从阿尔巴尼亚中部穿过伊庇鲁斯和色萨利直达南希腊的小王国，并在这个小王国拥有独断的权力。[③]阿利帕夏选用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充实自己的统治机构，如亚历山大·努特索斯（Alexander Noutsos）、爱奥尼斯·科莱提斯（Ioannis Kolettis）、曼索斯·奥科罗姆（Manthos Oikonomou）和他的兄弟克里斯托斯（Christos）。1800—1815年，阿利帕夏巧妙地玩弄强权政治的把戏，镇压了所有反对派，巩固了他对希腊大陆的统治。1820年阿利帕夏的野心被发现，马哈茂德二世派伊斯马仪·帕索贝伊（Alexander Paso Bey）进攻阿利帕夏。正因为帕索贝伊与阿利帕夏在交战，才给亚历山

---

① Nicholas Doumanis, *A History of Greece*, Pla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10, p. 171.

② Richard Clogg,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6, p. 52.

③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1, p. 16.

大·伊普昔兰提斯领导的“友谊社”成员提供了发动起义的机会。

阿利帕夏在反抗奥斯曼素丹的战争中也是讲究谋略的，比如他与“友谊社”成员、与拥有武装的索里奥特人（The Souliotes）、与各种各样的匪帮建立联系或进行合作。不过，这些派别之间互不信任。原计划是，如果奥斯曼政府的大兵压向爱奥尼亚，基督教徒在三个地区同时起义策应。一是在多瑙河的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二是在首都伊斯坦布尔，三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① 可惜，起义并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真正发动起义时，“友谊社”的计划不切实际——比如要在巴尔干其他地区发动起义，策应希腊本土的起义，还计划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发起暴动——也依赖阿利帕夏的力量，但这些计划大都落空了。②首先，“爱奥尼亚的狮子”阿利帕夏不堪一击，在1821年3月中旬就被奥斯曼的政府军打败了。其次，伊斯坦布尔起义没有实现。再次，作为这次起义主力军的多瑙河公国也没有得到俄国支持。③

尽管希腊人的起义力量不强，但希腊本土的起义军还是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奥斯曼帝国正规军队。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正规军就是那些加尼沙里军，战斗力不强。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境内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反抗活动，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分兵平叛，顾此失彼。当马哈茂德二世集中精力用兵于杰尼纳（Janina）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起义军开始屠杀当地的穆斯林，马哈茂德二世接到战报忧心如焚，在平定杰尼纳之乱后，急忙移师至希腊。而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雅典城已经落入起义者控制之中了。

在胜利的鼓舞下，希腊地区大片土地燃起起义烈火，奥斯曼帝国对希腊的统治似乎已经丧失。这一时期，学者阿达马提奥·科莱斯不断撰文，理性地指导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在1821年时他反复提醒希腊革命者：取得自由是容易的，但保持自由就不那么容易。他不怀疑革命能取得胜利，但他担心希腊取得胜利后能否保持宽容和给予民众自由。希腊人用武力驱逐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会用武力报复。而得到胜利的希

①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1, p. 17.

② Richard Clogg,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6, p. 50.

③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1, p. 18.

腊人又有可能用奥斯曼土耳其征服者奴役他们的办法，去奴役奥斯曼土耳其人。[①]

1822年1月27日，起义者在埃皮达罗斯（Epidauros）召开了国民议会（第一届国民会议），庄严宣布希腊独立。他们宣称："我们现在正进行的反土耳其人的战争，既不是一种党派之争，亦不是煽动民变。它并非旨在谋求任何单独部分的希腊人民的利益；它是一种民族战争，一种神圣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在于恢复个人自由的权利以及财产与荣誉的权利……"[②] 国民议会选举出以亚历山大·马弗罗戈达托（Alexander Mavrocordato）为首的5人执行委员会，行使领导希腊人民的最高行政权。经过投票选出一个由59人组成的立法会议，德米特里·伊普昔兰提斯为主席。国民会议通过了希腊《宪法》，建立了由议会和执行委员会组成的新政府。

不久，国民会议公布第一部《宪法》，亚历山大·马弗罗戈达托被选为总统，但他在希腊没有多少权威，仅仅在西部希腊的阿卡纳尼亚有一些影响。[③] 这年6月，起义军打败了来镇压起义的奥斯曼政府的精锐部队（约有步兵2.3万人，骑兵6000人）。但起义者内部出现分裂，甚至发生冲突。奥斯曼政府抓住机会，再次派兵镇压。

关键的问题是，希腊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位是在全希腊拥有广泛权威的。马弗罗戈达托和德米特里·伊普昔兰提斯位于领导核心，他们与伊兹拉地区的商人和船主库托里奥特斯（Kountouriotes）建立联合，但他们三人的权威有限，尤其受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起义首领们的公开挑战。如拥有武装的匪帮首领科罗科特劳尼斯（Kolokotrones）和伯罗奔尼撒的权贵扎伊姆斯（Zaimes）蔑视伊普昔兰提斯等人。科罗科特劳尼斯明确表示对宪政程序没有耐心，他实际上用武力控制了政府的执行委员会，统治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不过，科罗科特劳尼斯很快失

①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p. 7 - 8.

② 《希腊国民议会宣布希腊为独立国家》，译文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蒋相泽主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6—458页。

③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 19.

败了。[1]

尽管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但起义四年后，希腊人还是成功地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大陆的大部分。奥斯曼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倾注全力征剿，但奥斯曼军队战斗力太差，完全失败。1824 年，马哈茂德二世不得不求助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825 年 2 月，穆罕默德·阿里应马哈茂德二世之邀，派儿子易卜拉欣的军队进攻希腊。易卜拉欣的军队攻占克里特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登陆，并迅速占领了大片希腊土地。雷希德帕夏率领的奥斯曼政府军 2 万人也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起义军与奥斯曼政府军和埃及军队进行了艰苦的战斗。1826 年 4 月，迈索隆吉翁陷落。雅典也被雷希德帕夏的军队围攻。克里特岛、纳瓦里诺先后被攻占。科罗科特劳尼斯急忙向俄国求救。

二　外国的干涉和希腊的脱离

希腊起义刚刚爆发时，只引起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的关注，英国和法国一开始并未重视。当时神圣同盟的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大国的反应是，尽快商讨如何镇压希腊起义。几大国的外交官们认为，“希腊革命”会在欧洲其他国家引起连锁反应。也就是说，希腊起义对神圣同盟各国带来威胁和不安。

俄国本来很早就支持希腊人自治，甚至鼓励希腊人的反抗运动。希腊人也曾经把脱离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愿望寄托在俄国人身上。1769 年俄国军队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鼓动希腊人起义，但没有成功。后来希腊人又把希望寄托于维也纳会议上列强的支持，但是，维也纳会议的《最后议定书》宣称奥斯曼帝国对希腊的统治不变，让希腊人失望。在希腊起义之初，俄国担心刚刚恢复的正统秩序受到破坏，反对任何起义或分离活动，因此，俄国非但没有表示支持希腊起义，而是和奥地利、普鲁士一样，从“正统主义”出发谴责希腊起义。当然，俄国绝不会对希腊起义这一事件视而不见。对俄国来说，希腊起义是削弱奥斯曼帝国大好的机会，俄国人很想支持希腊人。1821 年 4 月至 5 月，奥斯曼军队镇压和屠杀基督教徒，4 月 22 日，大主教格列高利被绞杀，马上引起俄国沙皇的

---

①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p. 24 – 25.

关注。沙皇认为这一事件是对他本人的侮辱，立即做出反应。[①]

俄国申明自己有权保护奥斯曼素丹臣民中的东正教徒，所以第一个提出方案，希望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1824 年 1 月，俄国提出的解决希腊问题的方案包括一个秘密的关于希腊问题的“和约”和“备忘录”。要点是：把希腊地区分为三个公国，这三个公国仍是奥斯曼帝国属地，但应拥有与多瑙河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样的地位。东部希腊由色萨利、维奥提亚和阿提卡组成，西部希腊由以前威尼斯人控制下的沿海地区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组成，南部希腊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组成。[②]三个希腊公国继续向奥斯曼政府纳贡，但奥斯曼素丹不能干涉希腊公国的内政；希腊人有权使用自己的国旗，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奥斯曼政府限制。这个秘密方案在 1824 年 5 月份向外界透露后，奥斯曼政府和希腊起义者都激烈抗议。对于俄罗斯公然要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企图，奥斯曼素丹很愤怒。英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没有公开反对俄国的方案。此时希腊起义者已主动寻求英国的保护。

其实，并不是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说，“欧洲人似乎把希腊人的行动看作是对奥斯曼素丹的反叛，欧洲人对希腊起义不抱任何同情”。[③] 相反，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听任希腊革命蔓延，有可能点燃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之火；不支持希腊起义，等于放弃在巴尔干地区扩展势力的机会。在希腊起义的过程中，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坚持“维持现状”，起初英国并未支持希腊的独立运动，是没有考虑好如何做。

看到俄国人提出方案，英国不会坐视不管。1823 年 3 月 25 日，英国外交官把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称为“交战国双方”，等于是把希腊当作一个与奥斯曼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英国向希腊起义者提供经济援助，支持或暗中支持希腊起义军。英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同情希腊革命，同情者不仅捐资，甚至奔赴希腊参加战斗。如著名的诗人拜伦于 1823 年 7 月前往希腊，支援希腊解放事业。1824 年 1 月 5 日英国诗人拜伦来到取得“自

---

①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 15.

② J. M. Wagstaff, *Greece: Ethnicity and Severeignty, 1820—1994, Atlas and Documents*, Archive Editions, London, 2002, pp. 55 - 56.

③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 15.

由”的希腊土地上，住在英国控制的爱奥尼亚岛。他到达希腊既有实际的重要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因为希腊独立运动触动了欧洲人，像拜伦这样的人，富于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情感，在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发现了一种“高贵的理由”，他们在希腊的斗争中看到了传播自由思想的机会。[①]关于拜伦支持希腊独立，还有一种说法是：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三个因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与欧洲的联系是割不断的，欧洲人从感情上与希腊人是接近的，拜伦参加希腊独立运动也是这种体现。[②]

1824 年 4 月 19 日，拜伦病逝于迈索隆吉翁（一说：1824 年拜伦登陆迈索隆吉翁，当时这座城市是在马弗罗戈达托的“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三个月后，拜伦因发烧而病故）。在希腊人看来，拜伦的指导和忠告比他在欧洲的声援更有价值，或许比他从伦敦带给希腊政府的筹集的款项更有价值。[③]

战场上的局势发展不容乐观，迫使欧洲大国采取了行动。因为，1821 年至 1824 年希腊起义者和奥斯曼政府军之间处于僵持状态，互有胜负，1824 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明显处于劣势，希腊起义烈火呈燎原之势。1824 年易卜拉欣率领军队进入希腊，并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1826 年春攻陷迈索隆吉翁，夏季奥斯曼政府军和埃及联军占领雅典，奥斯曼政府恢复了对中部希腊的统治。其后希腊起义军在各地败退，起义据点逐步丧失。也就是说，1825—1826 年奥斯曼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借助于埃及军队，转败为胜。以 1827 年夏季的形势看，希腊起义眼看就要被镇压了。希腊独立运动明显陷入困境，一部分起义者转入游击战。实际上，就在欧洲列强各打自己的算盘在谈判桌前商量对策的几年里，希腊人民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与奥斯曼政府军和埃及军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被围困的城市弹尽粮绝，死伤惨重。

1826 年 2 月，俄国在彼得堡召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的代表开会，英国代表参加了会议。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心支持希腊独立运动，不惜与奥

---

①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1, p. 23.

②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399.

③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 25.

斯曼帝国开战。英国不愿意看到俄国率先出兵巴尔干，也担心俄国会控制黑海海峡，便派威灵顿公爵赴俄国公开磋商，1826 年 4 月，英国与俄国签订《彼得堡议定书》。在议定书中，英国支持希腊自治，但希腊仍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向奥斯曼政府纳税，由奥斯曼素丹任命希腊自治政权的领导人。[①]这一“调解”希腊问题的方案，是承认奥斯曼帝国仍拥有宗主权，允许希腊自治。实际上是想让希腊变成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国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不赞成这项协定草案，他认为希腊要么完全独立，要么完全屈服，不应该有这样一种折中方案。[②] 奥斯曼政府军和埃及军队此时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不同意给予希腊自治权。

在希腊一边，1827 年 4 月 11 日，第三次国民大会选举卡普迪斯特里(Kapodistrias)为新的总统。这位新总统信任西方大国，赞成《彼得堡议定书》中关于希腊地位的规定。1827 年 5 月发表的《希腊政治宣言》中，宣称“希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并没有关于领土的声明。

法国出于自己利益考虑（不愿看到英俄联合控制黎凡特地区），于 1827 年 7 月 6 日与英、俄一起在伦敦签订《伦敦条约》。条约敦促停战，使 1826 年的议定书生效，并承诺由欧洲强国保护希腊，授权派遣联合舰队维护和平。[③] 也就是准备使用武力迫使奥斯曼政府屈服。条约还提出希腊和土耳其两个民族分离的原则与“和解”的方式。事实上，英国、法国和俄国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并加入了希腊一方。

1827 年 8 月 16 日，《伦敦条约》被送给奥斯曼帝国，等于是英、法、俄三国向奥斯曼帝国发出通牒，结果，奥斯曼素丹拒绝停战。1827 年 9 月初，英、法、俄三国正式出兵，切断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联军的运输线。10 月 20 日，英、法、俄的舰队在纳瓦里诺（Navarino）战役中，打败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和埃及的海军舰队。奥斯曼帝国海军和埃及海军 64 艘舰艇参战，至少 29 艘被击沉，损失惨重。[④]

纳瓦力诺战役之后，埃及军队撤离，法国军队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

---

①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1, p. 25.

②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 22.

③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1, p. 26.

④ 这次失败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被称为继勒班陀海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海军最大的一次惨败。一说：奥斯曼帝国舰队 89 艘战舰损失了 60 艘，伤亡 1 万余人。见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1, p. 26。

俄国军队跨过多瑙河，开进奥斯曼帝国领土。

1828 年 4 月 26 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理由不是奥斯曼素丹拒绝欧洲大国联合提出的议案，而是奥斯曼素丹不愿意从多瑙河公国撤出军队。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经过一年多的交战，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俄国军队直逼伊斯坦布尔。英国和法国不愿看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被俄国占领，也不愿看到希腊被置于俄国沙皇保护之下。于是英、法两国急忙采取行动，阻止俄军胜利前进，并使用外交手段解决“希腊事务”。7 月 2 日，英、法、俄在伦敦召开会议，就希腊领土边界等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协商。[1] 8 月，俄国军队移师奥斯曼帝国首都附近。奥斯曼政府被迫求和。9 月 14 日，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埃迪尔纳条约》。根据条约，希腊取得独立，但在 10 年内每年向奥斯曼政府缴纳 150 万金币的贡赋；并划定阿尔塔—沃罗一线为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线。

从 1828 年 1 月起，总统卡普迪斯特里正式就职，这位领导人是欧洲大国认可的。在俄国舰队司令雷科德（Ricord）和亲俄的科罗科特劳尼斯的军事力量支持下，卡普迪斯特里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并迅速组建了政府机构。但是，卡普迪斯特里未能成功地充当“和事佬”，处理好他与希腊本土当权者的关系。连他为建立西方式的管理制度所做的努力，也不断遭到反对。卡普迪斯特里感叹：“希腊的命运掌握在上帝和欧洲大国的手里。”[2]

就在奥斯曼军队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处于劣势时，希腊军队乘机反攻。1829 年 5 月 14 日，希腊军队收复了迈索隆吉翁，9 月，德米特里·伊普昔兰提斯率领的希腊军队大败奥斯曼帝国军队，迫使奥斯曼军队撤出希腊。

希腊人民艰难的独立战争至此取得胜利。

1830 年 2 月 3 日，英、法、俄签订《伦敦议定书》，4 月，奥斯曼政府接受这份议定书，希腊完全取得独立。[3]《伦敦议定书》指出：“希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政治、行政管理、贸易等方面享有完全独立的权

---

① J. M. Wagstaff, *Greece: Ethnicity and Severeignty, 1820—1994, Atlas and Documents*, Archive Editions, London, 2002, p. 66.

②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1, p. 28.

③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24 – 25.

利。”不过，《伦敦议定书》规定的希腊疆域范围比《埃迪尔纳条约》的规定缩小了。后来，到 1912 年巴尔干战争结束后，根据新的条约，克里特岛被划给希腊，而爱琴海上有几个岛屿被希腊人占领。①

希腊正式独立后，局势很不稳定，反对力量在增长。1831 年 1 月，虽然奥斯曼军队撤出北希腊，但 10 月 9 日希腊总统卡普迪斯特里被杀。英法俄三国起初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为君主，引发希腊局势的波动，科勒提斯（Kollettes）乘机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古斯提诺（Agostino）离开希腊。② 不久，利奥波德遇刺身亡，计划落空。

1832 年 5 月 7 日，英、法、俄三国与巴伐利亚签订《君士坦丁堡协定》，选择巴伐利亚的奥托（Otto）亲王接受希腊王位。奥托 1832 年成为希腊统治者，称奥托一世（1832—1862 年在位）。

《埃迪尔纳条约》、《伦敦议定书》、《君士坦丁堡协定》共同确立了希腊在列强保护下的独立国家地位。根据 1829—1832 年的几个条约（或协定）划定了希腊边界，建立希腊政府。③ 希腊王国边界的范围是：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岛和中部希腊构成疆域主体，连同邻近的岛屿，如基克拉泽斯群岛、萨洛尼卡岛。而在希腊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克里特岛、萨摩斯岛、希俄斯岛和佐泽卡尼索斯岛等，仍然归奥斯曼帝国管辖。独立之初的宣言并没有涉及希腊领土，1822 年 8 月底的维罗纳（Verona）会议上明确了这个将要建立的国家的范围，即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埃维亚岛（Evvia）、维奥蒂亚（Boeotia）、阿卡纳尼亚、埃托利亚（Aetolia）、色萨利和伊庇鲁斯的大部分，以及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但边界仍是模糊的。④ 奥托国王所统治的希腊，国土大致仅有今天希腊的 1/3，其国民只是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徒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希腊本土的人口与独立战争前相比有所减少。1821 年之前大约 76 万多人，而 1828 年仅有 60 万人，直到 1838 年之后人口才开始恢复增加，1853 年增长到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希腊军队于 1919 年 5 月在协约国舰队的帮助下占领伊兹密尔，后被凯末尔的军队赶出来。

②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p. 32.

③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1, p. 28.

④ *Greece: Ethnicity and Severeignty, 1820—1994, Atlas and Documents*, by J. M. Wagstaff, Archive Editions, London, 2002, p. 65.

100 多万人。[1]奥托当政时，希腊人口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1833 年时希腊人口中超过一半的人住在中希腊，22% 的人居住在爱琴海诸岛。希腊国内也居住着瓦拉几亚人和信仰东正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希腊王国的扩展和境内讲希腊语的东正教徒人口的逐渐固定，是在 20 世纪初才完成的。1923 年希腊和土耳其根据《洛桑条约》交换人口之后，大体上确定了希腊国民的基数。[2]

客观地说，希腊人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的，欧洲大国的干涉和插手起到很大作用。由此，希腊政治成为欧洲政治的一部分。希腊王国的君主是巴伐利亚人，法国人充当希腊的军事顾问，英国人指导希腊政府的管理[3]。希腊王国的首都起初不在雅典，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卢普林港。1833 年 2 月 6 日，奥托一世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现代希腊的历史正式掀开。

三　希腊独立的深远影响

希腊独立是 19 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希腊革命是现代希腊光辉的第一页。在希腊独立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失败，也给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留下一道深的印记。

第一，希腊是第一个主动反抗奥斯曼帝国并取得成功的巴尔干国家。希腊独立在奥斯曼帝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了后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保加利亚等地的独立运动。希腊起义鼓舞了巴尔干其他民族，希腊的独立成为巴尔干民族运动的榜样。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希腊独立是维也纳会议后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维也纳体系，也削弱了神圣同盟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希腊独立的意义超出了希腊和希腊历史的界限，它是 1776 年美国革命以后处于服从地位的民众反抗帝国强权的独立战争中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也是第一次成功的民族主义革命，为后来的民族主义斗争提供了样板。希腊独立也是对维也纳会议上形成的保守的“欧洲大国一致”原则

---

① Nicholas Doumanis, *A History of Greece*, Pla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10, p. 176.

②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242.

③ 在 1821 年发动起义时，希腊起义者心里并不清楚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体，起义后他们在摩里亚、西部希腊和东部希腊建立起“立法机构”。

的一次真正考验。[①]

第二，希腊独立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巴尔干南部重要的领土和居民。仔细探究起来，属地的分离并不是始于希腊。1774 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条约要求奥斯曼帝国放弃对克里米亚的统治。克里米亚是被迫从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分离的第一个穆斯林居住区，而《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是欧洲大国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属地脱离帝国的开端。[②] 不过，希腊的独立是通过起义方式反抗奥斯曼帝国，是属地主动争取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开端。希腊独立后，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外交的重要性也在这一时期的危机中凸显出来。奥斯曼政府 1839 年和 1856 年颁布法令大张旗鼓地推行西化改革，重新界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臣民之间的关系，这些变化都是 19 世纪 20 年代希腊独立运动引发的后果。

第三，希腊独立对埃及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战争损耗了埃及的力量，尤其纳瓦里诺一战，使穆罕默德·阿里多年来的军队建设成就毁于一旦。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帮助素丹镇压希腊起义，也在奥斯曼政府与埃及行省之间埋下了战争的祸根。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希腊，引发了后来埃及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两次战争，战争的结果，穆罕默德·阿里获得了在埃及的世袭统治，但军事力量从此一蹶不振，埃及成为欧洲大国渗透和控制的对象。

第四，希腊独立后建立现代希腊国家，对希腊人而言，这使他们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不同寻常。客观地说，希腊独立运动 10 余年，给希腊本土经济和社会带来极大破坏，原来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船舶业、航运业和贸易优势受到损害，战争的创伤几十年之后才得以逐渐恢复。不过，从长远来看，希腊独立有利于希腊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希腊独立并逐步统一后，经济得到恢复，尤其是传统的船舶、海运等行业得到恢复，被其他商人垄断的东地中海贸易又有了希腊人的份额。除了雅典、科林斯、阿哥斯等传统商业中心恢复其地位，帕特拉斯（Patras，一译帕特雷）这样的港口也发展为大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希腊的文化、教育、

---

①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1, p. 9.

② Itzchak, Weismann, Fruma Zachs, *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 B. Tauris*;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5, *pp*. 17 – 19.

体育竞赛也发展起来。[1]

第五，希腊的独立，是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干预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开端。乘希腊独立运动之机，俄国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并获得很大的利益，强化了它在巴尔干和土耳其海峡的优势，这也加剧了俄国与英、法、奥地利等国的矛盾。40多年之后欧洲强国围绕巴尔干问题的斗争，比这一次的斗争更为激烈，矛盾更为错综复杂。干预希腊问题成为欧洲大国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成功范例”，后来巴尔干半岛上寻求独立的民族，欧洲大国总要“担保”或“保护”。也就是说，希腊成为欧洲大国“担保和保护”幼弱的巴尔干民族的先例。[2] 支持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表明欧洲大国在近东的争夺升温。巴尔干地区从此成为大国争夺的场所，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也逐步加剧。

第三节　穆罕默德·阿里挑战奥斯曼素丹权威

穆罕默德·阿里起初没有挑战奥斯曼素丹马哈茂德二世的权威，相反，却几次积极帮助马哈茂德二世摆脱危难。

前面提到，穆罕默德·阿里1811年出兵阿拉伯半岛镇压瓦哈比教派的起义，是第一次帮助马哈茂德二世。当时接受瓦哈比教的沙特家族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穆斯林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也在沙特家族控制之下。沙特家族还占领伊拉克南部地区，毁坏卡尔巴拉的什叶派清真寺。马哈茂德二世作为哈里发，保护圣地是他义不容辞的任务。镇压瓦哈比教派的反叛刻不容缓，但他要对付国内的加尼沙里军叛乱和巴尔干地区的起义，面对这场咄咄逼人的瓦哈比教派的军事行为，马哈茂德二世力不从心，他下令大马士革、巴格达、吉达的省总督派兵镇压，但这些省总督兵力不足，无法抵挡沙特家族的进攻，马哈茂德二世只能求助于穆罕默德·阿里。客观地说，穆罕默德·阿里还是有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打算，马哈茂德二世命令他出兵，正合他的心意。不过，埃及军队花费了七年时间才占领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地区。问题是，穆罕默德·阿里出兵阿拉伯半岛，埃

---

① Nicholas Doumanis, *A History of Greece*, Pla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10, pp. 177 - 178.

② Gά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242.

及军队控制麦加和麦地那之后，就威胁到作为哈里发的奥斯曼素丹的权威。

马哈茂德二世不愿看到穆罕默德·阿里壮大，试图削弱穆罕默德·阿里的力量，但军事方面遇到困难，还不得不又一次求助于他。1821年希腊掀起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大起义，发展成为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战争。希腊起义军俘虏了奥斯曼政府的爱琴海舰队指挥官，切断了奥斯曼政府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道路。[①] 由于镇压起义的奥斯曼政府军队连吃败仗，摩里亚半岛和爱琴海的许多岛屿被起义军占领。在这种形势下，马哈茂德二世急忙命令穆罕默德·阿里派兵增援。

多数通史著作和教材中说，穆罕默德·阿里是盼望这样一个好机会，因而立即答应马哈茂德二世的请求。事实上，奥斯曼素丹的请求使穆罕默德·阿里陷于两难境地。因为希腊起义引起欧洲大国的关注，俄、英、法等国都想插手。俄国长期以来认为自己有权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东正教徒，希腊起义后俄国向奥斯曼政府施压，试图建立一个受俄国控制的希腊独立王国。英、法两国不允许俄国以支持希腊的名义插手巴尔干。欧洲主要国家的民意是支持希腊的。穆罕默德·阿里如果出兵希腊，必然破坏与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也会引起其他大国的反对。如果拒绝马哈茂德二世的请求，会被马哈茂德二世视为穆罕默德·阿里要反叛。因为马哈茂德二世一直怀疑阿里在亚历山大建立舰队的动机。穆罕默德·阿里如果得到列强的支持，他可能会拒绝马哈茂德二世的请求，但列强并没有支持他反而压制他。此时，列强聚集在伦敦协商对策，决定告知马哈茂德二世，希腊的自治得到列强的保证，并准备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希腊起义者之间进行调解。马哈茂德二世拒绝协商，而要求穆罕默德·阿里提供援助。穆罕默德·阿里与马哈茂德二世之间讨价还价之后，达成的协议是只要穆罕默德·阿里派遣埃及军队占领摩里亚，作为回报，马哈茂德二世允许穆罕默德·阿里获得克里特的帕夏辖区、大马士革、的黎波里（Tripoli）、叙利亚。[②] 穆罕默德·阿里还是观望，但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反复推诿之后，穆罕默德·阿里决定答应马哈茂德二世的请求，

---

①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 36.

②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 37.

1824 年 7 月派易卜拉欣率领 16 艘战舰开赴希腊水域，去援助他的宗主。[①]

易卜拉欣的舰队和奥斯曼政府的舰队在爱琴海并不能消灭希腊起义军，易卜拉欣转而进攻摩里亚半岛，到 1825 年底占领摩里亚半岛的大部分，然后继续前进，占领雅典城。

这时欧洲大国俄、英、法都做出反应。1827 年 7 月俄英法三国签订《伦敦条约》，要求希腊和奥斯曼政府停战。穆罕默德・阿里先表示接受条约，但俄、英、法三国还是决意消灭埃及海军，10 月 27 日的纳瓦里诺海战中，埃及舰队和奥斯曼政府的舰队大部分被击沉或损毁。穆罕默德・阿里与三个强国单独媾和。易卜拉欣于 1828 年 10 月率残余部队返回埃及。

在穆罕默德・阿里帮助奥斯曼政府镇压希腊起义的事件之后，奥斯曼政府与埃及之间的关系紧张。在埃及帮助奥斯曼素丹的几年里，人力、财力、物力损失严重，穆罕默德・阿里把目光移向叙利亚。叙利亚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饶，穆罕默德・阿里很早就想得到叙利亚。据记载，1810 年穆罕默德・阿里就打算用巨资从奥斯曼素丹手里换取对叙利亚的统治权。20 年代穆罕默德・阿里的心腹在此大造舆论，声言叙利亚的独立地位难保。在纳瓦里诺遭受重创之后，穆罕默德・阿里要求奥斯曼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履行诺言，将叙利亚和克里特岛划归埃及管辖。马哈茂德二世只答应给穆罕默德・阿里一个克里特岛，穆罕默德・阿里非常不满，决定诉诸武力。穆罕默德・阿里取得在埃及的统治权之后，主要的努力是想把埃及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也就是脱离土耳其人的统治。不过，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期间不得不面对土耳其统治者和英国这两个对手。

一　"第一次埃土战争"

当阿里通过改革使埃及强大起来后，组建了现代化的军队（组建现代化的军队是阿里统治埃及几十年的主要任务）。埃及有了经济实力，有了现代化的军队，侵入叙利亚，向奥斯曼素丹发起挑战成为可能。[②]前文提到，穆罕默德・阿里发展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使埃及国库充盈，有财

---

①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p. 36 – 37.

② Vatikiotis, P. J. ,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p. 49 – 50.

力发展军事工业。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埃及建立军事学校，培养现代军队所需的人才；同时，购置国外先进武器，也能自己制造常规的武器装备，穆罕默德·阿里在短时期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穆罕默德·阿里把注意力转向叙利亚。不过，穆罕默德·阿里不想过分刺激奥斯曼素丹，他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虽然在纳瓦里诺海战中损失惨重，但经过短短几年的恢复，1830 年穆罕默德·阿里已拥有强大的海军和陆军，有实力向奥斯曼素丹发起挑战，出兵叙利亚。[①]

1830 年，穆罕默德·阿里提出要马哈茂德二世兑现以前允诺的领土，马哈茂德二世未作答复。1831 年 10 月，阿里派军队跨过西奈半岛，攻打巴勒斯坦（属于大叙利亚的一部分），公开向奥斯曼帝国挑战。埃及出兵的理由是，一些埃及叛乱分子逃到阿克，当地总督阿卜杜拉没有及时引渡给埃及。这场埃及行省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战争，史称“第一次埃土战争”。

当时由易卜拉欣率领 3 万（一说 4 万）埃及军队，陆路和海路同时进发。易卜拉欣宣称他为建立一个阿拉伯帝国而进行圣战，目标是打到伊斯坦布尔。这一号召得到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支持。在最初的几次战役中，埃及军队连连获胜，很快攻陷了阿里什、加沙和雅法，并包围阿克。此时奥斯曼政府刚刚经历了希腊战争的失败，国内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旧军队废除了，新军队并不强大，土耳其人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也不稳固，如黎巴嫩的酋长公开支持穆罕默德·阿里的军事占领，叙利亚人也希望借助埃及的力量赶走土耳其统治者。奥斯曼政府陷入困境。1832 年 4 月 23 日，马哈茂德二世宣布革除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的职务，而埃及的大军很快于 5 月 27 日攻克阿克城，6 月 15 日占领大马士革。7 月，埃及军队在霍姆斯附近地区仅以 100 人伤亡的代价，消灭奥斯曼政府军队近 4000 人，俘获所有大炮。此后的几个月里，埃及军队先后攻占霍姆斯、阿勒颇等重要城市，在没有遇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控制了整个叙利亚。[②]

为辉煌的胜利所鼓舞，同时也害怕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反击，易卜拉欣

---

① Vatikiotis, P. J.,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64.

②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 39.

未作停留，一口气打到了小亚细亚。[①] 1832 年年底，易卜拉欣在科尼亚（Konya）附近再次以少胜多（3 万埃及军队打败了 6 万奥斯曼军队），攻占了科尼亚，兵锋直指奥斯曼帝国的腹地。

马哈茂德二世一筹莫展，急忙向欧洲大国求救。法国是支持穆罕默德·阿里的，自然不愿帮助马哈茂德二世；英国忙于其他事务，暂时不愿插手，但又担心俄国插手，更不愿看到埃及军队打垮奥斯曼帝国，便抛出外交上的“说辞”——要求欧洲大国共同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俄国答应马哈茂德二世的请求，“热情”地提供帮助。俄国派军队到达伊斯坦布尔，驻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英法两国看到俄国出兵，立即做出反应，给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施压，要他们谈判解决争端。英、法、奥（奥地利）三国还同时派代表出面劝马哈茂德二世向穆罕默德·阿里父子让步。

就在列强忙于外交斡旋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命令易卜拉欣继续北进，埃及军队攻陷了屈塔希亚（Kütahya），这里距离伊斯坦布尔只有 3 天的路程。埃及军队占据屈塔希亚，做好进一步推进的打算，并准备到布鲁萨过冬。马哈茂德二世无兵可调，而英法不敢得罪。面对埃及军队的威胁，马哈茂德二世实际上需要俄国的帮助，但俄国舰队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其威胁不亚于易卜拉欣大军。[②] 毫无退路的情况下，只能与穆罕默德·阿里达成妥协。埃及军队尽管在战场上连连得胜，而穆罕默德·阿里并不想得罪欧洲大国，同意谈判。

1833 年 4 月 8 日[③]，奥斯曼政府同埃及签订《屈塔希亚条约》，也称为“屈塔希亚协定”。根据协定，奥斯曼素丹同意撤销一年前革除穆罕默德·阿里父子职务的决定，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阿拉伯半岛、克里特岛的统治权，并将叙利亚和阿达纳划给阿里管辖；易卜拉欣成为杰德

---

①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 40.

②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Çeviren Server Tanilli,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40.

③ 一说签订《屈塔希亚条约》的时间是 3 月 29 日，协定主要内容是：易卜拉欣为叙利亚、基里基亚（Kilikya）、汉志（Hicaz）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依然是埃及总督。详见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40。

拉（Jedla）、大马士革、阿勒颇和阿达纳（Adana）的总督[①]；埃及军队从安纳托利亚撤出，继续承认奥斯曼素丹的宗主权。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埃及军队占领了阿克、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大马士革、阿勒颇、阿达纳等大城市[②]，埃及、大叙利亚、阿拉伯半岛至此连成一片，一个庞大的、跨亚非两洲的阿拉伯王国形成了，而穆罕默德·阿里就是这个王国的主人。

二　“第二次埃土战争”

第一次埃土战争后，奥斯曼政府与埃及行省之间的矛盾加深。《屈塔希亚条约》未能满足缔约的任何一方的要求，反而刺激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欲望，也激怒了马哈茂德二世，他不甘心失败，决定寻找机会从穆罕默德·阿里手中夺回大片领土。马哈茂德二世先依靠俄国，1833 年 7 月与俄国秘密签订了《云加尔码头条约》[③]，同时批准了《埃迪尔纳条约》。条约主要达成的原则是：任何军舰不能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样一来，阻止了英、法对黑海的威胁。《云加尔码头条约》主要内容是：两国之间建立永久和平；为了共同防卫两国的领土不受侵犯，两国相互提供物资援助；一旦奥斯曼帝国遭受外来侵略时，俄国许诺出兵支援。重要的一项秘密条款是，奥斯曼帝国承诺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只对俄国舰队开放，不准其他国家的舰队进入。1834 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又签订了新的条约，俄国答应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撤军，并取消《埃迪尔纳条约》的条款。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变得“亲近”，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沉不住气了，急忙施展手段，以强硬的口气提出抗议，迫使俄国沙皇口头承诺不履行《云加尔码头条约》。

就在马哈茂德二世寻求列强支持，试图用武力迫使穆罕默德·阿里退出所占领土时，穆罕默德·阿里的野心也在渐渐膨胀，想乘此机会获得独立，脱离奥斯曼帝国。

---

①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6.

②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65.

③ 土耳其文名称 Hünkâr İskelesi Antlaşması。国际关系史资料中译为《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是生硬的不准确音译。本书使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刘钊教授的译名。

客观地说，1833—1839 年的埃及确实是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辉煌时期。从疆域上来看，南边拥有苏丹，东边拥有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地区，大叙利亚也归埃及控制。这些广阔地区（居民说阿拉伯语）似乎已经从奥斯曼政府统治下脱离出来，不再听从来自伊斯坦布尔的政令，而要听来自开罗的指令。从内部管理来看，通过多年的改革，已经建立起一套完全服从穆罕默德·阿里的行政体系，欧洲管理方式也得到推广。从经济上来看，农业生产、对外贸易、工业建设、海军建设都有明显的成效，整个埃及已经成了“伊斯兰—欧洲因素”的混合体。[①] 奥斯曼素丹的法令已经不能在面积扩大了的埃及产生威力，穆罕默德·阿里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奥斯曼素丹。此时穆罕默德·阿里谋划独立也是有条件和实力的。况且，穆罕默德·阿里父子把埃及经济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埃及陆军训练有素，战斗力超过奥斯曼政府军队，埃及海军部队也是东地中海的一支劲旅。

穆罕默德·阿里把独立的打算告知英国外交官，希望得到英国的帮助。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既反对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也反对埃及独立。1837 年奥斯曼政府给穆罕默德·阿里提出建议，愿意保证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世袭埃及总督，保留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在阿拉伯半岛所占的领土，要求他放弃埃及军队占领的其他地区，他拒绝了。而马哈茂德二世早已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援助。1838 年 8 月，英国与奥斯曼政府签订了《奥斯曼—英国贸易协定》，给予英国在奥斯曼帝国更多的特权。协定的主要内容：第一，英国货物进入奥斯曼帝国只缴纳 5% 的进口税，或 15% 的出口税，不须缴纳帝国境内的其他任何税、费。第二，英国商人可以直接从奥斯曼帝国的生产者手中收购本地的物品，通过收售双方商议确定价格。奥斯曼帝国放弃对这些商品的专卖权。第三，英国被允许参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②] 后来的学者们对 1838 年贸易协定有各种评论，持批评态度的不少，但不得不承认，这个协定对奥斯曼帝国是有利的。

穆罕默德·阿里知道《奥斯曼—英国贸易协定》意味着什么，于是极力反对。英国则策动奥斯曼素丹采取强硬态度，撕毁《屈塔希亚协

---

①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p. 65 – 66.

②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26 – 27.

定》。奥斯曼素丹马哈茂德二世此时对军队的改造也有成效，在普鲁士教官的帮助下，通过训练和装备更新，奥斯曼新军的战斗力也有所提高，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打击穆罕默德·阿里而做的准备。这样，奥斯曼政府与埃及行省之间的第二次战争不可避免了。

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的鼓励下，停止了向奥斯曼政府缴纳的贡赋。马哈茂德二世在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庞森比（Ponsonby）的建议下，派遣一支由哈夫兹（Hafiz）帕夏率领的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亚。1839 年 4 月，马哈茂德二世以埃及未履行纳贡称臣的义务为由，命令大军越过幼发拉底河向叙利亚进攻。易卜拉欣率领埃及军队开赴叙利亚前线迎战。1839 年 5 月在阿勒颇附近的尼济普（Nizip）[①]，这支奥斯曼政府军队被易卜拉欣的军队打败。其后，由艾哈迈德·费沃兹（Ahmed Fevzi）指挥的一支舰队从达达尼尔海峡驶出，向叙利亚海岸进发，但中途改变航向，驶往亚历山大港，投向埃及一边。[②] 6 月 24 日，奥斯曼帝国军队与埃及军队在尼济普再次相遇，双方集结数万军队展开大战。奥斯曼政府军在尼济普有过三次战役，这是第四次战役。奥斯曼政府军队又被打败了，而且损失惨重，死伤 4000 人，被俘 1.2 万—1.5 万人。埃及军队再次跨过陶鲁斯山进入安纳托利亚。

马哈茂德二世于 7 月 1 日病逝，新素丹阿卜杜·麦吉德一上台就任用改革家雷希德帕夏为大维齐，准备与埃及和谈。欧洲大国插手进行干预。俄国准备派兵，英、法两国坚决抵制俄国南下，奥地利和普鲁士也表示与英国立场一致。英国全力支持奥斯曼帝国，但反对奥斯曼政府单独与埃及讲和。就在尼济普战役不久，英国就派舰队向埃及舰队发起进攻，轰炸埃及在贝鲁特和阿克等城市的军事基地。英国军队还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亚丁。同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宣称保持近东现状，维护奥斯曼帝国在其素丹统治下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③]

英国与法、俄、奥（奥地利）、普几国磋商解决埃及问题，法国坚决反对英国的意见，未能达成一致。英国决定撇开法国，拉拢俄国、奥地

① “尼济普”的英文名称有两个：Nizip，Nezib。

②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p. 44.

③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66.

利、普鲁士与奥斯曼帝国代表，在伦敦召开五国会议。1840 年 7 月 15 日在伦敦签订《伦敦协定》，内容包括：第一，给予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力，并把阿克划归阿里管辖；埃及军队从克里特岛、阿达纳、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撤出，并保证每年向素丹纳贡。第二，埃及军队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组成部分，必须为帝国效力。第三，奥斯曼素丹批准的各项协定和法令，必须在埃及行省和阿克省有效。第四，倘若穆罕默德·阿里不接受前述条件，将剥夺他在阿克省以至整个埃及的统治权；签约的五国将对埃及诉诸武力。[①]《伦敦协定》相当于最后通牒，但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接受。1840 年 9 月，英国舰队在俄国、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舰队的配合下，很快攻占贝鲁特，并乘势控制了叙利亚沿海的城市。

三　战争带来的后果

以英国为首的联军在炫耀武力的同时，鼓动叙利亚人民起来反抗易卜拉欣的统治。几年前叙利亚人民希望借助埃及军队赶走奥斯曼土耳其人，是支持易卜拉欣大军进入叙利亚的。易卜拉欣在统治叙利亚之初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也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发展生产。由于不断进行战争，有扩充军队的需要，他便向叙利亚勒索摊派，甚至抓丁拉夫，激化了与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当英国军队进入叙利亚时，叙利亚人民起来反抗易卜拉欣的统治，埃及政府被迫撤离驻守叙利亚沿海的军队，并愿意与奥斯曼素丹谈判。阿卜杜·麦吉德有欧洲大国撑腰拒绝和谈。联军发动新攻势，夺取阿克城。

从军事力量来说，穆罕默德·阿里仍可凭借陆海军与奥斯曼政府军队及英俄等国的联军周旋，但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放弃顽抗。一是叙利亚人民的反埃大起义迫使埃及退却；二是法国态度的转变，使埃及失去依靠。法国统治集团权衡再三，仍不敢为了埃及而与英、俄、普、奥（奥地利）四强兵戎相见。穆罕默德·阿里对法国的援助所寄托的希望化为泡影，而英国和奥地利的联合舰队在猛烈围攻亚历山大港。穆罕默德·阿里别无选择，为了不至于眼看着数万埃及军队被全歼，他只好求和，答应欧洲大国和奥斯曼素丹提出的一切条件。在第二次埃土战争中，法国人自认为是埃及阿里王朝的支持者，也被埃及人看作埃及支持者，而英国被看

---

①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4 页。

作奥斯曼素丹的保护者。[①] 实际上法国和英国都是为各自的利益做着打算，没有哪一个真心帮助埃及或帮助奥斯曼帝国。

1841 年 1 月 30 日，英国、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四国照会奥斯曼帝国，敦促结束战争。奥斯曼素丹阿卜杜·麦吉德颁布敕令：埃及帕夏的职位由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中的最长者继承；苏丹地区归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永久管辖；埃及的军队在和平时期总数不得超过 1.8 万人；未经奥斯曼素丹同意埃及不能造战舰；上校以上军官的任命须由奥斯曼素丹批准；埃及每年向奥斯曼素丹纳贡。[②] 1841 年 7 月 13 日，英、法、俄、奥（奥地利)、普等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伦敦海峡公约》，规定外国任何军舰不准进入土耳其两海峡。客观上维护了奥斯曼帝国的“现状”。

第二次埃土战争之后，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退守埃及，仍然是埃及的总督，领土包括埃及和苏丹。不过，埃及经过两次战争，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军事力量大为衰减，加上条约的制裁，与 1831 年之前相比，已经衰弱不堪了。穆罕默德·阿里之后的埃及统治者，没有哪一个敢于向奥斯曼素丹发出挑战。

---

①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p. 68.

②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7 页。

第五章　坦齐马特时代的全面改革

1839—1876 年，奥斯曼帝国继续推行改革，这 37 年即历史上的坦齐马特时代。这一时代先后由两位素丹统治，其中，阿卜杜·麦吉德执政 22 年（1839—1861 年），阿卜杜·阿齐兹继承阿卜杜·麦吉德，当政 15 年（1861—1876 年）。“坦齐马特”（Tanzimat）的主要含义是“整顿”（the Reorganisation）、“改革”（reforms）。这个词后来变成奥斯曼帝国史中的专用名词，成为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标志。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既体现了改革者挽救危亡、振兴国家的努力，也变成一种时代特征，长期以来为学者们所关注。

坦齐马特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例如，以 1839 年“古尔汗法令”到 1856 年颁布《改革法令》为第一阶段，1856—1876 年为第二阶段，把 1856 年的《改革法令》作为整个坦齐马特时代的分水岭。[①]或者，以 1861 年为界，即两位奥斯曼素丹的政权更替来划分。有的著作中把 1840 年作为坦齐马特实践的开端，以 1860 年作为第一阶段的休止，指出前 20 年（1840—1860 年）的改革主要是以国家推行的全面改革为主，而后 16 年（1860—1876 年）以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为主。[②] 坦齐马特时代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改革为土耳其现代化奠定了基石。

第一节　阿卜杜·麦吉德的改革及其成就

1839 年 7 月 1 日马哈茂德二世病逝，皇位传给阿卜杜·麦吉德

---

①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Ⅳ; *Osmanlı Dönemi（1730—1861）*,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289.

②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719.

（Abdül Mecid）。阿卜杜·麦吉德是马哈茂德二世的儿子，1839 年 7 月继位时年仅 16 岁。他在位共 22 年，38 岁时死于肺结核病。麦吉德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法语，喜爱欧洲文学，欣赏西方古典音乐，也喜欢西方服饰和装饰物，也是有一定成就的书法家。[①]阿卜杜·麦吉德一上台就遇到了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首先是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军事威胁。在列强的帮助下，1841 年迫使穆罕默德·阿里放弃所占领土，成为只保有埃及和苏丹两地的世袭统治者。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威胁解除后，阿卜杜·麦吉德也没有喘息的机会，1845 年巴尔干地区发生叛乱，后来叙利亚、黎巴嫩也出现反叛，国内局势不安定，而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冲突演变为 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结束后，改革继续进行。

一　改革法令的颁布

由于阿卜杜·麦吉德在宫女和宦官的陪伴下长大，受过的教育不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的了解不多，对国家面临的局势也不甚明了。[②]好在他身边有一批改革派大臣，因而能够延续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事业。阿卜杜·麦吉德 1839 年即位后颁布了一篇"上谕"（敕令），即《古尔汗法令》[③]。当时帝国所有达官显贵和外国使节聚集于古尔汗宫（Gülhane），听雷希德帕夏宣读这篇"上谕"。在场的除了奥斯曼素丹阿卜杜·麦吉德，还有宗教领袖、政府要员、各界头面人物、贵族、外国使节和代表，其中有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三儿子德·儒内维尔（de Joinville）。宗教领袖中除了伊斯兰教领袖、犹太教拉比，还有亚美尼亚和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9.

② Cyrus Hamlin, *My Life and Times*, Boston, The Pilgrim Press, Chicago, 1893, p. 199.

③ 《古尔汗法令》土耳其文全称 Gülhane Hatt-i，或 Gülhane Hatt-ı Hümayunu，英文中有几个不同的名称：the Decree of Gulhane（古尔汗法令），the Imperial Edict of Reorganization（帝国改革敕令），the Imperial Edict of Gulhane（帝国的古尔汗敕令），the Rose Garden Decree（玫瑰园法令），the Rose Chamber Edict（玫瑰厅敕令），the Proclamation of Tanzimat（坦齐马特公告）。据说宣读敕令的宫殿也叫玫瑰厅或玫瑰宫，英文名为 Rose Chamber，所以"古尔汗法令"也被译为"玫瑰厅敕令"、"花厅御诏"或"御园敕令"。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是在 Topkapi 宫附近的"玫瑰园"里宣读敕令的。现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托普卡帕宫附近有一个公园，是古尔汗宫遗址所在地。

希腊基督教的教长；各界头面人物中也包括行会的代表。[①]

《古尔汗法令》是倡导改革的重要文件。以《古尔汗法令》为标志，奥斯曼帝国“开展了一场旨在革新的进步运动”，称为“坦齐马特”。也有资料表明：1846年雷希德帕夏重新担任大维齐，他着手恢复1839年开始的进步运动，号召按照古老、纯洁和宽恕的穆斯林的做法进行改革，这个改革运动就叫“坦齐马特”。也就是说，坦齐马特是从1839年就开始的，但得到坦齐马特这个名称较晚一些。

《古尔汗法令》的主要内容：

第一，保证在生命、荣誉和财产方面主持公正。

第二，法令承诺颁布维护臣民利益的新法律；个人不得凭借其地位和势力违反这些法律；法令禁止未经审判而惩处的做法。

第三，废除包税制，代之以政府官员征税制。

第四，整顿兵役制，规定服役期限为四至五年（募兵办法和服役期限由帝国军事会议审议）。

第五，贿赂是违法的，应予禁止。

第六，法律对所有的臣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是平等的（即法令各项条款适用于所有臣民，不分宗教或派别）。[②]

在《古尔汗法令》中，“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的条款具有重大意义（甚至被认为具有革命性）。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处于上升时期能够保持对非穆斯林的宽容，而17世纪以后随着一连串战争失败，非穆斯林被当作劣等公民对待。[③] 在奥斯曼帝国臣民的心目中，能否同等对待非穆斯林，成为衡量帝国政治进步与否的标志。《古尔汗法令》是面向本国臣民的，法令的文本尽可能使用最简洁、最通俗的语言，目的是让普通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54;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2.

② “古尔汗法令”的译文依据费希尔著《中东史》（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408页），也参阅 Dexter H. Mursalog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8。

③ Dexter H. Mursalog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28 – 29.

民众听得明白。[①] 当然，法令也是想让西方人听见，至少要向西方大国表明，奥斯曼素丹要用现代文明理念来治理国家。

西方人对《古尔汗法令》大加赞赏。法国报纸上说，这一成文法令为土耳其进入现代文明奠定了制度基础，是一部真正的宪法，是西方文明的胜利。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则对《古尔汗法令》做出不同的反应，有的甚至持负面评价。毫无疑问，西方人认为法令体现的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赞赏和支持这一法令是把它看作西方文明成果的一部分。但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认为，法令就算与文明有关，那也是奥斯曼帝国自己的文明成果，而不是外来的。[②]

后世学者对《古尔汗法令》评价很高。一般认为，阿卜杜·麦吉德时期的改革，是在西化进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虽然法令中没有提到建立立法机关，但法令是对奥斯曼帝国改革意图的重要陈述。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说：法令的内容欧洲人直接听到了。在某种意义上，法令可以看作一个向欧洲强国的保证。为了使奥斯曼帝国得到认可，与欧洲国家一致，奥斯曼帝国国内会做相应的改革。[③] 1839 年的《古尔汗法令》为建立一种公平的征兵制度提供法令依据；帝国法令承认所有奥斯曼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尤其给予非穆斯林重要的权利；标志坦齐马特时代开端的《古尔汗法令》中规定，要限制素丹—哈里发的权力，国家的权力中心要逐步从皇宫移向政府“波尔特”（Porte）。[④] 这些都是进步的，有重要意义的。还有学者认为，坦齐马特改革，是“奥斯曼土耳其社会走向西化和现代化的决定性的一步”，法令“把人权、法规、自由、民主等观念引入奥斯曼土耳其社会，使土耳其人从此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⑤]。

阿卜杜·麦吉德统治时期有不少得力的帕夏，最有名的是穆斯塔法·

---

①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66.

②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114.

③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 73.

④ Itzchak, Weismann, Fruma Zachs, *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 B. Tauris;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5, p. 24.

⑤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0.

雷希德帕夏（Mustafa Reşid Paşa），而改革中最活跃的还有阿明·阿利（Amin Ali）帕夏和富阿德帕夏。[①]《古尔汗法令》颁布后，1840年就开始了改革实践。改革以保障臣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目的，内容涉及军事、财政、行政管理、司法、教育等方面，其中首要的是军事改革和税收改革（对臣民来说服兵役和纳税是大事）。[②]

军事方面：当里扎帕夏任大维齐时（1841—1842年），实行严格的征兵制，并雇用了一些外国军官。基督教徒被排除在征兵范围之外。正规军和后备军增加到将近50万人，正规军服役期限是三到四年。还有一项重要举措，即1845年奥斯曼帝国政府成立单独的警务部门，学习西方国家的模式，把警务和国防严格分开。此后，奥斯曼帝国警务部门正式承担治安任务，不再依赖军队。

司法方面：重要举措是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如1840年颁布新的《刑法》，新《刑法》是仿照法国刑法制定的。1841年讨论制定一部新的《商法》（原来的《商法》被停止执行），1850年以法国《法典》为蓝本颁布了《商法》，在此前后颁布新《民法》。为了实行审判平等，取消地方总督手中处死犯人的权力；建立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以协助总督；规定总督的行动要征得地方议会的同意。此外，还建立民事刑事混合法庭。

行政管理方面：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阿卜杜·麦吉德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改革。建立管理上的中央集权，扩大政府部门职能，完善地方管理制度。把"最高司法委员会"改称"国家委员会"，监督政府实行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节制奥斯曼素丹的权力。1840年建立奥斯曼政府的邮政部；而1855年在伊斯坦布尔建立"现代市政组织"。[③]地方管理仿照法国的府县制，在省以下设立"桑贾克"、"卡扎"、"纳赫伊"三级建制。每一级设有"管理委员会"。一般认为，自1839年11月3日颁布《古尔汗法令》后，奥斯曼帝国从此开始了行政管理的现代化。[④]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9.

②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199.

③ 英文名称为"Modern Municipality Organization"。

④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91.

经济方面：财政改革是《古尔汗法令》的重要内容之一。《古尔汗法令》确定了财政改革的三个专门领域：执行公正的税收和评估体系；计划取消包税制；编制行政开支的预算。[①] 1840 年，奥斯曼政府建立了第一个欧式银行，定期发行纸币。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迫于财政拮据，改革派创办了以西方资本为主的几家银行，从国内国外筹集资金，开展业务，以克服政府财政困难。富阿德当政时期，建立了财政预算制度。

税收改革主要是废除原来的包税制，代之以政府直接征税。以前是由包税商和采邑主征收，改革后由奥斯曼政府派带薪的税官去征税，收入直接归国库。[②] 在税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多种名目下的赋税征收，所有税项归并为一个单一的税种。奥斯曼帝国历史文献中，这一阶段的改革措施中最主要的举措是简化税收征收手续。[③] 为配合税收改革，奥斯曼政府采取措施对货币制度进行了全面调整。1839 年发行债券，这一年也发行纸币。

教育方面：奥斯曼政府在 1846 年重新建立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推动了西化的进程。1846 年，雷希德帕夏把先前创办的医学院、农学院、海军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兽医学院合并起来，计划筹办伊斯坦布尔大学(并不顺利，多次推迟)。阿卜杜·麦吉德时期还于 1847 年建立技术学校、农业学校。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中等教育问题。委员会建议推行普及性的义务教育，到 1851 年开办了 6 所中等教育的学校（后来因缺少经费和不受重视而停办）。

在奥斯曼帝国，西式教育的另一个途径是由政府支持创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整套教育体系。1854 年 3 月 7 日，阿卜杜·麦吉德在一所清真寺里发表讲话，谈教育的重要性，表明了兴办教育的决心。[④] 此后，开始尝试在较短的时间建立教育部，派教育部大臣去英、法、普等国考察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54.

② 说明：税收改革实际上在马哈茂德二世统治的后期已开始实行了，1826 年为了建立新军他向城市征收货物税，后来他废除了货物税，也废除了市场税和大部分农村货物税。他的地籍调查在许多地方还没完全展开，所以，真正的税收改革是在坦齐马特时代。

③ Re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 50.

④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675.

教育。政府成立教育委员会，这是迈向西式教育的第一步。私立中学和宗教学校暂未得到政府支持。

其他方面的改革：帝国在 1840 年创办土耳其语报纸；1855 年奥斯曼帝国有了电报，1856 年开始修筑铁路。

1856 年 2 月 28 日，阿卜杜·麦吉德颁布了新的敕令，名为《改革法令》（Islahat Fermanı），英文文献中叫“帝国敕令”（Imperial Decree）。这是一份新的改革文件。颁布这道法令前，经过了反复磋商，法国顾问参与了法令内容的讨论。当时讨论的关键是奥斯曼帝国臣民中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权利划分，涉及社会、税收、军事、教育、公职等方方面面。在这个法令颁布时，国务会议代表、乌勒玛、天主教主教、犹太教拉比、外国使节在场，听大维齐宣读法令。①

《改革法令》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基督教臣民与穆斯林有同等权利；信仰自由，不得强迫任何人改教，不得因为信仰不同而取消其担任公职、进入学校、服兵役的资格；总主教和米勒特的首脑可以终身任职，米勒特制下的臣民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机构。

第二，不同教派之间的案件审理和诉讼程序、商务和刑事案件均归混合法庭办理，并应公诸于众。

第三，帝国范围内的各宗教团体，课税和服役一律平等。

第四，准备制定兵役法。

第五，外国人可以在奥斯曼素丹管辖的范围内持有、购买和处理不动产。

第六，每年编制一次国家预算；建立银行和其他财政机构；改革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和金融制度。

第七，鼓励商业和农业；重视公路和运河建设。②

除此之外，改革法令中还涉及以下内容：如改进各省参政会议的代表构成，选举基督教徒代表参加；设立独立法院，以确保基督教臣民的合法权益；对帝国境内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者杂居地区设立各类世俗学校的规

---

①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Osmanlı Dönemi* (*1730—1861*), *Türkiye Tarihi*, Vol. Ⅳ;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289.

②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412 页。

定，等等。[①]

与1839年的《古尔汗法令》相比，1856年的《改革法令》延续了《古尔汗法令》的宗旨，涉及的改革计划和措施比《古尔汗法令》更具体，确认1839年法令中的承诺（取消包税制，禁止贿赂，军事和司法平等）。《改革法令》包含了1839年法令中所没有的内容：严格坚持每年的财政预算，建立银行，吸收欧洲资本，修订刑法和商法，成立混合法庭，禁止使用侮辱性的语言，放弃对叛教者进行死刑审判。《改革法令》进一步承诺扩展代表制度原则，改善地方政务会议（委员会），整顿米勒特制，在米勒特事务上加大世俗化的因素，而最高司法委员会扩大并容纳非穆斯林的代表。因此，《改革法令》"开启了西化改革的新阶段"。[②] 对这两项改革法令，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古尔汗法令》和《改革法令》能否算是宪法草案性质，仍有争议。有的研究者把这两个法律称为"社会契约"，有的学者则否认。[③] 但不管怎么说，1839年的法令和1856年的法令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都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地位平等"放到重要位置。[④] 这是极大的进步，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奥斯曼帝国公布1856年的《改革法令》时，欧洲大国的外交官正聚集在巴黎讨论如何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和安排近东事务。得到奥斯曼帝国颁布改革法令的消息，代表们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把"《改革法令》承诺在巴尔干行省实行改革"写进《巴黎条约》中。所以，奥斯曼帝国的史料中有"向全世界宣布《改革法令》"的说法，也有"《改革法令》是《巴黎条约》（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基础或组成部分"[⑤] 的说法。

《改革法令》颁布之后，一些新的改革付诸实践。

第一，1857年建立教育部。1859年建立林业学校、政治科学学校；

---

①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Osmanlı Dönemi (1730—1861)*, *Türkiye Tarihi*, Vol. Ⅳ;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301.

②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94.

③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55.

④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421.

⑤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Osmanlı Dönemi (1730—1861)*, *Türkiye Tarihi*, Vol. Ⅳ;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2, s. 289.

这一年政府建立文官学校。[1] 同一时期，欧美的传教使团在叙利亚建立许多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是 1866 年美国使团在叙利亚建立的叙利亚新教徒学院（即今天的贝鲁特美国大学），成为这一地区首屈一指的教育机构。[2] 当时大量的欧洲技术书籍和科学书籍、文学书籍被翻译介绍，对外国语言的学习变得越来越普及。这些都为奥斯曼帝国的教育发展准备了条件。[3]

第二，1858 年颁布了新土地法，确认了土地实际占有者的使用权、继承权和自由处置权，实际上等于确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新土地法禁止把整个村庄变成私人庄园。随着农业出口的增加，许多个体把土地据为私有，政府努力制止大片地产的增长。新土地法试图按照欧洲方式取消早期各种农业关系，结束土地占有制的混乱，逐步扩大和确定土地使用权、占有权和所有权。新土地法之后，农民只向国家纳税，与地主分享收获物，实现劳动自由，生活境况有所改善。西方学者对 1858 年颁布的土地法令评价很高，认为这是“19 世纪奥斯曼法律进步的一个革命性的标志，是奥斯曼帝国第一部现代的、广泛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1858 年土地法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法律的许多特征。”[4]

1859 年颁布的新法令确立了土地的占有权关系（至奥斯曼帝国崩溃前一直有效），修正了现有的关于农奴和地主的权利与义务。农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了书面合同保证；地主按要求为农奴提供住房；只要农民缴纳了什一税，工作在土地上，地主就不能把他们赶出庄园。也就是说，地主在占有庄园方面受到限制，而农民的承租权利得到保证（只要他们履行义务）。[5]

第三，改革采矿税。采矿税以前的规定是，不论在公共的还是在私人土地上采矿，政府要抽取 1/5 的矿产税。根据 1858 年的土地法，所有新

---

① Dexter H. Mursalog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5.

② Trevor Mostyn, Albert Gourani (Advisory Editor),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Sydney, 1988, p. 81.

③ 说明：1784 年伊斯坦布尔开办了印刷厂，1833 年建立了翻译局。在埃及，1822 年在布拉克（Bulaq）建立起政府的印刷厂，1837 年之后也重新整顿教育制度，1841 年建立翻译局。这些都为科技知识和文化教育的普及提供了条件。

④ Aytekin, E. Attila, "Agrarian Relations, Property and Law: An Analysis of the Land Code of 1858 in the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6, November 2009, pp. 935 – 936.

⑤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52.

发现的矿，不论在谁拥有的土地上发现，都属于国家，但国家要给开采者偿付一定费用，以防地主据为私有。

阿卜杜·麦吉德的改革力度较大，正在实践《古尔汗法令》和《改革法令》的一些设想时，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打断了他的改革计划。战争结束后，帝国的改革措施继续推行。而阿卜杜·麦吉德在这个关键时期于1861年病故。

二　阿卜杜·麦吉德改革的“名”与“实”

或许是人们对改革寄予厚望，或许是人们看到《古尔汗法令》的宏伟蓝图，阿卜杜·麦吉德的改革得到较大范围的支持，改革的力度也远远超出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那么，《古尔汗法令》和《帝国法令》的条款中到底有哪些付诸实践？哪些未见成效甚至可能事与愿违呢？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阿卜杜·麦吉德改革的实际情况如下：

第一，《古尔汗法令》宣布服兵役是奥斯曼帝国所有居民的义务，但这一制度没有完全推行，只有少数基督教青年被允许纳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系统，相当多的非穆斯林仍然被排除在征兵范围之外。[1] 1841年采用的军事组织法规定，奥斯曼军队分成五支部队，采取抽签方式征兵，规定五年的现役和七年的预备役。而这个时期的兵役制也不规范，从一些地区大量征兵，另一些地区则不征兵；职业兵制度也只是局部实现了。[2]

第二，《古尔汗法令》保障帝国臣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其实普通居民的生命和财产是相对安全的，而政府官员随时可能被处决，或被没收财产。虽然1826年就取消了财产充公的法令，但波尔特夫帕夏因触怒马哈茂德二世被处决。奥斯曼政府的官员一直处于奴才地位。虽然1855年取消了人头税，允许帝国境内所有臣民当兵，但服兵役向基督教徒开放仍停留在纸上。1856年的奥斯曼帝国法令再次承诺服兵役时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平等，但实际执行中还是鼓励基督教徒缴纳免役税，以代替服兵役。[3]

---

①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34.

② Dexter H. Mursalog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8.

③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 34.

第三，阿卜杜·麦吉德时期的改革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和限制，因而未能像埃及那样大规模发展工农业。经济上的改革也涉及财政、税收、农业、工业几方面，但不如埃及的改革深入，主要经济领域（如农业和工业）的改革成效不多。阿卜杜·麦吉德和前任素丹马哈茂德二世一样，主要致力于建立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扩大政府部门职能，完善地方管理制度，而经济改革没有放在主要位置。

第四，《古尔汗法令》向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臣民许诺，给予他们基本的公民自由和平等的税收制度，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奥斯曼帝国保持统一，但这个目标并未实现。

第五，不仅仅阿卜杜·麦吉德的改革，整个坦齐马特时代，有一个通过建立委员会和部门，把行政机关变成欧式管理机关的举措[①]，实际上形式改变了，本质没有改变。1856 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推行新的管理方式，但改革是不易的，有些地方出现了叛乱，对素丹政权构成威胁。不过，政府还是坚决地把新政策推广到更大的范围。[②]

第六，改革者的目标是通过社会改革促使成百上千的民众觉醒，而不是等他们起来反抗政府来改变社会，完成他们的欧洲敌人所不能做的事。然而，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力量日益衰弱，有些努力并没有见效。此外，中央政府与地方贵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有些地方，土地所有者反对改革政策，鼓动民众叛乱。[③]

第七，奥斯曼帝国从统治者到普通民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奥斯曼帝国，没有经历像西方社会那样的个人至上、自由、鼓励竞争等方式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直到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领导者的世界观才有所变化，认识到平民百姓的生命与自己的生命并没有本质差别。[④] 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理性等观念进入奥斯曼社会，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改变。例如，奥斯曼帝国在这一时期出现改变宗教信仰的事例，既有异教徒皈依伊斯兰教的，也有放弃伊斯兰教（退教）的。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54.

②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199.

③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183.

④ Bilal Eryılmaz, *Tanzimat ve Yönetimmde Modernleşme*, işaret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6, s. 244.

表面上看，皈依伊斯兰教不外乎反复念诵“清真言”（真主是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皈依基督教不外乎接受洗礼，实质上没有那么简单。一个人改变信仰，你可以说只是个人的事，当作问题来讨论是多余的。但要深究起来，改教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以及其他因素，较为复杂。在有些社区，个人改变信仰可能产生法律的、社会的、经济的后果。这种现象至少反映出，坦齐马特时代在奥斯曼帝国社会的民众中，原有的价值观已发生变化。①

总体来说，阿卜杜·麦吉德的改革的确为奥斯曼帝国的西化进程开了一个好头。尤其是1856年《改革法令》颁布后的改革，使基督教民众的部分权利得到保障。而且，由于赋税征收平等，每年的预算公开，纳税人知道政府把税收收入用往何处，增强了基督教臣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阿卜杜·麦吉德时期奥斯曼政府建设道路，建立银行，吸收了欧洲资本，使帝国的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基督教民众的收入较为稳定。② 从这里可以反映出，阿卜杜·麦吉德改革的成效体现在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

第二节　阿卜杜·阿齐兹时期的改革实践

阿卜杜·阿齐兹（Abdül Aziz，1861—1876年在位）的统治，在行政管理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61—1871年），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几位积极改革的大臣手里，如阿利帕夏、富阿德帕夏和最有名的改革家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米德哈特帕夏。阿卜杜·阿齐兹并不是无实权的首脑，而是他的权力受到大臣和官僚机构的限制。阿卜杜·阿齐兹统治的第二阶段（1871—1876年）是从1871年阿利帕夏去世算起的（富阿德帕夏已经于1869年去世），阿卜杜·阿齐兹这一年开始直接领导政府。坦齐马特改革的支柱之一——加强中央集权尤其对他有吸引力；他计划把权力抓到自己手中。为了避免权力被大臣把持，他不停地更换大臣，大维齐任职年限平均不到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们不得不采取变通的手段迎合最高统治者，确保各自的职位不被替代，从整体上看，改革被弱化了。

---

① Halide Aslan, *Tanzimat Döneminde Din Değiştirme Hareketleri, 1839—1876*, Ankara, 2010, s. 3; s. 219-223.

② William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p. 299.

当然，一些改革的措施仍获得了通过，尤其管理和税收改革。[1]

阿卜杜·阿齐兹生于1830年，在他1861年执政并推行改革时，已经30出头。从立为皇储到当上奥斯曼素丹就有21年时间。他在皇宫中长大，主要生活在后妃、宫女和太监构成的特殊人群中。不过，他并非完全被锁于笼中，而是受过良好教育，受过监督和训练，当然，他生长的环境缺乏友爱。[2]阿卜杜·阿齐兹会说阿拉伯语、波斯语，也学习了法语，对音乐、书法、诗歌感兴趣。阿卜杜·阿齐兹不像他的兄长阿卜杜·麦吉德那样柔弱，而是身体强壮、高大。他是出色的弓箭手，还善于摔跤。阿卜杜·阿齐兹于1863年访问埃及行省。1867年应拿破仑三世的邀请出访法国，在巴黎和法国皇帝、皇后会谈，并出席了巴黎博览会。然后又到伦敦，会见了威尔士王子爱德华二世、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访问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抵达科布伦茨（Koblenz），会见了普鲁士国王和王后；在维也纳会见了奥匈帝国的皇帝。这次出访，前后行程达46天。阿卜杜·阿齐兹是仅有的一位访问过欧洲国家的奥斯曼素丹。[3]

阿卜杜·阿齐兹的改革，涉及奥斯曼中央和行省的管理、法律、财政、教育、军事等方面。

一　行政管理和司法方面

1864年颁布“行省法”（Vilayet Hukuku）。大维齐富阿德帕夏和米德哈特帕夏主要负责行省法的制定。这是1856年的改革法令中承诺过的。米德哈特帕夏对西方的制度有细致的观察，他学习西方的目的是寻求挽救奥斯曼帝国衰败的方法。他在行省任职时，办事能力强，有革新意识，能够抵制腐败行为。他在巴尔干镇压过两次暴动，因功被委任为尼什的总督。因为治理尼什省有功，他在1864年被召至伊斯坦布尔。米德哈特帕夏、富阿德帕夏一起起草了《行省法》。《行省法》在两个最难管理的行省图纳（Tuna）省和巴格达省试点。该法于1867年和1871年两次修订，

① Philip Mattar, Macmillan Reference,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Vol. 1—3, U. S. A., 2004, p. 24.

② Enver Ziya Karal, *Osmanlı Tarihi*, Vol. Ⅷ,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5, s. 113.

③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

主要是把全国重新划分为27个省（Vilayet），每一个省由总督（Vali）负责管理，总督重新选用自己的下属职员，拥有广泛的权力。根据法令，地方政府由民政、财政、警察、司法等部门构成，财政部门的领导直接向伊斯坦布尔的财政大臣负责。根据行省法成立管理委员会，省级的代表大会从各个卡扎（县）选举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代表。在每个省、桑贾克、卡扎分别成立民事和刑事的混合法庭。[①] 此外，行省边界重新划定。

1861年首次编纂有关采矿的法规。1868年建立政务会（State Council），同年建立司法部。1869年依据法国1810年的采矿法，制定了一套新规则（后来于1887年建立矿业部，随之对采矿税有了明确规范）。

这一时期的管理中，允许行省实行新的管理机制，运用地方权力，独立发展经济，但当行省新的管理机制发挥效用时，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各自对地方权益的追逐显得突出，地方权力大有脱离中央政府之势。[②]

二　经济方面

发展农业的措施包括：第一，在奥斯曼帝国国内建立农业技术学校，课程包括农业理论和实践，还有化学、数学、土地法、税法，以及农机农具的使用、耕作技术等。农技校毕业的学生回到家乡工作。第二，建立一支职业性的农业专家队伍（亚美尼亚专家占主体）；派农业检查员到行省给农民就技术提出建议和指导。第三，选派青年去欧洲的农业学校培训（以亚美尼亚青年为主，也增加穆斯林和希腊人赴欧培训）。第四，为推动经济发展，1876年建立农会和商会。农商会成员没有薪俸，是从种植业主和商人中选出的代表组成，他们每周集会，向政府就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情况提出定期报告。第五，针对农业生产资金缺少，不能改善农业工具、选育良种的现实，政府设法为农民贷款。[③]不过，总体来说农业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很多。比如乡绅、地主拥有的土地不能触动，但仍有些乡村土地可以租让，土地上的农民支持对社会基础的变革，而土地所有者持激

---

①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pp. 95 - 96.

②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222.

③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Ⅱ, pp. 230 - 231. 说明：坦齐马特时代没有建立农业银行。到1888年，农业银行建立，也建立完备的农业信贷制度，农业银行后来不仅成为提供农业资金的主要源泉，而且发展成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烈的反抗态度。[①]

城市工商业改革：第一，1862 年政府设立审计部门。第二，国家财政有所改善，关税、营业税、印花税等税收为政府带来较多的财政收入。原先由包税人征收盐税，到坦齐马特时代，征税权收归国家，政府控制了盐的所有权、生产权、销售权，盐税收入直接交入国库。第三，军火制造和销售、邮政和电报服务，也是政府垄断，收入归国库。第四，印花税是这一时期“发明”的，实际上为国家带来巨大收益。总之，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 10 年，上述各项税收收入增加了[②]。此外，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从 1855 年以后私营工业开始缓慢启动，1864—1873 年，随着“工业改革委员会”的建立，商人联合组建不少贸易公司，一个新的私营和民营经济逐渐形成。[③] 19 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帝国私营经济领域的发展较快，其中发展变化最为明显的是这一时期。

当然，阿卜杜·阿齐兹时期也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他的前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向欧洲借款，除了支付战争费用，还用于弥补其他开支。阿卜杜·阿齐兹时期财政开支巨大，改革所需的资金——支付顾问、教员、技术人员的费用，基础设施的投入，几乎都是借款来维持。应归还的利息逐渐累加，而国内税收收入有限。1873—1874 年安纳托利亚发生饥荒，税收收入大大缩减。宫廷奢侈消费和官僚机构的开支，使财政问题更加恶化。[④]

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的努力：早年马哈茂德二世曾废除了道路税，由国库支付道路维护和建设费用。但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拨不出道路维护费。许多道路失修，严重的地方影响军事行动和经济活动，1867 年，一项新的制度产生了，它是依据米德哈特在多瑙河行省的经验推而广之的。办法是每个省设立专门银行，对道路建设、桥梁维修，还包括为当地学校建设等项目提供资金。银行资金来源是一小部分附加税，以及银行向农民贷款的利息。当然，这些资金是不够的。政府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必须在当

---

①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53.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Ⅱ, pp. 104 – 105.

③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715.

④ Philip Mattar,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Vol. 1 – 3, Macmillan Reference, U. S. A., 2004, p. 25.

地参加修路修桥的劳动4天，或每5年参加劳动20天。实际上是劳役取代道路税的办法。阿卜杜·阿齐兹的注意力集中在安纳托利亚修筑重要铁路等方面[①]，只是未能投入较大规模的建设。

三 教育方面

1869年的《普通教育法》确立了国家教育的课程体系，强调设立现代课程，如科学、工程学、地理学等。行省建立专业化的高级中学，筹划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大学。问题是，奥斯曼帝国有多少人对外国学校感兴趣呢？真正感兴趣的都是哪些人呢？西方的文化对土耳其教育影响有多大?[②]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使团在奥斯曼帝国建立西式学校，但土耳其孩子入学就读的很少。例如1857年伊兹密尔创办的一所西式学校，110名学生中只有1名土耳其学生。1869年罗伯特学院的学生71名，只有2名土耳其学生，还是改信基督教的土耳其人的孩子。[③] 由于历史原因，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的教育主要是宗教文化教育，接受西方科技知识还需要一个过程。教育改革起到一定作用，但距离最初推广西式教育的目标还差得远。

此外，阿卜杜·阿齐兹把注意力集中用于大规模发展军队方面，尤其是创建强大的舰队等方面，[④] 比如购置新军服，购买新武器。除了购买法国和普鲁士的武器，还从美国购买军火，聘请美国军事专家，1869年奥斯曼政府从美国购置的军火占到79.56%。[⑤] 不过，阿卜杜·阿齐兹时期军事建设的成就没有后来哈米德二世时期那样明显。

1876年5月30日，正处于壮年（46岁）的阿卜杜·阿齐兹在政变中被废黜，穆拉德被拥立为奥斯曼帝国新的素丹，称穆拉德五世。6月5日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

②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671.

③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671.

④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

⑤ Oral Sander, Kurthan Fişek, *Türk- ABD Silah Ticaretinin İlk Yüzyılı* (1829 – 1929), İmge Dağitim, İstanbul, Ankara, 2007, s. 18 – 19.

阿卜杜·阿齐兹死亡，死因不得而知（一般记载是自杀，也有记载是被杀）。坦齐马特时代至此结束。

第三节　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评析

学界对坦齐马特时代改革的评价，总体上高于对马哈茂德二世的评价。一般理由是：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古尔汗法令》和《改革法令》所体现的原则，具有现代色彩。当然，对坦齐马特时代改革也有不少批评意见。具体来看：

第一，从坦齐马特时代改革运动的整体影响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奥斯曼帝国的牢固等级。改革引进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划分方式，即不以宗教信仰来划分民众。“奥斯曼人”取代了传统的穆斯林和迪米人的区分；迪米人被“非穆斯林奥斯曼人”的称谓所取代。1869 年的奥斯曼民族法使这些概念和称谓从法律上确定下来。[①]宗教和种族之间在官方的区分变得越来越模糊。通过组织代表大会来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削弱了不同社区在传统上由宗教人士所占据的位置。[②]这些措施，对推动奥斯曼帝国的世俗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坦齐马特时代初步有一个倾向，即建立一个更加世俗化的国家，但这种倾向并不持久）。

不管怎么说，在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落后国家，通过法令的形式明确宣布保障所有臣民的权利，公开承诺颁布维护人民利益的新法律，宣称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不分族别和信仰在法律面前平等，这是破天荒的。非穆斯林与穆斯林享有同等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改教，已经接近西方的政治观念，难能可贵。因此有的学者说，“坦齐马特是土耳其人为争取公民权利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是宪政的开端”。[③] 而改革期间设立混合法庭、编制国家预算、建立银行、鼓励商业和农业等措施，成为西化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后来土耳

---

①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4.

②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p. 75 – 76.

③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p. 30.

其共和国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具体的改革措施成效较大。例如19世纪50年代之后不但引进了现代战术和军事组织，更新了军事装备，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1871年之后军事方面整体有所改观。侯赛因·阿沃尼（Hüseyin Avni）帕夏任大维齐时（1874—1876年），政府投资军事设施，从德国购置新式枪械和大炮。重建并修缮与俄国边界的堡垒，重新整顿帝国军队。例如，把安纳托利亚的军队从锡瓦斯（Sivas）转移到埃尔祖鲁姆（Erzurum）。在土耳其海峡修筑了防御工事。[①] 阿卜杜·阿齐兹统治时期相对平稳，没有大的战事。只有1866—1869年发生了克里特的叛乱，不得不在这个岛上实行管理改革。又如经济方面，根据《古尔汗法令》中关于税制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包税制被废除，征收直接税成为奥斯曼帝国财政制度的基础。改变了人头税征收的对象和范围，个体纳税人的税额分配由那些受到非穆斯林信任的人决定，承诺改变非穆斯林纳税人负担过重的状况，这是较大的进步。[②]

改革之后，管理和司法状况已经有所变化。非穆斯林民众被给予自由。那些遥远的行省再次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中。改革措施实行后，人们生活发生了变化，在农村耕地面积有所增长；在较大的城市和港口，生活设施得到改善；在政府机构中，男士礼服和土耳其毡帽取代了长袍和穆斯林头巾，商人以及社会名流从旧城市的老房屋，搬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意大利别墅，住进了开罗新区、士麦那和贝鲁特。连奥斯曼素丹自己也搬到了华丽的、有着吊灯和镀金长镜的新式水上宫殿，看起来已不再是东方式的专制君主。[③]

改革之后，住在大城市、沿海城市以及交通发达城镇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变化最为明显。帝国境内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上层土耳其人，以及外来的法国人、英国人占据城市里生活豪华的区域。本地的富有人家或官僚们大都对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着迷，他们着意模仿欧洲礼仪，

---

① Philip Mattar,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Vol. 1—3, Macmillan Reference, U. S. A., 2004, pp. 24 - 25.

② Alfred Bonne,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Routledge, London, 1998, p. 60.

③ Albert Hourani,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981, pp. 14 - 15.

在社交圈中讲西方语言以示与普通东方人不同。他们熟练掌握的是英语和法语，而不是阿拉伯语。他们甚至模仿欧洲上流社会的绅士，加入俱乐部，穿黑色毛料制服、晚礼服，露着白领子。同时，当地富人和官员们模仿西方的消费方式和居住样式。[①]

第三，值得肯定的是，坦齐马特时代改革者的目标是清楚的、明确的。这个时代的改革目标是使奥斯曼帝国从传统的东方专制国家转化为现代法制国家，这一目标，远远超出塞利姆三世“强兵”、“御侮”的目标，也超出马哈茂德二世建立军事强国、维护帝国统一的改革目标。塞利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途径是购置西方先进武器，翻译西方科技书籍，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走上强国之路；坦齐马特时代改革的途径，除了引进西方科技之外，还要学习和模仿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改革者要以1839 年的《古尔汗法令》为开端，承诺要保证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的生活、荣誉和财产安全；在法律面前平等；建立征兵制度；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国家控制直接税的制度）。[②] 其实，在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实行改革的重要性普遍被认识到了。坦齐马特时代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获得的支持是较多的，而当政者面对的只是“到底如何改革”的问题。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坦齐马特时代的各项改革得到帝国境内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支持。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常常是把城市以外的新知识、新观念向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传播的中间人。穆斯林接受新生事物比本地的基督教徒缓慢，而在基督教徒中，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也不均等。坦齐马特时代的精英人物努力实现折中方案，给予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宗教社区以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权利，作为他们忠诚于帝国、忠诚于奥斯曼素丹的回报。为实行这一方案，精英人物寻求建立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其目标是不同社区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以“独立而平等”为标识，实现社会和睦而又保持他们各自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③] 当然，坦齐马特时代

---

① M. Riad EL-Ghonemy, *Affluence and Pover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 New York, 1978, p. 31.

②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67 – 268.

③ Bruce Alan Master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40.

精英人物的理想并未实现。“在素丹眼里所有臣民一律平等”的声明，未能立即改变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

坦齐马特时代社会习俗改革中有一项是服饰改革，要求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戴费兹帽（被当作现代文明的象征)。1844 年，奥斯曼政府要求城里人戴费兹帽的法令到达阿勒颇，没有人响应。但 1847 年有一群青年基督教徒集体决定甩掉他们的头巾，戴上费兹帽，支持阿卜杜·麦吉德的改革法令。不久，基督教精英中的男性几乎全都接受了改革，采用欧式服装。[①]

第五，坦齐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关系有很大的变化，1856 年的《巴黎条约》接受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从那时起，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被当作欧洲的都市之一，成百上千的欧洲人进入伊斯坦布尔定居。[②] 而且，土耳其人去西欧各大城市参观、学习的增多；土耳其的青年人模仿法国诗歌、艺术，钻研西方哲学，也仿照西欧组织沙龙，建立民间团体；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国人的礼仪，当然还有法国的自由主义，一时间成为奥斯曼帝国最流行的东西（不过，这些只是有闲阶级、有产阶级圈子里的时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有限)。

第六，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起初得到国内各派和来自欧洲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但真正要付诸实践，就会受到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不同群体的反对。许多穆斯林抱怨改革，觉得改革把特权给了非穆斯林；在旧制度下享有特权的穆斯林包税人、银行家、充当商业中介而谋利的群体，都批评新政策——因为新政策实行后限制了他们获取利益的途径，直接物质利益和预期的利益都受损失；穆斯林援引“沙里亚”（伊斯兰法），说把权利让给基督教徒是与神圣的伊斯兰法则相违背的，于是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而许多非穆斯林则觉得改革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新政策并不好。改革措施中对宗教代表不免税，还坚持征收人头税，于是受到宗教界人士严厉的指责。[③]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不满改革，认为他们失去

---

① Bruce Alan Master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7.

② Bilal Eryılmaz, *Tanzimat ve Yönetimmde Modernleşme*, işaret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6, s. 18.

③ Gά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554.

了在基督教社区中享有的特权。这样听起来，不满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非常非常多，事实也许未必如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肯定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有充分的证据。不过，批评坦齐马特时代的也能找出很多理由。

有的人批评坦齐马特时代缺少实现改革方案的明确方针；有的人批评改革措施推行不力——比如在推行改革时，有的行省推行了新法，有的行省没有；距离首都近的行省实行了改革，中央能有效控制的行省也实行了改革，如布鲁萨、安卡拉、艾登（Aydin）、伊兹密尔、科里亚（Korya）、锡瓦斯（Sivas）、特拉布宗（Trabzon），而其余的地方则没有实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从巴勒斯坦到阿拉伯半岛有大批的贝督因人，他们过着游牧部落的流动生活，是奥斯曼帝国边境地区的不安定因素，能否有效控制这些地区是历任奥斯曼素丹关注的大事。坦齐马特时代的宗旨是推进现代化，按理说，由此促使贝督因部落定居是一个大好时机。但这个时代奥斯曼政府仍然使用武力解决沙漠地区贝督因部落之间的冲突，如1845—1865年采用强硬手段削夺了耶路撒冷地区部落首领的权力，用武力控制了巴勒斯坦南部的重要城镇。[①] 在行政管理方面，为了达到权力控制的需要，扩大政府机构，增强政府的影响力是必要的，但没有在改进交通条件、建设公共工程、发展教育等方面下工夫。做这些工作真的非常困难吗？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19世纪90年代做到了，他对部落地区使用怀柔的办法，事实证明效果是明显的。当然，1864年和1871年颁布行省法之后，政府尽力劝服贝督因部落定居，并在沙漠中建立城镇，如比尔谢巴、纳杰夫、加沙就是改革时期开始建立的。建立比尔谢巴等城镇，构成了奥斯曼帝国城市化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政府并没有计划要城市化，当时只是为了管理游牧部落的需要。毫不奇怪，这些城镇的建立成了坦齐马特时代在沙漠地区的最大成果。[②]

有许多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批评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说奥斯曼政府已

---

① Yasemin Avci, "The Application of *Tanzimat* in the Desert: the Bedouins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Town in Southern Palestine (1860—1914)",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6, November 2009, pp. 969 – 972.

② Yasemin Avci, "The Application of *Tanzimat* in the Desert: the Bedouins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Town in Southern Palestine (1860—1914)",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6, November 2009, pp. 972 – 974.

经完全依附欧洲强国。有的学者说，坦齐马特时代的现代化就是“独裁式的现代化”。这场“独裁式现代化”的改革“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制度，而现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则宣称16世纪以来的政治制度是腐朽的、并且正在衰败，以此来表明他们弃旧图新、开创新局面的必要性”[①]。

说到改革领导者的个人倾向，甚至个人素质，当时的抨击者和后世的评价者不少。费希尔的《中东史》列举了一些批评意见，如“改革不尽人意之处太多。连一度手握大权、志在改革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博士都对改革失望，决意返回英国不再到土耳其去了。他看到周围都是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连他的朋友雷希德本人都已腐化堕落，并任命了一些不称职的和臭名昭著的人担任高级官职”；“阿卜杜·阿齐兹时期更糟。有少数人主张开发自然资源，但这部分人被那些贻误国事、恃贪污为生的和使帝国政治处于停滞状态的人弄得哑口无言”。还有一些温和批评：“雷希德在第一次任大维齐时，总是专心致志于建立一种更加自由的政体。虽然他在方针上有时是软弱的，本人也容易受贿，但他还是改革的倡导者，完全倾向于亲英。”[②]

其实，改革领导者不但有改革的决心，也有改革的能力。以米德哈特帕夏为例，他就是在地方工作中积累了改革的经验，然后承担帝国改革大任的。米德哈特帕夏先在首都任职，后回到保加利亚担任新成立的多瑙河省的总督。在任职期间，米德哈特帕夏兴修公路、桥梁、铁路，创办孤儿院、学校、医院、银行、农业合作社等，颇有政绩。民众对他的好印象，是他能够公平地对待基督教徒。朝廷赞赏他，主要还是他有能力恢复秩序（严厉镇压当地民族主义者谋求自治和独立的反抗活动）。于是，他一次次得到重用。他在政府的中枢机构工作过，当过大维齐，当过尼什总督、多瑙河省总督、伊拉克总督、萨洛尼卡总督。[③] 像米德哈特这样的政治

---

① Baki Tezcan, “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3, May 2009, pp. 477 – 479.

②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11、413、408页。

③ 后文将要提到，米德哈特在引退期间策动政变，废除了阿卜杜·阿齐兹，拥立穆拉德五世，又很快废黜穆拉德五世，立阿卜杜·哈米德为奥斯曼素丹。1876年出任大维齐，1877年被流放。1883年，米德哈特和几位自由主义同胞被绞死在阿拉伯半岛麦加附近的塔伊夫一座地牢里。

家，推行改革不仅仅是依靠热情，凭借头脑中的构想，而更多的是实际经验。有的人对奥斯曼素丹提出质疑，比如认为阿卜杜·麦吉德容易被国内有势力的大臣所左右，他自己幼稚的或错误的念头，也可能导致一些决策的失误。但是，阿卜杜·麦吉德上台后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出使伊斯坦布尔的美国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中记述：麦吉德执政后，奥斯曼帝国完全改变了，政治环境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外国人不用再提心吊胆，可以继续干自己的事，而感觉到他们是安全的。[①] 事实证明，阿卜杜·麦吉德和他的继任者还是努力限制自己权力的，他们在位时没有处决任何一位大维齐。[②]

有的批评者指责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大臣亲西方，改革的结果是奥斯曼帝国更加依附于欧洲国家。这类批评承认坦齐马特时代的领导者试图通过改革来恢复奥斯曼帝国的活力，无疑是诚恳的。但问题在于，“改革还承担着另一个目标：要成为欧洲舞台上的一员，获得国际地位。改革的双重目标，在以实现法律面前的平等为目的的改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促进这样的平等，提升成分复杂的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同时，可以平息欧洲民众的意见（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徒的地位问题很敏感）”[③]。改革得到西方支持，与西方交流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其结果，改革派的帕夏对欧洲大国的依赖不断增加。通过欧洲的支持，帕夏们也增强了与素丹抗衡的力量。例如，雷希德帕夏、侯赛因·阿维尼（Hüseyin Avni）帕夏、米德哈特（Midhat）帕夏依赖英国的支持；阿利（Ali）帕夏、富阿德（Fuad）帕夏、尼迪姆（Nedim）帕夏得到俄国的支持。[④] 坦齐马特时代在奥斯曼历史上成了最有争议的时代之一。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是无的放矢，这种情况的确存在。

奥斯曼帝国不同地区差异较大，这是帝国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决定的。因此，在一个地理范围出现的变革，与另一地区表现出极大差异，奥

---

① Cyrus Hamlin, *My Life and Times*, Boston, the Pilgrim Press, Chicago, 1893, p. 199.

② Baki Tezcan, “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3, May 2009, p. 485.

③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p. 77.

④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29.

斯曼帝国现代化进程呈现的不平衡显而易见。[①] 坦齐马特开始的前10年，奥斯曼帝国遇到的困难较大，既有转型时代带来的挑战，也有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国内国外的困难，尤其是经济困境长时间延续。[②] 帝国以前的改革运动，仅仅触及西方文化的一些概念，做了某些管理方面的调整，只有到了坦齐马特时代，改革真正深化，西化产生了结果。[③] 然而，奥斯曼社会阶层多样，一旦推行西化，个人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必然表现出差异(或出现分化)。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要实现“现代化”，建立新的组织机构就必不可少，我们今天所知的正规教育，社会的、管理的、哲学的问题，大都由此而来。教育机构为个人提供受教育的场所，管理机构保障个人在社会上公平竞争；这一切反过来激发人们创造的热情和兴趣。[④] 所以，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浩大工程。

而说到改革的效果，不能不考虑到改革的难度。奥斯曼社会一些根子上的陋习没法改变，如社会上风行的“贿赂”。《在君士坦丁堡四十年》的作者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1873年到君士坦丁堡后吃惊地发现，整个城市普遍流行的是行贿受贿。几乎每一件事，无论大事小事，都要送礼，不行贿办不成任何事。埃德温·皮尔斯和他的同伴们住了不久，每个人都能讲出许多个行贿受贿的故事。埃德温·皮尔斯印象最深的还是收受贿赂后制造出“豆腐渣工程”的真事。比如，奥斯曼政府要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投放100个浮标，购置浮标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办理的过程经过几个中间环节，每个浮标花费150英镑，但等待安装时发现，浮标有质量问题，根本不能用。又如，在君士坦丁堡不远处搭建了一座木桥，耗资8000英镑，木桥建成不到两周就塌了。[⑤] 可见，问题不出在改革领导者身上，不出在改革措施执行坚决与否，关键还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积弊太久，仅靠几道改革法令是难以解决问题的。

---

①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225.

②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207.

③ Bilal Eryılmaz, *Tanzimat ve Yönetimmde Modernleşme*, işaret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6, s. 18.

④ Yurdagül Mehmedoğlu, *Tanzimat Sonrasında Okullard Din Eğitimi*, *1838—1920*, İstanbul, 2001, s. vi.

⑤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p. 6 - 7.

概而言之，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没有因为改革而迅速好转，政治局面没有因为改革而出现良性循环，旧文化也没有因为改革而转化为新文化，但是，经济、司法、教育等领域的具体改革措施（尤其是一些“硬件建设”）均收到了实际效果，关键是大张旗鼓地为后来的改革开辟了道路。促使传统根深蒂固的穆斯林社会逐步接受外来文明，这是奥斯曼帝国开放的标志。改革中可能激化了某些矛盾，但毕竟消除了一些阻碍国家机器运转的因素，使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艰难转型，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坦齐马特时代所推动的事业，为后来土耳其国家所延续，使这个民族最后进入共和国时代。从这个角度说，这一时代的各项改革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是非常有益的。[1]

---

[1]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s. 53.

第六章　国内危机的国际效应

坦齐马特时代是奥斯曼帝国全面改革的时代，其实也是奥斯曼政府内外交困的时期。19 世纪 50 年代即坦齐马特时代的中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政府因为打仗而被迫举借外债。克里米亚战争第一阶段是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很快变成一场多国卷入的影响欧洲格局的战争。70 年代的坦齐马特末期，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巴尔干起义，进而演化成国际事件。坦齐马特的终结则是由于政权更迭，阿卜杜·阿齐兹被废黜。巴尔干的“危机”（1875—1878 年的“近东危机”）恰恰是在奥斯曼帝国财政困难、经济萧条、军事失利、政治失稳、外交出现困境的时候发生的。[①]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发生起义，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宣布独立，奥地利入侵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实现自治。在此前后英国军队登陆塞浦路斯，俄国入侵安纳托利亚东部，占领卡尔斯（Kars）和阿尔达哈（Ardahan）省。奥斯曼帝国总共失去 21 万平方公里领土和 550 万人口，这么多人口相当于奥斯曼帝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领土和人口的缩减，使得帝国的财源大大减少。[②]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仅仅 20 年时间，事件不断，更让帝国统治者措手不及的是，每次国内的政治问题都会产生“国际效应”，演变成国际重大事件。最后的处理，不是奥斯曼素丹要怎么办，而是看欧洲外交官们说怎么办。

---

①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Çeviren Server Tanilli,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135.

②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Çeviren Server Tanilli,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135.

第一节　“圣地保护权”引发克里米亚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中叶的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除了规模较大、伤亡惨重、影响深远外，战场上还使用了一些科技手段，也出现了战地医疗服务，因此这场战争在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战争史上都很出名。对奥斯曼帝国来说，经受了17世纪晚期以来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取得“来之不易”的一次胜利，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克里米亚战争的主战场本来在多瑙河下游，但从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撒丁王国参战之后，战场转移到克里米亚半岛，所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1]。

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和法国争夺“圣地保护权”的问题引发的。

一　“圣地保护权”问题的扩大化

俄国侵略奥斯曼帝国有多种借口，其中之一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俄国在1768—1774年的战争中获胜后，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它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并写入《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在后来几次签订的条约中，都直接或间接重申“保护权”问题。俄国以“保护东正教徒”为幌子，多次支持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反政府活动。19世纪30—40年代，俄国加紧在巴尔干地区活动，因为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坚持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是迟早的事。尽管1839—1841年他帮助奥斯曼帝国打败埃及军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此时认为奥斯曼帝国不会崩溃。俄国在奥斯曼帝国渗透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比如，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的居民“90%同俄国人信奉同一种宗教，有700万奥斯曼帝国臣民的语言几乎与俄语毫无差异。俄国的代理人很容易通晓土耳其事务”[2]。数以百计的俄国代理人周游奥斯曼帝国，向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做宣传，鼓动他们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

法国从16世纪弗兰西斯一世时期就宣称，法国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

---

① 有的外交文献称之为“东方战争”、“对俄战争”，有人对这场战争的名称进行了讨论。详见 Iran Fletcher and Natalia Ishchenko, *The Crimean War, a Clash of Empires*, Spellmount, Staplehunt, 2004, Pxi。

②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页。

天主教徒有“保护权”，圣地耶路撒冷和城南的伯利恒由法国天主教徒管理（管辖权原来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圣地具体要管理的范围包括圣墓（耶稣墓地）、伯利恒的大教堂、耶稣诞生地的遗址、格西玛尼公园的圣母之墓等。[①]“圣地保护权”就涉及圣地和圣物的保护问题，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长期纷争。法国为了插手近东事务，也以“圣地保护权”为突破口。从16世纪以来，有法国的支持，巴勒斯坦地区的天主教徒享有特权。1740年，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条约，强化并巩固法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优势地位。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三世上台，这段时间法国国内局势动荡，无暇顾及近东事务，而俄国支持的希腊东正教徒逐渐取得支配地位。[②]

尼古拉一世上台后，感觉到法国人蔑视俄国，对俄国不信任，因此他不打算与法国达成一项关于近东事务的协议。相反，尼古拉一世认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可能会被奥地利和英国接受。1833年2月，尼古拉一世向梅特涅提出，俄国和奥地利应该对近东地区的未来有所规划，但没有什么进展。1843年9月，尼古拉一世两次与奥地利外交官菲凯尔芒（Ficquelmont）在华沙进行会谈，草拟了一个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1844年3月，两国在维也纳达成了进一步的协议。不过，梅特涅对俄国不信任，对近东毫无兴趣。

俄国和英国之间在1844年夏天达成某种妥协。尼古拉接受英国的邀请，于5月31日访问英国。6月4日和5日，沙皇与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和外交大臣阿伯丁（Aberdeen）勋爵进行了交谈。最后达成一个协议，内容是当奥斯曼帝国快要崩溃或者是遭到其他国家进攻时，英国和俄国一致行动。这个协议是模糊的，没有细节，但协议透露的信息是，尼古拉一世反对任何大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也反对希腊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③]几个月后内塞尔罗德（Nesselrode）访问英国时，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提交给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后来形势发生

---

① S. P. 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1902, p. 99; Angelia Michelli Fleming & John Maxwell Hamilton, *The Crimean War*, 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4. 说明：关于圣地遗址和遗物的具体内容，各种文献的表述不一样。

② S. P. 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1902, p. 99.

③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p. 111 - 112.

变化，俄国与英国之间的外交没有取得多少成就。

1848 年欧洲革命之后，大批匈牙利和波兰革命者逃到了奥斯曼帝国境内避难，很快引发真正的危机。俄国政府要求引渡波兰革命者，奥地利政府要求引渡匈牙利革命者，奥斯曼素丹在英国支持下拒绝引渡。① 1848 年 9 月 17 日，俄国和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断绝外交关系。奥斯曼帝国显然得到英国的支持。尼古拉一世感受到英国舆论强烈支持奥斯曼政府，便放弃了引渡波兰流亡者的要求。奥地利没有得到俄国的支持，也放弃引渡匈牙利流亡者的要求。到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危机就已经结束了。不过，后来也发生了英国舰队进入土耳其海峡的事件，引起俄国的紧张。英国舰队很快离开了海峡，但这表明，俄国对于任何一个威胁其海峡利益的事件是多么敏感，哪怕这个威胁只是假象。② 在 1848 年革命之后的几年里，俄国人的气焰是嚣张的，尼古拉一世本人也认为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

恰在此时，法国人提出“圣地保护权”问题。1850 年 5 月，路易·波拿巴向奥斯曼帝国发出照会，对黎凡特地区天主教徒的合法权利被东正教徒剥夺表示抗议。照会要求奥斯曼素丹履行 1740 年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条约中规定的关于天主教徒权益的义务。俄国立即做出反应。路易·波拿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1851 年 5 月，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向素丹转达了路易·波拿巴的意见：要尊重耶路撒冷天主教的特权和基本权利。7 月 15 日，奥斯曼素丹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赴圣地考察。1851 年 12 月路易·波拿巴在政变成功后，信心十足地实行强硬政策，派使臣到伊斯坦布尔，提出圣地的所有建筑物由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共同占有。几个月后，调查委员会递交的报告支持法国的要求。1852 年 2 月 9 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得到了素丹的认可。③奥斯曼帝国正式颁布敕令，承认奥斯曼帝国与法国早年签订的条约有效，基督教圣地的管辖权归法国天主教徒。不过，奥斯曼素丹不敢得罪俄国，私下告诉东正教徒，他们的权利不受影响。后世学者认为，路易·波拿巴在“圣地”问题上有意设下圈套，试图恢复法国在近东的利益，同时打击“欧洲宪兵”俄国，事实上也达到

---

①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p. 74 - 75.

②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p. 113 - 114.

③ S. P. 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1902, pp. 99 - 100.

了自己的目标。关于“圣地保护权”确认的过程，有一种说法是：起初奥斯曼素丹犹豫不决，路易·波拿巴做出动武的架势，奥斯曼帝国才答应了法国的全部要求。

法国得到“圣地保护权”，俄国的尼古拉一世做出强烈的反应。他先在欧洲进行外交活动，希望得到奥地利支持，换得普鲁士谅解，然后准备直接向奥斯曼政府施压。俄国向奥斯曼素丹政府提出抗议，坚决反对奥斯曼素丹在“圣地”问题上向法国妥协。“圣地保护权”问题扩大，变成俄国和法国的外交争端，法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对抗一度非常激烈。[①] 俄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享有高于天主教徒的特权。俄国代表还提出，《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已经规定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东正教教堂，奥斯曼帝国应该兑现条约的承诺；而且，俄国的东正教徒应该自由赴耶路撒冷和奥斯曼帝国境内其他圣地。同时，俄国也告知英国政府，俄国打算派陆军总司令缅施科夫（Menshikov）公爵为特使向奥斯曼帝国正式交涉“圣地”问题。

1853 年 2 月中旬，缅施科夫率领使团从俄国敖德萨出发，先去视察多瑙河公国的俄军驻地，在比萨拉比亚举行阅兵式，然后奔赴塞瓦斯托波尔，检阅了俄军舰队的演习。这一番举动，显然是炫耀武力，做戏给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看的。2 月 28 日，缅施科夫及其随员 12 人（舰队司令、参谋部官员为主）抵达伊斯坦布尔。[②]

缅施科夫使团到达奥斯曼帝国首都后，公开声明不愿意与奥斯曼外交大臣富阿德打交道，理由是这位外交大臣亲近法国。在外交礼节上，缅施科夫蛮横无理，盛气凌人。缅施科夫在伊斯坦布尔向奥斯曼帝国先后发出三个照会，不仅要求奥斯曼帝国答应俄国的条件，还要求签订条约加以确认。5 月 7 日缅施科夫向奥斯曼帝国递交的条约草案中，提出的新要求包括：《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埃迪尔纳条约》中关于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东正教堂等规定继续有效；现在这项特权要变成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普遍保护权。奥斯曼素丹接受英国劝告，起初还准备对俄国妥协。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大臣曾把一份关于“圣地”问题的素丹敕令副本

---

① Angelia Michelli Fleming and John Maxwell Hamilton, *The Crimean War*, 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5.

② 一说：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时间是 3 月 1 日。

交给缅施科夫，表示奥斯曼帝国同意保障基督教徒的权利，不过，两国不缔结条约。奥斯曼素丹做了很大让步，但并没有满足俄国的全部要求。缅施科夫使团很快向奥斯曼帝国发出通牒，坚持要求签订条约来保证俄国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5 月 10 日发出的照会大致内容是：如果奥斯曼帝国拒绝，俄国皇帝将不得不认为这一行动是对他本人和对俄国完全缺乏尊敬的表示，并且将对这一消息“深表遗憾”。其实，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多数东正教徒反对沙皇的保护，得知俄国的要求之后掀起反抗行动，俄国认为它是奥斯曼政府煽动的。面对俄国的步步紧逼，奥斯曼素丹向英国和法国求援，英国和法国做出反应，秘密达成采取行动的协定。在英法两国大使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不过，英国外交官又背着法国劝说奥斯曼素丹向俄国让步。

奥斯曼素丹拒绝俄国的无理要求之后，很快改组了政府，撤换了亲俄的外交大臣，并于 5 月 17 日召开会议，正式表示，绝不接受缅施科夫建议的条约。缅施科夫讹诈失败，就离开了伊斯坦布尔。西方有的报纸说，缅施科夫去了敖德萨；有的报纸说，缅施科夫得到拒绝的通知后，仍没有离开伊斯坦布尔。不管怎么说，1853 年 5 月下旬这位傲慢的特使率领使团回国去了。

此后的一个多月，俄国在外交场合一面声明自己保护基督教徒的“正当理由”，指责法国破坏和平，另一面恫吓奥斯曼政府，制造出兵多瑙河公国的借口。英国和法国决定派舰队开赴爱琴海，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局面。6 月 26 日，俄国尼古拉一世发表宣言，明确表示要占领多瑙河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 有资料显示，俄国哥尔查科夫（Gortchkov）公爵于 6 月 27 日接到命令：强渡普鲁特河，占领多瑙河公国。7 月 2 日，俄国指责英国和法国舰队是带有敌意的示威。7 月 3 日哥尔查科夫公爵率领 8 万俄军度过普鲁特河，不久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2]

俄国已经进行军事侵略，而英国政府准备退让，既批评调动舰队的海

---

① Angelia Michelli Fleming and John Maxwell Hamilton, *The Crimean War*, 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6.

② 也有资料表明，6 月 20 日之前俄军已经占领多瑙河公国。因为，6 月 20 日俄国涅谢尔罗迭公爵发出照会：在奥斯曼素丹没有同意沙皇的要求，英法舰队没有离开土耳其海域之前，俄国军队决不会从多瑙河公国撤走。

军上校，又对法国军队进入爱琴海表示遗憾。奥地利首相奥布尔伯爵邀请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的大使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形成了一个“维也纳照会”。照会没有要求俄国撤出军队，却在劝说奥斯曼帝国不要诉诸武力。马克思曾撰文[①]深刻揭露问题的本质：“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扩张而鼓励苏丹（素丹）反抗沙皇，而结果却由于害怕普遍战争会引起普遍革命而强迫苏丹（素丹）让步……西方列强不敢想办法改造奥斯曼帝国，只能努力‘保持现状’。”[②]

奥斯曼帝国外交部于8月19日对照会做出答复，提出以俄国立即撤军为先决条件，并要求对照会进行修改。英、法等国则努力压制奥斯曼帝国接受这个照会。俄国得知英、法等国的态度后，更加肆无忌惮，向保加利亚边境集结3万军队，在布加勒斯特建立新的军需站。直到此时，奥斯曼帝国才准备进行军事反击。

10月1日，奥斯曼帝国交给四大国一份公告，大致内容是：

> 素丹并没有造成引起纠纷的任何口实。在圣地问题解决以后，就不再有纠纷的理由了。俄国方面破坏了一切条约，而土耳其方面则用尽了一切和解的手段。各强国自己都认为，素丹不应当同意缅施科夫公爵的照会。当然，素丹也不同意与缅施科夫的照会没什么差别的“维也纳照会”。因此，要求俄国统帅哥尔查科夫公爵撤出多瑙河省。如果哥尔查科夫公爵在接到上述警告后15日内给予否定的答复，那么，奥默尔（Omer）帕夏就应开始军事行动，俄国代表就应该离开奥斯曼帝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就应停止。[③]

这份公告中说的“警告”（相当于“通牒”）是10月9日通知俄军统帅的，撤军的期限应该是10月24日。其实，在这个时间之前俄国与奥斯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了百余篇文章，及时报道战争进展，分析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状况，揭示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的外交官对待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复杂心态，戳穿他们外交言辞下隐藏的险恶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9卷收录关于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战争的文章25篇，第10卷收录65篇，第11卷收录30篇。这些专题文章或政论有长有短，大多数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有几篇发表于《南非人报》、《新奥德报》。

② 马克思：《战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1页。

③ 马克思：《土耳其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72—473页。

曼帝国军队在多瑙河和高加索两地展开厮杀，战争已经爆发了。[①]

正式开战后，俄国还散布谎言，说愿意接受大国调解，是奥斯曼帝国军队先挑起了战争，俄国别无选择。英法等国外交官相信俄国的谎言，急急忙忙展开斡旋。本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起初占优势，英国说服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起给奥斯曼政府施压，要求奥斯曼军队停止战斗。奥斯曼素丹面对欧洲大国的调解出现犹豫，俄国军队则没有放弃攻势。俄国取得锡诺普（Sinope）战役的胜利后，要向伊斯坦布尔进军，英国、法国的官员们坐不住了，急忙派兵“保卫土耳其”。

客观地说，派军队与俄国在多瑙河和克里米亚作战，是奥斯曼帝国不得已的选择，是自卫性质的反抗；而发动这场以侵占多瑙河公国为开端的战争，是俄国南下侵吞奥斯曼帝国的战略中必然采取的步骤。

近代国际关系史中，把克里米亚战争前微妙的国际局势和欧洲外交官们的活动，描述得非常复杂、细腻，充满戏剧性。其实，问题的本质是，英国坚决不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在贸易上的地位，使它也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粉碎俄国的侵略计划，对英国来说是大事。从奥斯曼帝国的角度看，丧失两海峡，就会失去伊斯坦布尔；失去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就变成两部分：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并且是无法彼此相顾的两部分，欧洲土耳其很快会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保住海峡，这是奥斯曼当政者让步的底线，所以不惜与俄国一战也不答应俄国的无理要求。

二　克里米亚战争始末

克里米亚战争从 1853 年 10 月开始到 1856 年 3 月结束[②]，无论从战争规模还是从作战地点，都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按照战争规模，1853 年 10 月至 1854 年 2 月是第一阶段，是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1854 年 3 月至 1856 年 3 月是第二阶段，即以俄国为一方，以奥斯曼帝国、英国、

---

① 关于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正式爆发的时间，有的外交文献以 10 月 1 日为宣战日，也当作战争爆发时间；有的文献说宣战日是 10 月 5 日；有的外交文献说 10 月 23 日两国正式宣战；有的文献则以 10 月 18 日驻守多瑙河的奥斯曼军队发起进攻的时间算起；有的文献以 10 月 16 日高加索的奥斯曼军队发起进攻的时间算起。

② 有的国际关系著作中，仅仅把 1854 年 3 月英法等国参战至 1856 年 3 月签订条约称为克里米亚战争。也就是说，克里米亚战争指的是多国的大规模战争，把 1853—1854 年的战争只看作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俄土战争）。

法国、奥地利、撒丁王国为一方的大规模战争。按照作战地点，1853 年 10 月至 1854 年 8 月主战场在多瑙河下游；1854 年 9 月至 1855 年 9 月在克里米亚半岛作战。其实，高加索地区、波罗的海也是分战场，高加索的山地战和波罗的海的海战，也对战争全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多瑙河战场，俄军的战线是从维丁对面的卡拉法特延伸到希尔索瓦对面的奥腊什，这样的部署，不仅使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受到威胁，也使通往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受威胁。在奥斯曼帝国宣战前，俄军已经开始调兵。哥尔查科夫被任命为统帅。多瑙河各公国的俄军有 13 万—15 万人。虽然俄军炮兵的水平不高，但其步兵战斗力强。

奥斯曼帝国一方，总兵力 11 万—12 万人。奥斯曼帝国炮兵因受到普鲁士和法国军官的训练，单兵作战能力强，但全体步兵备战不足，攻击力不强。开战前，奥斯曼军队修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在多瑙河，用以阻止敌人强渡；第二道防线从瓦尔纳到苏姆拉；第三道防线在卡姆契克河畔，那里有要塞可以防守巴尔干山脉的山口。据说这些工事很坚固，不过，仅有防御工事是不够的，关键就看奥默尔帕夏的指挥才能。总体来看，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不占优势。

1853 年 10 月 18 日，奥默尔帕夏采取攻势，率军队在维丁附近渡过多瑙河。在此后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奥斯曼军队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几次击败俄军。奥斯曼军队士兵作战英勇，法式步枪也发挥了威力。不过，奥斯曼军队在多瑙河战场并没有占据主动权。

俄军积极备战，并在黑海寻找战机。俄国黑海舰队有各种类型的军舰超过 150 艘，在克里米亚南部还建有沿海炮台，设立海事法庭、海军图书馆和海军学校。[①] 俄国黑海海军已经有多年的经营和建设。在 10 月 30 日，俄军和奥斯曼海军发生了一场海战，这就是俄国人夸大其辞的锡诺普海战。

奥斯曼帝国的锡诺普港口在黑海南岸，距离君士坦丁堡大约 340 英里，距离俄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仅 200 英里。因恶劣天气暂停在锡诺普港内的奥斯曼军舰和运输船被俄军舰队发现，俄国军官报告塞瓦斯托波尔基地。奥斯曼海军在发现俄军后，立即发出警报，请求

---

① Iran Fletcher and Natalia Ishchenko, *The Crimean War, a Clash of Empires*, Spellmount, Staplehunt, 2004, p. 8.

奥思曼（Osman）帕夏快速支援。由于塞瓦斯托波尔距离锡诺普较近，俄军的援兵先到。纳基莫夫（Nakhimov）元帅不仅率领自己的旗舰，还增加多艘护卫舰，并装有多门大炮，而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只有 7 艘护卫舰、1 艘小型炮舰、1 艘蒸汽船和 11 艘运输船。[①] 开战约一个小时后，俄军就占领了海港。俄军速战速决，奥斯曼军队伤亡严重，据统计士兵死亡 4000 人，同时还有几百人被俘，统帅奥思曼帕夏也做了俘虏。

其实，锡诺普发生的战斗只是一批运送士兵和弹药、物资的奥斯曼军队的运输船和护卫舰遇到突然袭击，并不是大规模海战，而且，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在抵抗 1 小时之后才投降。而俄国人则大肆渲染，说俄国舰队在锡诺普附近击毁了奥斯曼舰队。“奥斯曼军队在锡诺普大败”！这一消息让英法两国的官员们震惊。一旦俄军节节胜利，下一步就会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伊斯坦布尔。这是英国和法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1854 年 1 月 3 日，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出现在黑海。这意味着英国和法国对俄国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沙皇尼古拉一世宣称，这一类行动是宣战的信号。一个多月后，俄国宣布与英、法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到 2 月 27 日，英、法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撤离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沙皇置之不理。3 月 13 日，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签订同盟条约。

1854 年 3 月 27 日和 28 日，法国和英国先后向俄国宣战。战争迅速扩大。英国官方发布的宣言（1854 年 3 月 28 日）称：由于俄国发动的针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到了不计后果的地步，俄国皇帝执意拒绝奥地利皇帝、法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英国国王提出的停战协议，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以维护和平与正义。出兵作战是为了英国人民的利益，为了欧洲各国的独立，为了维护英国的盟国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尊严和独立地位。[②]

在多瑙河战场，俄国陆军 5 万人分两路在加拉茨（Galatz）和图尔恰（Tulcea）渡过多瑙河，4 月中旬围攻南岸的锡利斯特里亚（Silistria）。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奥默尔帕夏的率领下奋力守卫锡利斯特里亚，给英国和法

---

① Iran Fletcher and Natalia Ishchenko, *The Crimean War, a Clash of Empires*, Spellmount, Staplehunt, 2004, p. 18.

② Joel H. Wiener, *Great Brita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1689—1971: a Documentary History*, Mcgraw Hill Book Co., New York, London, 1972, p. 2381.

国军队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Varna）港口集结军队赢得了时间。[①] 待联军集中到多瑙河口，海军立即轰炸俄国的敖德萨港，迫使俄军撤除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包围。

5月28日，英法联军兵分两路向多瑙河流域的瓦尔纳进发。法军一部分由陆路进发，另一部分与英国海军一道由海路进发。英法军队进入战场，多瑙河前线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士气大振。

6月3日，俄国信任的盟友奥地利与英法结盟，并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正式要求俄国立即撤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俄军虽全力抵抗，但无力扭转战局，主帅哥尔查科夫在战斗中负伤，俄军士气低落，不得不向北方撤退。奥斯曼军队乘胜追击。布加勒斯特的"俄国通报"于6月26日宣布：遵照圣彼得堡的命令，锡利斯特里亚已经撤围，全部俄军正准备调回到普鲁特河另一岸。电讯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俄国皇帝出于对奥地利这个老盟国的深深尊敬，满足了它的要求，已下令将自己的军队调回普鲁特河左岸。"[②] 不久，俄国确实彻底地把军队撤出了多瑙河公国。

在南高加索，俄军于1854年7月下旬在巴耶济德附近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打开了通向安纳托利亚的卡尔斯、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的道路。8月，在卡尔斯附近的库鲁得莱（Kuludere），2万俄军打败了4万奥斯曼军队。[③] 塔希尔（Tahir）帕夏指挥奥斯曼军队严守卡尔斯，但是食物供应紧张，加之霍乱和伤寒病流行，1854年12月放弃卡尔斯，撤至穆拉维夫（Muraviev）。

1854年8月8日，英国、法国、奥地利提出停战方案。大致内容是：欧洲大国共同保护多瑙河各省；多瑙河自由通航；取消俄国在黑海的优势；俄国放弃单独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徒的要求。[④]

俄国的尼古拉一世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决定继续战斗。

多瑙河两公国由奥地利军事占领，俄军已经撤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162.

② 马克思：《克里木战争》，1854年6月27日撰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15页。

③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162.

④ S. P. 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1902, pp. 112 - 113.

斯托波尔。英、法等国联军便开赴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战争并不为争夺克里米亚，克里米亚早被俄国吞并了。俄国从1783年起统治克里米亚，此后以克里米亚为基地，企图控制黑海，占领土耳其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克里米亚战争发生之前，俄国人统治克里米亚70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对抗始终存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受俄国人的压迫，几十年间不断向奥斯曼帝国境内迁移。在18—19世纪，俄国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差不多每隔20年就会发生一次，克里米亚鞑靼人移民受到不公正对待。[①] 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同情鞑靼人，却无力收复克里米亚；俄国人占据克里米亚，对奥斯曼帝国实施军事打击更为便利。这一次，俄国军队撤退到“自己的”克里米亚，英法等国的联军却不放过俄国军队，一直追到克里米亚。

9月13日，联军先头部队在克兹勒夫（Kezlev）登陆，命令该城的居民选择留下或是在24小时之内离开。由于缺乏有效的防御，没有足够的武装人员，克兹勒夫陷落，一小队联军占领了克兹勒夫。几天内大部分军队完成了登陆。起初，占领克兹勒夫的联军部队人数不多——约450人的英国海军，还有300名法国士兵和200名奥斯曼土耳其士兵，在两周内又补充了100名英国兵。一位俄国官员详述：在受降时，克兹勒夫的居民缺乏食物，状况非常糟糕，克里米亚鞑靼人几乎都处于饥饿状态。联军向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进军，这里成为克里米亚战争中军事行动的焦点。[②]

9月14日，联军与俄军在阿尔玛河（Alma River）展开激战。英法联军用重炮轰击俄军，俄军无力还击，只得撤退。在取得了阿尔玛河战役的胜利后，联军于9月底进入巴拉克拉瓦（Balaklava）。这时遇到一支拥有火炮、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俄军，双方经过多次交战，终因俄军兵力占优势，联军暂时撤退。巴拉克拉瓦之战后，俄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万人，联军方面兵力严重不足。

从9月中旬开始，联军多次攻击驻守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国军队，未能攻克这座要塞。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不断有惊人的消息：“克里米亚血战”，“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俄国舰队大部分被歼灭”等。后来证实，攻克塞

---

① Hakan Kirimli, “Emigrations from the Crimea to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08, pp. 751 - 752.

② Hakan Kirimli, “Emigrations from the Crimea to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08, p. 753.

瓦斯托波尔的消息是谣传。针对当时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文章批评"'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是大骗局"[①]。

与此相反，俄国军队决定进攻因克尔芒（Inkerman）的联军。11月5日，俄军乘雨天对联军进行突袭，使得联军步枪的优势无法施展，损失惨重，伤亡3246人。俄军的损失更大，有10729人伤亡。俄军通过攻击因克尔芒，试图解塞瓦斯托波尔之围，但在这次战役中双方都受重创，加之冬季来临，战场上出现相持的局面。从1854年11月到第二年（1855年）2月，大批奥斯曼帝国军队从多瑙河战场转移到克兹勒夫。

1855年春，克里米亚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撒丁王国对俄国宣战，并派1.5万人到克里米亚。联军准备再次攻击塞瓦斯托波尔。当时克里米亚的俄军步兵约有12万人，骑兵2万人；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联军步兵11.9万人，骑兵3500人。俄军防守塞瓦斯托波尔的兵力5万人，联军攻城的兵力约4.6万人。[②] 1855年3月2日，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双方重开会谈。但俄国对英法等国所提的方案不能接受，谈判陷入僵局。

6月4日会谈终止，联军继续发动进攻。6月8日和9月5日，联军两次全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炮弹如雨点般倾泻，俄军的工事大部分被摧毁。俄军伤亡惨重，主帅纳基莫夫负重伤身亡。9月10日，联军攻占了他们围困11个月之久的塞瓦斯托波尔。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线全面崩溃。在高加索等战场俄军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已经不能改变败局。

克里米亚战争的后一阶段英法军队是主力，不过，奥斯曼帝国军队也为联军提供了兵员和后勤服务，并且还封锁、侵扰俄军的供应线，协助联军作战。在围攻塞瓦斯托波尔时7000名奥斯曼帝国士兵参加了登陆作战。

1856年3月30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撒丁王国与战败国俄国在巴黎签订《巴黎条约》，正式结束克里米亚战争。

在战争过程中，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国举行过几次外交协商，1854年8月，奥地利外交大臣主持，英、法、普、奥（地利）的大

---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骗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52—553页。

② 恩格斯：《克里木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40—243页。

使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商讨克里米亚战争对策。1855 年 3 月，英、法等国派外交部门的代表再次到维也纳开会，法国外交大臣德雷宁·德·拉伊（Drenyn de Lhays）、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爵士（Lord John Russell）、奥斯曼帝国外交部长阿里帕夏参加了会议。[①] 在伦敦也举行过会议，而巴黎举行的会议是结束战争的一次。在每次会议上，欧洲国家的外交官们认真研究在奥斯曼帝国已经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连许多细节问题也进行了调查和讨论，试图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②]

根据《巴黎条约》[③]，第一，英法等国联军撤出塞瓦斯托波尔、巴拉克拉瓦等城市和港口，这些城市和港口归还俄国；俄国军队撤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占领区。第二，赦免全部战犯，交战双方同时释放战俘。第三，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仍属于奥斯曼帝国属地，俄国把以前夺占的比萨拉比亚归还给摩尔达维亚。第四，关于"保护权"，俄国放弃对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保护权；缔约国共同保证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不受侵犯。第五，黑海中立化；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均不得在黑海沿岸保持舰队和兵工厂。第六，关闭土耳其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1841 年的《伦敦条约》继续有效，任何国家的军舰在和平时期不能通过土耳其海峡；但保证各国商船在土耳其海峡自由通航。第七，缔约国担保，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允许，塞尔维亚不能调遣军队。第八，缔约各国组成一个监督委员会，监督占领军从多瑙河三角洲撤出。此外，《巴黎条约》还宣称，1856 年 2 月 28 日阿卜杜·麦吉德颁布的"改革法令"是受到缔约各国一致欢迎的。[④]

在这场战争中，双方总伤亡人数在 50 万以上（一说 80 万人）[⑤]，其中法军的损失最大。大多数士兵不是阵亡，而是因饥饿、营养不良、卫生

---

① Hayredin Nedim Göçen, *Osmanlı ve Avrupa*, Selis kitaplar, İstanbul, 2008, s. 71.

② Hayredin Nedim Göçen, *Osmanlı ve Avrupa*, Selis kitaplar, İstanbul, 2008, s. 15.

③ 全名：*The Treaty of Peace (Paris) Terminating the Crimean War, with Pertinent Annexed Conventions and a Treaty of Guarantee*（《关于终止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约，附相关会议文件及一个保证条约》）。国际关系史资料中称为《法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和平友好总条约》。

④ 在各种国际关系资料中，关于《巴黎条约》的主要内容大体是一致的，此处依据国际关系史资料，并对照土耳其通史做了补充，补充部分参见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Ⅳ, *Osmanlı Dönemi (1730—1861)*,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 Ankara, 1992, s. 285 - 286。

⑤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162.

条件差和野战医院的条件不好而病死。其实，当时俄国提高了医疗服务，联军有医疗救助，如英国的护士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斯库塔里（Scutari）组建了医疗救护站，俄国医生皮罗古夫（Pirogov）在塞瓦斯托波尔建立医疗救护站，没有这些医护人员，伤亡会更加严重。[①]

三　克里米亚战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克里米亚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国际关系史长期以来关注和研究的话题，这次战争对俄国的打击，也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大问题。然而，这场战争对奥斯曼帝国有何影响，在国际关系史中却是很少提及的。

自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多次遭受俄国的侵略，两国之间较大规模的战争就有 10 余次。俄国女皇索菲亚统治时期于 1687 年和 1689 年向克里米亚发动过两次战争。彼得一世时期于 1695—1711 年多次进攻亚速要塞、刻赤海峡和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叶卡特琳娜时期于 1768—1774 年、1787—1792 年两次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迫使奥斯曼帝国先后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雅西和约》。1806—1812 年俄国侵占多瑙河公国，并打败奥斯曼帝国军队，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尼古拉一世上台后于 1828—1829 年发动战争，迫使奥斯曼帝国签订《亚德里亚堡和约》，取得不少特权。克里米亚战争是进入 19 世纪之后两国之间发生的第三次战争，不仅范围广（西起波罗的海、东到高加索），而且卷入欧洲几个大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在为了控制黑海、争夺黑海而发生的历次战争中，规模最大、伤亡最重的就是这场克里米亚战争。[②]

总体来看，克里米亚战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是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中来之不易的一次大胜利，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俄国南下侵略的步伐。

自 17 世纪以来，在抵制俄国入侵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大都以失败告终，仅有 1711 年打败过俄国军队，迫使俄国放弃已经占领的亚速要塞。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162.

②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161.

自那以后的 142 年里（1712—1853 年）奥斯曼帝国屡战屡败，无力阻挡俄军的铁骑，失去了亚速要塞、克里米亚半岛、格鲁吉亚等地区。克里米亚战争算是一雪前耻，彻底迫使俄国放弃了长期纠缠不清的“对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

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迫使俄国放弃了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俄国在奥斯曼帝国获取的特权。① 俄国被迫放弃对卡尔斯、多瑙河三角洲、比萨拉比亚的控制权，同意拆除在黑海沿岸建立的军事堡垒，黑海又回归奥斯曼帝国。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使得俄军一个多世纪为之奋斗的南下占领黑海的计划受挫，进而减缓了奥斯曼帝国北部边境的军事压力。

第二，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为奥斯曼帝国赢得一个推行改革的有利环境。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总是被战争打断。在马哈茂德二世推行改革时，两次与俄国作战（1806—1812 年，1828—1829 年），两次与埃及作战（1831—1832 年，1839 年）。1839 年坦齐马特的第一道法令颁布时，正在与埃及的军队打仗，1853 年又与俄国作战。改革事业总是不能顺利开展。克里米亚战场的战事结束后，1856 年 2 月 18 日，阿卜杜·麦吉德素丹就颁布第二道改革法令。由于战争结束，政局稳定，此后一些新的改革措施付诸实践，如 1857—1861 年，先后颁布新的土地法、安全法，建立林业学校、政治专业学校。1861 年阿卜杜·阿齐兹素丹继位后改革继续进行，行政管理、税收、法律、财政、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都有成效，西化改革进入新阶段。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终结”，但另一些学者则把这场战争看作引起奥斯曼帝国国内改革的推动力。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十几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议会建立、1876 年颁布奥斯曼帝国第一部宪法。②

第三，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政府被迫两次向欧洲举借外债。

奥斯曼帝国政府以前并没有多少外债，但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政府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163.

②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 16.

开支大于收入，甚至连文职人员的薪水都难以支付。遇到战争，不得不举借外债。1854 年是第一次大规模举借外债。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危机”的概念，有人说，土耳其语中的“危机”（kriz）一词就产生于这一时期。[①] 战争结束后，奥斯曼政府忙着推行新的改革，旧债未能清偿，又不得不举借新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虽然这次战争使俄国元气大伤，短期内不能对奥斯曼帝国造成威胁，但英国、法国、奥地利加强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控制。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从表面上看国际地位提高了，可以参与欧洲公法，从英、法的支持中也获得了好处。但是，英国和法国的势力渗透到海峡地区。尤其是英国，一直打着维护奥斯曼土耳其人利益的幌子，“帮助”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俄国，实则是为了自己在近东的利益。通过《巴黎条约》将黑海中立化，使俄国 20 年没有侵犯奥斯曼帝国领土，客观上维护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但英国的收益更大，因为这确保了英国通往东方运输线的安全。在奥斯曼帝国改革期间，奥斯曼帝国聘请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主要是法国人。依赖法国的技术，就需要法国人“指导”，法国渐渐影响了奥斯曼政府。

简言之，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获得胜利，不仅打击了俄国的侵略野心，阻止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俄国南下侵吞奥斯曼帝国的步伐，而且为奥斯曼帝国国内推行西化改革赢得了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由于奥斯曼帝国自身财政空虚，为了应付战争不得不举借外债，这些外债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负担，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受到英、法等国的经济控制。

第二节　巴尔干问题引起“近东危机”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其范围北至多瑙河平原，东至黑海，南至爱琴海，西至亚得里亚海。这里居住着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巴尔干地区自公元 14 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接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这一地区民族成分复杂，人口最多的是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包括五个民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东部的斯洛文尼亚人，亚得里亚海东南部的克罗地亚人，再往东是塞尔维亚人，往南是马其

① Bilal Eryılmaz, *Tanzimat ve Yönetimmde Modernleşme*, işaret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6, s. 250.

顿人，还有黑海沿岸的保加利亚人，他们分布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巴尔干中部广阔地带。[①] 居住在巴尔干半岛最南端的希腊人，占据的就是古希腊人的居住地。15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到达这里，散居于希腊地区。还有 16—18 世纪从西班牙、葡萄牙、俄国和波兰逃到这里的犹太人，奥斯曼帝国允许他们在此居住，犹太人后来散居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等地。吉普赛人是 15 世纪到达巴尔干地区的，数量不多，居住在罗马尼亚等地。巴尔干不同区域还有俄国人、马扎尔人、茨冈人等外国侨民。巴尔干地区不仅民族成分多，而且是许多民族混杂居住——例如塞尔维亚人聚居的地方还有波斯尼亚人和门得内格罗人，而塞尔维亚族人也散居在巴尔干其他地方；又如马其顿地区有不同信仰的保加利亚人，还有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巴尔干民族以信仰东正教为主，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信仰罗马天主教，巴尔干西北地区有信仰新教的团体。东部色雷斯主要是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中有 70% 是穆斯林，波斯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也有为数不多的穆斯林。[②] 保加利亚人一部分信奉基督教，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

一　巴尔干民族起义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农民起义是巴尔干问题的导火线。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在巴尔干地区的中西部，是奥斯曼帝国的西北边陲，也是帝国境内相对落后的省份。这里既是山区，又是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奥斯曼政府对这里控制不严，治理不善。穆斯林地主和地方势力近乎独立，这里处于半自治状态。在穆罕默德二世集权统治时代，他们有过多次反抗。到 19 世纪 50 年代，奥斯曼政府对这里的管理比以前有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1861—1862 年，波斯尼亚发生严重叛乱，并得到塞尔维亚的支持。19 世纪 60—70 年代波、黑两省遇到经济困难，政府仍然增加赋税，在耕作条件极差的地区，农民对奥斯曼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增长，终于引起 1875 年 7 月的起义，即奥斯曼政府所说的“叛乱”。这次叛乱主要是基督教农民

---

① Philip Mattar,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Vol. 1 - 3, Macmillan Reference, U. S. A., 2004, p. 383.

② Philip Mattar,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4, p. 383.

反对统治他们的穆斯林地主，唤起了斯拉夫世界的同情。[①]

1875 年 7 月的农民起义在黑塞哥维纳的一个村镇发生。8 月，起义从黑塞哥维纳省向北蔓延，席卷波斯尼亚省。起义者利用有利地形，在崇山峻岭和密林深谷中作战，不断袭击政府的地方武装，出没于门得内格罗、塞尔维亚以及奥匈帝国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接壤的边界地区，当地驻军试图镇压起义军，但未能控制局面。欧洲各国驻巴尔干的领事和外国游历者对这一事件有报道，对起义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推测，较为可信的说法是，起义是由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基督教农民无法忍受伊斯兰地主的歧视和压迫，揭竿而起，很快得到其他斯拉夫势力的支持。[②]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起义，首先得到近邻的门得内格罗和塞尔维亚的同情和支持。门得内格罗的首脑人物尼古拉秘密支持叛乱者。塞尔维亚不受臣民拥戴的米兰大公没有表明态度，塞尔维亚首席大臣里斯提彻(Ristich) 不希望与奥斯曼政府发生战争，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也警告塞尔维亚政府不要支持叛乱者，但持续的民众抗议和国民议会的态度迫使米兰大公采取了行动。1875 年 10 月，塞尔维亚的军队与刚刚跨过边界准备镇压叛乱的奥斯曼军队发生冲突。[③] 门得内格罗因为俄国背后撑腰，从 1876 年 1 月开始一直公开支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起义。

1876 年 4 月底，保加利亚爆发了起义。保加利亚人的这次起义是有准备的，并且得到了塞尔维亚的支持。奥斯曼政府发现了保加利亚人的意图，起义者被迫提前行动，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起义者遭到奥斯曼政府军队残酷的镇压，大约 60 个村庄被毁，1.2 万—1.5 万人被屠杀。[④] "保加利亚大屠杀"这个醒目标题出现在西方报纸上，例如英国国内就强烈抗议和谴责奥斯曼帝国的血腥镇压。凡是反映保加利亚人遭受屠杀的书，在英国很畅销，英国国内亲奥斯曼帝国的人物受到国内民众的批评。英国民众批评英国政府是大屠杀的同谋者。[⑤]

---

①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p. 178 - 179.

② 朱瀛泉：《近东危机和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 页。

③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 179.

④ 一种说法是："到 6 月 30 日，估计被毁坏的村庄达 60 个，不久官方报道说，估计有 1.2 万人被杀害。" 见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17。

⑤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 184.

其实，早在1875年春天就有谣言说在保加利亚当权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流亡到俄国和鲁米利亚的一些革命者建立组织，渲染说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这个帝国政治环境是多么恐怖，多么不公正，因而出现煽动“实行自治”的言论。[①] 1876年4月“叛乱”真的发生了，奥斯曼帝国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发泄不满的民众，便采取杀戮的残酷手段。

从1875年7月起义开始，到1876年4月保加利亚起义，巴尔干地区许多民族已经卷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行动，奥斯曼政府难以平息各地的反抗，欧洲大国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而强烈关注巴尔干局势。局部的起义逐渐蔓延，变为“巴尔干问题”，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演化为国际关系史上的“近东危机”。

二　“近东危机”及其演变

假如巴尔干民族的反抗和奥斯曼政府军的镇压没有外国参与，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不外乎是一次“内乱”。问题是，从起义刚刚发生，就引起了欧洲大国的关注，甚至使欧洲大国的外交官们“感到震惊”，这次在巴尔干发生的事件很快变成国际事件。从当时留下来的资料看，欧洲国家的外交官比奥斯曼帝国的官员还着急，处理巴尔干问题比奥斯曼帝国官员还卖力。1875—1878年三年时间就产生了不少协定、照会、条约，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后人不仅能从官方文献中详细了解当时欧洲大国的外交原则和外交策略，也能找到大量由欧洲政治家和作家撰写的回忆录、著作，可以由此了解当时欧洲大国在维也纳、巴黎、柏林等城市召开多次会议，为解决近东的危机进行磋商、讨论、签署文件的细节。[②]

事后来看，在欧洲国家当中，有些国家的领导层担心巴尔干地区出乱子，有的国家领导层盼望着巴尔干地区出乱子，有的国家领导层既盼望巴尔干地区出乱子又担心乱得出格对自己不利。欧洲大国政治家们的这种“复杂心态”，始于对1821年希腊起义的态度，在1875—1878年达到极致。西方外交文献中的一连串术语“东方问题”、“近东问题”、“巴尔干问题”、“巴尔干危机”、“近东危机”，云山雾罩。看似有差异，本质上没

---

①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14.

② Hayredin Nedim Göçen, *Osmanlı ve Avrupa*, Selis kitaplar, İstanbul, 2008, s. 14.

有大区别；好像是表明一样的问题，实际上又有不同。简言之，“东方问题”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而“近东危机”是指1875—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假如把187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农民起义只看作导火线，“近东危机”就是指1876—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所谓危机，一是巴尔干地区的战火越燃越旺，不能控制；二是欧洲国家越搅越乱，越陷越深，甚至它们相互之间争斗起来，难以收场。

在“近东危机”中，反应最敏捷、花费力气最大的是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官。

在巴尔干起义发生之前，俄国亚历山大二世、德国威廉一世和奥匈帝国的弗兰兹·约瑟夫举行会谈，并于1873年6月签订协议，建立军事同盟——三皇同盟。奇妙的是，这三国在许多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唯独在对待巴尔干的问题上态度大不相同，一提到“巴尔干事务”三国关系就紧张。俄国长期以来鼓动并帮助巴尔干公国自治甚至独立，借此削弱奥斯曼帝国，同时极力抵制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扩张。[①] 奥匈帝国反对巴尔干各民族建立独立国家，因为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符合奥匈帝国的利益。德国希望同时与俄国和奥匈帝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因为巴尔干争端使德国陷入不知该支持谁的两难处境。凑巧的是，继希腊起义之后，巴尔干地区时隔半世纪又发生了危机。

（一）俄国和奥匈帝国针对巴尔干问题的外交活动

巴尔干起义发生后，俄国和奥匈帝国最先做出反应。俄国国内有政策分歧，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伊格纳切夫（Ignatiev）认为奥斯曼帝国会在斯拉夫人的反抗中崩溃，主张支持巴尔干民族的反抗。保守的外交家哥尔查科夫认为巴尔干问题应该通过国际会议协商解决，俄国的注意力应集中在土耳其海峡，而不是浪费在支持落后的山区斯拉夫人身上。哥尔查科夫的谨慎态度得到国内许多大臣的支持。不过，固执的伊格纳切夫打算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叛乱”。1875年7月，伊格纳切夫说服奥斯曼素丹，素丹愿意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达成一项秘密协定，至于协议的内容，则由伊格纳切夫负责。哥尔查科夫则准备与奥地利合作。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拒绝接受伊格纳切夫提议，但越来越多的俄国民众对巴

---

①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p. 179 - 180.

尔干起义者持同情态度。[①]俄国当局也有人提出“在奥斯曼帝国宗主权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两省自治”的方案。

奥匈帝国国内的军界人士曾鼓动皇帝选择合适的机会去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但大部分官员不赞成武装占领。当巴尔干地区的起义真的发生时，外交大臣安德拉西却反对立即派出军队，并于这年的10月16日指出，俄国的“在奥斯曼帝国宗主权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两省自治”的方案不可行。理由是，除了宗教信仰的差异之外，一旦同意这两个省份自治的要求，保加利亚也会效仿，还可能刺激希腊、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反抗奥斯曼帝国。总之，奥匈帝国和俄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不同。但是，不能听任巴尔干的战乱延续。第一个外交上的努力，就是由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和俄国驻奥匈帝国大使诺维科夫在维也纳起草的一份“安德拉西照会”。1875年12月30日，俄国和奥匈帝国把这份照会告知欧洲各国。照会的内容有：建议奥斯曼帝国给予两个叛乱省份宗教自由；废除在当地的包税制，帮助该地区的农民从封建主那里买回土地，以减少他们由于对土地的不满而引发的叛乱，奥斯曼素丹应建立一个由穆斯林和基督徒混合的委员会推行在两省的改革，并确信会正式实施这些变革。[②]

奥斯曼帝国也向各国转达了10月2日和12月12日曾颁布的两项法令，并保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改革顺利进行。尽管英国犹豫不决，拒绝在奥斯曼帝国的文件上签字，但“安德拉西照会”得到了其他欧洲大国的承认。1876年2月13日，英国政府勉强同意在奥斯曼帝国提交的文件上签字，并要求对文件做一些修改。几天之后，“安德拉西照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宣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基督徒已经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信任，所以起义者拒绝停战。实际上，俄国和奥匈帝国对奥斯曼帝国改革的诚意和能力也不抱太大希望。安德拉西等人公布的这个“照会”，仅仅是权宜之计。

1876年形势变化，保加利亚起义被镇压，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的民众反抗奥斯曼政府的情绪更激烈，塞尔维亚与奥斯曼帝国之间随时发生

---

①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p. 181 - 182.

②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p. 182 - 183.

武装冲突。奥匈帝国和俄国的敌对状态也较为明显。为了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安德拉西和哥尔查科夫在柏林会晤，俄、奥（匈）、德三国就发生起义的两省实现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5 月 12 日（一说 13 日）公布了一份《柏林备忘录》(Berlin Memorandumu)。备忘录中要求奥斯曼素丹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奥斯曼帝国为安置回到家园的难民提供物质保障，帮助重建他们在战火中被毁坏的房屋和教堂。[①] 第二，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这种重建工作。[②] 第三，为防止再发生冲突，除特殊地区的军队外，奥斯曼军队应撤出起义地区。[③] 第四，授权基督教徒保持武装。[④] 第五，授权奥斯曼帝国的外国顾问和代表行使对奥斯曼行省改革的监督权。[⑤] 此外，备忘录还要求停火两个月，并宣布如果两个月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欧洲大国将会采取有效手段阻止事态的发展。《柏林备忘录》还提到，假如奥斯曼帝国崩溃，将同意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部分地区，同意俄国恢复在比萨拉比亚南部的统治。备忘录被送往巴黎、罗马和伦敦，法国和意大利很快接受了《柏林备忘录》，而英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min Disraeli）不愿接受。[⑥] 关键是，安德拉西和哥尔查科夫的和平努力对塞尔维亚未发生任何影响。6 月 30 日塞尔维亚决定向奥斯曼政府宣战。7 月 2 日“塞土战争”正式爆发，不久得到门得内格罗的军事支持。

战争刚刚爆发，俄国和奥匈帝国立即就战争可能的结果达成一项秘密协定。1876 年 7 月 8 日，哥尔查科夫和安德拉西随两国皇帝在波希米亚的赖希斯塔特（Reichstadt）举行了秘密会谈。这次谈判结束后既没有签署正式公约，也没有签订议定书。达成的协议由双方根据自己的记录单独加以说明。一份记录是根据安德拉西口授写成的，另一份记录是根据哥尔查科夫口授写成的。这两份记录，成了记载赖希斯塔特谈判结果的仅有的

---

① Enver Ziya Karal, *Osmanlı Tarihi*, Vol. Ⅶ,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 1995, s. 99 - 100.

② S. P. 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y*,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p. 131.

③ 这一条款土耳其文献和英文文献有出入，此处依据：Enver Ziya Karal, *Osmanlı Tarihi*, Vol. Ⅶ, s. 99 - 100。

④ 这一条款在土耳其文献和英文文献中是一致的。

⑤ S. P. 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p. 131.

⑥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 183.

文件。后来的国际关系史把这两份记录称作“赖希斯塔特协定”。

这个协定的大体内容是：塞土当前交战期间俄国和奥匈帝国遵循“不干涉原则”。如果奥斯曼军队获胜，俄国和奥匈帝国会要求塞尔维亚恢复其战前的版图，也可能要求承认门得内格罗为一个独立的州。即使奥斯曼军队获胜，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将会根据哥尔查科夫给沙皇的提议，或者根据“安德拉西照会”和《柏林备忘录》，得到“自治”的基础。如果奥斯曼军队失败，俄国将恢复在南部比萨拉比亚的统治，同时，奥匈帝国将不会反对俄国获得巴统和邻近奥斯曼帝国边境的亚洲领土。奥匈帝国的打算是获得新帕扎尔州，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大部分土地。[①] 如果塞尔维亚获胜，“两大国对成立斯拉夫国家一事将不予协助”。尽管各自打着算盘，但俄国政府仍然采取与欧洲各国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与奥匈帝国合作。

就在奥匈和俄国做外交上的努力，而巴尔干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几个月里，奥斯曼帝国发生了政权更迭。奥斯曼素丹阿卜杜·阿齐兹于5月30日被废黜，穆拉德五世被推上奥斯曼素丹宝座，8月31日穆拉德五世被废黜，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继位。

同情巴尔干起义的俄国人向塞尔维亚输送物资，也有俄国志愿者加入塞尔维亚军队，给塞尔维亚人以鼓舞。但这些帮助对塞尔维亚的作用很有限。塞尔维亚的兵力不足以对抗奥斯曼帝国军队，门得内格罗的协助也未减轻塞尔维亚军事上的压力。8月中旬，塞尔维亚政府不得不接受停火建议。9月15日奥斯曼政府同意停火。不久又开战，10月底，奥斯曼军队向塞尔维亚挺进。塞尔维亚在军事上的失败，促使俄国考虑以武力打击奥斯曼帝国。俄国人的理由是，不仅仅为了保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人，也是保护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居民。[②]

（二）从君士坦丁堡会议到《伦敦议定书》

巴尔干问题导致的危机，到1876年10月仍没有发生逆转的迹象。而在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德国、英国到底是怎样的态度，采取了哪些措施？

---

①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p. 185 - 186.

②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 187.

德国首相俾斯麦不愿看到俄国和奥匈帝国产生严重的冲突，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缓和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矛盾，同时满足欧洲大国对巴尔干的野心。如果这样做，只能坐视奥斯曼帝国分裂。因为，奥匈帝国将会获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并支配巴尔干西部国家；俄国将会控制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并支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英国将会占领埃及，也许还会占领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的一些岛屿；法国将会在叙利亚取得自己的利益作为补偿。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德国首相俾斯麦在这次危机发生时积极奔走。在 1876 年年初，俾斯麦努力和英国政府达成一致。迪斯雷利不喜欢奥斯曼土耳其人，但他尽可能防止奥斯曼帝国崩溃，他也提到奥斯曼帝国的分裂会不可避免。

德国支持俄国但态度不积极。俄国明确提出，俄国军队进攻波兰，需要德国的支持，倘若与奥匈帝国作战，德国应保持中立。对于这样一个讨厌的要求，德国首相俾斯麦努力拖延，不给予明确答复。但是俄国人对奥斯曼帝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迹象明显，德国首相俾斯麦斡旋的余地缩小。德国不希望看到俄国力量削弱，也不希望奥匈帝国受到威胁。俾斯麦不愿意偏袒一方反对另一方，俄国沙皇和哥尔查科夫对德国非常失望。

就在塞尔维亚与奥斯曼政府开战期间，俄国出现规模空前的“泛斯拉夫”群众性运动。莫斯科等地的泛斯拉夫委员会为塞尔维亚募捐资金达 350 万卢布，奔赴塞尔维亚前线，在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指挥下战斗的志愿军将近有 3000 人。沙皇政府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姑息的态度。[①] 面对一触即发的俄土战争，欧洲几个大国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以避免大的战争发生。

1876 年 10 月 15 日，俄皇亚历山大派伊格纳切夫去君士坦丁堡，与其他大国达成以下条款：第一，双方停火六周；第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和保加利亚自治；第三，欧洲保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和保加利亚自治的权利。奥斯曼帝国一再拖延，不给予答复，并尽量在塞尔维亚扩大战果，到 10 月 30 日已完全打开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大门。伊格纳切夫得到消息后立即代表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 48 小时以内立即停战，否则俄

---

① 朱瀛泉：《近东危机和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 页。

国将会使用军事手段。奥斯曼帝国被迫屈服，11 月 2 日正式停火。[1]

1876 年 12 月至 1877 年 1 月，俄国、德国、奥匈帝国、英国的大使聚集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使级会议，力图再次为和平解决危机寻找出路。

会议最后的结果如何，取决于两点：一、是否能够就改善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的地位和命运达成统一的解决方案；二、这个方案是否能够得到已经在塞土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奥斯曼帝国的同意。也就是说，外交官们的努力一开始注定有可能变成空谈。

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大使们讨论的内容主要有：第一，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联合成一个省，同意由奥斯曼帝国任命的总督管理。第二，允许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获得小部分领土（不包括获得出海口）。第三，保加利亚的地位问题难以处理，暂不做结论。第四，伊格纳切夫提议建立一个从黑海一直向西延伸到旧塞尔维亚并包括部分爱琴海沿岸领土的独立国家。第五，会议修改以前提出的方案，同意保加利亚南部的边界应该从亚德里亚堡伸展到莫纳斯提尔（即放弃爱琴海的出海口），并规定，新的国家应该分成东西两部分。[2]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外交大使索尔兹伯里不希望俄国在巴尔干处于支配地位。为了尽快解决危机，在预备会议上英俄两国代表索尔兹伯里和伊格纳切夫首先在保加利亚问题上达成了妥协，才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达成初步协定后，准备把方案递交给奥斯曼帝国。出乎欧洲大国意料的是，12 月 23 日早晨，就在大使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颁布新《宪法》。本来大使们费尽心思讨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徒们的地位问题，准备促使奥斯曼素丹接受改革方案，保障奥斯曼素丹治下的所有臣民的自由，召开议会，实行地方分权。可是奥斯曼帝国自己决定实行宪政了，欧洲大使们达成的协议似乎用不着了，他们的努力也白费了。其实，奥斯曼素丹不在这个时候颁布宪法，可能会拒绝大使们达成的协议，欧洲大国也没有迫使奥斯曼帝国就范的任何办法。

欧洲大国的政治家们也在期待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改革产生效果。然而，1877 年 2 月 5 日，准备推行宪政的大维齐米德哈特帕夏突然被放

---

① S. P. 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y*,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pp. 134 - 135.

② M. S. A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p. 191.

逐到布林底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维护了自己的最高权力。2 月 28 日，塞尔维亚政府与奥斯曼政府签订了“保持原状”的条约，从塞土战争的灾难中解脱出来。

在此期间，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官还私下签订条约。一份是 1877 年 1 月 15 日签订的，一份是 3 月 18 日签订的。前一份是专门条约，后一份是补充条约，合称《布达佩斯条约》。专门条约的内容是：保证在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作战时奥匈帝国保持中立。交换条件是：奥匈帝国军队有权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奥匈帝国担保不向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门得内格罗方面扩大军事行动，而俄国也不得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和门得内格罗方面扩大军事行动。不过，奥匈帝国同意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参加俄方作战。补充条约是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和设想的战后安排：奥匈帝国取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但新帕扎尔州除外(关于这块领土另立协定)；俄国收回比萨拉比亚西南部；俄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对俄国而言，有了与奥匈帝国达成的秘密条约，就可以放心地向奥斯曼帝国开战了。但俄国外交官还要与英国达成协议，还要联合欧洲大国采取一致行动。1877 年 3 月，伊格纳切夫在柏林、巴黎、伦敦和维也纳做巡回演说。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议，遣散在巴尔干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由欧洲大国监督这里的改革。他在伦敦和维也纳都感到一股让他担忧的倾向，即要求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也应该同意解散军队。3 月 31 日，俄国外交官和英国外交官以及驻伦敦其他大国的大使磋商后签订了《伦敦议定书》。3 月 31 日，议定书草案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伊格纳切夫的提议修改后的版本。即便如此，英国政府还是犹豫再三后同意签字，并有较多的保留意见。

《伦敦议定书》再次重申，欧洲大国在改善基督徒命运这一点上利益一致，要求奥斯曼帝国在和平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军队，并有效地实施已经应允的改革。英、俄外交官在附属议定书的声明中保留了各自的立场。英国外交大臣声明：英国只为普遍和平利益才签署了这个文件，如果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不能解除军队的备战状态，该议定书被视为无效。俄国驻伦敦大使舒瓦洛夫声明：奥斯曼帝国在完成与门得内格罗谈判以及接受欧洲大国劝告、执行议定书之前，可派专使前往圣彼得堡交涉有关解除军队战备状态的问题。也就是说，英国将议定书的生效取决于俄土双方是否解除战

备状态，而俄国则把自己解除战备状态取决于议定书是否被奥斯曼帝国认真执行。[1]

（三）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及结果

1877 年 4 月 9 日，《伦敦议定书》草案被奥斯曼素丹拒绝。4 月 24 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战争开始，受压迫的巴尔干民族把俄国军队看作救星，纷纷站在俄国一方。塞尔维亚再次向奥斯曼政府宣战。塞尔维亚军队在皮罗特（Pirot）打败了奥斯曼军队，米兰大公带着喜悦进驻塞尔维亚古镇尼什。所有的斯拉夫军队、俄国军队、塞尔维亚军队、马其顿军队继续前进，罗马尼亚则封锁了维丁（Vidin）。此时奥斯曼土耳其人想求和也是徒劳的。

1878 年 1 月，俄国军队在付出惨重的牺牲后，终于越过积雪齐腰的巴尔干山，如 1829 年一样再次攻入亚德里亚堡，直逼君士坦丁堡。在俄军进入罗多彼（Rhodope）的堡垒前，哥萨克人对待这里的难民就如同奥斯曼土耳其人 1876 年对待保加利亚人一样，进行残暴杀戮。由于恐惧，当地穆斯林开始逃亡。博利马科维奇（Belimarkovich）将军率领的军队在沃拉加（Vranja）取得了塞尔维亚人的又一次胜利，把公国的军队带到科索沃平原的边缘。门得内格罗军队占领了安提瓦利（Antivari）和杜奇哥罗（Dulcigno）。塞尔维亚人进入塞尔维亚旧地，门得内格罗军队则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领土，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了维丁。[2]

奥斯曼土耳其人看到大势已去，要求停火。3 月 3 日，在距君士坦丁堡只有 12 公里的小镇圣斯蒂法诺签订了俄土和平条约，史称《圣斯蒂法诺条约》。

根据《圣斯蒂法诺条约》，奥斯曼政府承认门得内格罗公国独立，门得内格罗获得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方向的两个狭长地区，其疆域扩大。奥斯曼政府承认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独立，塞尔维亚得到尼什西南部地区，罗马尼亚获得多布罗加。希腊则一无所获。条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产生“大保加利亚国”，其疆土从色萨利沿爱琴海直至多布罗加，并将整个马其顿、旧塞尔维亚以及色雷斯部分地区全部囊括其中。“大保加利亚

---

① 朱瀛泉：《近东危机和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3 页。

② William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 1801—192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pp. 376 - 377.

国”是沙皇赞许的。伊格纳切夫伪装成是替保加利亚人谋利益，义正词严地从奥斯曼帝国勒索领土，其实是为了俄国的利益。[①]若建立这样一个亲近俄国的大保加利亚，对俄国非常有利，所以俄国对《圣斯蒂法诺条约》相当满意。可是，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外出现这么一个国家，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极大的威胁，奥斯曼帝国不能接受。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前或500多年来欧洲存在过这么一个保加利亚国。条约涉及的领土划分引起各国的质疑。

第三节　大国对巴尔干事务的临时安排

由于俄国过分追求在巴尔干地区以及从黑海直达地中海的利益，而忽视了奥匈帝国和英法等国的利益，并且不现实地让保加利亚领土过于膨胀，直接触及奥匈帝国在巴尔干西部和英国在爱琴海沿岸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因此，《圣斯蒂法诺条约》缔结后，欧洲大国纷纷表示反对。英国和奥匈帝国反对俄国在巴尔干扩大势力，不同意在巴尔干地区建立大保加利亚国；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德拉西提议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审议和修改这项条约，英国赞同安德拉西的提议。俄国刚结束战争，内外交困，无力再战，只能同意参加会议。

1878年6月13日，欧洲大国的外交官再次聚首柏林，召开会议讨论所谓的“东方问题”[②]，这次持续多日的会议即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德国为东道主，德国首相俾斯麦是会议的主席。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德国、俄国、英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或政府代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希腊等国被邀派代表参加，但没有表决权。会上争论的焦点：对保加利亚的处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归属，俄国在南高加索获得的领土问题。会议期间，各大国的代表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形成对一些争议性问题的具体建议，许多细节问题也得到了讨论和磋商。[③] 俄国在这次会议上处于孤立地位，被迫做出大的让步。经过一个月的会谈、协调甚至争吵，7月13

---

① *The Balkan War Drama, by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pp. 4 - 5.

② “东方问题”土耳其文为 *Şark Meselesi*，英文为 the Eastern Question。

③ Hayredin Nedim Göçen, *Osmanlı ve Avrupa*, Selis kitaplar, İstanbul, 2008, s. 268.

日签订了《柏林条约》。[①]

《柏林条约》共计64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保加利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素丹宗主权下自治的公国，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保加利亚的大公（或亲王）由居民自由选举，经大国同意，奥斯曼政府予以确认。[②] 保加利亚公国的领土限于巴尔干山脉以北地区。

第二，在巴尔干山脉以南划出自治的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允许建立自治机构，总督应为基督教徒，仍由奥斯曼帝国统治。

第三，马其顿地区仍属奥斯曼帝国管辖。

第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仍属奥斯曼帝国，但奥匈帝国有权驻军，有权行使管理。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之间的走廊新帕扎尔州由奥匈帝国管辖。

第五，承认塞尔维亚独立。[③] 塞尔维亚得到尼什、皮罗特、弗拉涅和托普利察四个地区。塞尔维亚的领土扩展到皮罗特和弗拉涅地区（压缩了保加利亚国的领土）。

第六，承认门得内格罗的独立。[④] 门得内格罗得到尼克西奇、波德戈里查（铁托格勒）和科拉欣、巴尔、乌尔奇尼等市镇，并拥有一个出海口。

第七，罗马尼亚获得独立，但必须分担奥斯曼帝国的债务；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俄国，以收回北多布罗加作为"补偿"。[⑤]

第八，俄国兼并巴统、阿达罕、卡尔斯；巴统宣布为自由港，成为商业港口。

第九，阿尔巴尼亚仍属奥斯曼帝国管辖，奥斯曼帝国必须保证改善其境内基督徒的状况，并同希腊谈判修改与希腊之间的边界。

第十，希腊获得色萨利部分地区（色萨利于1881年完全归希腊）。[⑥]

---

① 土耳其文为 *Berlin Antlaşması*，英文为 Treaty of Berlin。

② 1885年保加利亚与东鲁米利亚合并，并在1908年获得独立。

③ 1882年塞尔维亚王国建立。

④ 1910年门得内格罗建立王国。

⑤ 1881年罗马尼亚王国建立。

⑥ 以上《柏林条约》的10项主要内容，主要依据《1871—1898年欧洲国际关系》译文，引自《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王绳祖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164页；也参考了英文文献汇编：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 Vol. Ⅰ, 1535—191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413 - 414.

根据《柏林条约》，马其顿、旧塞尔维亚、色雷斯的一部分和亚德里安堡都回到了奥斯曼帝国，从爱琴海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仍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诺夫—巴扎桑贾克的军事和商业要道驻扎奥匈帝国的军队，奥匈帝国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对萨洛尼卡出海口的控制。[①]保加利亚损失最大，仅留下一个空名称。在这个条约中有一条（第23条）规定，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省份包括马其顿在内要推行改革，改善对少数民族和教派的待遇，但这一条并没有被执行。[②] 马其顿后来成为巴尔干地区争夺的中心地区。

英国在这次柏林会议之前已经获得好处，于1878年6月4日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塞浦路斯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英国答应以武力保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答应实行改革，保证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的利益，同意把塞浦路斯岛让予英国占领和管理，作为英国履行条约义务的前提条件。精明的英国外交官认为，选定塞浦路斯对英国控制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附近地区非常有利，而最大的好处还在于，英国获取塞浦路斯不会"引起欧洲强国的嫉妒"，不会"打扰欧洲的和平"。[③]

《柏林条约》满足了欧洲大国削弱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势力的愿望，显然达到了欧洲大国实现自己利益的目标，也表露出在这一过程中主宰巴尔干小国命运的野心。欧洲大国是巴尔干危机中的得利者，而《柏林条约》改变了巴尔干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俄国对《柏林条约》很恼火，又无能为力，认为是欧洲大国联合跟它作对。巴尔干各国的独立虽然得到承认和受到大国的保护，但它们对条约并不满意。罗马尼亚对失去比萨拉比亚耿耿于怀，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对奥匈帝国产生愤恨。保加利亚则感到失望。

这次"近东危机"以《柏林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算是对巴尔干问题有了一个暂时的安排。但《柏林条约》不仅未能解决巴尔干的民族问题，反而激化了这一地区固有的矛盾，给以后更大的冲突埋下了祸根。只要民族矛盾没有消除，强权势力依然存在，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还会增

---

① S. P. 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y*,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pp. 143 - 144.

② *The Balkan War Drama, by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p. 6.

③ 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 Vol. Ⅰ, 1535—191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11.

生。仅仅在七年后（1885 年），保加利亚又出现危机，东鲁米利亚赶走奥斯曼帝国的行政长官，自行宣布和保加利亚公国合并。1887 年英、意、奥匈三国签订了两个《地中海协定》，声称“共同维持近东现状和保护海峡，确认奥斯曼政府对保加利亚的宗主权”。随着巴尔干局势的发展，俄国和奥匈帝国两个主要在巴尔干地区争夺的国家于 1897 年 5 月 8—17 日缔结了关于巴尔干现状的协定，巴尔干问题暂时“冻结”。

每个强国在奥斯曼帝国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关注的地区也有侧重。不过，只要列强之间没有严重地侵犯相互的利益和关注的地区，1/4 世纪以来大动干戈的事就可以避免。不管是由于大国的行为，还是由于巴尔干民族的行动，或由于奥斯曼帝国或其属地统治者的行为，当侵犯利益的事发生时，近东的危机就会出现。[①] 既然列强无法就奥斯曼帝国崩溃时如何瓜分其遗产达成一致，既然它们不想放弃在近东追逐自己利益的机会，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和现状，避免东方问题发生新危机，也就在习惯上成了大国的选择。

当然，巴尔干问题的产生并酿成危机，还有深刻的内因。首先，巴尔干地区是多民族混合居住的地区（前文已说明），民族问题复杂。其次，巴尔干半岛有着迥异的文化渊源。这里曾受希腊、罗马、拜占庭、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东罗马和西罗马之间分裂的界线正好经过巴尔干地区（大致是从今斯库台到贝尔格莱德或以萨格勒布为界），形成了“东部文化区”和“西部文化区”。其实还夹杂着中欧文化和“巴尔干山地文化”，文化观念差异较大。其三，巴尔干各国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这成为该地区民族争端的诱发因素。巴尔干民族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不满的时候，利用宗教问题制造矛盾，引发冲突和斗争。其四，巴尔干公国之间的领土争议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之前，这里既出现过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也出现众国割据局面，如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王国，有的存在时间长，有的昙花一现，同一块领土在不同时期就分属不同的王国统治。

奥斯曼帝国处于强势时，这里的小国不敢轻易反叛，弱小民族也不敢奢望独立，但 19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衰弱不堪，于是巴尔干国家不论其面

---

①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ank Cass, London, 1996, p. 1.

积大小和人口多寡，也不论实力强弱，都想借奥斯曼帝国衰败之机扩大自己的版图，建立巴尔干地区性大国。况且，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立运动，又会与巴尔干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要求发生冲突，局部争端甚至战争就不可避免。

第七章　帝国北非属地的丧失

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面临的问题很多，属国和行省掀起反抗统治的斗争，纷纷要求独立。先是希腊起义，后是两次埃土战争。埃土战争本是奥斯曼政府与“闹独立”的埃及行省的战争，但欧洲列强极力插手，最后既打垮了埃及，也削弱了奥斯曼帝国。19世纪70—8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黑塞哥维纳、保加利亚等属国起义，最后在列强的干预和操纵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奥斯曼帝国穷于应付。就在奥斯曼帝国当政者被巴尔干问题所困扰时，北非属地的脱离趋势也让他们非常忧虑。苏伊士运河问题引起的后果未曾消除，法国扩大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并占领突尼斯，英国吞并埃及行省，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北非属地大片丧失，只剩下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

第一节　苏伊士运河问题始末

苏伊士运河问题是由运河开凿引发的，但其影响却远远超出航运问题本身。

在苏伊士地峡开凿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连接起来的想法并不新鲜。据说古埃及法老曾尝试凿通运河，而中世纪威尼斯人也曾研究穿过苏伊士地峡的可行性，产生过开挖运河的计划。统治范围囊括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则一直对这一类计划抱有敌意，怀疑欧洲人以友好通商为借口是为达到政治渗透的目的。[①] 不管开凿运河的设想有多么早，真正把构想变成现实的是19世纪的法国人。

---

① Benno Avra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ez Canal Status, from* 1869 *to* 1956, *a Historic-Juridical Study*, Librairie E. Droz, Geneva, 1958, p. 23.

法国人最初的实地考察，是在法国军队入侵埃及期间。拿破仑进入埃及后，随军到埃及的工程师勒佩尔（Le Pe're）在苏伊士附近进行测量和勘探（但错误估计了红海和地中海的水位），提出直通红海和地中海的运河不可行，主张疏浚古运河（尼罗河至红海）。拿破仑 1799 年底就离开埃及，而法国军队在埃及只坚守了三年，勒佩尔计划最终搁浅。1829—1835 年，英国军官韦格霍恩从亚历山大港经苏伊士南下红海进行考察。几乎同时，法国宗教团体“圣西门会”到达埃及，以传教作掩护暗自进行开凿运河的考察。1846 年法国“圣西门会”还邀请英法等国的工程师组成“苏伊士运河研究会”，讨论运河开凿的技术上的问题和经费问题。[①] 法国人几十年里多次实地考察，也提出过多种方案，由于英国人从中作梗，计划未能付诸实践。直到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1805—1894 年）着手运河开凿计划，才使千年梦想得以变成现实。

莱塞普出身于外交官世家，他的父亲、叔叔都是法国外交界享有声望的人物，参与过许多重大外交事务。莱塞普 20 岁就被派到法国驻里斯本的领事馆，在他叔叔巴泰勒米·德·莱塞普（Barthélemy de Lesseps）手下任职，开始了外交官生涯。[②] 1832 年，莱塞普作为驻亚历山大的副领事第一次到埃及。在去埃及的途中，他才从书本上了解到前人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设想，其中就包括勒佩尔的考察报告。从此他下决心对这项工程进行研究。1849 年莱塞普退出外交界，花费时间专门研究开凿运河的可行性问题。

莱塞普能够实现他的计划，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莱塞普个人不寻常的努力，二是赛义德 1854 年成为埃及总督，同意支持莱塞普开凿运河。此前，莱塞普于 1852 年把自己拟定的运河开凿计划呈递给埃及总督阿巴斯，没有被采纳；呈递给奥斯曼帝国的当政者也没有被采纳。1854 年赛义德继任埃及总督，昔日与赛义德保持友谊的莱塞普听到消息，急忙写信给赛义德。得到赛义德的邀请后，莱塞普于 11 月 7 日到达埃及。[③]

---

①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4—125 页。

② Charles W. Hallberg, *The Sue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1, p. 115.

③ Charles W. Hallberg, *The Sue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1, p. 117.

莱塞普描绘苏伊士运河开凿后对埃及的好处，说服赛义德同意开凿运河。1854 年 11 月 30 日，赛义德给予莱塞普特许权，第一份特许合同签署，授权莱塞普建立公司，开凿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根据特许合同的规定，埃及政府有权赞成或否决公司成立过程中任何影响公司策略的变动；埃及政府同意提名公司的负责人。“这是埃及统治者给予私人公司的特许合同，不涉及任何国际义务，也不构成一项国际性的法令，事实上，当时没有奥斯曼政府的同意埃及无权签订任何国际性的协定或条款。”[①]

此后英国方面不断设置障碍，试图阻止法国人开凿运河。英国不愿看到苏伊士航线开通给其他欧洲国家带来便利，使其他国家有能力在印度及远东与英国竞争。[②] 也就是说，英国宁可绕非洲南端航行，也不愿在自己得到航运便利的同时便利他国，给自己的优势地位带来挑战。英国这一时期的外交，一方面为了印度殖民地的利益而支持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阻止穆罕默德·阿里向叙利亚等地扩张（当穆罕默德·阿里挑战奥斯曼素丹权威时，英国打压穆罕默德·阿里）。另一方面，英国的企业把铁路、公路修筑技术带给埃及，这就引起与法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莱塞普从赛义德那里取得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特权，使英国人感到自己外交上的失败。[③] 不过，在英国人看来，只要运河方案尚在研究中，关于运河的外交磋商正在进行中，英国就有办法阻止法国人开凿运河，就有机会给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反对奥斯曼素丹批准埃及总督赛义德的运河协定，也可以想办法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抵制埃及的公司。法国政府对运河计划是满意的，但没有给予莱塞普官方的支持。奥地利政府则倾向于赞成莱塞普获得特许权，并给予积极的支持。

莱塞普尽管取得了特许权，但还不能开始他的运河工程，他必须从奥斯曼素丹那里得到特许权。1855 年 2 月莱塞普来到伊斯坦布尔，为得到奥斯曼素丹的许可权而奔走。赛义德帮助他进行联络，找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雷希德帕夏，但雷希德帕夏受制于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拉福德·雷

---

① Benno Avra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ez Canal Status, from 1869 to 1956, a Historic-Juridical Study*, Librairie E. Droz, Geneva, 1958, pp. 23 - 24.

② Benno Avra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ez Canal Status, from 1869 to 1956, a Historic-Juridical Study*, Librairie E. Droz, Geneva, 1958, p. 27.

③ A. Harry Gailey, *History of Africa, from 1800 to present*,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2, p. 93.

德克里夫（Stratford Redcliffe）爵士。关键是，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在进行，英国和法国正在联合对付俄国，苏伊士运河特许合同的确让英国人大为恼火，但不便于公开反对，只能想办法怂恿奥斯曼帝国拒绝批准这一计划。战争在持续，要让奥斯曼帝国支持这样一项工程，本来可能性不大，更何况英国又持反对态度，从中作梗。不过，莱塞普的努力不是徒劳的，至少有两个收获：一是说服了雷希德帕夏，即使不支持开凿运河也可以修筑铁路；二是清楚得到许可权这件事难办的根源，一旦弄清楚，他可以从英国大使那里想办法。当然，莱塞普会见斯特拉福德·雷德克里夫大使，并没有使事情立刻出现转机。奥斯曼帝国进退维谷，既不想因同意运河计划而得罪英国，也不想因拒绝莱塞普的请求而得罪法国。此时法国政府放下“不介入”的姿态，准备通过外交手段积极促成运河计划的实施。[①]

奇妙的是，奥斯曼帝国越反对，赛义德越是对莱塞普的说辞深信不疑，认为开凿运河有可能使埃及脱离奥斯曼帝国。1856 年 1 月 5 日，赛义德与莱塞普签订了新的合同，这是给予莱塞普的第二份特许合同，主要是对 1854 年的那份特许合同做了新的补充，目标是解释和完善前一个法令中对运河公司在责任、费用、索价、应得收益等方面的规定。[②] 第二份特许合同扩大了运河公司的权责范围。

莱塞普与埃及政府之间多次通过签订合同或者是埃及政府颁布法令的形式，对开凿运河的相关问题做出规定。1854 年 11 月 30 日的合同授权莱塞普建立运河公司（以后的合同都认可这一合同的有效性）。1856 年 1 月 5 日签订的第二份合同，确定费用预算表，以保证负责运河工程的商业公司的组建；一旦得到奥斯曼政府的批准，就授权公司动工开凿运河；经过埃及总督签署，运河公司的地位在这份特许合同中做了补充规定。1856 年 1 月 20 日的法令，规定运河公司可以雇用埃及的劳工开凿运河。运河开凿过程中，1863 年 3 月 18 日，埃及总督与公司签署一项协议，就开罗与瓦迪（Ouady）之间淡水渠第一阶段运送工程达成一致。1866 年 1 月 30 日，最后一份协议做了如下规定：公司有权使用开凿运河所需的土地；转让与此相关的淡水渠、土地、工程和建设用地；瓦迪地区以 1000 万法

---

① Charles W. Hallberg, *The Sue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1, pp. 124 – 126.

② Benno Avra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ez Canal Status, from 1869 to 1956, a Historic-Juridical Study*, Librairie E. Droz, Geneva, 1958, p. 24.

郎的价格卖给公司；支付以上这些费用的时间由运河公司决定。[1]

莱塞普的运河公司和埃及政府之间的合同，涉及多方面的规定，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包括：莱塞普有权组建国际性公司——苏伊士运河海运公司；公司自运河通航之日起享有对运河99年的运营权，期满后归埃及所有；埃及政府给予运河公司开凿运河所需的土地，并允许其享有在这些地方开采矿藏的免税权；规定埃及政府每年得到运河公司纯利润的15%。其余利润的分配是：运河公司占75%，运河建设者占10%。埃及总督许诺为工程的实施提供方便。[2] 此外还有：在租期内运河公司向每吨货物和每位旅客征收不高于10法郎的税金；埃及政府每年能分享15%的纯利；运河两岸和自尼罗河引水的河渠两侧，两公里宽的土地无偿归运河公司占用，无须缴纳地价和地税；运河公司在租让期内有权无偿开采和使用埃及的矿藏和石料来修筑运河设施；运河工程所需的劳工，80%由埃及方面提供，公司付给一定的报酬（工资由公司决定）。[3]

1857年，莱塞普正式成立国际苏伊士运河海运公司，注册资金为2亿法郎，分成40万股，每股500法郎，计划向各国抛售。1858年11月莱塞普出售股票，法国购买207111股，接近股票总数的52%。由于英国鼓动，其他国家拒绝认购，莱塞普出售给埃及176602股，约占股票总数的44%。1859年4月25日，莱塞普不顾英国的反对，不等奥斯曼帝国批准，运河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运河动工建设的前两年，采取自由招工的办法，但招到的劳工少，工程进展缓慢。1861年之后，在法国政府的要挟下，赛义德实行劳工法令，强制征收劳工。劳工数量大增而生活条件没有改善，许多劳工在饥饿、劳累、伤病中死去。劳工怠工、逃跑的事件不断发生，赛义德坚决惩治，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苏伊士运河公司与埃及政府之间发生争执，拿破仑三世组成调解委员会，就废除劳工法令等事项进行“调解”，损害了埃及人民的利益。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起初坚决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后来看到

---

① *The Suez Canal: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Suez Canal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Suez Canal Company*, form November, 30, 1854 to July, 26, 1956, London, 1956, p. 39.

② Charles W. Hallberg, *The Sue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1, p. 118.

③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运河已接近尾声，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反对。

到1869年11月17日，全长166公里的运河正式通航。11月19日，赫底威伊斯梅尔与莱塞普签订的运河协议才被奥斯曼素丹批准，这时苏伊士运河已经通航了。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被看作是与15世纪葡萄牙人航海同等重要的事件，开创了东西方贸易的新纪元，欧洲人由此进入了一个迅速扩张的时代。苏伊士运河通行，使西欧航船不再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而直接经红海进入印度洋，缩短航程5500—5800公里；从黑海沿岸到印度，可缩短航程14000公里；从北美洲到印度洋，可缩短航程约6000公里。

由于运输速度的加快，刺激了新的寻求原材料、开辟新市场的热潮。英、法等国忙碌的工厂里生产出的大量工业品，很快运往世界各地，而苏伊士运河开通后的几年内，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利润的重新分配。随之而来的是，非洲被瓜分，远距离的殖民地和海军基地陆续建立，欧洲文明以最快的速度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①]

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为世界范围的运输和大规模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埃及人民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据阿拉伯学者拉费伊《伊斯梅尔时代》一书的统计，埃及购买运河公司股票花费342.66万镑；按仲裁规定而赔偿336万镑；购买河谷之地花费40万镑；1869年为取消公司部分特权和收回一些建筑物又赔偿120万镑；挖掘淡水渠费用120万镑；庆祝运河通航耗资140万镑；加上贷款利息、佣金和仲裁费等共计581.4万镑。各项花费总计为1680万镑，而欧洲股东的全部投资仅为448万镑。”[②]埃及因为修筑运河而付出的巨额费用，加上其他各项财政开支，政府不得不举借外债。到1875年6月，伊斯梅尔被迫把他40万份苏伊士运河股份中的17.6万份转让。英国首相迪斯雷利设法取得这些股权，英国于是变成了苏伊士运河公司最大的股东。[③] 伊斯梅尔的麻烦仅仅是开了个头。债务本利累积，导致埃及财政破产。由于欧洲债券

---

① Charles W. Hallberg, *The Sue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p. 216.

② 数据来源：阿布杜·拉赫曼·拉费伊：《伊斯梅尔时代》（上），开罗1932年版，第106—107页。转引自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③ Harry Gailey, *History of Africa, from 1800 to present*,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2, p. 94.

持有者给政府施加压力，1876 年埃及被迫接受欧洲的财政监督。运河没有给埃及带来“便利”，而是给西方殖民者控制埃及带来便利。

客观地说，运河也没有给莱塞普带来发财机会。运河开通的最初几年，运河公司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亏欠。1858 年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估计运河的费用是 2 亿法郎，然而运河的开凿实际花费超出 4 亿法郎，是预估费用的两倍多。从股票抛售中公司得到 2 亿法郎，从埃及政府那里得到 8400 万法郎，运河公司按照 1869 年的协定实际得到 3000 万法郎。也就是说，运河公司得到款项是 3 亿法郎多一些，其余 1 亿法郎是空缺的。为了筹措这些款项，运河公司 1867 年贷了一笔款，并发行 333333 份股面价值 300 法郎的公债，但到 1868 年只有 1/3 被认购。法国政府帮助公司想办法，售出债券，筹到了部分款项。[①] 一年后运河通航时，欠款还没有着落。

其实，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初欧洲商船通过运河的数量不多。据记载，从 1869 年 11 月至 1870 年年底，仅有 486 艘船（总吨位 436609）通过，运河公司得到的收益仅有 4345758 法郎。这点收益不够偿还债务的利息，公司信誉受损，面临破产。1871 年至 1874 年之间，莱塞普几次召集股东商讨对策，一度提出把运河公司经营权转让给英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奥斯曼政府反对转让，认为运河公司是埃及的公司，应该放在奥斯曼帝国的权限之内。由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没有采取行动，加上奥斯曼帝国的反对，运河公司的转让计划只能搁浅。到 1875 年，运河公司的财务状况有所好转，转让运河经营权的问题就偃旗息鼓了。[②]

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英国的政治家们也在重新估量形势。总体看，从苏伊士运河通过的货船最多的还是英国船。因为英国有最强大的海军，在欧洲与中东和远东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占明显优势的还是英国。只要其他国家没有控制埃及，英国的有利地位就不会受到威胁。所以，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目标是亲近奥斯曼帝国，采取对奥斯曼素丹有

---

① Charles W. Hallberg, *The Sue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1, pp. 217 – 218.

② Charles W. Hallberg, *The Sue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1, pp. 221 – 222.

利的政策，让奥斯曼素丹阻止其他任何国家染指埃及事务。[①]

第二节　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奥斯曼土耳其人从16世纪开始拥有埃及以西、摩洛哥以东的北非属地，这一地区包括阿尔及利亚（Algeria）、突尼斯（Tunisia）和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三部分。在奥斯曼帝国对外征服的历史上，取得北非属地的过程，也是与西班牙长期争夺、不断战争的过程。从攻占阿尔及利亚的科洛，到最后彻底控制突尼斯，奥斯曼帝国前后与西班牙军队断断续续进行了50多年（1521—1574年）的拉锯战[②]。

奥斯曼政府一度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合并为一个行省，由奥斯曼素丹任命的帕夏进行统治。不久，三个地区成为各自独立的王国，试图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只是形式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奥斯曼军队在此驻扎。

阿尔及利亚是最先被征服的地区，公元1587年前由奥斯曼素丹委任的海盗首领进行统治。海盗首领负责阿尔及利亚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事务，任期不定。此时的阿尔及利亚基本上是军事贵族政体。后来奥斯曼帝国的控制逐渐被削弱，17世纪中期，海盗集团推选自己的首领做总督，称为达伊（Day）。海盗集团与奥斯曼帝国加尼沙里军妥协，规定达伊由海盗首领和加尼沙里军官任命。奥斯曼政府从此不再委派帕夏，而是承认达伊为奥斯曼帝国阿尔及利亚属地的最高长官。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稳定局

---

① Benno Avra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ez Canal Status, from* 1869 *to* 1956, *a Historic-Juridical Study*, Librairie E. Droz, Geneva, 1958, pp. 27 - 28.

② 1518年，海盗首领赫尔丁向奥斯曼帝国俯首称臣，奥斯曼土耳其人支持赫尔丁占领阿尔及利亚的重要城镇和军事要塞。1521年赫尔丁的部队和奥斯曼军队攻占了科洛、波尼和君士坦丁城，占据阿尔及利亚东北部。1529年5月攻占佩尼翁，1541年10月打败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舰队，确立了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宗主权。在攻占阿尔及利亚的佩尼翁不久，奥斯曼军队攻占突尼斯城（1534年8月），推翻哈夫斯王朝。1535年7月，西班牙军队攻占古累特和突尼斯城，重新恢复哈夫斯王朝。西班牙军队撤走后，突尼斯陷于混乱。1542年，奥斯曼军队支持哈夫斯王朝内部的政变。在重新占领突尼斯之前奥斯曼奥斯曼军队于1551年8月分海陆两路向的黎波里（Tripoli）发动进攻，8月18日攻占的黎波里。不久奥斯曼人又征服的黎波里以东的卜雷加和南部的费赞地区，被征服地区被统称为“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Tarabulus）。1569年，奥斯曼军队再一次灭亡哈夫斯王朝。1571年10月，奥斯曼军队与西班牙军队发生著名的勒班陀海战，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失败。1573年，西班牙军队攻占突尼斯城。1574年，奥斯曼军队夺回突尼斯城，彻底征服突尼斯。至此，马格里布中部和东部地区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奥斯曼军队曾西侵摩洛哥，但最终未能征服摩洛哥）。

面短暂，叛乱、政变不断发生，以达伊为首的统治集团，势力所及只在沿海地区，内地处于半独立状态。当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宗教旗帜下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

奥斯曼帝国在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统治方式，大体上与阿尔及利亚相似。起初奥斯曼素丹任命的帕夏为最高行政长官，奥斯曼帝国加尼沙里军是维持统治的支柱，税收则由海盗帮会和当地部落首领负责征收。这两个地区在 17 世纪摆脱奥斯曼政府的控制，当地实力派人物掌握政治权力。突尼斯内部纷争不断，从 1631 年起，贝伊（Bey）一职由穆拉德家族世袭，这标志着突尼斯事实上的独立。在的黎波里塔尼亚，1611 年加尼沙里军的军官苏莱曼·萨法尔自封为贝伊。后来贝伊一职被海盗首领把持，海盗首领控制着一个较强的军事集团，成为当地的统治者。1672 年之后的黎波里塔尼亚陷于混乱，海盗首领和加尼沙里军的军官为争夺贝伊一职混战不休，不到 40 年（1672—1711 年）更换了 24 个贝伊。奥斯曼政府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统治和影响，一直是很薄弱的。

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三块属地，在经济上几乎没有出现过长时间的繁荣。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游牧生活普遍存在，谷地和绿洲的居民从事种植业，小麦、橄榄、椰枣是主要作物。在沿海的城镇，传统手工业有一定的基础，如阿尔及利亚一些城镇的手工刺绣、突尼斯的制帽、制鞋业，产品销路较广。由于地理条件优越，这些属地的沿海，商业一直没有中断，但受到海盗劫掠、地中海战争的影响。地中海与红海正常的贸易往来频繁时，海盗商业活动给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等沿海城市带来生机，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封锁，西欧商品的冲击，使当地传统手工业和商业走向衰落。在社会相对稳定、商业出现复苏时期，北非属地的宗教文化也会有所发展，修建了不少清真寺和学校，有利于当地文明程度的提高。然而，到 18 世纪末，阿尔及利亚沿海的贸易逐渐衰落，加上饥荒和瘟疫，人口急剧减少，城市居民仅占居民总数的 5% 左右。相比之下，突尼斯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马格里布国家中是较高的，但突尼斯仍是落后的农业国，18 世纪欧洲廉价商品涌入突尼斯，当地手工产品逐渐被排挤，国内市场逐渐为外国商品所占据。[1]

---

① J. D. Fage and R. Oliv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Cambridge Uniuersity Press, London, 1975, p. 15.

一　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

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先后对阿尔及利亚进行过征服活动，攻占了一些要塞和城镇。欧洲国家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借口很多，如制止海盗行径、拯救战俘、防御野蛮部族骚扰等，还曾打着保障当地人的和平安全、根除奴隶制等旗号。[①] 总之，战争时断时续，既有基督教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争夺，也有欧洲大国之间的竞争，还有海盗劫掠行为，阿尔及利亚人深受其害。由于地中海沿岸的贸易衰落，阿尔及利亚统治集团的外贸收入锐减，只能向本地民众大量增收赋税，激起西部地区和谢利亚山区农牧民的多次起义。在国内矛盾尖锐、社会不稳定、经济恶化的情况下，阿尔及利亚难以抵御外敌入侵。

法国早有占领阿尔及利亚的野心。16世纪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过据点，18世纪马赛的一家公司获得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粮食贸易的特权。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需要粮食，从阿尔及利亚大量购粮，以致于欠了阿尔及利亚一大笔债款。阿尔及利亚的侯赛因达伊后来多次向法国索还债款，法国一直拖欠。其实法国已经为侵略阿尔及利亚做过实质性的准备工作。拿破仑就有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打算，派人对阿尔及利亚沿海进行考察，绘制军用地图，拟订行动计划。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法国新政府也没有放弃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计划。

不久，发生了历史课本中所描述的阿尔及利亚君主用苍蝇拍子打法国领事的事件。事件的经过是：1827年4月29日，阿尔及利亚的侯赛因达伊接见法国驻阿尔及尔领事德瓦尔，侯赛因询问法国政府拖欠购粮债款的偿还问题，德瓦尔傲慢无礼，惹怒了侯赛因。侯赛因顺手用苍蝇拍子朝德瓦尔的脸上打去。后来有关这个事件的传闻有多种版本，其中一种说法是，侯赛因用扇子打了德瓦尔的脸，这一事件叫"扇击事件"。不管怎么说，法国政府认为这是对法国的严重侮辱，决定断绝与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关系。为洗雪耻辱，法国国防大臣克莱蒙·托内莱（Clermont-Tonnerre）向内阁提交了一份保证能成功的军事行动计划。后来法国人说，1830年的军事行动并不是出于全面的政治考虑，也不是出于扩张的意愿，仅仅是

---

① Jeannine Verdès-Leroux,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de 1830 à aujourd'hui*,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1, pp. 103 - 104.

因为阿尔及尔的侯赛因达伊造成的事件（涉及粮食供应问题）引起的。[①]

法国人小题大做，要求侯赛因道歉。侯赛因拒绝道歉，法国海军便封锁阿尔及利亚的港口。1830 年 5 月 25 日，法国一支由 3 万余名士兵、600 余艘船舰组成的舰队，从本土出发远征阿尔及利亚。[②] 6 月 14 日，法国侵略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登陆。

法国军队登陆之后，遇到阿尔及利亚军队的顽强抵抗。6 月 29 日，法军开始进攻首都阿尔及尔，15 天的战斗过后，法军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围困阿尔及尔，并于 7 月 4 日攻占了君主的堡垒。胜利者在穆斯林注视下穿过阿尔及尔街道时，法国军官并没有感到胜利的欣喜，他们倒是担心事态会恶化。[③] 7 月 5 日，侯赛因被迫签订投降协定，并于 7 月 27 日被流放（1838 年死于埃及）。法国侵略者抢劫了王宫，劫去黄金 1.5 万磅、白银 22 万磅，加上其他物品，总计价值达 5500 万法郎。[④] 在侵占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法国殖民者进行了野蛮屠杀，仅在 1832 年 4 月 6 日这一天就屠杀了 12 万名阿尔及利亚居民。

当法国远征军第一次踏上阿尔及利亚时，他们对这块比自己国家大五倍的土地一无所知。他们想象中的北非居民是野蛮人，其实这个地方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显然，法国的目的是要把阿尔及利亚变为它掠夺原料的殖民地。1834 年 7 月 22 日，法国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属地，在阿尔及尔设立总督府，直属陆军部。阿尔及利亚的总督握有军事指挥权和最高行政管理权。德鲁埃·德尔龙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1848 年法国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设置三个省：阿尔及尔省、瓦赫兰省和君士坦丁省。1865 年 7 月 14 日，法国颁布法令，宣布穆斯林土著也是法国人（不过，他们只是法国的臣民而不是公民）。

法国虽然占领了阿尔及利亚，并开始了殖民统治，但阿尔及利亚人民并没有屈服，40 年（1830—1870 年）里没有停止反抗斗争。西部地区的

---

① Raphaël Delpard, *L'Histoire des Pieds-Noirs D'Algérie, 1830—1962*, Editions Michel Lafon, Neuilly-sur-Seine Cedex, 2002, pp. 11 – 12.

② 一种说法是：这支舰队共有军舰和其他船只 103 艘、运输船 542 艘、士兵 3.76 万多名，由陆军中将布尔蒙和海军中将迪佩雷率领。

③ Raphaël Delpard, *L'Histoire des Pieds-Noirs D'Algérie, 1830—1962*, Editions Michel Lafon, Neuilly-sur-Seine Cedex, 2002, p. 12.

④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56 页。

民族解放运动由阿卜杜·卡德尔领导，东部地区的抗法运动由艾哈迈德达伊领导。

1832年4月法军侵犯马斯卡腊地区时，阿卜杜·卡德尔就投入了抵抗运动。这一年的11月22日，年仅24岁的阿卜杜·卡德尔被参加抗法运动的部落推选为领袖。由农牧民组成的起义军在阿卜杜·卡德尔领导下，以马斯卡腊为中心，采用游击战术，多次挫败法国军队。在起义军的打击下，盘踞瓦赫兰的法军首领同意与阿卜杜·卡德尔谈判，并于1834年2月26日签订了《瓦赫兰条约》。条约承认除了沿海的瓦赫兰等三个城市外，阿尔及利亚其余地区属于阿卜杜·卡德尔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国的领土。11月，阿卜杜·卡德尔被拥立为阿尔及利亚国的素丹，以马斯卡腊为首都。

1835年，法军向阿卜杜·卡德尔管辖的地区发起进攻，被卡德尔的军队打败。法国侵略者不得不妥协，1837年5月30日，法国元帅托马斯·毕若（Thomas Bugeaud）与阿卜杜·卡德尔签订《塔夫纳条约》，法国承认除东部地区和阿尔及尔、瓦赫兰等沿海城市外，整个阿尔及利亚中西部都归卡德尔统治。

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艾哈迈德达伊领导的抗法队伍顽强战斗，消灭法军数千人。法国侵略者与阿卜杜·卡德尔签订《塔夫纳条约》后，全力以赴对付东部地区，集中兵力进攻君士坦丁城。艾哈迈德达伊未能与阿卜杜·卡德尔联合，孤军作战，1837年10月被打败，君士坦丁被法军占领。艾哈迈德达伊在山区坚持斗争，1838年兵败被俘。

法国侵略军镇压东部地区的起义后，1839年6月向阿卜杜·卡德尔的军队发动进攻。由于法国增兵，法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阿卜杜·卡德尔军队渐渐失利。1841年6月，首都马斯卡腊失陷，接着，塞伊达等城市也被法军占领。1843年5月16日，法军突袭卡德尔营地，阿卜杜·卡德尔被迫撤退到摩洛哥境内。1845年春，布·马扎在达赫拉山区举行起义，阿卜杜·卡德尔返回阿尔及利亚，投入布·马扎起义队伍，重新被推举为起义领袖。阿卜杜·卡德尔打了几次胜仗，然后挥师东进。1846年，托马斯·毕若派出18个纵队追逐阿卜杜·卡德尔起义军，阿卜杜·卡德尔再次退入摩洛哥境内。1847年4月，布·马扎战败。12月24日，阿卜杜·卡德尔兵败被俘（先被押解到法国，监禁几年后释放，1883年死于大马士革）。

1870年，法国总算完全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不过，无论是皇帝拿破仑三世，还是法国政府的官员，都对能否长久占领阿尔及利亚没有信心。他们觉得，这个地方遥远而神秘，这里的野蛮人时刻准备杀掉所有基督教徒。镇压卡德尔叛乱的托马斯·毕若元帅也不相信能建立持久的统治，他一度建议皇帝放弃这块非洲土地。问题是，如果法国人真正扭头离开这个地方，"叛乱者"马上会收复他们失去的领土，法国人多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撤离阿尔及利亚，等于是承认法国这些政府官员们无能。于是政府官员和拿破仑三世本人都采取了坚定的立场。[①]

阿尔及利亚的征服者托马斯·毕若元帅对法国政界普遍的麻木感到愤怒。他到巴黎去向议会请求："你们想留在阿尔及利亚吗？那就应该做点实事！可到现在为止，你们什么都没有做！你们愿意这几十年无谓的牺牲换来的结果就是烧毁庄稼，把大量伤兵送往医院吗？不能继续这样荒谬的事情了！应该向着坚定的目标前进，应该把它建为法国的一个省。"[②] 于是宏大的殖民计划被提出来了。国民议会对这个计划反响热烈，因为它规划了阿尔及利亚的未来。议员和部长们觉得目标很明确了。重要的是向他们提出一个宗旨："为殖民而征服，为保有土地而殖民。"托马斯·毕若要求在未来三年内派遣15万个家庭前去建设法国的这个新省份。[③] 1870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所谓的民政体制，将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权力由陆军部转移到内政部。法国的殖民政策是大规模掠夺土地，并大量向阿尔及利亚移民。

就在法国人认为已经彻底征服了阿尔及利亚，正准备移民和建设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又爆发了1871—1872年大起义。

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毛克拉尼（Mokrani）。据记载，参加起义的队伍人数达到20万，还有8.6万土耳其士兵参加[④]。起义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民政体制，实际上还是变本加厉

---

① Raphaël Delpard, *L'Histoire des Pieds-Noirs D'Algérie, 1830—1962*, Editions Michel Lafon, Neuilly-sur-Seine Cedex, 2002, pp. 11 – 13.

② Raphaël Delpard, *L'Histoire des Pieds-Noirs D'Algérie, 1830—1962*, Editions Michel Lafon, Neuilly-sur-Seine Cedex, 2002, p. 13.

③ Raphaël Delpard, *L'Histoire des Pieds-Noirs D'Algérie*, 1830 – 1962, Editions Michel Lafon, Neuilly-sur-Seine Cedex, 2002, p. 14.

④ Jeannine Verdès-Leroux,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de 1830 à aujourd'hui*,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1, p. 151.

地殖民掠夺，阿尔及利亚的社会秩序混乱。恰好法国与普鲁士发生战争，非洲军团被抽调回国参战，法国失败，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阿尔及利亚人认为赶走法国殖民者的机会到了。毛克拉尼是贵族阶层，法国的殖民损害了他的利益，因此他非常希望把法国人赶出去。毛克拉尼认为，进行长期的、激烈的武装行动，可能会迫使法国政府考虑阿尔及利亚各个大家族的力量，乃至恢复哈里发制度。几经踌躇之后，他决定起义，并号召每个阿尔及利亚人拿起武器。①

毛克拉尼的军队是来自各个大家族的新兵，这些新兵与将领并不亲密，甚至有可能背叛将领，毛克拉尼求助于宗教领袖哈达德（El-Haddad）。1871 年 4 月 8 日，这位宗教领袖号召“圣战”，几天后，10 万人参加毛克拉尼的队伍。起义的性质发生变化，从毛克拉尼的贵族领主叛乱，变成了“圣战”和人民战争，农民、牧民加入队伍，起义范围不断扩大。法军很快得到增援，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5 月到 7 月，毛克拉尼牺牲，哈达德战败被俘。哈达德和他的儿子阿齐兹投降，起义力量受到削弱。毛克拉尼的弟弟麦兹拉格·毛克拉尼（Mezrag Mokrani）率领余部，转战于南部撒哈拉地区。1872 年 1 月 20 日，法军攻占了起义军的最后两个据点——图古尔特和瓦格拉，麦兹拉格·毛克拉尼被俘，起义军被镇压。成千上万的起义者被处死、投入监狱或者流放。参加起义的部落被夺去 57.4 万公顷的土地，18 万支枪械被没收，并缴付赔款 3600 万法郎。②

法国殖民者镇压这次起义之后，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长期的殖民统治，不过，局势仍然不稳定。殖民者时常担心阿尔及利亚人会再次掀起反抗运动，甚至认为，他们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面临起义的威胁。③

二　法国确立对突尼斯的“保护”关系

突尼斯虽然处于半独立状态，但奥斯曼帝国还是希望加强对突尼斯的控制。从 18 世纪末期起，突尼斯贝伊的军事力量较弱，而欧洲大国加紧对突尼斯的侵略。1799 年，美国舰队侵犯突尼斯，遇到挫折后与突尼斯

---

① Jeannine Verdès-Leroux,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de 1830 à aujourd'hui*,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1, pp. 152 – 153.

②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6 页。

③ Jeannine Verdès-Leroux,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de 1830 à aujourd'hui*,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1, pp. 156 – 157.

政府签订条约，突尼斯承诺不再袭击美国商船。1819 年，英、法两国派特使到突尼斯，向马哈茂德贝伊递交一份照会，内容大致是：如果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对欧洲任何和平贸易采取对立方式，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欧洲大国的共同反对。马哈茂德贝伊被迫采取默认的态度。1824 年法国与突尼斯签订条约，在突尼斯取得一些特权，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也与突尼斯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827 年，突尼斯海军参加纳瓦里诺战役遭受重创，从此失去海上防卫能力。

1830 年法国入侵比邻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贝伊感到威胁就在眼前。突尼斯贝伊与法国签订友好条约，还劝说阿尔及利亚放弃抵抗。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后，奥斯曼帝国于 1836 年派舰队到突尼斯，准备直接统治突尼斯。法国极力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派舰队到突尼斯海岸，并向奥斯曼帝国发出照会，态度强硬。奥斯曼帝国妥协，法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837 年，法国军队从阿尔及利亚侵入突尼斯，占领突尼斯内地的绿洲。英国坚决反对，法国军队撤出占领区，此后英国和法国展开在突尼斯的争夺。

面对这种局势，突尼斯的统治者试图增强国力，以维护突尼斯的独立。艾哈迈德贝伊（1837—1855 年在位）、穆罕默德贝伊（1855—1859 年在位）和萨多克贝伊（1859—1882 年在位）先后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涉及军事、法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艾哈迈德贝伊主要改革军队，按照欧洲模式建立现代化陆军和海军，建立军事技术学校。突尼斯的海军在 1848 年时达到 3.5 万人。穆罕默德贝伊于 1857 年颁布了《基本公约》，规定全体臣民不论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可侵犯。萨多克贝伊统治时期，颁布了突尼斯第一部宪法，设立国务会议。首相赫雷丁进行了农业改革、税收改革。

在推行改革尤其是正规军建设时，突尼斯政府向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购买军服和武器装备，并制定了一部军事法典。由于财政困难，军队的装备和给养无法解决，军饷时常拖欠，政府只好遣散大部分军队，保留 4000 名官兵；从 1864 年起又减少到 3000 名以下，军事学校也在 1869 年正式取消了。萨多克贝伊为推行改革花费大量的金钱，只得向外国借款来摆脱财政困境。

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在突尼斯已经占有 10 多万公顷土地，突尼斯欠法国外债 1 亿法郎（突尼斯外债总额 1.25 亿法郎）。1879 年法国人在

突尼斯筹办突尼斯第一家银行（即后来的突尼斯银行），加大了在突尼斯的渗透和侵略。意大利也在突尼斯开办企业，修筑铁路，大量投资。从1878年的柏林会议开始，法国在北非的活动得到德国的支持，不过，法国想使用外交手段迫使突尼斯承认法国的保护，突尼斯没有屈服。

1881年4月12日，法国军队3万人从阿尔及利亚侵入突尼斯。不久，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比塞大登陆，直逼突尼斯城。萨多克贝伊答应与法国签订条约，即《巴尔杜条约》。根据条约，突尼斯和法国之间原来的条约和协定重新得到确认并生效；法国殖民当局认为有必要占领的地方，都可以占领；突尼斯贝伊不得与其他国家缔结国际条约。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拒绝承认这个条约，但欧洲大国都承认法国对突尼斯的占领。不久，突尼斯南部发生了反抗法国的起义，法国殖民者重兵围剿，到1883年征服了突尼斯全境。

1883年7月，法国又迫使突尼斯阿里贝伊缔结新的条约，突尼斯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第三节　奥斯曼帝国失去埃及行省

一　1849—1882年的埃及社会状况

1849—1882年，埃及先后由阿巴斯（Abbas）、赛义德（Said）、伊斯梅尔（Isma‘il，也译为“伊斯马仪”）和陶菲克（Tawfiq）统治。他们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总督，实际上是埃及这个半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名号为“赫底威”（Khedive）[①]。其实，1849年后的埃及已经没有穆罕默德·阿里时代的独立地位，穆罕默德·阿里的继承者们对埃及的控制越来越弱。

在穆罕默德·阿里强势政府之后，历任埃及统治者无法维持原来的治国方略。经济方面，既放弃了对农业的垄断，也不能有效掌握贸易主动权。埃及经济发展呈现单一模式，出口棉花和农产品，进口其他所需的物品。由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埃及的优质棉花大量出口到英国。从19世纪50年代起，棉花出口大幅度增长，给埃及换得大量外汇。这一时期外国银行在埃及建立起来，这些银行和外国控股的棉花出口

---

① 一译“赫迪夫”，意思是“伟大的埃米尔”。

公司为棉花生产提供资金[①]。随着外汇收入的增加，埃及有财力扩建港口，修筑道路。而且，灌溉区域的扩大和交通运输的改善，反过来促进了棉花的生产和运输。

不过，埃及经济出现结构性的问题：第一，埃及大量种植棉花，虽然获取短期的利益，但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农民的粮食面积来换取的。从长远看，埃及统治者政策导向是失误的，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使埃及走上经济畸形发展的道路。第二，埃及统治者试图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而欧洲资本对埃及的垄断性投资，使得埃及严重依赖外国。第三，棉花产量增加，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却被财政开支（消费和偿还外债）的增长所抵消，储蓄率很低。第四，埃及政府受1838年的《奥斯曼—英国贸易协定》的限制，不能提高关税，甚至被迫免除关税，使埃及受到损失。第五，埃及制造业几乎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埃及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开发[②]。第六，在欧洲强国的压力下，埃及被迫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埃及出口贸易以初级产品为主，使埃及农产品的价格不得不随国际市场价格的起伏而波动。

1863年，伊斯梅尔继位，他想使埃及快速发展，走上欧洲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于是政府大力恢复和重建基础设施，兴建铁路、运河、桥梁、港口，建设电线电报，发展水利工程，兴办学校，还发展轻工业如纺织业、制糖业等。后世史家批评和指责伊斯梅尔“软弱”，过分依赖欧洲大国。其实，应该看到伊斯梅尔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他1863年一上台就承受了来自欧洲强国的压力，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埃及的生存。在国内，他要改善埃及的贸易条件，改善灌溉系统，要发展农业，要开办欧洲式的学校，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向欧洲国家借款是仅有的办法。当然，伊斯梅尔也有野心，比如他冒险入侵苏丹，远征埃塞俄比亚，是为了实现“埃及帝国”的梦想。[③]在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上，伊斯梅尔一方面尽力使用外交手段，谋求埃及内部的自治；另一方面帮助奥斯曼素丹镇压

---

① Charles Issawi, *Middle Eastern Economy: Decline and Recove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4 – 115.

② Charles Issawi, *Middle Eastern Economy: Decline and Recove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6.

③ A. Harry Gailey, *History of Africa, from 1800 to Present*,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2, p. 94.

帝国各地的起义——1863—1865 年出兵镇压阿拉伯半岛的起义，1868 年镇压克里特岛的起义，1876—1878 年卷入俄土战争。此外，伊斯梅尔得到英国的鼓励，出兵占领马萨瓦港（米齐瓦）、萨瓦金群岛，取得红海出海口。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欧洲大国在东地中海的争夺进入新阶段。巴尔干危机的持续，使俄国与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的摩擦冲突日益加重。1878 年俄土缔结的《圣斯蒂法诺条约》引起其他大国的不满。在大国的争夺中，埃及问题成为讨价还价的砝码。此时英国在埃及的利益仍以经济利益为主，埃及产品的 80% 出口到英国，埃及进口的 44% 来自英国。随着埃及被纳入由欧洲人主宰的市场，超过 9 万的欧洲人到埃及居住，其中上千名欧洲人充塞埃及的政府机构。贸易规则由欧洲强国制定，埃及人不可能在商业、财政、建设方面与欧洲人竞争。[①] 1876 年 5 月，埃及被迫接受英法提出的解决方案，组成“埃及财政监督委员会”，核定埃及全部外债的总数为 9100 万英镑，规定年息 7%，用 65 年全部还清[②]。埃及从此接受英国和法国的双重监督和财政控制。

1878 年 8 月 28 日，伊斯梅尔被迫授权曾经流亡海外的努巴尔组阁，其中规定内阁和赫底威共同执政，但内阁不向赫底威负责。这就表明赫底威独大的权力被剥夺，内阁取代赫底威的位置，伊斯梅尔失去对内阁的控制，也失去对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财产控制。新内阁（即“欧洲人内阁”）由一位英国人管理财政，一位法国人负责公共工程，实际上变成西方强国控制埃及的工具。从 1876 年起实行的混合法庭，也成为紧勒伊斯梅尔和埃及人脖颈的另一个绳索。[③]一位叫艾沃里·巴林（Evelyn Baring）的英国官员（就是那位克雷默勋爵[④]）从 1879 年开始控制埃及的征税权。

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尽管英国在商业和航海方面还占优势，可英国人发现，出入运河仍受多方面的限制，最好的办法是由英国人控制运河

---

①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9 – 220.

② 另一说法是：委员会颁布了清偿法，把债款压缩到 8500 万英镑，保留政府年度收入的 450 万镑，其余所有收入（估计 400 万英镑）用来偿还债务。详见西·内·费希尔的《中东史》（上），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72 页。

③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p. 219.

④ Lord Cromer，一般译为克雷默勋爵，也译为“克罗默勋爵”。

或控制埃及。不过，当时外交条件并不允许英国武力占领埃及，英国只能想办法通过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控制埃及。从那一时期的外交通信看，到1881年英国还没有占领埃及的意图。[①]当埃及出现奥拉比领导的民族起义时，英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酝酿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埃及成立了两个政治组织——"青年埃及协会"（1876年）和"祖国协会"（1878年），这是以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开明地主阶级为代表的两个团体，1879年两个团体联合起来成为新组织，名为"祖国党"。祖国党致力于拯救埃及，唤醒民众，反对殖民，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激励和鼓舞了埃及的反帝运动，祖国党后来成为领导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坚力量。埃及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受了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阿富汗尼倡导宗教改革，希望穆斯林各民族团结起来反抗西方侵略，却不反对穆斯林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与文化。他在埃及讲学期间，就公开讲授西方文明史和现代科学知识，吸引了一大批有志向的青年知识分子。1879年埃及发生"二·一八"事件，是部分下层土著军官维护切身利益，反对当局任意克扣军饷而引发的，民众对这次事件表示同情和支持。这次行动规模不大，但它表明埃及土著军官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崭露头角。

二　奥拉比起义和英国占领埃及

1879年上台的陶菲克既专权，又惧怕欧洲人。在他看来，要保住赫底威的职位，就必需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甚至听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指导，英国和法国恢复了在埃及的双重监督。祖国党的《埃及报》和《商业报》发表文章，揭示英国和法国践踏埃及主权的行为，谴责赫底威陶菲克和里亚德内阁。1879年11月4日，祖国党改组，由奥拉比担任主席。

奥拉比（'Urabi，1841—1911）[②]是典型的土著埃及军人，1841年生于东部三角洲沙基亚省的赫雅—拉兹纳（Hiyat Raznah），他是一位乡村谢

---

① "Letter of November 4, 1881", quoted from *Benno Avra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ez Canal Status, from* 1869 *to* 1956, *a Historic-Juridical Study*, Librairie E. Droz, Geneva, 1958, p. 28.

② 奥拉比的名字有两个，一是'Urabi，一是Arabi（译为"阿拉比"）。

赫的儿子，从小在宗教学校学习，13 岁入伍。赛义德统治时期，奥拉比就被擢升为陆军中校，1861 年跟随赛义德赴麦地，那时奥拉比才 20 岁。[①]不过，赛义德去世后奥拉比在整个伊斯梅尔时代始终没有得到提拔。到陶菲克统治时期，奥拉比成为上校，此后再没有升职。1879—1881 年，埃及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不仅民族主义者反对英法殖民者，反对陶菲克的独裁统治，新兴资本家也要求限制外国资本的渗透。埃及财政破产导致上层地主豪绅利益受损，他们也投身到反对西方列强的民族运动中，埃及社会已经酝酿着一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埃及在这一时期纷纷创办官方报刊和私人报刊，积极宣传公正、自由、平等的思想。就在这种形势下，奥拉比这位富有爱国心的军官走上埃及历史舞台。

奥拉比当选祖国党主席后，积极开展政治活动，要求取消民族压迫政策，进行社会改良，维护埃及人民的利益。赫底威陶菲克对祖国党力量的壮大感到恐慌，于是以节约财政开支为名裁减军官，减少军饷。掌握军权的陆军大臣乌斯曼·里夫基（Uthman Rifqi）则歧视、压制埃及土著军官，引起土著军官的极度不满。1881 年 1 月，奥拉比联合阿布·希尔米（Abd Al Hilmi）和阿里·法赫米，拟出一份请愿书，指控乌斯曼·里夫基的种种罪状，要求撤换陆军大臣。但在 2 月 1 日奥拉比等人被捕了，土著军人在愤怒中带着武器冲进陆军部，营救他们出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陶菲克被迫让步，撤换了乌斯曼·里夫基的职务，任命巴鲁迪为陆军大臣，并答应改善土著军人的待遇。这次请愿取得了胜利。

由于法国于 5 月占领突尼斯，埃及人普遍感到惊恐，担心埃及会成为法国的下一个目标。恰在这时，赫底威任命达乌德·亚昆（Da'ud Yakan）成为陆军部长，这位陆军大臣要求奥拉比和阿里·法赫米的军队离开埃及，以奥拉比为核心的军官们决定采取行动，于 9 月 9 日在阿比丁广场举行武装示威。这次行动（兵谏、起义）得到广泛支持，连宫廷卫队也归附奥拉比。奥拉比要求解散里亚德内阁，选举新的内阁，允许他的军队增加到 1.8 万人。[②] 在强大压力下，赫底威陶菲克不得不答应要求，解除里亚德的职务，任命谢里夫组阁，重新任命巴鲁迪为陆军大臣。奥拉比

---

①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4 - 225.

②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26.

领导的武装行动胜利了。

奥拉比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不包含狭隘种族观念，与那些要求起义的宗教和政治呼声不冲突，与那些忠实于奥斯曼素丹——哈里发的愿望也易于共鸣。起义发生之初，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并没有宣布奥拉比起义是叛乱。[①]就在1881年的2月至9月，奥拉比由一个陆军上校很快成为一位本民族的政治家。他满足部分行省的需求，得到贵族的支持和拥护。1881年的“二月请愿”、“九月兵谏”，使奥拉比名声远扬，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1882年1月1日，奥拉比和巴鲁迪、穆罕默德·阿布杜发表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份报告，发表于《泰晤士报》，表明了奥拉比等领导人对埃及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不久，奥拉比等人提出废黜陶菲克、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主张。2月24日，巴鲁迪组阁，内阁中祖国党占多数，奥拉比担任陆军大臣。巴鲁迪内阁维持了三个月，就在这三个月里，奥拉比的许多政治思想得到阐发，有一部分得到实施。按照杨灏城先生的看法，埃及历史学家所说的“奥拉比革命”或“奥拉比起义”（指“九月兵谏”、支持巴鲁底组阁等政治活动），其实既不是暴力革命，也不是武装斗争，而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②]

奥拉比领导的反抗运动之初，军官、土地贵族、乌勒玛、新闻界人士是重要的支持者。关键是，在新的内阁中，军官和土地贵族能否建立联盟。从1882年2月起，奥拉比革命进入新的阶段，马哈穆德·萨米（Mahmud Sami）和奥拉比进入内阁，奥拉比担任陆军大臣，组成七人内阁。2月7日通过的基本法规定，议院对内阁提出的议案有表决权，议院讨论预算，监督所有官员。有民众的支持，自信的议会代表敢于过问部长的任免问题，不过，议会到3月就停开了。[③] 奥拉比一派取得的胜利是短暂的。

埃及局势在发生着变化，英国人迫不及待地插手和干预埃及事务。当

---

①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8.

② 杨灏城先生的观点是：奥拉比领导的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英法殖民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显示了以土著军人为后盾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潜在力量。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③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29.

奥拉比开始军事准备时，英国就担心运河交通受到威胁。奥斯曼政府似乎要派军队赴埃及平叛，法国和意大利也要派兵，英国当然不能坐视①。应赫底威的“请求”，英国派军队登陆并帮助赫底威“恢复秩序”。1882 年 5 月，陶菲克公开摊牌，态度变得强硬，因为英国和法国的舰队此时已经驶向亚历山大港。5 月 25 日，英、法要求埃及的内阁辞职，要求流放奥拉比，要求阿里·法赫米上校和阿布德·阿尔离开开罗城。军官和贵族聚会商讨对策。只有 5 名议员赞成奥拉比的提议：请求奥斯曼素丹罢免赫底威陶菲克。5 月 26 日，贵族们向陶菲克提出，只有恢复奥拉比的陆军大臣职务，才能恢复法律和社会秩序，否则没有其他办法恢复秩序。② 6 月 11 日亚历山大发生了英籍侨民和市民之间的流血事件，大约有 50 名欧洲人和 250 名埃及人丧生，英国驻亚历山大港领事科克森也受了伤。埃及的局势骤然紧张。

埃及的政治危机使奥斯曼政府和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措手不及。因为 1877—1878 年奥斯曼帝国刚刚发生过战争，1878 年的塞浦路斯协定和柏林会议之后，奥斯曼帝国正陷入战争和外交失败带来的泥淖中。1881 年奥斯曼帝国把财政控制权部分交给“公债管理处”。同时，奥斯曼帝国要承担给俄国的战争赔款。紧接着，1881 年法国占领了突尼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又出现了问题。奥拉比起义发生后，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来自英国的，二是来自埃及赫底威陶菲克的。英国和陶菲克都要求奥斯曼素丹派遣一支远征军到埃及。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既是埃及的宗主，也是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应该怎么办。

不久，奥斯曼政府选择支持赫底威陶菲克。一般的说法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欺骗了奥拉比，其实这样的判断并不准确。奥斯曼素丹并不喜欢陶菲克，他只是考虑到奥拉比潜在的威胁更大，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会乘机扩展到帝国的其他地方。况且，陶菲克是合法的埃及统治者，代表奥斯曼素丹在埃及行使权力。赫底威陶菲克没有估计到奥拉比起义引起外国

---

① 英国除了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埃及，找借口说要保护在埃及居住的欧洲人的安全。当时的情况是，1853 年居住在埃及的欧洲人只有 6000 人，而到 1882 年居住在埃及的欧洲人达到 10 万人。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对这些欧洲人的安全构成威胁。

②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0 – 231.

干涉，问题会有多么严重。而奥拉比和他这一派人与奥斯曼政府有联系，奥拉比的书信向奥斯曼素丹表明了他的忠诚，奥拉比的信件公开发表。在 1881 年 10 月的请愿书中，奥拉比说陶菲克要脱离奥斯曼帝国，去投靠英国。[①]

1882 年 6 月，奥斯曼素丹哈米德二世往埃及派了一位特使，是德维什帕夏（Derviş Paşa）。德维什帕夏的使命有三重：一是要平定埃及叛乱但防止英国军事卷入；二是邀请奥拉比到伊斯坦布尔，使这位起义领袖暂时离开埃及；三是支持赫底威陶菲克，认定陶菲克是素丹在埃及的合法代表，而抵制任何外来干预。[②]

奥拉比起义实际上把奥斯曼素丹和奥斯曼政府置于两难境地。首先，到底是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埃及穆斯林的反抗？还是采取克制姿态对"奥拉比运动"给予有限的支持？倘若直接派兵镇压，奥斯曼素丹在叙利亚穆斯林眼中成为伙同基督徒压制穆斯林的帮凶，奥斯曼素丹的尊严和统治的合法性会受损；如果支持奥拉比起义，意味着支持奥拉比分子推翻赫底威的合法政府。其次，支持奥拉比，会使阿拉伯民族主义扩展到其他各行省，其危害可以预见；打击奥拉比，等于是支持赫底威，必然增强赫底威陶菲克的权威，这与奥斯曼素丹削弱赫底威的意图相违。而且，支持赫底威等于是与英国和法国的立场一致，方便了英法两国对埃及事务的干预。最后，德维什特使到达埃及，执行的是既支持赫底威又支持奥拉比的模糊政策，也是摇摆政策。

官方的声明宣称德维什特使支持赫底威，而奥拉比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沟通并没有中断。特使德维什的角色，既是专横的集权制的拥护者，也是"泛伊斯兰主义者"。作为前者，他支持陶菲克；作为后者，他支持奥拉比。初到埃及时，特使德维什设法使陶菲克与奥拉比之间达成和解。对于是否派遣军队开赴埃及，奥斯曼政府内部有争议。从根本上说，奥斯曼素丹不想使用武力解决埃及问题。到 1882 年 6 月 19 日，奥斯曼素丹指示特使德维什，让奥拉比辞职，免得奥斯曼政府被迫出兵造成穆斯林之间的分裂。奥斯曼素丹要德维什转告奥拉比：奥斯曼素丹对奥拉比"绝不生

---

① Selim Deringil, "The Ottoman Response to the Egyptian Crisis of 1881 – 82",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1, January, 1988. pp. 4 – 5.

② Selim Deringil, "The Ottoman Response to the Egyptian Crisis of 1881 – 82",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1, January, 1988. p. 8.

气"，相反，他邀请奥拉比来伊斯坦布尔。到7月份，奥斯曼政府和素丹本人似乎失去信心，因为这么长时间的温和政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①]

1882年7月3日，英国与其他欧洲强国的大使在伊斯坦布尔开会。英国给奥斯曼素丹哈米德二世施加压力，要他向埃及派遣军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以拖延策略来回应。直到不得不表态的最后一分钟，阿卜杜·素丹哈米德二世才宣布奥拉比是叛乱者。[②]

7月10日，英国舰队借口"埃及修筑工事，威胁英法舰队"，发出通牒要求埃及交出炮台。11日清晨英国舰队开炮轰击，13日就占领了亚历山大港。奥拉比对英国抱有幻想，认为英国人同情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不可能入侵，所以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英国人的武装入侵，激起了埃及人的愤慨，他们奋起反抗。奥拉比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发动圣战，支援埃及人民。赫底威陶菲克从开罗逃到亚历山大，接受英国军队的保护，并发表声明说英国军队无意占领埃及，炮击亚历山大完全是奥拉比等人违抗命令，擅自修筑工事、安装大炮所致。很显然，埃及的统治者已经公开站在侵略者一边。

1882年8月初，奥拉比写信给汉志地区的领导人，希望得到同情和支持，但奥拉比的努力是徒劳的。[③] 英国主战派促使格莱斯顿政府采取武装侵略行动，宣称是保卫苏伊士运河航线。英国军队指挥官采取迷惑战术，西线进攻为虚，占领运河区为实。奥拉比未识破敌人的战术，军队重点部署于西线。英国军队8月19日迅速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控制运河区，然后向开罗推进。同时，英国人在伊斯坦布尔召集会议，认真讨论如何限制奥斯曼帝国出兵埃及以恢复赫底威的权力问题。

当英国军队开进苏伊士运河区时，莱塞普提出抗议，认为这违反了运河的"中立"。然而英国的借口是，埃及的赫底威邀请英国军队保卫埃及。关键是当时并没有一项国际认可的保证运河中立的条约。1856年的

---

① Selim Deringil, "The Ottoman Response to the Egyptian Crisis of 1881 - 82",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1, January, 1988, p. 12.

② 伊斯坦布尔会议从7月3日就开始了，但奥斯曼帝国代表到7月26日才参加讨论。英国的外交官们是要求奥斯曼帝国派军队的主要支持者，不过他们不大相信奥斯曼素丹会派兵。实际上直到9月2日奥斯曼素丹哈米德二世才宣布奥拉比起义是"叛乱"。

③ Ş. Tufan Buzpinar,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on Syria, 1882 - 83",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1, January, 2000, p. 82.

运河协定，不足以保证运河的中立地位。[1]法国政府起初提议与英国一起共同占领埃及，却遭到格莱斯顿的拒绝。后来法国改变了策略，当英国军队侵入埃及时，法国总理拒绝授权给法国军队，英国的入侵未得到法国军队的协助。[2]

在开罗，起初没有人想到要召开军事会议，有的议员逃往亚历山大站在陶菲克一边，有的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庄园去了，留下的是下级官员。当英军进攻运河区时，奥拉比召集这些人紧急集会，但与会者拒绝了奥拉比提出的增加运河防御的请求，也否决了奥拉比提出的把警察派往前线的建议。在第二次集会时，参加的代表较广泛，有赫底威家族的反对派成员，有基督教牧师、犹太拉比、行会的领导人、商人等，开罗城内还有支持奥拉比的宗教学校的学生、律师等。奥拉比实际上承担起组织武装力量保卫埃及的使命。奥拉比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例如切断亚历山大与其他地方的通信联系，以防止赫底威操纵各地的支持力量，也禁止亚历山大报纸在全国各地流传。[3] 但支持奥拉比的力量是弱小的，高级职位的官员和宗教界领袖要么站在陶菲克一边，要么退缩了。

奥拉比在军事上节节失利。英军在贝督因向导的带领下，一夜急行军就到了奥拉比军队的面前，奥拉比军队难以抵抗，在遭遇战中，英军只伤亡 57 人，埃及军队死亡大约 2000 人。[4] 9 月 13 日英国军队发起总攻，埃及军队全面溃败，奥拉比退守开罗，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只能发布缴械的声明，向英军投降。9 月 14 日，英国军队占领开罗。一周之内，各地的反抗力量放下武器，英国遣散起义军，扶持陶菲克复位。9 月 25 日，赫底威陶菲克一行在英国领事陪同下，在 5000 英军护送下，从亚历山大返回开罗。9 月 30 日开罗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英国军队耀武扬威地穿过阿比丁广场。埃及从此成为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英国对埃及进行了无限期的军事占领，但英国对外宣称只是帮助赫底威恢复秩序，埃及仍是奥斯

① Benno Avra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ez Canal Status, from 1869 to 1956, a Historic-Juridical Study*, Librairie E. Droz, Geneva, 1958, pp. 28 – 29.

② A. Harry Gailey, *History of Africa, from* 1800 *to Present*,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2, p. 94.

③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2 – 235.

④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36.

曼帝国的一个行省。

事件平息后，9 月 26 日当局对奥拉比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审判。英国占领者害怕惹起埃及人民的反对，没有处死奥拉比，而是宣判奥拉比和巴鲁迪等人终生苦役，把奥拉比等领导人流放到锡兰（今斯里兰卡），把穆罕默德·阿布杜流放到叙利亚。还有约 150 人（有部长、酋长和其他不同级别的官员）被定罪，一些被流放国外，另外的则到其他省份居住并受到监视。

从 1882 年 10 月 30 日开始，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达弗林被派往埃及，担任英国在埃及的高级代表。达弗林为英国在埃及的统治提出了一套方案。这一套方案包括多方面内容，实质是把埃及纳入其殖民地范围。1883 年，有"东方暴君"之称的克雷默担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代表，他的统治达 24 年之久（1883—1907 年）。[①]这位实际的埃及主宰者，在埃及遇到的问题也不少，例如埃及严峻的安全问题、埃及的财政问题，迫使克雷默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在 1885 年的伦敦会议上，欧洲大国同意改变债务清偿的办法，以解决埃及的债务危机。在英国占领时期，英国代表掌握着埃及政治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为了在形式上有利于英国统治，英国当局在埃及组建了立法咨议会、省代表会议。常见的判断是："埃及的政权机构表面上由赫底威、内阁大臣、三个代表机构和其他埃及官吏组成，实际上它不过是奴性十足的执行机构，背后是由英国代表兼总领事和'顾问'、'总监'组成，这些人被誉为'英国的智慧'，主宰埃及的一切。"[②]埃及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逐渐减少。严重的社会分化引起了底层人民的反抗——尤其是丹沙微惨案的发生。英国为了稳定其统治，拉拢当地的地主贵族、富商大贾参与某些行政管理，分享一定的经济利益。接受过西欧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在埃及广泛地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党派纷纷出现。1892 年陶菲克之死，标志着英国征服后的巩固时期告终，却是埃及人民反抗英国

---

① 1907 年新任的英国代表兼领事埃尔登·戈斯特代替了克雷默，他采取的策略中，把一部分权力给予埃及政府。到 1914 年，欧洲局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在奥斯曼帝国选择加入同盟国之际，英国赶快宣布结束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把埃及纳入其"保护国"的范围。

②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5 页。

统治的开端。[①]

三　埃及的政治危机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1881 年 9 月至 1882 年 9 月的奥拉比起义，目的是驱逐英国和法国人，打破他们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控制，打破奥斯曼土耳其人对重要军事基地的独占，削弱赫底威陶菲克的权威。奥拉比起义失败，英国乘机占领埃及，赫底威也失去实际的控制权。在埃及，陶菲克的支持者和许多西方人都把奥拉比起义称为“军事叛乱”，但奥拉比掀起的反抗，既有广泛的民众参与，也触及埃及的社会问题，没有理由把这次失败的反抗运动称为“叛乱”。按照《剑桥埃及史》编纂者的看法，我们把历史上欧洲 1848 年失败的反抗运动和俄国 1905 年失败的反抗运动称为“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奥拉比领导的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者的运动，为什么不能算作一场革命?[②] 但不管是不是一场革命，其结果确实是全面失败了，而且导致了英国的军事占领。

英国直接派军队占领埃及行省，奥斯曼帝国不可能不做出反应。然而，埃及局势的发展，一度使奥斯曼政府陷入困境。奥拉比的起义在阿拉伯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埃及局势的发展让奥斯曼统治者很紧张。其实对于奥斯曼素丹来说，奥拉比个人的言论如何他不去细究，能够做到的就是避免公开指责奥拉比。1882 年 7 月，奥斯曼政府在埃及报纸上发布了一项声明，要求埃及人服从赫底威，并警示说伊斯兰内部不存在部族主义或民族主义，宗教和民族性是不可分的。当然，奥斯曼素丹在公开场合强调，他绝不会屈服于英国的压力采取针对奥拉比的军事行动。

从奥拉比起义到英国占领埃及，对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省份产生冲击，其中叙利亚受到的影响最大。埃及危机给叙利亚人的直接影响，首先是埃及难民抵达叙利亚省的沿海城镇，给叙利亚地方政府带来很大压力。奥斯曼政府试图努力控制奥拉比起义在叙利亚的影响，采取措施防止来自埃及的穆斯林难民引发新的事变。

1882 年夏天叙利亚人才注意到埃及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具体

---

①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40 - 241.

②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7.

情况，大批来自亚历山大的难民就涌入叙利亚，并在6月11日发生了一次群体冲突事件。第一批难民到达贝鲁特，后来进入的难民陆续到达叙利亚的其他沿海城镇。难民乘着各式各样的汽船和包租的船，据估计人数有大约2000人，主要是亚历山大的居民和此前定居于埃及的叙利亚人。他们的到来，立即成为沿海城镇尤其是贝鲁特的新闻，人们都在急切地关心和讨论着埃及的事情。[①] 到了7月初，埃及难民带来的关于埃及局势的消息传遍了叙利亚。许多穆斯林表达了对奥拉比的同情，并认为他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②]伴随越来越多的难民乘船到达叙利亚，叙利亚穆斯林的激愤情绪在增长。7月中旬，来到叙利亚的难民人数达到1.5万人，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有些是需要照顾的弱者，他们负担不起车船费。

面对这种情况，叙利亚地方政府采取应急措施，例如，派警察守在海岸边，阻止更多的难民登陆。对于已经进入的难民，尽力给予帮助，例如在贝鲁特，为收容难民而组建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提供住所和食物。城中富裕的居民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在叙利亚一些小城镇里，民众明显流露出对奥拉比的同情，也表现出对基督教徒的反对情绪。例如，在阿克城由于穆斯林极其愤怒，当地的许多基督徒移往海法。海法的气氛也很紧张，只不过有更多的基督徒聚集到那里，使他们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在拿撒勒（现为以色列北部小城），新教传教使团的成员遭到辱骂，一些人还受了伤。在哈马（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拉塔基亚（叙利亚西部海港城市）发生了同样的暴力事件。尤为严重的事件是，1882年8月4日一名穆斯林青年被谋杀于贝鲁特的一个基督教区，给这位青年举行葬礼时穆斯林呼喊着复仇。虽然当地警察成功地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但不得不实行宵禁，由警察、军队和骑警组成的队伍负责巡逻，维护城市治安。后来在贝鲁特还发生了零零星星的事件，引起基督徒的恐慌。

就在中小城市不断出现混乱时，大马士革这样的大城市相对平静，据英国驻大马士革的副领事狄克逊的报告，整个7月份和8月初民众情绪总体上是稳定的，仅有一些基督教徒表示出担忧。8月中旬发生了冲突事

---

① Ş. Tufan Buzpinar,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on Syria, 1882 - 83",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36, No. 1, January, 2000. pp. 82 - 83.

② 奇妙的是，奥拉比并没有被叙利亚人视为民族主义领袖，而是被看作向基督教势力发起圣战的穆斯林领袖。叙利亚人也把埃及奥拉比领导的运动看作一场仅仅是针对异教徒的战争。

件，引起奥斯曼政府高度重视，因为奥拉比的信徒曾前往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各地宣扬他们的思想。大马士革出现暴力冲突就不是小事。叙利亚地方当局立即采取措施，尽量截断来自埃及的消息，并发表了一份公报，禁止贝鲁特报刊杂志转述任何与埃及事件相关的报道，也禁止邮局寄发含有与埃及事件相关的电报。同时强化对新闻报道的审查，尤其来自埃及和埃及难民的私人信件。

既然奥斯曼帝国不能抵挡或挫败英军占领埃及，那么它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降低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想办法把奥拉比起义造成的冲击波压缩到最小的范围，使其不至于扩散到其他的阿拉伯省份。然而，控制事态发展也不是容易的。埃及难民出现在叙利亚后，叙利亚政府很快陷入困境。因为警察和执法人员很难从难民中辨认出哪些是支持奥拉比的积极分子，哪些是普通的逃难者。无奈之下，奥斯曼政府只能向阿拉伯省份发出严格命令，要求地方政府做好难民管理工作，防止奥拉比分子煽动民众。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所有省份都接到命令，地方政府必须想办法阻止任何煽动性的演讲和争论，免得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发生冲突。

虽然奥斯曼政府的每样工作都努力做了，但问题显然没有解决。一是无法遏制各种消息甚至谣言的传播。在整个埃及政治危机期间，埃及报纸流行于叙利亚，叙利亚人宁可相信埃及报纸而不相信官方的报刊，受其影响，叙利亚的一些穆斯林产生了对英国人的敌对情绪。二是有些奥斯曼政府的高层官员和军事官员同情甚至支持奥拉比。三是地方政府解决难民问题遇到实际困难。以叙利亚为例，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摩擦早已存在，穆斯林把埃及发生的事件归结为基督徒势力入侵埃及造成的恶果。于是一些穆斯林公开而义正辞严地表达了对“伊斯兰斗士”奥拉比的同情和支持。1882 年 9 月中旬，英国军队打败了奥拉比军队并占领埃及，这一消息使叙利亚各地的基督徒极其兴奋，他们唱歌、游行和鸣枪庆祝胜利。然而对穆斯林来说，奥拉比失败的消息令他们沮丧，感到屈辱。[①] 叙利亚的雅法等城市发生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

埃及危机结束后，部分难民返回家园，一些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叙利亚。叙利亚地方政府不情愿接纳这些来自埃及的逃难者。叙利亚总督哈姆迪帕

---

① Ş. Tufan Buzpinar,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on Syria, 1882 - 83”,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36, No. 1, January, 2000, p. 86.

夏请示奥斯曼政府，是否让这些人留在叙利亚。1883 年 1 月 30 日，政府告知哈姆迪帕夏，这些流亡者不仅应该离开叙利亚，而且应离开奥斯曼帝国领土。当哈姆迪帕夏把素丹的命令传达给流亡者的代表时，流亡者表示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是唯一能避难的地方，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流亡者请求奥斯曼素丹留下他们，并向奥斯曼政府发了电文。[①] 哈姆迪帕夏也给帝国政府发了电报，并详细说明了流亡者的处境，以及流亡的穆斯林的真实意愿，并提醒奥斯曼素丹：使用武力驱逐流亡者是行不通的，流亡者应该被转移到他们乐意去的省份。两个电文一同在内阁会议上被讨论，支持哈姆迪的部长表示：既然流亡者不会去别的地方，那么强制驱逐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当然，把他们留在叙利亚也不合适，应转移到政府控制下的卡斯塔莫努省（Kastamonu）和安卡拉省。[②] 后来政府屈从公众的压力，改变了把难民移往卡斯塔莫努省和安卡拉省的决定，流亡者被允许留在了叙利亚。

那么，奥斯曼政府为什么坚持要流亡者离开叙利亚呢？后来的研究者分析，肯定与这些流亡者的“身份”有关。不管流亡者是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管奥拉比起义是不是民族主义运动，关键是奥斯曼政府如何看待这些流亡者。其实，奥斯曼政府不欢迎埃及人进入叙利亚，可能还有其他原因。[③]不管怎么说，把这些埃及流亡者留在叙利亚是不明智的。

随着埃及政治危机的结束，叙利亚的公共秩序得以逐步恢复，可以说，奥斯曼帝国政府成功地把危机造成的影响降到可以控制的范围。从 1882 年 9 月中旬的冲突之后叙利亚就逐渐恢复平静。当地的英国官员赞扬哈姆迪帕夏和耶路撒冷辖区高级官员劳夫帕夏（Rauf Paşa），是他们与下属官员共同成功地维持了公共秩序。总体来说，叙利亚的穆斯林和基督

---

① 电文大意如下：在清真寺长大的人们学会了宗教知识后，他们宁愿与他们的孩子和志同道合者被绞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愿意被流放到国外。我们的素丹是伊斯兰国家和宗教的守护者，不会让忠实的信徒被异教徒耻笑。

② Ş. Tufan Buzpinar,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on Syria, 1882 – 83”,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1, January, 2000, p. 87.

③ 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人占领和统治过叙利亚，奥斯曼政府始终担心埃及人会用各种方式对叙利亚施加影响，这种担忧似乎也有其理由。在 1868 年就有人传言，说叙利亚有可能被并入埃及。1876 年，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告知大维齐萨法维帕夏：埃及吞并叙利亚的谣言要引起注意，它会引发叙利亚民众请愿或革命。这些传言属实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受这些传言的困扰。详见：Ş. Tufan Buzpinar,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on Syria, 1882 – 83”,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1, January, 2000, p. 88。

徒之间本来有摩擦，而埃及危机则强化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确信奥拉比的“叛乱”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并且威胁到奥斯曼政府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然而令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不快的是，叙利亚穆斯林没有认识到奥拉比起义带来的危害。

尽管英国和法国都曾表示拒绝派军队进入埃及，其他欧洲大国也表示自己“没有兴趣”参与，可每个欧洲强国都对解决埃及内政有着积极的意向，并且都在埃及享有投资权。哈米德二世没有向埃及派出军队，他仍然是埃及的宗主，是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英国政治家非常肯定地声称英国对埃及的占领仅仅是暂时性的。[①]埃及的危机也影响到南边的苏丹。英国人从埃及派出军队，对苏丹的马赫迪作战，1883 年，希克斯率领的英国远征军被马赫迪的苏菲派信徒歼灭。面对日益增加的混乱，英国派遣戈登将军远征苏丹，结果被马赫迪常胜军彻底打败。[②]

1882 年的事件是埃及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英国人打败了埃及军队，彻底占领埃及，使埃及进入被外国强权主宰的时期。后来的埃及人为了取得独立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882 年之后的埃及，仍然受着奥斯曼帝国的影响，也受着英国的支配，受少数欧洲人的控制。英国人总是以尽快结束占领为幌子，为其继续控制埃及提供堂皇的理由。按照英国人的说法，他们派驻埃及的官员只是充当奥斯曼帝国埃及行省政府的“顾问”。但这些“顾问”的建议埃及统治者必须接受和遵守。英国派驻埃及的代表、专员在 1914 年之前都是起实际作用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顾问”或“代理”的职位并不高。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名实不符”，也限制了英国人在埃及进行更有效的改革，没能解决埃及社会的实质性问题。[③]

自从英国占领埃及后，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权就变成名义上的统治。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早就变成了一种象征，因为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按照 1841 年的条约就获得了对埃及世袭统治的权力，埃及

---

①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110.

②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110.

③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9 - 240.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但取得自治地位这一事实被奥斯曼政府认可，这样一种现状是西方大国促成的。当然，埃及军队的规模受到限制，自治权也是有限的。根据1841年的条约，埃及总督每年要向奥斯曼政府纳贡；埃及的陆军和海军要穿戴奥斯曼帝国的军服，使用奥斯曼帝国的军旗；埃及铸造的货币要印上奥斯曼素丹的名字，式样要和奥斯曼帝国的货币相同。也就是说，埃及表面臣服奥斯曼帝国的这种半独立状态，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一直延续到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英国占领埃及后，却有意要保留奥斯曼帝国象征性的宗主权。1885年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英国军队撤离埃及、奥斯曼帝国和英国同时派专员到开罗等。协议最后落空了，因为英国并没有撤军，但奥斯曼帝国派专员艾哈迈德·穆塔尔（Ahmed Muhtar）到开罗，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权的标志或象征，奥斯曼政府派驻埃及的专员在英国占领时期一直存在。[①]

按理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协定失效，专员穆塔尔就没有合法的理由留在开罗。因为奥斯曼帝国在埃及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也没有多少权威，穆塔尔背后也没有军事或经济力量支持。奇妙的是，穆塔尔保持专员一职长达24年（1885—1909年），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英国人也需要穆塔尔这样的奥斯曼帝国专员。与其说穆塔尔是奥斯曼帝国行使名义主权的象征，不如说是英国占领埃及需要这样一个幌子。同时也应该看到，穆塔尔专员的存在，对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权威、合法性、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1876—1909年），行省和属地挑战奥斯曼帝国素丹的权威、地方对抗中央政府的事件不断发生，标榜“素丹对埃及拥有主权”是向分离主义者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性和强大权威不仅是国内公认的，也是国际上认可的。[②]

对奥斯曼素丹来说，得到国内边远省份和属地的忠诚，是很重要的，但得到欧洲大国的认可更重要。埃及被英国占领，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损失很大，但也有“好处”。因为埃及自穆罕默德·阿里1805年当政起就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所谓的帝国统治权只是奥斯曼素丹的一厢情愿。可是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英国宣布承认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宣

---

① Oded Peri, "Ottoman Symbolism in British-Occupied Egypt, 1882—1909",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1, No. 1, January, 2005, p. 103.

② Oded Peri, "Ottoman Symbolism in British-Occupied Egypt, 1882—1909",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1, No. 1, January, 2005, pp. 104－105.

称英国军队是临时维持埃及的社会稳定，而且1885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平等地"坐在谈判桌前，商讨如何解决埃及问题，无异于向国际社会表明：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主权是得到欧洲大国保证的。哈米德二世和奥斯曼政治精英们就需要这样的一种效应。

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后，穆塔尔于1909年离开埃及，奥斯曼政府与埃及的这种象征性的主权关系结束。按照奥德·佩里的观点，奥斯曼帝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是"象征性"的还是"真实"的，都没有本质差别。因为，象征性的做法产生真实的政治意义，而真实的政治意义也是通过象征性的做法体现出来。[①] 1909年之后发生的变化表明，埃及政府不再把奥斯曼素丹当作伊斯兰世界的主宰者，不再高看奥斯曼政府，附在奥斯曼政府专员身上的这种象征关系结束，也就宣告奥斯曼帝国权威的终结。

总体来说，1881年9月至1882年9月的埃及政治危机，反映出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反映出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真实态度；其二，反映出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其三，事件清晰地表明，英国人和奥斯曼统治者均未能真正理解奥拉比背后的社会支持力量。[②] 其实，自从1878年的塞浦路斯协定之后，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之间原来密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双方的怀疑和不信任就增加了。1881年英国干预埃及事务，引起哈米德二世的警惕；而英国首相和外交官们也不信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1882年1月，英国和法国联合发出照会，许诺支持赫底威，反对奥拉比。在奥斯曼帝国看来，这是对奥斯曼帝国主权的侵犯，因为支持赫底威还是支持奥拉比应该是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事。奥斯曼政府只想保持埃及现状，不希望由于埃及危机引发其他阿拉伯行省的问题。[③] 正因如此，在奥拉比起义之初奥斯曼政府的政策是温和的、谨慎的。

很显然，对奥斯曼统治者来说，"埃及问题"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间发生了。奥拉比是"叛乱者"还是"爱国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被

---

① Oded Peri, "Ottoman Symbolism in British-Occupied Egypt, 1882—1909",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1, No. 1, January, 2005, p. 116.

② Selim Deringil, "The Ottoman Response to the Egyptian Crisis of 1881—82",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1, January, 1988, p. 3.

③ Selim Deringil, "The Ottoman Response to the Egyptian Crisis of 1881—82",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4, No. 1, January, 1988, pp. 6 - 7.

“看作”叛乱者。尽管乌勒玛和维齐们是同情奥拉比的，但奥斯曼素丹主要考虑的是，奥拉比反对的赫底威是奥斯曼素丹的合法代表，是埃及的合法领导人。奥拉比的行动，将在帝国的其他阿拉伯行省产生不良影响。

第八章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持续统治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中，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Ⅱ）[1]以“专制、冷酷、残暴”出名。在中东通史中，一般都要讲到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如何实行暴政，在统治期间他的专制如何登峰造极。但是，阅读更为详细的晚期奥斯曼帝国史资料后就会发现，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当政的33年里（1876—1909年）所做的事情不少：既有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也有涉及宫廷内部矛盾的小事；既有明显的政绩，也有不可抹掉的劣迹；有时残暴，有时则忍让。单从施政情况看：一方面，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处置了改革派代表人物米德哈特帕夏；另一方面，他没有停止西化改革，也没有向西方国家一味地妥协退让。尤其在发展经济、改善交通等方面做了较大努力。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连连丧失疆土，好几块属地从帝国分离出去，人们可以指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缺乏治国方略，但也应考虑到奥斯曼帝国在两个世纪里走下坡路的事实和欧洲大国干涉内政的事实。以最简单的思维推断：这位素丹当政33年，是晚期奥斯曼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假如只有暴政而没有业绩，他怎么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统治呢？因此，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评价，涉及对奥斯曼帝国33年历史的判断，我们需要做客观的分析。

第一节　专制统治的表象与实质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阿布杜·哈米德二世得到的评价确实不佳。人们说他反对宪政，破坏改革，是暴君，是独裁者，西方人还称他是“血腥的素丹”和“该死的哈米德”。由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

---

① 有的文献中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名字是 Abdü-lhamid 或 Abdül-hamit Han 等。

制，由于他的暴政，才引起了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09年被废黜，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之下，具体的事实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专制和“暴政”？

一　奥斯曼素丹专制的表现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1876年上台时留给本国人和西方人的印象是好的。表面上看他是一位思想开明、支持君主立宪制的统治者。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任命米德哈特为大维齐，宣称将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因此取得了立宪派的支持。在他即位之后，很快起草了《宪法》。刚起草的这部《宪法》以比利时和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初稿完成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却表示反对，认为这部《宪法》对奥斯曼素丹权力的限制太多。米德哈特帕夏等立宪派被迫做出让步，重新修改了草案。1876年12月，这部奥斯曼帝国《宪法》（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正式颁布。《宪法》规定，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两院制议会，各族人民按比例取得代表权；重申帝国内所有臣民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保证宗教信仰、教育、出版自由；课税平等；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宪法》还特别规定，倘若奥斯曼素丹解散议会，新的议会必须在六个月内开会；并进一步规定，《宪法》条款不得以任何借口停止执行。[①]

1877年的议会选举如期进行。根据1876年10月28日颁布的选举法，给予安纳托利亚的省份、非洲行省、欧洲省份不同比例的代表名额。1877年3月19日，第一届奥斯曼帝国议会在道尔马巴赫彻宫（Dolmabahçe Sarayı）的接待大厅开幕。各部大臣、贵族代表、议员和外国官员参加了开幕仪式。阿哈迈德·维菲克（Ahmad Vefîk）帕夏当选为议长。[②] 这届议会由一个25名官员组成的参议院和一个拥有125名议员的众议院构成。

问题在于，选举过程与宪法规定的程序相抵触，选举结果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亲信和对立宪一无所知的人居多。所以这个议会变成傀儡式的机构，奥斯曼素丹只是借此给自己的政府装点自由与民主的门面。尽管如此，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还是发现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他并不能完全

---

①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②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446.

控制议会，对此感到很不满意。1877 年 4 月爆发俄土战争，奥斯曼军队遭到惨败。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将战败的责任推给立宪派。他将米德哈特解职并流放到国外（后来被杀害），7 月下令把所有的议员送出了君士坦丁堡，《宪法》中涉及建立代议制政府的部分条款也暂时搁置。1878 年 2 月，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强行解散议会，宣布停止推行宪政。尽管从未公开废除《宪法》，还继续把它刊在帝国年鉴上，但不再召开议会，《宪法》实际上被束之高阁了。奥斯曼帝国的宪政，其实议会仅召开过两次，存在了五个月时间。此后奥斯曼帝国长达 30 年没有召开过议会。一场旨在拯救帝国的立宪运动，就这样名存实亡，只保留了一纸空洞的文书。从此，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开始了他 30 多年的专制统治。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的专制统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操控官吏的任免，素丹集大权于一身

由奥斯曼素丹任命各部部长，又想办法限制这些部长的权力。通常的做法是，任命一些与部长立场不一样而完全听命于奥斯曼素丹的副部长，起到钳制部长的作用。部长们的工作变得像秘书工作，这样有利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权力控制。这种统治模式产生的主要后果是：政府官员腐败，政府机构的效率迅速降低，立法机关也成为严重腐化的机构。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几十年的皮尔斯写的回忆录里描述："如果你想与法官取得联系，你要找到这个人并与他做交易……"[①] 平时只要官员们顺从素丹的意愿，素丹便默许官员们的贪污、受贿行为。当时，关税的一部分由财政部征收，另一部分由高级官员征收。各省的省长和总督要花钱买官、保官，他们经常拿出一部分工资，交给宫廷长官，为的是保住并得到更合适的职务。而作为回报，宫廷默许他们对各省的勒索行为。政府机构各级官员的腐败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严格控制舆论，限制甚至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的后期对居民的集会、言论等权利加以严格的限制。各地的民众集会被禁止，甚至举办婚礼和球类运动也必须得到官方的批准，即便批准也要审查客人的名单。[②] 官方报纸上印刷的内容同样

---

①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6.

②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6.

要接受审查。例如，埃及当时已被英国人所占领，但官方报纸上或官方文件上却宣称埃及在奥斯曼素丹的直接统治下；由于亚美尼亚问题，“亚美尼亚”这个词被禁用，新闻审查官员宣称，“没有亚美尼亚这个地方”。禁用的名词还有“马其顿”，理由是马其顿属于其他行省，其名称自然要被取代。基督教徒的宗教作品很难获准印刷，戏剧表演同样受到严格的审查，著名的剧目“哈姆雷特”、“朱利亚·凯撒”和许多法国历史剧被禁演的理由是剧中有杀死国王的场景。① 尤其对新闻报刊实行查禁，试图遏制改革派和革命者的宣传。新闻报刊的严格控制，目的是阻断人们获得外界信息，为此甚至不惜编造假新闻以欺骗民众。②

（三）打击反对势力，严厉镇压各地的反抗活动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停止宪政后，打击改革派人物，用免职、流放、暗杀、监禁等方式打击、清除敢于反对素丹权威的人（各类关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的著作中有详细描述，恕不赘述）。他刚即位时奥斯曼帝国两个政治派别正在形成，一派是自由主义，另一派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学习西方，主张建立立宪政府，进行财政改革，鼓励发展工商业；保守主义者由那些图谋私利的、有野心的、冷酷而又心胸狭窄的人组成，他们维护专制统治，抵制改革。③ 阿布杜·哈米德二世有时在两派之间搞平衡，有时利用一派打压另一派，总体上还是不愿意看到统治集团陷于内斗。在他统治的30多年里，的确遇到很多难题，他本人要保持最高权力，防止内部争斗和分裂，为此耗去许多精力。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严重，不少地方出现强烈的反抗活动。1894—1896年发生政府军队和库尔德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为了平息事变，“几乎所有的亚美尼亚人被赶出君士坦丁堡，那些勤劳的亚美尼亚族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们丢了工作”④，他们的家人失去了经济来源沦落到挨饿的地步。许多有识之士指责阿卜杜·哈米德

---

①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p. 226－227.

②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8页。

③ 自由主义派在雷希德帕夏、富阿德帕夏和阿利帕夏死后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米德哈特帕夏、侯赛因·阿伍尼帕夏。保守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是达马德·杰拉勒丁和雷迪夫帕夏。

④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7.

二世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暴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受到怀疑的穆斯林也毫不手软，受怀疑的人常常从首都被流放到边远的省。显然，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这种做法，将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都逼到了反对派的阵营。[①]

（四）建立严密的特务系统，实行高压政策

为了掌控一般民众，防止反抗活动发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一个人统治这个帝国"，在帝国历史上首次广泛建立警察机构和特务系统。[②]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特务系统是严密的，他将密探派往全国各地，这些密探随时向素丹报告各地的情况。凭借着无处不在的特务系统，在帝国领土的每一处以及每一个社会群体中培养代理人，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能清楚地了解到各地的革命活动。数以万计的人被告发，并被带往王宫或警察局接受秘密调查，这些人来自不同阶层，不同信仰，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绝大多数人没有进行公开审判，而是受到严刑拷问，在社会上，各个阶层没有安全感。一旦密探和特务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将导致很坏的后果。一方面，每个有自由思想或改革意识的人都有可能被逮捕甚至遭暗杀，恐怖气氛笼罩着帝国，民间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另一方面，西方各种革命思潮仍源源不断地传到奥斯曼帝国，革命书刊屡禁不绝，革命组织取缔一批又新生一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感到非常恐慌。1895 年，奥斯曼政府逮捕"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成员，1896—1897 年进行全国范围的大搜捕。很多从事地下活动的革命者被捕入狱，或被充军、流放，或被迫逃往国外。有能力、有干劲但仇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流放者似乎到处都是。在一些省份，如埃尔祖鲁姆省，流放者数量之大，声誉之高——足以做省长和高级官员，1906 年就出现过由流放者领导一伙人受命去替换原来的省长的事例[③]。那些行省变成革命的中心，一旦有某个组织宣布革命，整个帝国都会响应。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依靠他精心布置的间谍网，直接为他提供情

---

①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8.

② Şebnem Pişkin, *Sevgili Abdülhamit Han*, Tepkapı, İstanbul, 2011, s. 6.

③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7.

报。[1] 密探还深入军队，搞得人人自危，军人之间感情冷淡，没有真正的信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害怕任何一种进步思潮在军队中传播，但派出特务、密探的做法，引起军官们的反感。其实，特务和密探带来紧张气氛是一方面，关键是部队中提拔军官不是依靠战绩或能力，而是靠关系和门路。一位曾在英国海军服役的能干的官员曾说，他便是依靠他的妻子和一位宫女，使他得到提拔。这种现象不仅在陆军中存在，海军中也是如此。[2] 通过军事学院考试的年轻官员被派到各省军团，不允许返回首都附近的驻地。与其说是“委派”，不如说是“流放”。军队中的不满情绪在蔓延。

（五）把宗教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也相信宗教的力量，用宗教加强统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倚重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宗教界人物——包括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胡达·赛雅德（Abul Huda al-Sayyadi）和他的门徒艾哈迈德·伊扎特（Ahmed Izzat）帕夏以及来自的黎波里的穆罕默德·扎费尔（Muhammad Zafir）等。这些人拥有较大的权力，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有一些影响（除了艾哈迈德·伊扎特帕夏在宫廷任职，其余的人主要在宣传部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统治与19世纪他的前几任有所不同。坦齐马特时代的政治家们虽然与伊斯兰教绝无敌意，但在改革中坚定地限制伊斯兰教的公共职能，把伊斯兰教看作改革的对立面和奥斯曼主义纲领、世俗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政策本质上没有大的变化，伊斯兰教在教育和法律方面的职能进一步被限制，但是这时伊斯兰教被包含在奥斯曼主义纲领中，新的目标要使奥斯曼帝国更加稳固，要让伊斯兰教发挥作用。[3] 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拥有哈里发头衔，他以伊斯兰思想为旗帜，团结广大的穆斯林，确保穆斯林对奥斯曼素丹—哈里发的忠诚，所以“泛伊斯兰化”也是他的基本政策之一。[4] 在帝国境内，“泛

---

①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e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p. 180 - 181.

②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8.

③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 181.

④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148.

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有助于团结穆斯林维护国家统治，鼓励穆斯林共同防止异教徒对帝国的分裂。宫廷对伊斯兰的虔诚——如花费资金修缮清真寺，扩大宗教书籍的出版，使得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比前几任统治者获得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帝国境外，“泛伊斯兰主义”发挥完全不同的效用。面对俄国入侵和分离主义倾向的日益严重，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把“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反对所有欧洲强国的强有力的外交武器——尤其对付俄国、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内有穆斯林臣民的国家。[①] 既然宗教是统一和稳定的基础，那么自然就是臣民服从和忠诚的基础。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对哈里发的认可，有利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的合法性。奥斯曼素丹是伊斯兰的哈里发，他为帝国尽职，就等于为所有的穆斯林服务，哈里发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就是众多力量所凝聚的焦点。[②] 当然，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哈里发地位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在他统治的33年里，哈里发问题一直是被热议的。1877—1909年，国内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字的文章，都是以此为主题，英国、法国、印度、埃及的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也讨论哈里发问题。[③] 客观地说，奥斯曼帝国推行新的改革方案，是全方位地改变帝国的管理结构，不得不依赖各阶层的支持，尤其是宗教阶层的支持。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颁布《宪法》而没有执行宪法，也有宗教方面的考虑。在奥斯曼帝国，有不少对宪政持反对态度的大臣和宗教界人士认为宪政限制了“沙里亚”（伊斯兰法）赋予素丹—哈里发的权力和权威。1876年颁布《宪法》，是因为“宪政主义者”暂时占上风，能够压制各种反对意见。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属地一连串的危机，尤其是1877—1878年对俄战争的惨败，加上实行宪政两年的经历，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开始确信，奥斯曼帝国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统一，而能维护奥斯曼帝国统一的实践基础是伊斯兰教。因此他停止了议会，实行专制，并越来越

---

①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p. 181 - 182.

② Weismann Itzchak, Fruma Zachs, *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 B. Tauris;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5, p. 26.

③ Weismann Itzchak, Fruma Zachs, *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 B. Tauris;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5, p. 26.

强调伊斯兰教的作用和穆斯林的统一。①

总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从1876年上台执政，直到1909年被废黜，专制而独断地统治着正在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欧洲学者常常将坦齐马特时代的自由主义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的专制主义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是多么好而后者是多么糟。这一比较把1877年米德哈特帕夏被流放作为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分水岭。似乎1877年之后的奥斯曼政治是一种倒退。

二　奥斯曼素丹的“暴政”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被称为“血腥素丹”，是因为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情况是：1894年夏末，库尔德人摧毁了24个亚美尼亚村庄，用残酷手段屠杀了他们所能发现的每个亚美尼亚人。② 据说库尔德人有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支持。1895年9月30日，亚美尼亚人在君士坦丁堡示威游行，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加入其中，扰乱了首都的安宁，激起更大的暴乱和流血冲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准备派警察恢复首都秩序，但因外国大使们指责他单方面镇压亚美尼亚人，他再没有采取措施，于是首都混乱持续多日，其他城市也发生类似情况。③ 同年10月至整个11月，亚美尼亚人被大批屠杀，有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城镇和村庄，几乎都遭到浩劫，埃德萨、凡城也遭受洗劫。1896年8月，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住处遭到暴徒袭击。当时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也采取了行动，他们占领土耳其银行，但遭到奥斯曼政府军队镇压，城市里出现为期三天的有组织的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一种说法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鼓动库尔德人组建了一支军事力量，他的密探散布谣言引起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怨恨情绪并相互仇杀，奥斯曼政府并未采取措施来制止大屠杀，而且奥斯曼军队

---

① Weismann Itzchak, Fruma Zachs, *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 B. Tauris;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5, p. 25.

② William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p. 429.

③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04.

也参加了大屠杀。[①] 欧洲大国曾发出两份照会给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要求停止暴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表面上接受外国人提出的方案，实际并未采取行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判断，欧洲大国因利益上的冲突而不会进行干预。

单从镇压和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暴行来看，指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血腥素丹”并没有冤枉他，我们应该弄清楚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为什么这样对待亚美尼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眼里一直是顺民，奥斯曼土耳其人没有对他们实行过于严厉的压榨政策。可是19世纪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试图取得独立，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攻击奥斯曼帝国的税官、邮差、法官，屠杀普通村民，迫使农民和商人躲藏起来，或因恐惧而支持这些革命者。[②] 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还采取极端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促成英、俄等国进行干预。

由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人数不多，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对他们的活动持淡漠态度，所以行省警察足以应对他们。不过，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几代人并肩相处的局面从此彻底被破坏了。阿布杜·哈米德二世担心亚美尼亚高地的省区从帝国分裂出去，因而不允许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政府或者实行自治。为了消除成立一个亚美尼亚国家的可能性，他对亚美尼亚人的反抗活动进行了坚决镇压。

无论何种理由，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镇压亚美尼亚革命运动的残酷手段应受谴责。至于有些书籍把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保加利亚人也算到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镇压保加利亚起义（当时有59到60个村庄被焚毁，1万多人被活活烧死）[③] 发生在1876年5月至6月，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8月31日上台的。当时一些欧洲人由于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反感，或出于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言辞中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把亚美尼亚人被屠杀的人数夸大到40万，也把前任素丹屠杀保加利亚人的事件都当作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暴政”了。

---

①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125.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02–203.

③ Edwin Pears, *Life of Abdul Hamid*, London, 1917, p. 65.

三　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实质及根源

前文列举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甚至“暴政”的表现，接下来要分析专制的实质及根源。

首先要考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当政时期奥斯曼帝国所处的不利环境。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近东危机”发生的第二年上台执政。本来镇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农民起义是内政，但由于俄、英、法等强国插手，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也成了“国际事件”。1877 年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发起战争，奥斯曼军队失败。登基不到两年的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被迫与俄国签署屈辱的条约《圣斯蒂法诺条约》（1878 年 3 月签订），承认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独立，波、黑两省获得自治；俄国得到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而此时聚集在柏林的欧洲大国的外交家们在计划着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属地。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十分精明地认识到，大国争夺的本质是“政治上竞争而经济上联合”。欧洲事态的发展，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决定依赖一两个欧洲大国而抵制其他大国。当时，法国与英国处于敌对状态，英俄在近东和中亚地区是竞争对手，德国则是英国的新对手，而且对近东的经济资源表现出极大兴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这些变化的判断是基本准确的，但欧洲大国采取了直接的军事行动，奥斯曼帝国无力对抗。到 1878 年为止，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和罗马尼亚完全脱离奥斯曼帝国，塞浦路斯岛也在这一年被英国占有，保加利亚取得部分独立，奥斯曼帝国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初期就失去大约 3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81 年法国占领了突尼斯，这一事件刺激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而 1882 年英国又占领埃及，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非常愤怒。后来青年土耳其党人指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没有派军队进入埃及，坐视埃及被英国占领。其实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当时面临两难境地：他不希望埃及革命，派军队进入埃及是合理的，但他深知，奥拉比不仅仅是民族主义领袖，也是对抗基督教强国的伊斯兰守卫者，他不愿意派遣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镇压埃及人反抗外国入侵的行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也憎恶英国入侵埃及（因为这是无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要考虑自己和英国一道进兵埃及引起的后果。假如他同意英国提出的条件，法

国会派军队占领叙利亚。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十分清楚，黎巴嫩山区的马龙派教徒会借机制造骚乱，正好给了法国一个进入近东的借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还顾虑俄国以此为借口重新占有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面对窘境时，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习惯性地推迟做出决定。索尔兹伯里担任英国首相期间（1885—1887 年）曾希望与奥斯曼帝国商讨英军从埃及撤军的问题，以摆脱外交上的不利局面。英国的建议得到了奥斯曼帝国高官们的认同，得到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同意，但经过长期谈判之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拒绝签署协议。后来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要求重新谈判，却被英国拒绝。[①] 失去埃及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心里留下隐痛，以至于后来禁止奥斯曼帝国的出版物中出现“埃及”这一地理名词。10 年后由克里特岛的起义引发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 1897 年的战争。奥斯曼军队打败了希腊军队（这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次胜仗），但欧洲大国迫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接受克里特岛在希腊管辖下自治的决定，奥斯曼帝国仅仅得到一笔战争赔款。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无法阻止欧洲大国对巴尔干地区和北非的控制，更无法阻止大国对帝国的干预。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统治，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整体来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确失去了大片土地——不是所属的公国独立，就是行省被欧洲大国占领，可以称得上“丧权辱国”。但放在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发展和对外扩张席卷世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衰弱国家没有能力抵挡这一趋势。巴尔干诸国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本来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内政，但欧洲大国干涉和插手，使“内政”国际化，被几个大国摆到欧洲人会议的桌面上讨论，实际上已变成了“外交事务”。在与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德国任何一国或几国打交道时，欧洲大国必定在巴尔干问题上做文章，暗中或公开支持属国的分裂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因此变成了“内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主动走近德国，把德国看作抵制其他欧洲大国的力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变被动为主动的做法，确实有效地防止了欧洲大国对奥斯

① Eversley, *The Turkish Empire from 1288 to 1914*, Howard Fertig, New York, 1969, p. 346.

曼帝国的瓜分，延缓了帝国的衰亡。[①]

其次，要看到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内实行专制的基本原因。

直观地说，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无非是为了维护统治，不希望失去最高权力。一般认为，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内实行的集权和高压政策源于他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憎恨和对改革的恐惧。他认为欧洲的政治文明会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危害，因而憎恨欧洲人，憎恨帝国境内的基督徒。他讨厌那些来自欧洲的政治家们对他喋喋不休地提出改革建议，因而对外国人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强烈不满。[②] 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以及其他的基督徒，还有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者，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都不喜欢，所以，他停止推行宪政，打击自由主义派，是他必然的选择。

很显然，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刚上台时，权力并未巩固，对整个帝国的各种力量也缺乏了解。从这一角度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赞成米德哈特帕夏的主张，颁布《宪法》，实行宪政，纯粹是一种必要的政治妥协。等他完全掌握权力，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首先发现《宪法》和议会对自己的权力限制较大。另外，弥漫到巴尔干等地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以各种形式对抗着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力求保持的秩序。[③] 如果不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权力，帝国的行省和属地就会分裂。通史和教材中说，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反对宪政，主要表现是杀死了改革派米德哈特帕夏，然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被米德哈特帕夏扶上素丹宝座的。换个角度看，米德哈特在一年内先是废黜阿卜杜·阿齐兹，扶持穆拉德五世，三个月后又废黜穆拉德五世，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上台，可见他能够操纵奥斯曼素丹的废立，权力之大可想而知。后世的研究者宁可相信，流放并处死米德哈特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反对宪政的手段。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当政初期颇有好名声，“至少与前两任素丹相比，他是一位聪明、肯上进

---

① 单从国土丧失来说，虽然不能阻止巴尔干属地的脱离，但奥斯曼帝国仍在亚洲行省保持了完整的统治权。即使在巴尔干地区，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并没有完全丧失控制权，保加利亚、门得内格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都是在 1908 年之后脱离帝国的。

②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100.

③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106.

的统治者。他不奢华，饮酒有度，思维敏捷"[①]。明白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当政之初的国内形势，就不难理解他的反常行动。

其三，哈米德二世不健全的性格影响他的政治决策。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性格狡诈、敏感、冷酷，外在的表现就是偏执、多疑、杯弓蛇影，有时行为诡秘。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性格的形成有深刻的根源，西方学者进行了专门分析。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他母亲所生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于 1842 年 9 月 23 日降生在彻拉安宫（Çırağan Sarayı），他 7 岁丧母。[②]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母亲的身份是奴隶（还是一名舞女），宫廷传言说他的父亲不是素丹阿卜杜·麦吉德，而是一名亚美尼亚厨子。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不是素丹阿卜杜·麦吉德的亲儿子并不重要，关键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从童年到成年一直生活在后宫之内，与奴隶、女人和太监们生活在一起。而这些人大多素养不高，迷信、贪婪并唯利是图，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成长不利。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承认他自己是早期环境和所受教育的产物，这种环境决定着他的生活方式。[③] 更为不幸的是，他的母亲死于肺结核（当时她年仅 26 岁），他的父亲阿卜杜·麦吉德 39 岁时也死于肺病。他的叔叔阿卜杜·阿齐兹被废黜了，不久自杀或被谋杀。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穆拉德五世也被废黜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推上素丹宝座的。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本人也是身材不高、体弱多病的（一说他个头高、肤色黑、鼻子长[④]），他不仅目睹了宫廷的阴谋，而且遇到过几次未遂的政变。他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加上关于他出身问题的流言，带给他的是深深的恐惧和不安，这一切导致了他的性格扭曲。幸好管教他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皇娘"，还有专门的辅导教师，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阅读了东方的诗歌名篇。[⑤] 这样一种性格的独裁者，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铲除异己，维护手中的权力。

本来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品行如何都是私人问题，但阿卜杜·哈米德

---

①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张增建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1 页。

② *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ıratım*, Hareket Yayınları, İstanbul, 1974, s. 31.

③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p. 99.

④ Şebnem Pişkin, *Sevgili Abdülhamit Han*, Topkapı, İstanbul, 2011, s. 6.

⑤ *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ıratım*, Hareket Yayınları, İstanbul, 1974, s. 31.

二世把持奥斯曼帝国内外政策，整个帝国处在他的统治之下运行 33 年，作为专制君主，他的性格和品行都直接影响着帝国的政治命运。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主要是穆斯林臣民中那些保守的、反对革命的群体，这些人也把他看作对抗土耳其青年党、非穆斯林群体以及西方基督教势力的领袖人物。军队也忠诚地站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一边，所以他能始终把握权柄。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怀疑身边的每个人，尤其害怕大臣们私下串联，听说某两个大臣私下会面，马上要询问清楚。在他统治期间，数以千计的土耳其人被处死或流放。[①] 至于屠杀亚美尼亚人，有的书籍中猜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讨厌亚美尼亚人是因为关于他出身的传闻使他不快。其实，他残酷镇压亚美尼亚人，主要是害怕亚美尼亚革命会导致东安纳托利亚省的分裂，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过，残忍手段的使用，还是与他的性格有关。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性格和品行，还有另外两个特征：一是他对宗教的狂热，二是他在外交方面准确的判断力。这两个特征带给奥斯曼帝国的是正面影响。他对伊斯兰教信仰非常忠诚，对基督教无限蔑视和憎恨。他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政策，鼓吹所有穆斯林联合，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团结穆斯林，维护伊斯兰世界的秩序。在对外关系中，面对列强虎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总是能较为准确地判断形势，尽量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轻易不把自己陷进欧洲大国争斗的漩涡中。

四　关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评价

通过分析可知，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一个带有性格缺陷的人，对待政敌极端无情，对待大臣极不信任[②]，镇压亚美尼亚人手段残酷。不过，他杀死或驱赶改革派人物，不完全是因为反对宪政，而是权力斗争。他打击改革派，是因为不想削弱和改变奥斯曼素丹的绝对权威，他并不拒绝经济、技术、教育、社会习俗的改革。他执政时期也是奥斯曼帝国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最多的时期。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实际上是很难准确评价的。现有的评价把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脸谱化，等于是把奥斯曼帝国

---

① Eversley, *The Turkish Empire, from 1288 to 1914*, Howard Fertig, New York, 1969, p. 317.

② 也有资料表明：素丹哈米德二世周围有一些忠实的可信赖的朋友，素丹有时想念和追忆他们，素丹并不是对谁都不信任。详见 *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ıratım*, Hareket Yayınları, İstanbul, 1974, s. 51 -52。

30多年的丰富历史简单化了。可是，在已有的“暴君”形象被接受的情况下，每提到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优点和政绩，就好像是替他“翻案”，或者听起来是为他的专制和暴政辩解。面对这一困惑，我们只能就事论事，避免做笼统的、定性的评价。涉及具体的问题和判断，可分析如下：

第一，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政绩是应该肯定的。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帝国33年，没有停止西化改革。从当时重要的政策条文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是坦齐马特时代改革的延续，只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的改革在内容、形式方面与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不一样。[①]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帝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较大，对外贸易有所增长，生活习俗文明化，社会开放程度提高。海军和陆军的建设都有成就，在对希腊的战争中也取得胜利。

第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执政能力是不必怀疑的。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确实连连丧失疆土，巴尔干和北非的行省和属地从奥斯曼帝国中分离出去，但并不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缺乏治国能力，完全是因为奥斯曼帝国长期衰弱所致，也是欧洲大国干涉内政所致。巴尔干诸公国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失去的，但奥斯曼帝国出现这样的结果，他的前辈应负主要责任。17—18世纪的许多奥斯曼素丹都贪图享乐、昏聩无能、不理朝政，把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大帝创立的光辉基业毁掉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风雨飘摇中登上政治舞台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是积重难返。面对欧洲大国的瓜分企图，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还是尽量想办法利用英、法、俄、德之间的矛盾，表现出一定的外交才能。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再英明的政治家也没有扭转乾坤之力，何况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君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作为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自然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也要维护帝国政府对广大臣民的统治。试想，倘若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根据西方的建议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革，允许民族自治，只能加快这些民族脱离帝国的步伐。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要维护多民族奥斯曼帝国的统一，而欧洲大国有意制造分裂；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处处受制

---

①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 179.

于西方大国，他纵然制定出合理的政策，也难以执行，即使执行也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第三，西方外交官、作家、旅行家和传教士笔下的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未必都是真实描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粗鲁和愚蠢，常常是西方人的谈资和笑料。"血腥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和残暴，西方的有些宣传明显夸大了。在西方人眼中，帮助巴尔干民族脱离奥斯曼帝国是他们做出的贡献，如奥匈帝国首相安德拉西所说，"从土耳其手中夺得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对文明的拯救"。[①] 西方人描写奥斯曼帝国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下如何黑暗，如何恐怖，这样的书籍大受欢迎，广为传播。另一些资料则出自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宣传机构。因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取得了反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专制的胜利，"青年土耳其党时期"取代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代，于是，他们说阿布杜·哈米德二世阻止宪政，就是践踏了自由。当初反对派揭露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暴政的渲染性、鼓动性的宣传，就被当作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就是说，革命者、立宪派把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看作宪政的敌人和旧势力的卫道者，对阿卜杜·哈米德专制和独裁的评价，有不符合实际的成分的。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揭露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资料，就源于西方人和土耳其革命者的那两类宣传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性格和品行上的问题是存在的，但专制和残暴的程度未必如述者所言。土耳其文回忆录中，说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一位"聪明而又多疑的君主"，[②] 这是很平实的。戴维森认为，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既是独裁者、镇压者，又是改革者、奥斯曼爱国主义者，还是环境的牺牲品"。[③] 这一评价也是客观的，反映出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角色特征的复杂性，也表明这种复杂性的根源是客观环境。

第四，不应该把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看成独断专行，或者是极权政治。西方学者根据史料得出的结论是，奥斯曼政府的实际权力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比以前更大。这一时期的政府，也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稳固。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的 30 多年中，有 28 年由五位首席

---

① Edwin Pears, *Life of Abdul Hamid*, London, 1917, p. 105.

② Şebnem Pişkin, *Sevgili Abdülhamit Han*, Topkapı, İstanbul, 2011, s. 6.

③ ［美］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张增建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8 页。

大臣前后当政[1]，每个人都控制自己的部门相当长的时间，保证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政策的连续性。尽管每个首席大臣不再拥有坦齐马特早期阿卜杜·麦吉德给予大臣的相对独立的权力，或者不再拥有阿卜杜·阿齐兹时期给予阿利帕夏和富阿德帕夏的权力，但不至于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说这些大臣仅仅是执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意志的工具。尤其萨义德和卡米尔很有才能，他们设计并实现了他们的许多政策。当然，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确比他的前任干预政府多一些。[2]

第五，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推行“泛伊斯兰主义”，试图用宗教武器维护帝国的统一，但他并不反对科学，相反，他认为科学和技术可以取自西方，伊斯兰教不会阻碍采用和发展西方科技。他强调伊斯兰教必须在政府法律、社会习惯、教育以及基本忠诚等方面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不需要西方的政治思想来指导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就算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内心多么不情愿，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是他颁布的，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和欧洲人一度相信他能带来进步和自由。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统治留在历史上的印记是深刻的，没有什么力量能抹去那些印记。

第二节　西化的延续与帝国的开放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虽然实行专制统治，但他并未放弃改革和西化，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方面也没有走回头路。这一时期的改革，取得了较多的成就，奥斯曼帝国总体上沿着坦齐马特时代开创的西化道路前进。伯纳德·刘易斯认为，“哈米德二世是一个积极推行现代化改革的人，是坦齐马特改革派的真正继承人”[3]。的确，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把坦齐马特时代改革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以前提出的一些改革构想得以实现。

一　西化改革的延续

其一，改革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头等大

---

① 他们分别是 Mehmed Said、Mehmed Kamil、Ahmed Jevad、Khalil Rif、Mehmed Ferid。

②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 180.

③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89 页。

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

第一，改进军事组织，扩大征兵。第二，注重军队教官的教育和训练，聘请德国军官培训奥斯曼土耳其军事人才。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派遣了许多青年军官去欧洲受训，德国是主要的目的地（这批留德军官中的佼佼者，如后来执掌大权的艾哈迈德帕夏、恩维尔帕夏等）。第三，为缓解正规军的负担，扩大了非正规军的编制。第四，改善军事装备，引进了大量克虏伯公司等德国军工企业所生产的武器。购置新式武器，如给步兵配备来复枪和克虏伯大炮等。为了发展军队的需要，奥斯曼帝国从美国和欧洲购买了大量武器。尤其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刚上台的最初一两年（1876—1877 年），奥斯曼帝国购置的军火中美国军火占 90%。[①] 后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关系加强，向美国购置军火的份额才有所下降。

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建设得益于德国军官的帮助。早在 1833 年，普鲁士的一个军事顾问代表团来到君士坦丁堡，帮助奥斯曼帝国训练新式军队。普鲁士人的守纪、拼搏精神给奥斯曼土耳其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由于财政困难，海军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1876 年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上台后，羡慕德国军队的强大，于 1882 年聘请德国的冯·德·戈尔茨元帅担任奥斯曼帝国的军事顾问。经过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以及军事装备的改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并在战场上显示威力。1897 年奥斯曼帝国和希腊为了争夺克里特岛而开战，在戈尔茨的指挥下，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较短的时间里打败了希腊军队，并收复了色萨利和埃庇鲁斯。这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表明军队建设卓有成效。

其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通过发展市政，精心构建行政管理体系。市政建设的成效是明显的。

其三，教育改革。这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虽然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限制言论自由，但他认为教育改革是推动奥斯曼帝国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国家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受到重视。无论是学校规模还是在校生总数，这一时期都有较大增长。奥斯曼政府也重新组建了文官学校、法律学校、财政专门学校，开放

---

① Oral Sander, Kurthan Fişek, *Türk-ABD Silah Ticaretinin İlk Yüzyılı (1829—1929)*, İmge Dağitim, İstanbul, Ankara, 2007, s. 19 - 20.

办学。[1] 1877 年奥斯曼政府改组和扩建了文官学校，增加了现代科学的课程；也扩充了原来的陆军学院、医学院等。开办这些学校，主要目的是为陆军、海军和行政机关输送各类人才。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主要贡献是扩大了公立学校的范围和规模，创办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所大学。[2] 奥斯曼帝国在 1845 年就打算建立一所大学，但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才提上日程。到 1900 年，奥斯曼帝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正式开办。

其四，法律改革。法律改革的着力点，是为司法系统培养受过现代法律教育的专门人才。主要是，组建司法机构，完善法院系统，引进新的司法程序，使政府司法部控制的各级世俗司法机构替代伊斯兰宗教法庭，让领事法庭和混合法庭独立存在。[3]

其五，经济改革。奥斯曼政府重视工业部门尤其是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国家政策向工业部门倾斜，部分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提升。在农业方面则重点改善种植业。政府经济改革的重点是发展基础设施，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基础设施。铁路、公路较快地发展，电话、电报等通信业务扩大，整个国家的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改善。

实际上，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也想推行政治改革，主要是官僚机构的改革，他反对奢侈，反对官场不良习气，但没有把裁撤冗员等计划付诸实践，官僚机构还是老样子。比如，在奥斯曼政府核心机构中，有 40 位元帅、60 位维齐、13 位部长、180 名高级官衔的职员、390 名增补的高级职员、21 位有帕夏头衔的副职、125 位名誉副官、31 名担任实职的侍从。[4] 这么多高级官员，人人想得到利益，政府的效率低下。可是奥斯曼素丹明白，把陈腐的机构变为精简的机构，几乎办不到。所以，机构改革没有进行。

直观地说，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军事改革、技术引进尤其是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效最大。这一时期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已不同于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而是以一种更有分寸的方式推行。在改革过程中，对那些来自

---

①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 179.

②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London, 2001, p. 69.

③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p. 179 – 180.

④ *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ıratım*, Hareket Yayınları, İstanbul, 1974, s. 71.

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都是谨慎地选择和吸纳。如何使教育制度、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适应新时代、适应现代化，是改革者非常重视的。[①]这表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和西化并没有因为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而中断，没有这一时期的改革，坦齐马特时代的事业不会延续，后世的现代化也缺少深厚的基础。

二　对外开放及其成就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取消议会、开始专制的时候（1878 年），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奥斯曼帝国需要一个稳定的财政基础，二是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建设迫切需要得到指导。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明白，这两个难题，只有依靠西方国家才能解决。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英国和法国不信任，他希望通过与德国合作来解决这两个难题。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认为德国将会成为有益无害的盟友，德国会帮助奥斯曼帝国走上正轨，于是他对加强与德国的联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遇到事情总是直接与德国人员商议，他从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工作的德国人中找到了合适的朋友。

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合作，始于修筑铁路。一般认为，奥斯曼素丹与德国官员密切的关系，为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合作尤其是巴格达铁路的修建奠定了基础。[②] 也有一种说法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伊斯兰政治与威廉二世的德国政治没有抵触，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决定修筑一条中东铁路，尤其是巴格达通往波斯湾的巴士拉的铁路，这样可以与印度穆斯林建立联系，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范围。[③]

（一）利用外资修筑铁路

最先规划巴格达铁路的是普雷塞尔。普雷塞尔是德国士瓦本的一名铁路工程师，曾修筑了贯穿欧洲中部至巴尔干地区的铁路。这个人有非凡的影响力，他决心修建一条穿越奥斯曼帝国腹地的铁路。普雷塞尔的一生中有 40 年时间是在为奥斯曼帝国工作。当巴格达铁路的计划还处于规划阶

---

① Yurdagül Mehmedoğlu, *Tanzimat Sonrasında Okullard Din Eğitimi, 1838—1920*, İstanbul, 2001, s. 19

②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 17.

③ *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ıratım*, Hareket Yayınları, İstanbul, 1974, s. 25.

段时，普雷塞尔就来到伊斯坦布尔，那时还没有修筑伊斯坦布尔到安纳托利亚腹地的铁路计划。经过普雷塞尔的劝说，当时的奥斯曼素丹阿卜杜·麦吉德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不仅可以维持统治秩序，运输军队，征收捐税，防范侵略，还可以通过铁路加强帝国各省份之间的联系，开发帝国的资源，使国家富强。1871 年，米德哈特帕夏产生了修筑通往巴格达和波斯湾的铁路的打算。普雷塞尔提出的计划是修筑一条连接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巴格达，直达巴士拉港的铁路。[①]这样一条穿过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现代化铁路，它的前景使普雷塞尔着迷。当然他也知道，必须吸引欧洲人的投资，对铁路经过的土地和附近的居民情况进行调查，这都是很大的工程。

修建这样一条铁路的成本是很高的，奥斯曼帝国的财政负担不起，缺乏资金的问题困扰着它们。直到欧洲人有信心冒险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投资，该项目才启动。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只能先修筑一条从伊斯坦布尔到伊兹米特（Izmit）的铁路，就连这段铁路，在建设中也曾多次停工。奥斯曼政府的官员们明白，开通一条铁路会对改善帝国的经济有很大帮助，但包括德国在内，没有哪个欧洲大国愿意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提供贷款担保。1875 年 10 月 2 日奥斯曼帝国宣布财政破产，铁路计划延期，这一年又发生巴尔干地区的叛乱，奥斯曼帝国一度出现危机，但普雷塞尔依然坚持帮助奥斯曼素丹的立场不变。[②]

危机平息后，普雷塞尔去说服新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普雷塞尔说，一条连接首都和远方行省的铁路，能够强化奥斯曼素丹在整个帝国境内的权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普雷塞尔的说法很满意。1877—1878 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被俄国击败，这一教训更坚定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修筑铁路的决心，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很快批准了普雷塞尔的计划。到了 1888 年，德国的财政援助开始一点一点进入奥斯曼帝国。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派遣普雷塞尔去德国，向德国银行家寻求支持。尽管普雷塞尔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那些原本被期待会投资的资本家们依然认为他的提议风险太大，普雷塞尔不得不沮丧地回到伊斯坦布尔。

---

①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p. 17 – 18.

②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 18.

不过，普雷塞尔很快与符腾堡联合银行的主管阿尔弗雷德·考拉(Alfred Kaulla)会面，寻求他的帮助。阿尔弗雷德·考拉赞成普雷塞尔的铁路计划，并许诺运用他的关系进行财政支持。阿尔弗雷德·考拉回到德国后，将“普雷塞尔计划”介绍给德意志银行的主管乔治·冯·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乔治·冯·西门子被铁路计划所吸引，立即同意与阿尔弗雷德·考拉一起争取获得铁路特许权。当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于1888年登上王位时，乔治·冯·西门子对投资巴格达铁路项目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威廉二世企图扩大德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不过，乔治·冯·西门子还是提醒普雷塞尔，对这样一个项目进行财政支持已经超过了德意志银行一般的职责。德国人一贯谨慎，乔治·冯·西门子也不例外，他觉得除非能保证长期盈利，否则自己无法使银行长期承担对巴格达铁路项目的财政支持。后来阿尔弗雷德·考拉和乔治·冯·西门子直接向德国外交部门求助，希望德国政府对争取安纳托利亚铁路特许权给予协助。德国首相俾斯麦不支持官方参与铁路计划。1888年10月4日，阿尔弗雷德·考拉和乔治·冯·西门子向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递交了他们对铁路计划的投标，很快被接受。11月，德国大使冯·拉多维茨(Radowitz)前往伊斯坦布尔提醒阿尔弗雷德·考拉对铁路计划更谨慎一些。最后，德意志银行还是于1889年3月4日组建了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①]

事情几经周折，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授予德意志银行修建铁路第一段的特许权，乔治·冯·西门子选择法兰克福的菲利浦·霍茨曼公司对铁路工程进行管理。乔治·冯·西门子想使这条铁路变成一个完全由德国人承担的工程——包括雇用德国员工，使用德国材料，并且使德国的投资者获益。普雷塞尔则带着人道主义的心愿，不想让奥斯曼帝国过度依赖外资，并鼓动公众夺回奥斯曼帝国对铁路的完全控制权，并且试图找到新的资金来源。这种尝试遭到了乔治·冯·西门子及其伙伴们的公开蔑视。[②] 1889年11月1日，威廉二世参加完希腊女王的婚礼后，到君士坦丁堡进行访问，会见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威廉二世一行在君士坦丁堡受到隆重的接待。经过这次访问，威廉二世确信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将成为重要的朋

---

①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 22.

②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 23.

友，奥斯曼帝国将是政治上的盟友。成立不久的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由乔治·冯·西门子和阿尔弗雷德·考拉掌控。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立即开始对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路段的铁路建设。[①] 安卡拉路段建成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支持把铁路延长至巴格达，并致电威廉二世，得到了威廉二世的承诺。[②] 1894 年德国在巴格达设立领事馆，筹划安卡拉铁路延伸到巴格达的具体事宜。

为满足奥斯曼素丹的愿望，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提出修筑一条更合算的路线，即从埃斯基谢希尔（Eskisehir）到科尼亚（Konya）铁路的支线。科尼亚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心地带，奥斯曼素丹批准了这条路线，随之双方签署了这条铁路的特许权合同，这条铁路于 1896 年 7 月完全开通。尽管在这条铁路的修建中遭遇了种种困难，铁路修筑者依然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任务。修筑了几条铁路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很快感受到铁路带来的好处。1897 年春天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发生战争，奥斯曼帝国运用安纳托利亚铁路很快将士兵运往前线，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取得战场上的优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深受鼓舞。

1898 年 10 月德皇再次访问君士坦丁堡，两国君主商讨了铁路的延伸问题。随后威廉二世访问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在大马士革，这位基督教国家的皇帝在萨拉丁墓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声称自己是奥斯曼素丹“至死不渝的朋友”，“全世界的三亿穆斯林也可以把他当作可信赖的朋友”[③]。

德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经济投资增大，加上铁路特许权，很快引起英国和法国的警惕。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向奥斯曼素丹施加压力，要求授予他们修筑巴格达铁路的特许状。巴格达铁路的修筑，本来在路线选择上有争议，如今英、法两国的政治家出来争论，工程是否继续进行就成了问题。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坚持认为巴格达铁路应该从安卡拉修到巴格达，德国

---

① 1888 年 8 月德意志银行取得了伊兹米特到安卡拉一段铁路的特许权。合同规定，为降低德国公司的投资风险，从铁路正常运营后，奥斯曼帝国将每年每公里付给承租公司 1.5 万法郎。这段铁路在修筑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但 1892 年顺利通车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这条铁路的修建非常满意，要求威廉二世帮助他把铁路继续延伸到巴格达。

②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 29.

③ Erik J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1993, p. 85.

人建议修一条以科尼亚为起点的铁路更是明智的主意。① 到1899年5月，德意志银行与法国人控制的奥斯曼帝国银行签署了关于向巴格达铁路投资的协定。10月，阿卜杜·素丹哈米德二世宣布，铁路特许权对各方都存在机会。12月，德意志银行向奥斯曼帝国投资20万土耳其里拉，铁路修筑特许权被授予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② 德国代表团多次谈判的辛劳和耐心总算得到回报，这条将由德国人投资为奥斯曼帝国修建的铁路，与几十年前普雷塞尔所设想的大致相似。

巴格达铁路修筑的过程中，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首先，如果没有他与德国人建立的长期友好关系，修筑巴格达铁路这样的工程是办不到的。对德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他对德国人的工作效率、德国人的敬业精神的认识之上的，事实也表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③ 其次，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自己认准的事情决不放弃，勇于克服各种困难，也会把握时机，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巴格达铁路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无论德国人还是奥斯曼统治者，主要考虑铁路所带来的政治和战略利益，至于铁路运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倒在其次。如果按照节省成本的原则，铁路应该从安卡拉延伸到安纳托利亚腹地的开塞利，再往东延伸，然后折向南到摩苏尔，从摩苏尔到巴格达。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考虑到这条铁路距离帝国与俄国的边境太近，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认为这条线路不合适。最后由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划定新的线路，即由安卡拉经科尼亚，到阿勒颇，穿过幼发拉底河到巴格达。这条线路所经过的地形复杂，线路长，修筑和将来运营的成本增加了数倍。

---

①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 32.

② 合同规定，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将用8年的时间修建一条从科尼亚延伸到巴格达及巴士拉的铁路。合同还进一步规定，奥斯曼帝国有权在任何时候从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手中购买铁路运营权。乔治·冯·西门子对奥斯曼素丹在最后时刻才表明态度感到不满，对特许权的有关规定也不满意。他认为奥斯曼素丹的决定是充满风险的，也是不成熟的。乔治·冯·西门子依然主张，这条铁路只有通过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而维持私人企业的性质才有可能盈利。他嘲讽道："所谓的巴格达铁路特许权不过是一张纸，我却为此付出了20万土耳其里拉！"详见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 32。

③ Jonathan S. McMurray,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 Praeger press, Westport, 2001, pp. 32 - 33.

1903 年 5 月 5 日，巴格达铁路特许权的官方合同正式签订。由巴格达铁路公司负责在 8 年内修筑从科尼亚到巴格达和巴士拉大约长达 2400 公里的铁路，合同有效期为 99 年。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希望通过这条铁路把阿拉伯半岛和安纳托利亚紧密联系起来，开发铁路沿线的矿产，使帝国变得富强；且在战时成为奥斯曼帝国运输军队、巩固边疆的生命线。英国和俄国感受到这条铁路对它们利益的威胁，对巴格达铁路的铺设竭力予以阻挠和反对。完成调查后，铁路工程立即开始，一切按计划实施。1903 年 7 月 26 日，科尼亚—布尔古鲁段开建，工程师以德国人居多，技术工人主要来自意大利，而重体力劳动由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完成。这一段铁路于 1904 年 10 月 25 日建成通车。

铁路本应继续向东延伸，但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承担每公里最低担保金，巴格达铁路被迫停工。直到 1908 年 6 月 2 日，在奥斯曼帝国提高关税税率之后，奥斯曼素丹才与巴格达铁路公司达成继续修筑铁路的协议。不久奥斯曼帝国发生政变，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于 1909 年 4 月被废黜，与德国合作修筑铁路的工作也被停止了。德国也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铁路租让权。英、法对此强烈反对，经过反复谈判，英国仍坚决不同意以科威特为该线的终点。1914 年 6 月 15 日，英、德双方草签《格雷—里赫诺夫斯基协定》，英国不再阻挠此路的修建，德国也承诺铁路以巴士拉为终点，不再延伸到波斯湾。[①]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除了帝国政府直接控制修筑权而建成的汉志铁路外，主要依赖外资修筑的有巴尔干铁路、安纳托利亚铁路伊斯坦布尔至伊兹米特段、伊斯坦布尔至安卡拉段、埃斯基谢希尔至科尼亚线，还有世界有名的巴格达铁路。可见，铁路建设的成就是明显的。

（二）对外贸易的增长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由于继续推进西化改革，大规模发展交通运输，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奥斯曼帝国 1878—1881 年的出口值是平均每年 8.551 亿库鲁什（Kuruş），1881—1887 年的年平均出口值是 12.057 亿库鲁什，1887—1893 年的年平均出口值是 13.8975 亿库鲁什，1893—1895 的年平均出口值为 13.5075 亿

---

①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双方未正式签约。巴格达铁路的全线工程拖到 1934—1944 年才分段建成，但它已不再具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国际政治意义。

库鲁什，1895—1899 年的年平均出口值是 14.577 亿库鲁什，1899—1907 年的年平均出口值是 16.722 亿库鲁什，1909—1912 年的年平均出口值是 20.5203 亿库鲁什。[①]

以当时的国际经济背景看，欧洲经济在工业革命之后急剧扩张，欧洲的工厂对原材料的需求以及欧洲产品对于市场的需求猛增。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近东地区，能够满足欧洲的这两样需求。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和属地既能提供给欧洲初级产品——尤其是埃及和叙利亚生产的棉花、黎巴嫩生产的丝绸、安纳托利亚出产的烟草，也能成为欧洲商品的主要消费者。[②]由于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德国制造的许多产品如纺织品、皮革、眼镜等已经充塞奥斯曼帝国的市场。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影响增大，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1888 年德国对奥斯曼帝国出口货物总值为 1170 万马克，1893 年激增到 4090 万马克。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对德国贸易也由 230 万马克增长到 1650 万马克。1900—1910 年间，奥斯曼帝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增长率为 166%。[③]当然，贸易的增长只是奥斯曼帝国经济的一个方面（其实西方国家从奥斯曼帝国获利更多），但贸易增长势头的持续，至少表明奥斯曼帝国是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是有活力的。

（三）外国资本的输入

晚期奥斯曼帝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国资本的输入。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私人银行和联合银行在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行省埃及和黎巴嫩等地建立起来。私人资本投入多种公用事业，如铁路、有轨电车、水、气、电等行业。德国人投资的铁路、港口工程和其他企业在安纳托利亚展开。法国开始着手在叙利亚的港口、铁路工程及其他公用事业等。农业扩大所必需的资金也来自国外。在服务行业中，电报电话业务、港口建设、铁路修筑、运输、电汽工程等，大都是外国公司承办和创建的，并且采用的是外国技术。欧洲的公司也主导了奥斯曼帝国的资源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Ⅱ,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39.（书中的数据引自土耳其文统计数据：*Istatistik-i Umumi*, *1878—1895*; *Ihsaiyat-i Maliye* I, *1895—1911*）

② Trevor Mostyn, Albert Gourani (Advisory Editor),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New York, Sydney, 1988, p. 79.

③ E. M. Earle,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New York, 1923, pp. 104 - 105.

开发。

英、法两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投资始于 1863 年，而德国的投资从 1885 年就开始了。外国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始于 1888 年，1888—1896 年迅速上升，呈现出第一个投资高潮，1896 年之后有一段低迷期，1905 年之后出现第二个高潮。在第一个投资高潮期间，直接投资超过了 3000 万英镑，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 1914 年之前外国在奥斯曼帝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40%。[①] 这些投资大部分（约 2/3）被用于铁路建设，小部分被用于偿还公债。当然，投资者的主要动机是逐利，因为奥斯曼帝国被说服为每公里的铁路给予费用担保，这样会给投资修建者免去风险。巴尔干、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半岛、埃及为欧洲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提供了诱人的投资场所。[②]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似乎成了一个开放的国度，商贾云集。不过，外国投资尤其是对铁路的投资、对公共工程和银行业的投资，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对外资的依赖。[③]

一般认为，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出现财政危机，债台高筑，外国控制了经济命脉。但实际情况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举借外债既没有前任素丹那么多，也没有后来青年土耳其党时期那么多。1876 年，当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上台时，奥斯曼帝国完全停止支付债务，奥斯曼帝国财政破产。也就是说，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上台之前就已经债台高筑，连偿债能力也丧失了。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个举借外债的高峰是 1903—1913 年，其中，大规模举借外债主要是 1909—1913 年（即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④]相比之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举借外债较少。然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承受了前任素丹举借外债带来的恶果，1881 年被迫颁布《穆哈兰敕令》（Muharrem Kararnamesi），同意成立由欧洲债权人组成的公债管理处[⑤]。这个机构控制了部分商品的征税权，等于是奥

---

① Şevket Pamuk,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 1820—1913: Trade,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7, , p. 64.

② Erik J. Zu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89.

③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p. 180.

④ Şevket Pamuk, *The Ottorn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 1820—191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7 – 178.

⑤ Emine Kıray, *Osmanlı' da Ekonomik Yapı ve Diş Borçlar*, Istanbul, İlestişim, yayınları, 1995, s. 34.

斯曼帝国让渡了部分主权。

不过，公债管理处等外国机构的日常管理工作富有效率，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一个欧式财政管理的榜样。在公债管理处，税收问题的裁定按预定时间进行，账目准时结算，该兑现的赠券及时兑现。在公债管理处工作的本地官员和普通服务人员的薪水是充足的，并且会按时发放。[①] 与公债管理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政府财政部各个分支机构的管理混乱，职员的工资经常被拖欠，特权和不公正现象无处不在。[②] 成为公债管理处的一名职员是许多奥斯曼土耳其青年和帝国境内基督教青年的愿望。在奥斯曼帝国的青年人看来，给欧洲人打工要比给本国老板打工好得多。

总体来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由于铁路和港口的修建，使国内各地的联系加强了，与国外的交流畅通了，奥斯曼帝国的资源也得到开发利用。奥斯曼帝国从德国购买武器装备，购买船舰，军事实力也增强了。为数众多的西方传教士、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积极活动，奥斯曼帝国许多城市建起了学校、孤儿院、诊所和医院，让本国臣民感受到生活的便利。社会进步的特征是明显的。

放在世界历史上看，1875—1914 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转折点”之一，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理由是，从 1914 年之后发生的变化是此前没法预料的，而 1914 年之后发生的事情甚至 20 世纪晚期的许多有特色的事情，往往可以从 1875—1914 年里找到源头。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帝国的年代”主要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的时代（1876—1909 年）。奥斯曼帝国在这一时期丧失北非的大片领土，巴尔干地区出现多次危机，但巴尔干的大部分属地仍没有完全脱离奥斯曼帝国（土耳其革命后的 1909—1914 年之间，奥斯曼帝国失去整个巴尔干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几乎退出了欧洲）。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维系国家主权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效的。不过，随着西化改革的深入，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奥斯曼帝国的开放程度有增无减，在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继续维持奥斯曼素丹的专制已很困难。

---

① Donald C. Blaisdell, *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29, pp. 6 – 7.

② Charles Morawitz, “The Public Debt of Turkey”,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75, No. 549 (August, 1902), p. 283.

第九章　土耳其革命与第二次宪政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奥斯曼帝国期间，政治上推行专制统治，但在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方面西化改革的成效不能被抹杀（前一章已做了全面分析）。不过，到20世纪初，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下的帝国存在许多潜在的危机，最终导致了1908年革命的发生，被迫恢复1876年的《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随后，奥斯曼帝国内部出现一连串的政治变化。从1908年到1918年被称为“第二次宪政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后，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关于第二宪政时期执政党的政策得失，我们要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评价。

第一节　土耳其革命

1908年革命前的政治局面是：第一，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继续其专制，各级官员必须听命于他。第二，政府机构的腐败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下级必须顺从上级，升迁的标准是是否顺从长官，高级官员默许低级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和以往一样，各省省长或总督花钱买官，也用钱来保住自己的官。当时，所有的人都感到，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彻底腐败了。第三，这一时期种族和宗教冲突很严重。自从发生亚美尼亚大屠杀之后，哈米德二世的民族政策受到普遍的谴责。第四，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居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的限制更严格，连普通民众的日常集体活动也受到监视。第五，素丹的密探遍布全国，严密的特务系统控制着国家，使民众生活于恐怖中。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往往将“可疑分子”流放到边远省份，并宣称是为了首都的安全。

在高压手段控制下，奥斯曼帝国表面上呈现祥和气象，实质上危机四伏。首先，仇恨奥斯曼素丹的流放者似乎到处都是。其次，民族政策引起

了少数民族不满，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秘密加入新成立的政治组织。复次，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害怕进步思潮在军队中传播，安插在军队中的特务和密探捕风捉影，随时怀疑军官对奥斯曼素丹的忠诚。仅 1908 年，陆军和海军中至少有 2000 名优秀军官被流放到边远省份服役。[①] 一场反抗奥斯曼素丹专制统治的行动正在酝酿中。

一　政治组织的建立及其作用

早在 1889 年，对奥斯曼素丹统治不满的奥斯曼土耳其移民在巴黎组建了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名为“团结与进步委员会”[②]，土耳其文简写 İ. T. C.，英文名称简写 CUP，一般使用 CUP 作为标志。这个组织以“青年土耳其党”（Jön Türkler）[③] 这个名称闻名。领导人是艾哈迈德·里扎，他出身于政治世家，父亲是第一届奥斯曼议会的议员。艾哈迈德·里扎思想较为保守，反对采取暴力。随后，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化。1902 年和 1907 年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上出现了两派，一派支持艾哈迈德·里扎，另一派支持萨巴赫丁（Sabahattin）亲王。艾哈迈德·里扎主张奥斯曼帝国应该追求现代欧洲先进科学，引进民主进步思想。艾哈迈德·里扎这一派拥护民族经济政策，反对欧洲人以亚美尼亚问题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萨巴赫丁亲王是奥斯曼帝国王室的一员，1899 年与他的父亲、兄弟来到巴黎。萨巴赫丁亲王主张实行自由经济，分散权力，自由经营企业，并且赞成引进外国资金以推动奥斯曼帝国经济发展。他这一派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并与欧洲国家合作。[④]

这个秘密政治组织在奥斯曼帝国的雅法、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及地方部队中有一些支持者，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与亚美尼亚反政府组织之间很少有联系或合作。1906 年，一个名为“奥斯曼自由社”[⑤]

---

①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2.

② 土耳其文的名称为*İttihad ve Terakki Cemiyeti*，或者*İttihad ve Terakki*，简写İ. T. C.，英文名称 Commitee of the Union and Progress，简写 CUP。

③ 土耳其文名称 Gençe Türkler，或 Jön Türkler；英文名称 the Young Turks；法文名称 Jeunes Turques。

④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p. 73 - 74.

⑤ 土耳其语名称 *Osmanlı Hürriyet Cemiyeti*，英文名称 the Ottoman Freedom Society。

的政治组织在萨洛尼卡成立，巴黎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第二年与奥斯曼自由社建立联系。[①] 迈哈麦德·塔雷特（萨洛尼卡邮局的电报主管）和恩维尔少校（第三军团的一名军官）是奥斯曼自由社出色的领导者。他们出色的工作使得这个组织与散布在马其顿的各个小团体合作，并与巴黎的艾哈迈德·里扎的政治组织建立联系，采用"青年土耳其党"的名称，并迅速成为奥斯曼帝国内反对哈米德二世专制统治的人们聚集的中心。[②] 萨洛尼卡的政治组织很快变得比巴黎的那个组织更强大，成为这个组织的实权掌握者，在后来的革命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1906—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活动迅速蔓延到整个奥斯曼帝国。无论是巴黎的委员会成员，还是萨洛尼卡的青年土耳其党主要成员，他们经过调查和思考，认为挽救民族危机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建立君主立宪制。

参加政治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也有为数不多的非穆斯林加入。他们要么本来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要么自认为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并且同情"土耳其民族主义"。这个组织以青年人为主。青年人更渴望承担革命的危险和责任，因而成为主导力量——特别是当这个组织的活动处于非法状态时。此外，这个组织中的大多数成员是文官或军官，他们"受过教育"，有的还是学生，有的毕业于某所西式学校，受过高等教育。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使奥斯曼土耳其人现代化，使整个奥斯曼社会现代化，把帝国转变为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像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一样。[③]

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起初的"非法组织"身份，决定了它只能采取隐秘的活动方式，每个成员联系的人不超过三个人，当然他们也不清楚领导是谁（领导们很少在会上露面）。这些年轻人从事的秘密活动，到底有什么目的，给谁办事，不为人所知，因而曾被人当成是奥斯曼素丹的密探。[④] 他们深入奥斯曼帝国欧洲行省的每个城镇，秘密地进行宪政宣传。深受压迫的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纷纷加入这个组织，其中奥斯曼土耳其妇女在推动运动发展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当时哈米德二世的密

---

① Fevzi Demir, *Osmanlı Devleti' nde II Meşrutiyet Dönemi Meclis-i Mebusan Seçimleri, 1908—1914*, İmge Kitabevi Yayınları, İstanbul, Ankara, 2007, s. 41.

②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74.

③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g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53－54.

④ *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ıratım*, Hareket Yayınları, İstanbul, 1974, s. 66.

探或普通警察在公众舆论下不敢对妇女进行检查，妇女正好可以传递那些男人不能传递的信息。[①] 而且，许多富有阶层的奥斯曼土耳其妇女懂得英文或法文，能够将信件或口头信息顺利传递出去。马其顿地区的妇女尤为活跃。她们的思想受到书本中进步知识的影响，对政治宣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该组织有时利用部队中军官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积极地发展成员——尤其是在马其顿的军队中。据说，到 1907 年年底，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已经发誓效忠 1876 年颁布的《宪法》，其余部队也受到影响。其实，爱国者早已蓄积力量，但不得不表面上屈从于军事统一和民族团结大局，因为从 1876 年第一次宪政算起 33 年（而不是一两年）之后才推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否则情况会完全不同。[②] 就是这样一个隐蔽的组织，得到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在两三年内迅速发展，影响遍及整个奥斯曼帝国。

二　1908 年革命

就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活动迅速扩大时，各地的密探向耶尔德兹宫（Yıldız Sarayı）发回了数百条关于国内局势的报道。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变得很慌乱，急切地想镇压这些对政府不满的人，于是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到萨洛尼卡。这个委员会受命去镇压革命运动，特别是军队中的革命活动。调查委员会由一些最拥护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人组成，这些人会忠诚地执行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任务，但调查委员会到达萨洛尼卡之后，发生的事情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预料的完全不同。有两位军官到雷斯纳山区（Resna Mountains），勇敢地宣称他们反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这两个人是尼亚兹贝伊（Niyazi Bey）和恩维尔贝伊（Enver Bey），后来两人都成为了革命的领导人。恩维尔后来任陆军部长，而尼亚兹是第一个举起反抗大旗的人，举起义旗的时间是在 1908 年 7 月 5 日。[③]

从尼亚兹第一个举起反抗大旗，并公开宣布支持《宪法》后，驻马

---

①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8.

② Necmeddin Sahir Sılan, *II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s 50.

③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29.

其顿的第三军团、驻色雷斯的第二军团中的下级军官纷纷响应号召，发动起义，要求恢复1876年的奥斯曼《宪法》。处于秘密状态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发出声明支持，这个声明已在马其顿最大的城镇莫纳斯提尔公布。在莫纳斯提尔和奥赫里德之间的地区，绝大多数士兵已宣誓忠诚《宪法》。这次起义宣告“土耳其革命”开始，因而后来被当作改变现代土耳其历史的事件。[①]

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军队发动起义后，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往每个主要城镇派代表去宣布“恢复宪政”，并向居民解释实行宪政的益处。这些代表尽力解释说，事变的发生是由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不是由奥斯曼素丹负责。然而，在奥斯曼亚洲行省和奥斯曼首都伊斯坦布尔，情况则大不相同。显然，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下的严格审查制度，阻止了民众从马其顿获得信息的渠道。[②]

此时，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尼亚兹积极做好应战准备。驻马其顿北部的奥斯曼政府军的将领是谢默希（Shemsi）帕夏。当时谢默希向尼亚兹进军，在白天遭到一名下属军官的射击，这名军官杀死谢默希后沉着地离开，没人逮捕他。一位名叫纳泽姆（Nazim）的将领奉命镇压尼亚兹的起义军。但马其顿军队不愿意去镇压“叛军”。7月8日纳泽姆向首都报告，他在马其顿逮捕了48名军官，其中首犯是哈基贝伊。两天后哈基贝伊在萨洛尼卡被杀。7月11日纳泽姆在同一个城市的街上受伤，刺客没有被抓获。纳泽姆立即返回君士坦丁堡向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报告，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又派出第二个调查委员会，肩负着同样的任务。[③]这一次恩维尔成为被指控的对象。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决定用利益诱惑他，邀请恩维尔立即返回伊斯坦布尔报告情况并承诺提拔他。但恩维尔对这突如其来的友好许诺表示怀疑，担心是个陷阱，于是带着不少士兵去了雷斯纳山区。在哈基贝伊遇刺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公开与起义者联系。当“叛乱”迅速蔓延到整个马其顿时，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命令几个月前才担任大维齐的费里德（Ferid）帕夏采取措施，平定叛乱并惩罚对政府不满的人。

---

①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73.

②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97.

③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30.

费里德指出，这不该是大维齐负责的，而是陆军部长的事。但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却不让他的陆军部长做这些事，他还想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信任他的密探，常常把派密探作为解决政治难题的万灵药。这次他命40名密探去马其顿，却起到相反的作用。军官们很快知道这个40人“使团”的目的，一些当初犹豫要不要参与行动的土耳其军官和士兵，如今感到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坚定了反对独裁的决心。①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很快了解到马其顿等地的情况。不过，传到他那里的坏消息是，在青年土耳其党人鼓动下，鲁米利亚第三军团准备发起军事行动。②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终于明白，像过去那样的镇压方式这次不能奏效了。

7月21日（一说22日），有一封从莫纳斯提尔军营送到耶尔德兹宫的电报，不仅要求重建《宪法》或让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退位，还提到起义的部队发誓不会放下武器，直到恢复《宪法》。这封电报犹如晴天霹雳，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变得慌乱。耶尔德兹宫连续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建议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接受事实或与叛乱者妥协或退位，会让他震怒。所以谁也不敢第一个发话。③经过很长时间，有人建议召见占星师。占星师来了，他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接受代议制，建立内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对于是否接受这个建议还在犹豫，他发电报给萨洛尼卡的希尔米（Hilmi）帕夏，鼓励他反击。希尔米给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发回一封电报，陈述他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控制之下，如果48小时内不宣布恢复宪法，他将被处死。7月22日晚上，费里德帕夏辞去大维齐职务。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颁布了一道圣旨，宣布将要召开议会。④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解释是，他过去被身边那些不忠实的顾问们误导，认为国家还没有做好实行宪政的准备，现在时机已

---

①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p. 231 - 232.

② Necmeddin Sahir Sılan, *II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s 51.

③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34.

④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p. 234 - 235.

经成熟。

恢复宪政的消息并不是立即被人们获知的，因为首都的报纸上第一次出现的告示并不明确，没有标题，只表明要实行新的选举。不过，人们很快得到消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表现得异常喜悦和轻松。不管来自哪个社区，不论是穆斯林、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在大街上友善地谈笑，庆祝这个好消息。民众们表达着一种普遍的期待，期待着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①]

新闻界人士深受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专制的迫害，这一次他们积极地采取行动支持革命，公开抨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土耳其报纸宣称：米德哈特 1876 年颁布的《宪法》一直被奥斯曼土耳其的改革家们作为自由的象征；这次恢复宪政的革命是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民众运动。7 月 24 日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要去圣斯蒂法诺访问，大群人挤在耶尔德兹宫前，要求拜访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并不断高呼"素丹万岁"、"宪法万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从窗户露面以示答复，并做了简短发言，宣称从今以后所有臣民不论种族或宗教都会受到平等对待。[②]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讲话引起持续的热烈欢呼。

军事政变引起的"宪政革命"或者叫"护宪运动"，唤醒了不少人追求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治热情。[③] 然而，"思想和言论自由"不仅仅引起民众善意的情绪表达，也引发大范围群众骚动。工人们要求涨工资，他们抱怨物价上涨太快。工人的要求没有被满足，于是罢工的浪潮横扫奥斯曼帝国，六个月内有 100 多场罢工。为了平息示威游行，奥斯曼政府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支持下制定《劳动法》。《劳动法》禁止在公共部门组织工会，采用《仲裁法》限制罢工活动。这项立法得到劳工运动的积极支持，后来几乎没有出现罢工。[④]

从 7 月 26 日开始的游行活动中有人发表演讲，宣称革命意味着自由、平等和友爱。发表演讲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怀着真诚的热情，在演讲中

---

① Erik J. Zürcher. ,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p. 97 – 98.

②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36.

③ Necmeddin Sahir Sılan, *II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s 19.

④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98.

宣称，从今以后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要和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友好地合作。游行队伍穿过街道，似乎每个客车车厢都被占用，“不同教派的人竟然肩并肩坐着，大家都公开为素丹和《宪法》祈祷。这个场景就像一部小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数百个客车车厢几乎全被不同信仰的人占用，数千人在不同地点祈祷，祈祷结束后接着为《宪法》欢呼。”①

然而，恢复宪政的兴奋并不能掩盖奥斯曼政治局势的混乱状态。新组建的政府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国内民众举行集会，强烈抗议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不少城市出现抵制奥地利商品的行动；而安纳托利亚东部、阿尔巴尼亚、阿拉伯行省出现暴动。② 此外，流亡在外的那些反帝制运动的领导人返回伊斯坦布尔后受到欢迎，但大多数政治组织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没有多大真正的影响力。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但组织内的实权由萨洛尼卡的那些骨干人物掌握。恢复宪政后的奥斯曼帝国，仍像一艘舵手迷糊、动力不足、船体不稳的巨型船，摇摇晃晃，航向不明。

第二节　第二次宪政时期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时期，是指 1908 年革命后恢复《宪法》，到 1918 年伊斯坦布尔被占领，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的一个阶段。第二次宪政时期，被土耳其历史学家看作土耳其历史上与法国革命同等重要的阶段。理由是，这一时期将土耳其推进到现代社会，并极大地影响了土耳其后来的历史。这是一次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实验”，因为它给奥斯曼帝国引进了民主参与的政治机制。③而且，“共和国时期许多趋于成熟的政策在第二次宪政时期已经被讨论。重要的是，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

---

①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p. 238.

② Fevzi Demir, *Osmanlı Devleti' nde II Meşrutiyet Dönemi Meclis-i Mebusan Seçimleri, 1908 - 1914*, İmge Kitabevi Yayınları, İstanbul, Ankara, 2007, s. 46.

③ 历史学家塔里克·图纳亚（Tarik Z. Tunaya）把“第二宪政时期”称作“一个‘政治实验室’”，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民众通过这次宪政实验看到“民主参与”的政治是什么样子的。详见 Fevzi Demir, *Osmanlı Devleti' nde II Meşrutiyet Dönemi Meclis-i Mebusan Seçimleri, 1908—1914*, İmge Kitabevi Yayınları, İstanbul, Ankara, 2007, s. 345.

·凯末尔这一时期积极地参与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活动。”①

一　宪政初期的形势

“土耳其革命”成功了，奥斯曼素丹被迫恢复宪法，召开议会。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并没有进一步扩大成果，没有提出废除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主张。

为什么青年土耳其党人不废除奥斯曼素丹？后来的学者认为：第一，要顾及民意——奥斯曼素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能轻易动摇。第二，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信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又觉得没必要废黜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他们甚至觉得难以控制政府权力。第三，在奥斯曼帝国，年龄和经验是获得政治权威的先决条件，而青年土耳其党人大多数都是年轻的上尉、少校或职务较低的官员，没有多少阅历和经验。第四，青年土耳其党人给自己的定位是：起监督作用，承担捍卫“新宪法之自由”的使命。②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暂时继续让大维齐萨义德帕夏领导内阁，保留素丹，实行君主立宪制。

当然，青年土耳其党人虽躲在幕后，却操纵着政府官员的任免和各项政策的制定，以绝对权力控制着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外交。而且，青年土耳其党人在革命之后扩展势力，积极在亚洲和北非地区建立新支部。一些有固定职业的群体如教师、律师、医生、穆斯林商人、行会的领导以及大地主加入新支部，那些被奥斯曼素丹流放的人以及各种反对派也被纳入组织之中。

1908年8月1日③奥斯曼帝国正式恢复《宪法》。为了使臣民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对1876年《宪法》做了修订，补充了若干新的条款，如保证公民享有信件保密和新闻自由等权利，还首次提出了“旅行自由”的原则。不过，《宪法》保留了1876年《宪法》中第113条——赋予奥斯曼素丹放逐危害国家安全分子的特权（该条款在1909年予以废除）。

---

①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53.

②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p. 98–99.

③ 有的资料中把1908年7月23日当作恢复宪法、重开议会的时间。见 Necmeddin Sahir Sılan, *II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s 51。

宣布恢复《宪法》后不久，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融入萨巴赫丁亲王的联盟，但后来萨巴赫丁对青年土耳其党人不抱幻想，他和他的支持者脱离了与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联合，组建“自由统一党”（Liberal Union Party）。

从1908年到1918年的10年中，举行过三次议会选举，1908年8至12月是第一次选举。在各城市，代表名额的确定基本上考虑到不同民族、不同教派的权利。参加选举的人数在伊斯坦布尔有伊斯兰教徒268458人，希腊东正教徒75776人，亚美尼亚人29042人，犹太人10694人，天主教徒792人，叙利亚人277人，总人口385039人（均为男性公民）。在伊兹密尔，选举检查委员会公布的参加选举的男性公民人数是78904人，参加第一次选举的实际人数有31803人。在萨洛尼卡，参加选举的男性公民人数为289203人，其中穆斯林111814人，非穆斯林177389人。[①] 其他城市的公民也积极参与这次来之不易的宪政活动。首都伊斯坦布尔被划分为20个选区[②]，严格按照程序慎重选举议会代表。1908年12月11日在新建的邮政大楼举行第二轮投票，选出511名议会代表。[③] 12月17日，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届议会隆重召开。

青年土耳其党人赢得了较多席位，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独立的议员。艾哈迈德·里扎成为议会的议长。[④]进入议会的重要人物，还有萨潘扎勒·哈克（Sapancalı Hakkı）、胡斯莱夫·萨米（Hüsrev Sami）、雅库布·杰米尔（Yakup Cemil）、纳泽姆（Nazım）、塔拉特（Talât）、埃于普·萨博里（Eyüp Sabri）、米德哈特·舒克吕（Mithat Şükrü）、希尔米（Hilmi）等。[⑤] 能够在选举中竞争的政治团体，除了团结与进步委员会之外，只有萨巴赫丁亲王及追随者在1908年9月才组建的新政党，然而这个新政党在全国范围没有影响，只赢得一个席位。

---

① Fevzi Demir, *Osmanlı Devleti' nde II Meşrutiyet Dönemi Meclis-i Mebusan Seçimleri, 1908—1914*, İmge Kitabevi Yayınları, İstanbul, Ankara, 2007, s. 63.

② 这20个选区（seçim daireleri）分别是：Sonuçta、Üsküdar（后改为 Kadıköy）、Anadolu Hisarı、Beykoz、Yeniköy、Tarabya、Büyükdere、Arnavudköy、Hasköy、Beşiktaş、Bayezıd、Samatya、Eyüp、Beyoğlu、Beylerbeyi、Doğancılar、Makriköy、Şile、Gebze、Kartl.

③ Fevzi Demir, *Osmanlı Devleti' nde II Meşrutiyet Dönemi Meclis-i Mebusan Seçimleri, 1908—1914*, İmge Kitabevi Yayınları, İstanbul, Ankara, 2007, s. 61 – 62.

④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54 – 55.

⑤ Galip Vardar (Anlatan), Samih Nafiz Tansu (Yazan), *İttihad ve Terakki içinde Dönenler*, Inkilap Kitabevi, İstanbul, Ankara, 1960, s. 62.

青年土耳其党人在新议会中占多数席位，但他们并不直接控制政府权力，因为他们不得不依赖当地贵族。选举之后，宫廷的力量受到一些限制，但政府的高级官员又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势力出现，而青年土耳其党人只能依靠议会中的多数派来控制政府。[①]

时间不长，青年土耳其党人与奥斯曼素丹之间的矛盾表面化，而各地对新政府的不满也逐渐显露，最终导致爆发了一次政变。政变被平定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才实现政治改革。

二　平定叛乱

议会选举后，许多阶层感到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少数民族没有获得期望的权利，尤其是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向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出抱怨；自由派倾向于萨巴赫丁亲王的主张，对选举的结果很不满；穆斯林协会抱怨各个宗教团体的代表同坐议会大厅是放弃伊斯兰法的举动；一些宗教保守分子（主要是职位低级的乌里玛和教区的长老）认为革命颠覆了伊斯兰法的地位；宗教学校的学生也表示不满。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内部，由于削减公共税收等政策而失业的文职人员公开表示了反对意见。政府中保守派的代表大维齐卡米尔帕夏痛恨青年土耳其党的高压统治，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就撤换了陆军和海军两位部长，并擅自将部队从首都调往鲁米利亚省。[②] 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卡米尔帕夏自作主张的态度很焦虑，在议会进行了第二次信任选举，卡米尔帕夏失去信任票，被迫离开，并于1909年2月13日辞职。在反对派中，军队不满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新政策，直接掀起了一场军事叛乱。

这次叛乱的公开理由是，为哈桑·费赫米（Hasan Fehmi）被谋杀鸣不平。这位高级专栏作家在1909年4月6日晚上被谋杀于加拉塔（Galata）大桥上，据说他受袭的那座桥两头都有警察署，但没有可疑分子被逮捕。愤怒的反对派们毫不犹豫地认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要对这桩罪行负责。4月8日，哈桑·费赫米的葬礼转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葬礼

---

①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p. 99 – 100.

②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55 – 56.

后5天，即4月13日（伊斯兰历是1325年3月31日），军事叛乱爆发。[①]

当时，第四营的中士哈姆迪（Hamdi）和塔克西姆（Taksim）广场附近兵营的几名中士逮捕了他们的长官，并煽动别的部队也这样做。同一天，他们到素丹艾哈迈德广场（Sultanahmet Meydanı）的议会门前聚集，高喊"我们要沙里亚法"的口号，要求赦免所有参与叛乱的人；要求议长艾哈迈德·里扎、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全体内阁辞职；并要求解雇一些高级军官；要求重新任命卡米尔（Kamil）帕夏为大维齐、纳泽姆（Nazım）帕夏为陆军部长、伊斯马仪·凯末尔（İsmail Kemal）为国民议会的议长。[②] 关于这次叛乱，还有另外的说法：当时，驻扎在巴什克施拉营地的马其顿部队发动兵变，这支部队是一周前被青年土耳其党人调来的，为的是取代"不可靠的"军队。为数不少的宗教学者和来自宗教学校的学生加入了叛乱者行列，他们向议会大楼进发。4月13日凌晨，越来越多的部队和乌勒玛加入其中。政府惊慌，不敢派遣部队，只能派警察长官去听叛乱者的要求，叛乱部队的发言人提出六项要求：第一，免去大维齐、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的职务；第二，撤换任职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第三，撤换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担任的国民议会议长职务；第四，把一批青年土耳其党人身份的议员赶出伊斯坦布尔；第五，恢复伊斯兰法；第六，赦免反叛的部队。[③]

叛乱发生后，大维齐侯赛因·希尔米帕夏使用安抚的方式，但没有成功，叛乱迅速蔓延。内阁、艾哈迈德·里扎和第一军指挥官马哈穆德·穆赫塔尔（Mahmut Muhtar）帕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全体辞职。担任要职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隐藏起来，离开伊斯坦布尔去巴尔干。其他议会代表看到叛乱也离开了议会。伊斯马仪·凯末尔和其他反对派代表不能达到有效多数去控制议会，也不能控制局势。这时，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填补了"这个权力空缺。他颁布政令：赦免叛乱者，任命泰菲克

①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57;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00.

②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57.

③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01.

(Tevfik) 帕夏为大维齐，任命加齐艾特姆 (Gazi Ethem) 帕夏 (1897 年奥斯曼帝国与希腊战争中的英雄) 为陆军部长。欣喜若狂的士兵前往耶尔德兹宫去表达他们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拥护。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在他的阳台上接见参加叛乱的士兵。叛乱的士兵闹腾了一个晚上，有的把他们的枪扔进火里。[①] 新内阁中的陆军部长艾特姆帕夏看望士兵，表扬他们并且答应：他们的所有要求将被满足。叛乱部队和伊斯兰教学者、学生们都欢庆他们胜利。出席议会的为数不多的议员们发出声明：维持伊斯兰法，也保持《宪法》不变。[②]

到底是谁策划了这场叛乱？事后出现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是叛乱背后的力量，因为借助平息这次叛乱加强了他们对奥斯曼政府的控制。其实这个可能性不大，没有证据证明青年土耳其党人去制造这么一场叛乱推翻自己的统治。第二种看法是：这场叛乱由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策划。这也不太令人信服。尽管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确从短暂的叛乱中获得权力，他是否想恢复以前的专制政体不得而知，很难证明是他策动这场叛乱。第三种看法是：萨巴赫丁亲王领导的反对派发动叛乱。假如是这样，为什么他们不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呢？事件演变成一场流血冲突，两天之内叛乱者杀死 20 多人，死者中大多数是军事院校的毕业生，遇害者还有政府官员。萨巴赫丁亲王确实试着去控制这场暴乱，但没有成功。[③] 不管怎么说，这次政变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理由。

叛乱发生的第二天，就在宫廷、政府和反对派为胜利欣喜时，青年土耳其党人在萨洛尼卡举行会议，民族主义者参加了。他们立刻采取对策，在当地市镇组织公开的示威游行，并用电报告知议会和王宫，让人们相

---

①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58.

②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01.

③ 虽然不清楚谁真正策划了这场叛乱，但能够弄明白是哪些人或组织煽动了士兵。瓦哈德提 (Vahdeti) 发行的《火山报》(Volkan) 的鼓动宣传是第一个诱因。而煽动士兵暴乱的第二个推动者是宗教学校的学生，他们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些政策不满。第三个推动者是士兵出身的军官，他们在新政策下被解雇了。第四个推动者是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抱怨新政策是“土耳其主义”。详见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58 – 60。

信，宪政正处于危机中。[①] 这样，青年土耳其党人轻易地赢得了马其顿宣传战的胜利。同时，他们建立起一支“行动部队”，以第三军团为主力，马赫穆德·谢夫凯特（Mahmut Şevket）帕夏担任指挥。他们还得到了萨洛尼卡军队及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1908年革命英雄尼亚兹贝伊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加入。此时伊斯坦布尔派出一个代表团到马其顿，目的是规劝军队回到各自的营地，不希望他们的行动引发内战，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代表团决定留在部队。来自埃迪尔纳的第二军团和萨洛尼卡的“行动部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指挥下，集聚在圣斯蒂法诺。1909年4月24日早晨，“行动部队”没有遭遇多大反抗便占领了伊斯坦布尔。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曾命令叛乱的士兵不要抵抗，但无人听从，流血冲突还是在一些地方发生了。4月27日大国民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被废黜，穆罕默德·雷沙德（Mehmed Reşad）被推上奥斯曼素丹宝座，他就是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8）。阿卜杜·哈米德二世33年的统治宣告结束。[②] 青年土耳其党人成为新的执政者，他们不让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留在伊斯坦布尔。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及其亲属连夜乘火车离开伊斯坦布尔，被遣送到萨洛尼卡。[③]

这场叛乱被平息后，无法找到谁是真正的策划者。但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对煽动或参与此次叛乱的人进行了严厉的处分，建立了两个军事法庭，宣判处决了大批的“叛乱者”。其中，发行《火山报》的瓦哈德提（Vahdeti）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以鼓动和宣传来支持叛乱。自由党的领导人萨巴赫丁亲王涉嫌领导反对派发动此次叛乱被捕，后得到英国大使的干预而获释。官方从未准确地说谁是这场叛乱的煽动者，也不去澄清事实真相。最后的结果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利用此次事件铲除了政敌，可谓一石二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行动部队”的许多年轻军官崭露头角，如穆斯塔法·凯末尔、卡济姆·卡拉贝克和恩维尔贝伊一跃而成为部队的高级将领，权力落在这些军官手中。尤其是被称为“强人”的总指挥马赫穆德·谢夫凯特，不仅被任命为三个主力部队——第一军团（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第二军团（驻

---

① Erik J. Zürcher. ,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02.

②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62;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p. 75.

③ Şebnem Pişkin, *Sevgili Abdülhamit Han*, Topkapı, İstanbul, 2011, s. 287.

扎在埃迪尔纳）、第三军团（驻扎在莫纳斯提尔）——的长官，手握军权，还在首都拥有各个方面的行政权力。青年土耳其党人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不得不依赖马赫穆德·谢夫凯特这位强权人物，希望通过这样的人物来维持局面。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无论是大维齐侯赛因·希尔米帕夏领导的内阁，还是1909年12月之后的哈基帕夏领导的内阁，甚至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没法挑战马赫穆德·谢夫凯特的权威。其结果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军队实际凌驾于《宪法》之上。

三　1909年后的政策与改革

平定叛乱后，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掌握了权力。

从1909年4月镇压叛乱到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着政府和议会，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其政策有得有失。这九年以1913年1月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治力量较弱，从1913年1月起青年土耳其党人彻底控制了政府机构。1913年6月11日，大维齐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从陆军部去政府的途中，在巴耶济德广场（Beyazıt Meydanı）被枪杀。[②]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谋杀事件，后来判定是"自由联盟"（Liberal Union）的成员策划的。事情的起因是，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军队惨败，丧失大片土地，而1913年6月10日签订的《伦敦条约》承认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同盟国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侵占，引起奥斯曼帝国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自由联盟"的计划不仅仅要暗杀大维齐而且要杀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③]谋杀事件发生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搜捕"自由联盟"成员，打击反对派，并借机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通史中说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独裁"。谢夫凯特帕夏遇害后，萨义德·哈利姆（Sait Halim）帕夏被任命为大维齐。

---

①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62 – 63.

② Galip Vardar (Anlatan), Samih Nafiz Tansu (Yazan), *İttihad ve Terakki içinde Dönenler*, Inkilap Kitabevi, İstanbul, Ankara, 1960, s. 163 – 164.

③ Shaw, Stanford,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Ⅱ),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96.

青年土耳其党人牢牢控制了最高权力，社会改革得以实现。

（一）巩固政权

首先，整顿并重组官僚机构，清洗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提拔的官员，开除多余的文职官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大约1/3的官员被清理。[①]其次，没收皇室的财产，严格预算宫廷开支，削减高官的收入，削减工资。最后，把奥斯曼素丹的权力限制在任命大维齐和伊斯兰教教长职务等方面。

在清洗之后的政府机构中，青年土耳其党的核心人物有大约50人，占据内阁的部长、省长、党组织的干事等，直接掌控行政大权。萨义德·哈利姆帕夏担任大维齐，塔拉特担任内政部长。上校恩维尔贝伊被提拔为帕夏，并在新的内阁中担任陆军部长。杰马尔（Cemal）担任伊斯坦布尔卫戍司令，也被提拔为帕夏。恩维尔帕夏重组军队，任命德国人施伦道夫（Schellendorf）为总参谋长，并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任命了许多德国军官。[②] 1913年之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设法削弱伊斯兰法的地位，伊斯兰教教长的职位被降到低于内阁成员，另设三个部门——司法部（控制宗教法庭）、教育部（接管宗教大学）、宗教基金部（管理瓦克夫），并在1917年重新安排宗教事务。

不过，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权力还是不够强大，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在较长的时间内都躲在暗处，私下处理政府和国家的各项事务。而且，在掌握行政权力的内阁成员之间，也缺乏基本的相互信任。比如，塔拉特帕夏和恩维尔帕夏之间有分歧，内阁成员与军队将领之间不合作等等。[③] 内部的不团结削弱了本来就不够稳固的权力基础。

（二）立法改革和教育改革

议会在短时期内制定了现代政府所需的基本法，对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都有相应的明确规定。议会将坦齐马特以来的改革法令编纂成典，对1876年《宪法》进行全面修订。1909年修订的《宪法》后来被称为“新宪法”。1912年至1914年又有一次修改。

---

①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05.

②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p. 78 – 79.

③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s. 47.

同时，制定了一项新的《民法》，还颁布了其他法律，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颁布了新的《兵役法》，规定所有奥斯曼帝国国民，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为了整合警察系统，1912 年颁布了法令，将宪兵队由陆军部划归内务部掌管，各省的宪兵队则听从总督调遣。1914 年 9 月，政府宣布取消外国商人和居民在帝国享有的财政和法律上的特权。1915 年政府颁布了一项鼓励国家工业的法律。

新的立法试图提高妇女的地位。新的《家庭法》里，婚姻必须得到地方法官认可，新娘的年龄必须达到 18 岁，新郎达到 20 岁，而且妇女有权提出离婚。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许多地方，妇女参加公开的民族俱乐部。出现了一些新的适合大众的杂志，如《妇女世界》（Kadmlar Dünyası）和《儿童世界》（Çocuk Dünyası）都是在 1913 年第一次发行。[①] 1917 年制定的家庭法虽未废除多妻制，但各项法律改革使得妇女地位有所提高。

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是，1915 年宗教学校转归教育部管辖。政府还进行了全面的学校建设，建立了一个从初等、中等学校到师范和专科学校，还有经过改组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在内的新教育体系。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给予女子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1913 年义务教育学校向女孩开放。后来伊斯坦布尔大学的一些课程也向妇女开放。在政府的干预下，小学、中学和大学一律招收女生。此后不久，许多行业有了女性，妇女不仅能够成为护士、教师，而且能够成为医生、公务员、律师和企业家。

（三）经济政策

政府推行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旨在提高奥斯曼帝国的国际地位，以期从国外筹集贷款。政府把涉及私有权的法规都改变为现代法律，取消关税壁垒，发展自由贸易。农业政策则倾向于支持大土地所有者。政府发展现代基础设施，给生产带来便利并推动了投资。政府提高征税工作的效率，有助于增加税收。还缩减官僚机构包括军队开支，达到削减预算开支的目的。1910 年，奥斯曼政府寻求宽松的贷款协定，被英国和法国政府

①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79.

拒绝，这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感到失望，于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转向与德国政府签订贷款合同。[①]

（四）维护国家安全

自控制奥斯曼帝国政权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引导奥斯曼政府和奥斯曼社会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北非、巴尔干地区不断出现危机。在1913年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遇害前，官员们站在大维齐、陆军部长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一边，与巴尔干同盟国军队作战。1913年3月26日埃迪尔纳被保加利亚军队攻陷，青年土耳其党人被迫求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方丧失。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遭暗杀不久，巴尔干同盟国由于瓜分胜利果实不均而相互争斗，1913年6月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7月20日由恩维尔率领的奥斯曼军队成功地攻克埃迪尔纳，收复色雷斯东部地区。[②]

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也是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的时期，不仅发生了局部战争，丧权失地，还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五）民族政策

在1908年的议会选举中，青年土耳其党人努力在民族问题上体现平等。不过，在这样一个帝国，多民族的差异表现为社会经济的差异，社会经济的差异则表现为政治地位的不同。根据奥斯曼帝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情况，在国民议会选举中，青年土耳其党人从代表名额的分配上努力注意照顾到方方面面，不过，少数民族代表还是敏感地注意到议会坐席安排上的不对等，这就是奥斯曼帝国多民族社会根本问题的表露。[③]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看来，巴尔干战争似乎表明，萨巴赫丁亲王构建“多民族帝国”的理想不会有好结果。奥斯曼帝国境内巴尔干地区各民族，甚至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明显地倾向于以民族主义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框架下解决问题。安纳托利亚的非穆斯林商人和企业家对巴尔干人民的民族志气表示同情。其

---

①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p. 76 – 77.

②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78.

③ Fevzi Demir, *Osmanlı Devleti' nde* Ⅱ *Meşrutiyet Dönemi Meclis-i Mebusan Seçimleri, 1908—1914*, İmge Kitabevi Yayınları, İstanbul, Ankara, 2007, s. 344.

实，自1909年以后，提倡"奥斯曼主义"的声音就开始减弱，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内一些少数民族更倾向于主张民族独立；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使得奥斯曼主义变形为"突厥主义"——例如强迫阿尔巴尼亚人使用阿拉伯语和突厥语言，引起人们对"奥斯曼主义"的反感。

在此情况下，1913年后，青年土耳其党人推行了一项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其目的是既要从外国控制奥斯曼帝国财政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又要保护和鼓励真正的民族工业。[①]巴尔干战争给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讲土耳其语的人以"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推动力。在尤素福·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等一批作家的影响下，"泛土耳其"思想传播开来。这个思想鼓吹安纳托利亚、东南欧甚至高加索地区所有的土耳其人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政治实体。恩维尔帕夏同意这个思想，并致力于为此奋斗。[②]

四　权力之争与党派斗争

"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具有政党的特征，但其成员即青年土耳其党人主要是军官和文职人员，大家从未追随某一个单一的领导人。为了不让权力集中于个人之手，1913年之前，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没有设立主席一职。不论作为总秘书处，还是1913年后的主席，几乎没有人拥有像后来土耳其共和国政党领导人那样的权力。[③]不过，这个政治组织的弱点，是较长时间处于秘密状态，或者诉诸恐怖行为，搞了许多暗杀活动。[④]

青年土耳其党的反对派在1909年4月受到打击，但过了不长时间又陆续出现。1909—1911年成立了许多新的政党，如温和自由党、奥斯曼改革党、人民党和新党等。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成员萨迪克上校（Colonel Sadik）组建了一个政党，其党纲宣称：不仅支持民主制度而且"保持普遍的宗教和民族伦理、道德"，保持奥斯曼的历史传统，尤其要维护"哈

---

①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79.

②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80.

③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p. 64 - 65.

④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66.

里发和素丹的神圣权力”。[①]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反对者迅速地团结在一起，到 1911 年 11 月，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和政党联合成一个新的政党，名叫“自由统一党”。这是一个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集合，内部各派除了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这一点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一致的地方。但在短时间内，这个党并无影响。自由统一党成立之后三个星期，在伊斯坦布尔令人吃惊地击败青年土耳其党候选人，成功地赢得了一次选举。[②] 在 1911 年 12 月的地方选举中，反对派公开地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竞争。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及时解散了议会，并宣称于 1912 年 4 月进行大选。青年土耳其党人操纵这次选举，赢得了 275 个席位中的 269 个。1912 年 4 月的选举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有名的“带着手杖的选举”，青年土耳其党人用暴力加威胁的手段，操纵了这次选举，反对派仅有少数人当选。这个新内阁依旧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手中的工具。然而这个大棒下选出的内阁没过几个月，就遭到萨迪克领导的青年军官的反对，在他们眼里，新内阁是没有合法性的，于是反对派以武装叛乱相威胁，1912 年 7 月迫使内阁辞职。[③] 从 1914 年 12 月到 1915 年 2 月以及从 1915 年 9 月到 10 月，国民议会举行了第三次新的选举[④]，此时奥斯曼帝国已经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外，奥斯曼帝国境内也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活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小圈子，他们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宪政革命后镇压工会和罢工运动，领导人是侯赛因·希尔米。

客观地说，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期间的各项改革措施还是进步的，有一些措施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果再考虑到国际局势和国内根深蒂固的矛盾，就能理解塔拉特帕夏、恩维尔帕夏等人的难处。不过，单从政治生活来看，国民议会、内阁和政府职能部门，无论权责的划分，还是作用的发挥，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1909 年至 1913 年间突出的问题是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大；身份仍处于秘密状态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未能处理好与它所控制的议会的关系；党派之间和党派内部斗争不断。

---

①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50.

②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07.

③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77.

④ Necmeddin Sahir Sılan, *II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s. 62.

一个基本情况是，职位相对低的官员通过他们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地位施加了更大的政治影响，这给军队的纪律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因为政治集团削弱了军官集团的权力。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清楚地表明过他的观点：军队在4月事件的介入是为挽救《宪法》，而不是挽救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军人们要么不遗余力地做好部队工作，要么就离开。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原则上表示同意。然而，4月事件表明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最终还是依赖它在军队中的地位，而且它在军队中的影响超过其政治地位。当然，青年土耳其党人身份的官员被允许进入议会是违反《宪法》的。军队干预政治和军队的政治化受到1910年后再次出现的反对派的猜忌，但当时可能没有办法解决，军队内部一度出现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活动，反对者以武装叛乱相威胁。在第二次宪政时期这种两难困境从未被解决。[①]

作为青年土耳其党组织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没有解决好它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反对派指责青年土耳其党人不负责任地行使权力。作为回应，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8年秋季的委员会大会上决定要成立一个政党。然而，在这个议会中，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的政党并没有取代原有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而是与它并存。由于它缺乏政党的纪律性，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并不完全相信议会的作用，结果，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内部的规章中把真正的权力仍然赋予中央委员会和它的秘书处。议会政党只有在1914年后被给予一个较大的发言权，但此时议会已变成一个橡皮图章。[②]

党派斗争在土耳其革命之后不久就出现。早在1910年，阿尔巴尼亚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同时有一位著名新闻记者阿哈迈德·萨米被暗杀。叛乱和谋杀事件等于是给反对派提供了新的动力。这次暗杀几乎是1909年谋杀哈桑·费赫米的重演。青年土耳其党人害怕又一次出现反革命运动，在7月处理了一批反对派领袖。然而反对派力量继续发展，到1911年年初，形势变得非常严峻，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调整策略，与反对派和解。但青年土耳其党人中的强硬派坚决反对和解，塔拉特等人以辞职相威胁，并于4月23日发表新的十点方案，取缔反对派提出的要求。萨迪克上校

---

①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p. 105 – 106.

②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 106.

对十点方案做了阐述。当时似乎要与反对派和解，哈克迪尔（Hakdil）帕夏在4月27日得到信任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内部的裂痕暂时被掩盖了。9月29日，意大利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占领的黎波里，哈基（Hakki）帕夏不得不辞职。继任的是赛义德帕夏，这是赛义德帕夏第八次担任大维齐。在反对派眼里，新内阁没有合法性。1912年5月和6月，萨迪克上校和他的朋友们要求解散政府并以武装叛乱相威胁。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的议会给赛义德帕夏投了信任票，但旧政府的官员还是离开内阁，因为他们对内阁不抱希望。①

关键是，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的核心人物把持内阁，矛盾和斗争一直存在。尤其是1912—1913年，当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战场上节节败退，斯科普里、萨洛尼卡、鲁米利亚被保加利亚等盟国军队占领时，内阁成员在如何应对战争局势、如何处理国内抗议情绪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争论不休。② 奥斯曼帝国陆军部成为受谴责的首要目标。陆军部的大臣们认识到军事失败的严重性。不久奥斯曼帝国又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1918年11月，奥斯曼帝国领土已经被占领，国民议会局限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很小的圈子，议会内部协商的内容，不是如何应对形势，而是争权夺利。

---

①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pp. 107－108.

② Galip Vardar (Anlatan), Samih Nafiz Tansu (Yazan), *İttihad ve Terakki içinde Dönenler*, Inkilap Kitabevi, İstanbul, Ankara, 1960, s. 100.

第十章　战争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20 世纪初期国际局势发生大的变动。1904 年英国和法国签订协约，1907 年英国和俄国签约了协定，形成与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对峙的军事集团。1908 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1911 年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战争；1912—1913 年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属国发生战争。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之间也在协商关于波斯湾沿岸属国的政治地位问题。1913 年 7 月，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协定，波斯湾的科威特谢赫领地成为英国在波斯湾的“半保护”体系的一部分，确保了英国在波斯湾的地位，而奥斯曼帝国放弃对波斯湾地区的要求。卡塔尔和巴林的独立得到奥斯曼政府和英国的“保证”。[①] 这样的协定，等于宣布奥斯曼帝国不再拥有波斯湾属地，东边领土只限于阿拉伯河口的法奥港及其以北的两河流域地区。这一系列事件，使本来已经衰弱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大幅度缩小。

不久，奥斯曼政府的“亲德派”走了另一步险棋：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并于 1914 年 10 月 29 日向协约国宣战，奥斯曼军人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奥斯曼帝国没有选择与英、法、俄结盟加入协约国一方，而是加入同盟国一方，执政者的错误抉择，把奥斯曼帝国引向亡国的道路。

第一节　局部战争与帝国领土的丧失

一　波斯尼亚危机

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之后的几十年里，巴尔干地区就像一座休眠

---

① 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 Vol. Ⅰ, New Have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69.

火山，随时有喷发的危险却又没有喷发。1878 年的《柏林条约》只是暂时安抚各方，实际上在巴尔干地区制造了新的矛盾。整个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代，巴尔干地区不时有事端发生。在 1897 年的希土战争中，奥斯曼军队打败希腊军队，遏制了希腊人的野心。当希腊与保加利亚发生冲突时，奥斯曼政府亲近保加利亚，给希腊很大的压力。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和奥匈帝国私下达成协议，以保护两国利益作为条件，换取两国对巴尔干小国的打压，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过分要求极其恼怒。英国人兰斯多恩（Lansdowne）带来了明确的改革提案，包括任命基督教总督、接受外国监督等内容。[①] 从巴尔干民族的立场来看，他们为实现各自的独立梦想，坚持不懈地奋斗着。恰恰是这种努力，使得巴尔干地区的局势长期不稳。巴尔干各国对邻国都保持警惕。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一直处于战争状态。1894 年和 1896 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同情，点燃了它们抗议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烈火，巴尔干问题立即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人为制造的局面，使得巴尔干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俄国和奥匈帝国的代理人在不断煽动原本就骚动不安的巴尔干各国，不久，在巴尔干地区互为对手的各国纷纷进入马其顿，在马其顿展开抢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试图扩张它们的势力范围，罗马尼亚也试图在马其顿得到利益。[②] 马其顿地区逐渐成为主要的争夺场所，马其顿问题也暂时掩盖了所有的矛盾。

《圣斯特法诺条约》(1878 年）和随后签订的《柏林条约》（1878 年）的是非曲直多次引起争议。这两个历史性的文件可以概括成："第一个文件是政治上的一大失误；第二个文件试图修改前者的错误而犯了更大的错误，不过，它变成了追求私利的罪证。"[③]众所周知，欧洲大国都想从巴尔干地区得到自己所需的利益，所以，没有任何措施能避免欧洲大国的争夺。根据《柏林条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④]主权仍属于奥斯曼帝国，但奥匈帝国有权驻军，尤其是直接控制新帕扎尔地区。奥匈帝国和俄国的争霸斗争愈演愈烈，其中争夺巴尔干地区主导权是两国的重要目标。奥匈

---

① *The Balkan War Drama*,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p. 15.

② *The Balkan War Drama*,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p. 17.

③ *The Balkan War Drama*,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p. 2.

④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简称"波黑"）两省的居民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帝国争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动力还在于：奥匈帝国是内陆国，在占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后再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领土就扩展到亚得里亚海，成为一个面积广大的国家，也确立了它在中欧的主导地位。为此，奥匈帝国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20 世纪初，奥匈帝国为蚕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做准备。巴尔干地区由于保加利亚和希腊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新的危机。1905 年 8 月 20 日，一位希腊人被暗杀，引起希腊人对保加利亚人的报复行动。21 日，希腊军队包围了保加利亚的城镇，希腊大主教在宪兵保护下，通过奥斯曼帝国官方，要求挨家挨户搜索，企图找出谋杀者。保加利亚人受到报复和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受虐待，受到侮辱。① 此后，强盗和绑匪十分猖獗，治安状况极差。

到了 1908 年秋天，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奥斯曼政府试图阻止这场独立运动，但显得力不从心。保加利亚的君主满怀野心，试图建立大保加利亚帝国，恢复拜占庭帝国的光荣。② 希腊君主也有自己的领土野心。一时间，巴尔干地区风云突变。乐观主义者曾以为巴尔干问题已经终结，想不到 1908 年巴尔干地区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10 月，奥匈帝国正式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两省所引发的危机，史称"波斯尼亚危机"(Bosnian Crisis)。

奥匈帝国选择 1908 年 10 月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是看准了俄国刚刚经受重创，国力受损。在 1904—1905 年的俄日战争中俄国失败，1905 年俄国国内发生了革命，使得俄国政府经受了双重打击。到了 1908 年，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也遇到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土耳其青年党人鼓动民众反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提出恢复宪政等主张。1908 年 7 月，奥斯曼帝国几个军团发生兵变，迫使奥斯曼素丹恢复 1876 年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国内局势出现不稳。趁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处于政治困境，出其不意地占领巴尔干，对奥匈帝国是难得的机会。

奥匈帝国的统治者加紧行动，准备实现自己的目标。目标分两步：第

---

① *The Balkan War Drama,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p. 18.

②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Ⅱ, Çeviren Server Tanilli,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s. 239.

一步是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第二步是打败并消灭已经取得独立的塞尔维亚国。

奥匈帝国首先与俄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俄国不愿看到奥匈帝国独霸巴尔干地区，自然不会坐视奥匈帝国的行动不管，但此时奥匈帝国的统治者认定，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不敢动武。1908年8月至9月，奥匈帝国的当政者召集会议，讨论和研究吞并波黑两省的策略和计划，然后开始实施。第一个举措是宣布从新帕扎尔地区撤兵，"安抚"奥斯曼素丹，缓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反抗情绪。接着，与俄国外交官进行实质性的交涉。9月15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艾伦塔尔与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摩尔达维亚举行会谈，两位外交官达成了口头协议[①]。俄国的伊兹沃尔斯基同意奥匈帝国兼并波、黑两省，但要求给予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以领土补偿，同时要求奥匈帝国支持俄国召开国际会议，修改《柏林会议》中对俄国不利的条款。奥匈帝国的艾伦塔尔没有答应后两个要求（即给予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补偿，支持俄国召开国际会议修改《柏林条约》），但保证不反对黑海海峡通航条例的修改（即黑海海峡向俄国军舰开放）。两位外交官还商定，奥匈帝国在10月初宣布吞并波、黑两省；如果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俄国和奥匈帝国也不公开反对。俄国关于海峡的要求，得到奥匈帝国的支持远远不够，必须争取英、法、德、意等国的支持，于是俄国的伊兹沃尔斯基前往欧洲各国游说。而奥匈帝国则于10月7日正式宣布将奥斯曼帝国的波、黑两省并入自己的版图。

奥匈帝国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引起持续半年之久的严重危机。

第一，奥匈帝国的行径激起了斯拉夫民族的愤慨。波、黑两省民众坚决反对奥匈帝国的统治，强烈要求与塞尔维亚合并。塞尔维亚本来打算向西扩展，如今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人的发展受阻。塞尔维亚政府向奥匈帝国提出抗议，并开始军事动员，同时向俄国求援。

第二，奥斯曼帝国提出正式抗议，国内开始抵制奥匈帝国的商品。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政变之后，奥斯曼素丹被迫实行宪政。1909年2月，奥斯曼帝国的亲德派与奥匈签订协定，承认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

① 一说"达成秘密协定"。

纳的兼并，这等于是放弃了对这两省的主权①。奥匈帝国宣布放弃对新帕扎尔地区的占领。

第三，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反应强烈，因为不能容忍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势力的扩大。1909 年 10 月，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三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意大利都灵南面的拉匡尼基城堡会晤，两国的外交大臣于 10 月 24 日签订了《拉匡尼基协定》。协定内容是：俄、意两国共同维护巴尔干地区的现状；如果巴尔干地区发生任何事件，俄国将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民族，排斥任何外国统治；两国共同反对一切与上述目的相违背的行动；意大利保证“善意地对待俄国在海峡问题上的利益”；俄国答应“对意大利在的黎波里的利益采取同样善意的态度”。②

第四，俄国向奥匈帝国提出抗议，并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俄国与奥匈帝国的矛盾表面化。同时俄国支持塞尔维亚，要求奥匈帝国给予塞尔维亚领土补偿。

第五，德国重视与奥匈的同盟，因而支持奥匈帝国的这次吞并。奥匈帝国政府倚仗德国的支持，拒绝召开国际会议，并在塞尔维亚边境集结军队，进行威胁。奥匈帝国要求塞尔维亚放弃对兼并两省的抗议，放弃补偿要求，1909 年 3 月，德国向俄国发出照会，要求俄国促使塞尔维亚承认奥匈帝国兼并两省的既成事实；假如俄国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德国和奥匈帝国将对俄作战。

俄国当政者认识到俄国力量不足以与德国对抗，而英国和法国不愿为了波、黑两省的问题卷入战争。面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硬态度，俄国被迫让步。俄国转而向塞尔维亚政府施压，强迫其放弃反抗奥匈帝国的战争动员，停止一切反奥匈帝国的行动。3 月 31 日，塞尔维亚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屈服，这场几乎导致战争的危机最终平息。

波斯尼亚危机使俄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不过，俄国向英、法两国靠近了。俄国改善与英国和法国的关系，这是 18 世纪以来俄国对西欧关系的大调整。20 世纪初期俄国与英、法等西

---

①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ank Cass, London, 1996, p. 39.

②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 3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70—371 页。

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协定，有余力回过头来对付奥斯曼帝国，分割它的领土。[①]

一般认为，波斯尼亚危机加剧了协约国和同盟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从1909年到1912年，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发生着变化。不过，欧洲大国这几年内在巴尔干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例如在英国国内，有的政治家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持支持态度，有的则持反对态度，但无论如何都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青年土耳其党人中对英国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开始减弱。英国政府将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英国从奥斯曼帝国获取经济利益上，给予奥斯曼国家银行特殊的支持。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新内阁，英国希望它能带来一些变革，并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有利于英国的结果。[②]就在英国国内反对奥斯曼帝国新政权的呼声很高时，英国政府在行动方面仍很谨慎。英国决定不介入各方在马其顿的争夺，还驳回了英国印度事务部希望对奥斯曼帝国近来在波斯湾的一系列侵扰采取强硬态度的请求。[③] 英国的这种反应，基本是默许了奥匈帝国的侵略行为。

巴尔干的情况是：自奥匈帝国驻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并直接控制新帕扎尔州之后，1881年至188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出现了第一次向外移民的浪潮，1900—1901年又有一次移民，大约有1.3万人移出这两个省。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后，引发第三次移民浪潮。据估计在1878年至1918年之间大约有15万人离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④]从后来的结局看，奥匈帝国吞并波黑两省，短期内得到了满足，却埋下了民族仇视的祸根。可以推断，没有奥匈帝国赤裸裸的军事占领，就不会激起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情绪；没有民族情绪的发酵，就不会有1914年6月的萨拉热窝事件。

---

① Necmeddin Sahir Sılan, *II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s 17.

② Josper Helle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4*, Frank Cass, London, 1983, p. 28.

③ Josper Helle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4*, Frank Cass, London, 1983, p. 38.

④ Friknet Adanir, Suraiya Faroqhi, *The Ottomans and the Balkans, a Diss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leiden, Boston, Köln, 2002, pp. 272 - 273.

二　意土战争及其影响

意土战争，即1911年意大利为了吞并奥斯曼帝国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而发动的战争[①]。战争持续了一年多（1911年9月29日至1912年10月18日），奥斯曼帝国战败，意大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位于非洲北部、地中海南岸，在一片广阔的沙漠地区，只有北部沿海的城镇人口稠密、经济基础较好一些。不过，这里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黎波里以西的阿尔及利亚1830年被法国占领；突尼斯1881年被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昔兰尼加以东的埃及1882年被英国占领。意大利很久就想占据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愿望。法国占据突尼斯之后，兼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的意图很明显，意大利表示强烈反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加紧在这里的行动，为进一步吞并做准备。意大利政府不断向这里移民，投机商人在这里购买土地，海军军官伪装成渔夫在的黎波里进行海岸测量，天主教神父以传教为掩护收集情报；意大利国内的新闻媒体也为此制造舆论。

不过，意大利并不敢轻易采取行动，一是怕引起其他欧洲大国的反对，二是1894年至1896年远征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遭到失败，教训深刻。为此，意大利一方面积极进行外交上的准备，另一方面等待合适的时机。

意大利首先得到的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支持或默许。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之间有1882年的三国同盟条约，德国和奥匈不会公开反对。

在英国和法国先后占领北非穆斯林国家，德国也想染指北非的大背景下，意大利也要实现蓄谋已久的计划。1900年法国侵略摩洛哥时，意大利表示出“与法国互利”的态度，意在为侵略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做铺垫。[②] 1909年俄国向奥斯曼帝国提出船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

---

① 又称“的黎波里战争”（土耳其文 Trablusgarb Harbi；英文 War of Tripoli）或“利比亚战争”（War if Libyan），一些历史资料提到这场战争，着眼点是意大利在战场上首次使用飞机进行军事侦察，这也是世界战争史上飞机首次被用于作战。据记载，在这次战争中意大利有9架飞机、11名飞行员参战。这些飞机在阵地上空进行了多次侦察，其中一架飞机的机翼还被地面的子弹打中。意大利飞机还执行了投弹任务。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2,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7, p. 289.

峡自由航行的问题，俄国一面强迫奥斯曼帝国答应其要求，另一面默许意大利在北非的扩张。[①] 在国际关系史的资料中，意大利和法国1900年签订《法意协定》，与俄国1909年签订《拉匡尼基协定》，意大利在北非的侵略得到法国和俄国的认可。

不久，意大利等待的机会就来了。1911年7月德国舰队抵达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引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法国和德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英国态度强硬地反对德国，不惜使用武力。此时西欧大国的注意力放在摩洛哥。9月28日，意大利向奥斯曼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生活的意大利侨民受到威胁，意大利政府不能无视自己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要求奥斯曼帝国采取措施，防止针对意大利军队的抵抗行为发生。

奥斯曼帝国无法接受意大利这种蛮横的威胁，但考虑到帝国所处的弱势，委曲求全地发出照会，表明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同时，奥斯曼帝国向欧洲大国发出呼吁，希望各大国制止意大利的侵略企图。欧洲国家的反应却是劝说奥斯曼帝国向意大利屈服。

9月29日，意大利向奥斯曼帝国宣战。意大利2万余（一说5万）军队登陆的黎波里北部沿岸。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只有一个师，约7000人。10月3日意大利轰炸的黎波里，4日，意大利军队登陆部队占领的黎波里和胡姆斯。11日，意大利军队击退为数不多的奥斯曼帝国守军，占领托卜鲁克（Tobruk）和德尔纳。19日，意大利军队占领班加西。本来奥斯曼帝国可以从东部调兵，但意大利军队封锁海岸线，而英国故意不允许奥斯曼帝国军队从埃及沿海通过，奥斯曼军队不能向北非增援。11月15日，意大利不等军事行动结束，就宣布兼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此后，这两地恢复使用旧称“利比亚”[②]。

奥斯曼帝国守军虽然被打败，失去了重要的沿海城镇，但奥斯曼帝国仍不肯妥协。意大利军队取得初战的胜利，可是随后遇到当地人民的强烈抵抗。意大利增兵9万人，对占领区反抗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到1912年春才勉强守住已占领的沿海地带，一直未能深入到内地。战事的拖延使

①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s. 476 - 477.

② 在古希腊时期，北非沿海被称为“利比亚”，指的是一个较大的范围。

意大利军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12 年 5 月，意大利海军占领东地中海的罗得岛、多得卡尼斯群岛，并发起强烈攻势，炮击贝鲁特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港口城市。

1912 年 10 月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处境艰难，不得不放弃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战场上的努力。10 月 15 日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在瑞士洛桑讨论签订条约，18 日正式签订《洛桑条约》。根据条约，奥斯曼帝国放弃对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主权。不过，被占领区的阿拉伯部落没有停止抵抗，反抗斗争一直持续几十年。

意土战争是局部战争，意大利取得了胜利，占领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实现了多年来的野心，而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失去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意味着帝国在北非的属地至此全部丧失。

三　两次巴尔干战争

1912 年 10 月至 1913 年 8 月在巴尔干地区发生了两次战争。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得内格罗组成的巴尔干同盟，进攻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是巴尔干同盟内部的战争，即保加利亚对抗由塞尔维亚、马其顿、希腊结成的同盟，并将罗马尼亚卷入其中，奥斯曼帝国也参与战争。

（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自 1908 年发生土耳其革命后，巴尔干地区的形势急剧变动。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保加利亚宣布独立，使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对色雷斯、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控制受到削弱。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巴尔干的统治并不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好。1909—1911 年，这一地区发生了很多屠杀、抢劫、绑架和宗教迫害，暗杀和爆炸事件接连不断，而爆炸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往往嫁祸于保加利亚人，于是保加利亚人就遭到报复。[①] 了解巴尔干问题真相的人士明白：巴尔干地区各国之间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巴尔干地区各国既担心奥匈帝国扩张，又担心奥斯曼帝国的镇压，巴尔干地区基督教国家暂时搁置相互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在马其顿问

---

① *The Balkan War Drama*,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p. 21.

题上的争议。[①] 趁着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引发战争的机会，几个国家迅速靠近，准备联合起来，把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巴尔干地区驱逐出去。而巴尔干战争之前的奥斯曼帝国正处在停滞和衰退的最后阶段，政权虚弱，国家临近崩溃，混乱局面弥漫到全国各地。[②] 奥斯曼帝国的政要们在外交上没有远见，情报不灵或者是对首都以外的消息闭目塞听，竟然对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军事准备不曾觉察。[③]

1912年3月，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签订同盟条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条约》规定，两国互相保证各自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当一方受到他国侵犯时，另一方有责任全力援助；任何一个大国企图武力占领巴尔干领土，如果缔约国一方认为应该宣战时，另一方有义务全力支援。同盟各国决定利用意土战争的时机发动战争。3月13日，希腊和保加利亚签订了一个盟约，即《保加利亚—希腊条约》，规定两国当中若有一国遭到他国的袭击，另一方必须全力支持。《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条约》和《保加利亚—希腊条约》都对发生战争后缔约双方出兵的数量和规模做出了具体规定。门得内格罗在8月参加巴尔干同盟，签订《门得内格罗—保加利亚条约》，10月签订《门得内格罗—塞尔维亚条约》。这个同盟背后有俄国的积极支持，同盟的中坚力量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按一般的看法，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半岛认可的领导者。[④]

1912年10月9日，门得内格罗以边界争端为由公开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巴尔干同盟国已基本完成战前军事准备。同盟国一方，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门得内格罗的总兵力51万人；而奥斯曼政府的军队只有25万人。[⑤] 另一种说法是，同盟国陆军总兵力70余万人（其中保加利亚36.6万人、塞尔维亚19万人、希腊12万人），希

---

①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Vol. 1 – 3, Macmillan Reference, U. S. A., 2004, p. 384.

②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43.

③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50.

④ *The Balkan War Drama*,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pp. 22 – 23.

⑤ 在同盟国军队中保加利亚24万人、塞尔维亚1万人、门得内格罗3万人、希腊10万人；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色雷斯15万人、马其顿9万人、阿尔巴尼亚1000人。详见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72。

腊还集结了一支海军力量。[1] 奥斯曼政府计划在管辖的地区征兵 100 万，实际仅仅征到 42 万人。[2] 巴尔干同盟的联军兵员数量多，士气高昂，军队战斗力较强。保加利亚军队主攻伊斯坦布尔方向，塞尔维亚的三个集团军对付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军团，希腊军队准备分别对付萨洛尼卡和亚尼纳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门得内格罗的军队主要任务是协同塞尔维亚军队在马其顿作战。同盟军队对奥斯曼帝国军队形成包围态势，准备以快速战术击溃奥斯曼军队。10 月 13 日至 17 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先后参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奥斯曼帝国于 1912 年 10 月 17 日对巴尔干同盟宣战。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就在多处遭受失败，损失惨重，仓皇撤退。10 月 24 日，保加利亚占领洛泽格勒（Lozengrad）。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大规模撤退，使得保加利亚于 11 月 12 日顺利包围亚德里亚堡。迪米特里夫（R. Dimitriev）将军率领的保加利亚第三军在攻陷洛泽格勒后，由于追击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失败，给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提供了一个撤退和重新布防的机会。然而，这个战略空间过于狭小。

保加利亚军队重新整顿，经过 4 天的激烈作战，占领了布尔加斯（Burgas）。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猛烈反攻，最后仍然败退。他们撤到了恰塔尔扎，修筑防御工事。保加利亚军队则势如破竹，在南部占领一座又一座城池，把领土延伸到了爱琴海沿岸。11 月 5 日他们占领了兹拉马，并切断了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具有战略意义的要道。11 月 27 日，保加利亚军队在斯维尔科穆尔（Sverkhomul）击溃了奥斯曼帝国的一支精锐部队，占领亚历山德罗波利斯（Alexandropolis）。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保加利亚通过一系列战争手段牢牢控制了爱琴海、马尔马拉海，抵达距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只有 40 公里的恰塔尔扎防线。[3]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被迫撤到恰塔尔扎——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后面。保加利亚

---

① Andrew Rossos, *Russia and the Balkans: Inter-Balkan rivalrie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908—1914*.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1981. p. 79.

② Andrew Rossos, *Russia and the Blkans: Inter-Balkan Rivalrie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908—1914*,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1981, p. 79. 说明：关于交战双方的军队数量，各种资料出入较大。土耳其文的《巴尔干战争回忆录》（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中的数据与《俄国与巴尔干诸国》（Russia and the Blkans）中的数据不一样。

③ Andrew Rossos, *Russia and the Blkans: Inter-Balkan Rivalrie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908—1914*.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1981. p. 80.

包围了奥斯曼帝国重镇埃迪尔纳。

当保加利亚军队在色雷斯战场作战时，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在袭击奥斯曼帝国西部战略要地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门得内格罗和塞尔维亚军队在进攻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斯库台（Shkodra），希腊占领西北部的杰尼纳。保加利亚和希腊争夺萨洛尼卡，但希腊率先到达这里并宣布占有这座马其顿最重要的城镇。两个月之内，奥斯曼帝国几乎丧失了它在欧洲的全部领土。[①] 当奥斯曼帝国军队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连遭失败时，阿尔巴尼亚于 11 月 28 日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

由于损失惨重，奥斯曼帝国请求欧洲大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英国、法国和俄国）调停，帮助签订一个停火协议。欧洲各国带着各自的目的，插手战争。俄国、英国、法国站在巴尔干同盟一边，德国和奥匈帝国则支持奥斯曼帝国。12 月 3 日，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签订休战协定。

俄国在支援巴尔干地区国家，又担心保加利亚军队进抵伊斯坦布尔不利于自己解决黑海海峡问题。德国和奥匈帝国则认为塞尔维亚和希腊是站在协约国一方的，因此不希望它们强大，相反，竭力防止奥斯曼帝国溃败。12 月 16 日，根据奥斯曼帝国亲英派大维齐卡米尔帕夏提出的请求，交战国的大使们在伦敦召开会议。奥斯曼帝国同意放弃马其顿和西部色雷斯，但拒绝放弃被保加利亚围困的埃迪尔纳。在会上，俄国、德国、奥匈帝国争论激烈。会议最后决定成立阿尔巴尼亚自治区，并要求奥斯曼帝国让出埃迪尔纳和爱琴海诸岛。其实，英国对于到底支持巴尔干战争哪一方，不断地变换态度。起初希望哪一方都不要获胜，因为无论哪一方胜利都难以达成解决争端的协议。没有料到奥斯曼帝国军队溃败这么快，英国外交决策者改变想法，打算支持巴尔干地区国家，同意保加利亚关于埃迪尔纳的要求，还支持希腊对爱琴诸岛的要求，准备确认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统治的终结，不过，英国外交部还是拒绝任何削弱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统治的建议。[②] 最后英国决定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解。

奥斯曼帝国新的内阁不甘心保加利亚占领埃迪尔纳等地，不接受大国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73.

② Josper Helle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4*, Frank Cass, London, 1983, p. 73.

提出的和解条件。1913 年 2 月 3 日战事再起。3 月 5 日希腊军队攻克杰尼纳，26 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联军攻陷埃迪尔纳。4 月 22 日，斯库台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投降。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接连几次失败后，被迫再次求和，回到谈判桌前。5 月 30 日，各方签订《伦敦条约》，而《伦敦条约》的第一条款规定：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诸国以爱琴海的埃内兹（Enez）至黑海的米迪耶（Midye）为边界线，这条线以西以北的欧洲领土不再属于奥斯曼政府管辖。[①] 条约还规定：阿尔巴尼亚的边界划分以及有关阿尔巴尼亚的所有事务委托给欧洲六国（俄、英、法、德、奥匈、意）处理，未经六大国允许奥斯曼政府无权进入阿尔巴尼亚；爱琴海诸岛归属问题委托给欧洲大国处理；相关国家派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解决巴尔干战争造成的财政问题；涉及战俘、司法权、国籍、贸易等事务，需签订另外的条约予以解决。[②]

履行条约，奥斯曼帝国放弃了埃内兹—米迪耶一线以西的欧洲领土，仅保留以东的地区，也放弃了对色雷斯和马其顿的要求，认可希腊对克里特岛的吞并。[③]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也获得了独立。阿尔巴尼亚独立但接受俄、英、法、德、奥匈、意等国的监督。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除保留伊斯坦布尔及附近的一小块地区外，其余在欧洲的领土被分割给巴尔干同盟各国，损失很大。对于巴尔干地区各国来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巴尔干地区四国摆脱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愿望得以实现。

（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伦敦条约》签订不到一个月，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 年 6—8 月）。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大部分奥斯曼土耳其人被驱逐出欧洲，但巴尔干各国仍不满足领土划分。塞尔维亚原计划得到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但没有得到，于是要求获利最多的保加利亚让出一部分马其顿领土。希腊要求占有马其顿南部和色雷斯西部。罗马尼亚希望占有南多布罗加。塞尔维

---

①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86.

②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87.

③ Philip Mattar,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Macmillan Reference, U. S. A. 2004, p. 384;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74.

亚和希腊对保加利亚获得较多领土强烈不满。协约国和同盟国出于利益需要，也插手巴尔干国家的领土分割。1913 年 6 月 1 日，即签订《伦敦条约》刚两天，塞尔维亚和希腊签订反保加利亚同盟条约，随后罗马尼亚也加入同盟。

保加利亚担心塞尔维亚—希腊联盟是对自己潜在的威胁，6 月 29 日对驻扎在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突然发起进攻，战争开始。塞尔维亚、希腊的军队进行还击。在保加利亚发动突袭后，罗马尼亚于 7 月 10 日对保加利亚开战，门得内格罗的军队也向保加利亚军队发起攻击。这些武装力量联合起来给保加利亚以沉重打击，保加利亚军队被迫撤退。

奥斯曼帝国乘机利用保加利亚的混乱局势，占领了东色雷斯，并于 7 月下旬收复埃迪尔纳。

1913 年 7 月 29 日，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的军队兵临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城下，保加利亚政府被迫求和。8 月 10 日，保加利亚和它的前同盟者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9 月 29 日，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伊斯坦布尔条约》。11 月 14 日，奥斯曼政府与希腊政府签订《雅典条约》，1914 年 3 月 13 日，奥斯曼政府与塞尔维亚在伊斯坦布尔单独缔结了条约，也叫《伊斯坦布尔条约》。[①] 其中，《布加勒斯特条约》详细规定了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各自所得的领土。

根据《布加勒斯特条约》和《伊斯坦布尔条约》，塞尔维亚和希腊在这些条约中获得的领土最多。塞尔维亚得到了马其顿北部，并与门得内格罗瓜分了诺维—帕扎（Novi Paza）行省，此后实力大大增强。希腊获得包括萨洛尼卡在内的马其顿南部地区，得到色雷斯西部和克里特岛（也获得伊庇鲁斯和杰尼纳）。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被承认。门得内格罗的领土也有扩充。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尼亚也获得了部分领土，埃迪尔纳归还给奥斯曼帝国，南多罗加划给了罗马尼亚。相应地，保加利亚丧失其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大部分土地，失去南多布罗加。马其顿的领土几乎全被塞尔维亚和希腊占领。

巴尔干战争是世界大战之前发生的局部战争。军事史上说，巴尔干战

---

①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109 - 114.

争提供了挖战壕作战的先例（特别是在色雷斯），此外还较早地有效使用机械手枪，战场上也使用了飞机（虽然一些镇子受到来自于空中的轰炸，但飞机主要是用于侦察）。巴尔干战争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影响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平民在这场战争中深受其害，许多人被迫迁移，遭到暴力袭击，遭受拷打，甚至被杀害。[①]

在战争中，奥斯曼政府利用大量宣传工具动员了全体居民（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性别差异）。政府采用一种模糊的、世俗的奥斯曼意识形态，试图团结“全国人民”。然而，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失败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矛盾更为突出，统治者被迫放弃世俗的“奥斯曼主义”的说教。在失去基督教徒聚居地之后，大批穆斯林难民（大约42万）涌入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东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帝国变成一个穆斯林占主体的强调土耳其人身份的国家。[②] 在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失去其欧洲领土的83%和居住在这里的人口的69%。[③] 在奥斯曼帝国，人口布局和地理的新变动，引发了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1913年2月23日，青年土耳其党解除卡米尔帕夏的职务，理由是他未能保住埃迪尔纳。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奥斯曼帝国放弃了基督徒占主体的巴尔干广大地区，奥斯曼帝国疆域大大缩减。[④] 巴尔干战争使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⑤]，因为这一次是被相对弱小的属国打败的，而且是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几个民族打败，一部分国土被分割出去。只要有机会，奥斯曼土耳其人渴望发动一场战争，重新得到此前一直拥有的巴尔干地区领土。奥斯曼土耳其人想重获这些领土的野心，是奥斯曼帝国自愿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动因之一。[⑥] 从另一个方面看，巴尔干战争就像是第一

---

①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74.

②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74.

③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98.

④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Vol. 1 – 3, Macmillan Reference, U. S. A., 2004, p. 384.

⑤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119.

⑥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p. 74.

次世界大战的“预演”[①]。

巴尔干战争的后果是多方面的：第一，巴尔干战争导致50万以上的人口被迫出逃或被驱逐，失去家园。[②] 第二，留在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人的权利和自由根据条约得到保证，但在战争之后，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巴尔干的土耳其人的问题突显出来。第三，战争带给巴尔干地区的重大变化，是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之间领土划分的变化。第四，巴尔干战争的失败，使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体制发生了改变。第五，战争加快了奥斯曼帝国社会和经济的崩溃。[③] 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导致巴尔干地区力量重组：罗马尼亚放弃与德国、奥匈帝国的同盟而与协约国靠近；塞尔维亚王国几乎把领土扩大了一倍；马其顿被瓜分；南多布罗加被罗马尼亚占领；奥斯曼帝国几乎彻底退出巴尔干地区（只占有东色雷斯）。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投向俄国一边，而保加利亚失败后加入德奥（匈）同盟，巴尔干各国被卷入欧洲大国争霸的漩涡。这次战争没有解决巴尔干地区诸国间的争端，反而增添了新的矛盾。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前文提到，青年土耳其党人从1909年开始掌权，形式上是在推行宪政，实际上试图实行一党独裁，内部权力斗争不断。在意土战争和巴尔干战争失败后不久，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签订盟约，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帝国瓦解。

一　结盟和参战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握政权期间，奥斯曼政府中握有实权的军官大多数是在德国接受教育或是受过德国军官培训的。手握大权的人物有：伊泽特帕夏（1913—1914年任陆军部长）、恩维尔帕夏（1914—1918年任陆

①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119.

② 国际关系史资料中的数据是：23.4万土耳其人被赶出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1.5万保加利亚人被迫从马其顿迁到希腊，7万希腊人从色雷斯逃往保加利亚，7万阿尔巴尼亚人被遣往埃皮尔，26.5万希腊人被奥斯曼帝国驱逐出境，10万土耳其人也不得不从希腊移到小亚细亚。

③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bul, 2011, s. 119 - 120.

军部长）、杰马尔帕夏（海军部长）、萨义德·哈利姆（1917 年之前担任大维齐）、塔拉特（内政部长，1917 年任大维齐）等，他们赞赏德国的先进武器、良好的军事组织，坚信德国战无不胜。这些青年土耳其党人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想让孱弱的奥斯曼帝国重新复兴，他们想唤起一种民族意识。在“泛土耳其化”[①] 思潮影响下，土耳其政治精英们试图仿效“大德意志”模式。

德国一方是如何看待奥斯曼帝国结盟问题的？根据资料，德皇威廉二世对奥斯曼帝国的广阔领土及其战略位置感兴趣，也相信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有潜在的利益。德国政府中的首脑人物如陆军和海军部长都认识到与奥斯曼帝国结盟有好处，但他们并不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武装力量在一场欧洲大战中能起多大作用。关键是，德皇威廉二世对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友谊”价值的认可是反复改变的。当奥斯曼帝国提出要加入同盟国一方时，德国人并不感到高兴。

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站同盟国一边，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当时大多数内阁成员明白，在经过接二连三的摧毁帝国财力以及军事力量的局部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很难去应付新的战争。青年土耳其党的多数成员认为奥斯曼帝国应该与英法靠拢，不要与德国靠得太近。其实，德国的独裁政府和军国主义仅仅对恩维尔和那些受过德国教育的官员具有吸引力。杰马尔帕夏和帝国海军官员起初也倾向于协约国，反对与德国结盟。[②]然而，1914 年初，恩维尔帕夏接替伊泽特帕夏出任陆军部长，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一周前（7 月 22 日）恩维尔帕夏向德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瓦根海姆（Wangenheim）提出，奥斯曼帝国作为正式盟友加入同盟国集团，明确说他和他的多数同僚认为同盟国“比

① 当时在近东地区主要有“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青年土耳其党人更多接受的是现代教育，思想较为西化，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对于建立“泛伊斯兰主义”兴趣不大。只有“泛土耳其化”的主张得到了奥斯曼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恩维尔帕夏在内的许多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都是“泛土耳其化”的拥护者。他们的目标不只是迫使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人绝对服从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人，而且将奥斯曼帝国之外所有可能找到的与土耳其在种族、语言、历史方面有着相似性的民族与国家视为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0.

协约国强大，而且将是世界大战的胜者”。瓦根海姆很清楚奥斯曼帝国没有做好军事准备，起初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几天后又同意重新协商。[①]

很显然，恩维尔帕夏已为结盟做好准备。恩维尔的观点很明确：第一，如果战争爆发，俄国显然会侵占奥斯曼帝国领土，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第二，俄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奥斯曼帝国很难得到英国、法国的保护。第三，德国在中东地区没有领土野心，其战略利益要求限制俄国的进一步扩张。第四，德国的盟友奥地利对奥斯曼帝国领土垂涎已久，但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吞并，使本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凸显，要进一步占据斯拉夫地区就变得困难。[②] 实际上，杰马尔帕夏通过各种渠道多次与协约国接触，意在与恩维尔的做法相抗衡，英国、法国却草率地拒绝了杰马尔帕夏的意图。看来，欧洲大国中只有德国愿意公开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大多数奥斯曼帝国内阁成员依旧反对参战，认为要参战除非奥斯曼帝国的安全得到保证。恩维尔帕夏主张站在德国一方加入战争，杰马尔帕夏在被英国、法国拒绝后也不反对恩维尔，而塔拉特帕夏则在两大集团之间斡旋。德国曾建议奥斯曼帝国派军队攻击克里米亚和黑海沿岸的敖德萨，或去攻击苏伊士运河，以牵制俄国和英国军队。英国、俄国怂恿奥斯曼帝国持中立态度，并开始与奥斯曼帝国谈判，希望奥斯曼帝国不卷入战争。

在与德国结盟依然遭到普遍反对的情况下，谈判最初仅仅是由大维齐兼外交部长萨义德·哈利姆和陆军部长恩维尔负责，并且是秘密进行的。8 月 2 日，正式同盟条约[③]在君士坦丁堡秘密签订，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关于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结盟，以及奥斯曼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因素，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学者们依据档案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员和军事将领们也写了不少回忆录，可供参考的资料十分丰富。基本结论是，奥斯曼帝国与德国 1914 年 8 月 2 日签订盟约是“无法阻止的”，而在签订盟约这件事上恩维尔发挥了主要作用，他的观念决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④] 恩维尔帕夏作为陆军部长，

---

①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ank Cass, London, 1996, p. 124.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0.

③ 全名《奥斯曼土耳其与德意志同盟条约》，土耳其文 *Osmanlı-Alman İttifak Antlaşması*。

④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s. 14 – 15.

之所以要把奥斯曼绑在德国战车上，是因为他有两个主要理想：一是把奥斯曼帝国变成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二是使土耳其斯坦的民族摆脱俄国，获得独立地位。[①] 恩维尔帕夏认定，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必胜，能够帮助奥斯曼帝国摆脱俄国并走向现代化。

当时，为了促成“被迫参战”的表象，恩维尔及其支持者寻找机会挑衅协约国，促使协约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9 月 7 日，奥斯曼帝国宣布彻底废除与英、俄、法等国签订过的一系列协定，目的是使协约国的经济利益蒙受严重损失。9 月 14 日，海军部长杰马尔授权海军将领把舰队开进黑海去攻击俄国船只，并让他用奥斯曼帝国的名义与之交战，但是这一命令却被内阁撤销了。10 月 1 日，奥斯曼帝国单方面将关税提高了 4%。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外国邮局（包括德国开设的）均被关闭，由帝国政府接收。在奥斯曼帝国的外国人也要接受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受奥斯曼法庭的审判。恩维尔以个人名义命令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不准外国船只通过，以防止协约国军队进入。10 月 11 日，德国大使私下许诺奥斯曼帝国，如果它们宣战，德国将向其支付价值 20 亿库鲁什的黄金。10 月 21 日，这批黄金被运送到奥斯曼帝国。恩维尔和杰马尔帕夏在没有征得内阁同意的情况下再次授权海军将领进攻黑海的俄国军队，以使其宣战。[②] 10 月 29 日，奥斯曼帝国海军攻击俄国海岸并摧毁一些俄国船只。萨义德·哈利姆和扎维（Cavit）非常愤怒，让恩维尔给海军司令发出停火的命令，并向协约国道歉。但一切都太迟了。恩维尔帕夏对该事件的声明激怒了俄国黑海舰队。11 月 2 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三天之后英国和法国也随之宣战。英国宣布吞并塞浦路斯，不久又宣布埃及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

1914 年 11 月 11 日[③]，奥斯曼素丹穆罕默德五世以哈里发的名义宣布发动对协约国的“圣战”，并号召所有的穆斯林——特别那些是处于英国和俄国统治下的穆斯林——加入这场针对异教徒的战争。从奥斯曼帝国成

---

①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s. 171.

② Stanford Shaw and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p. 312.

③ 关于宣战时间，有的文献中是 1914 年 10 月 29 日。因为 10 月 29 日是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击俄国海岸的时间，当时并未宣战。

为同盟国的成员，到奥斯曼素丹宣布向协约国发起“圣战”，三个月之内，没有资料表明奥斯曼帝国是如何加紧军事训练的，倒是有资料表明，恩维尔帕夏等人积极活动（为参战做了很大努力）。当然，德国是把奥斯曼帝国推向战场的重要的力量。德国在《奥斯曼土耳其与德意志同盟条约》签订之后，仍想办法促使奥斯曼帝国参战，因为德国需要把欧洲战线向前推进，在巴尔干和西亚战场抵抗俄军。① 法德之间正在西线酣战，德国需要扩大战场，借用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在东线与俄军战斗。恩维尔帕夏等人正好满足了德国人的愿望。

从奥斯曼帝国参战前的外交动向看，作为弱国，寻求欧洲大国的支持是必然的选择，但奥斯曼帝国选择与德国结盟而与英国、法国、俄国为敌并没有必然性。从另一个方面看，当时欧洲大国重新瓜分世界的意图，军备竞赛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论奥斯曼帝国与哪一个欧洲大国“结盟”，都会被拖入战争旋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能保持良好关系，奥斯曼帝国也可能选择与英国或法国结盟，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会作为协约国的一员进入战场，其结果会是另一种局面。所以，奥斯曼帝国被卷入战争是难以避免的，但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从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同盟国“共命运”的那一刻起，大多数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奥斯曼帝国参战的意义，主要限于军事战略关系的考虑。德国政府最关心的是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留在战场上并尽可能多地牵制协约国的军队。而奥斯曼帝国希望德国捍卫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并努力维持着自己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独立性。因此，每当奥斯曼帝国与它的德国盟友产生意见上的分歧时，土耳其人往往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双方的合作与斗争贯穿于整个大战时期。②

二　战场上的胜与败

1914 年 8 月初，英国为奥斯曼帝国建造的两艘军舰完工了，奥斯曼帝国派人来，准备运走这两艘舰。伊斯坦布尔已经筹备用盛大的典礼来欢

---

①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s. 25.

②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ank Cass, London, 1996, pp. 127 - 129.

迎新造的这两艘最大、最现代化舰艇的到来。然而，8 月 3 日，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突然宣布，根据欧洲的战局变化，这两艘舰艇将被英国海军征用。极其失望和愤怒的情绪在奥斯曼帝国迅速蔓延开来，成千上万为建造这两艘舰艇而捐钱的人们蜂拥至街道抗议，他们把英国的这一做法看作英国人背信弃义。[①]

奥地利已经开始与俄国对抗，德国要求奥斯曼帝国提供支援。萨义德·哈利姆要求德国给奥斯曼帝国提供正式的保护，以作为可能遭到巴尔干国家对其进攻的回应。恩维尔也要求用爱琴海诸岛（甚至西色雷斯、希腊和保加利亚）作为补偿。8 月 3 日，德国派地中海舰队的两艘战舰轰炸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等地，英国海军做出反应，立即紧追这两艘德国战舰。德国战舰急忙驶向地中海东部。8 月 11 日，恩维尔授意这两艘军舰进入奥斯曼帝国的水域。英国提出抗议，认为保持中立的奥斯曼帝国应该拘禁这两艘舰艇及全体船员，并把他们遣送出奥斯曼帝国的水域。德国和奥斯曼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把这两艘舰以一种虚构的交易方式，转让给奥斯曼帝国舰队。这两艘战舰改变了名称[②]，给所有船员配发奥斯曼帝国帽子和制服，并被征募进入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行列。

英国、法国于 1914 年 11 月 5 日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协约国军舰驶向土耳其海峡区。为保卫通往印度的运输线，英国出兵两河流域。11 月 6 日，从印度调来的英国舰队驶至波斯湾。大战开始不久，另一支英国军队也从埃及出发，进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近东战场的战斗全面展开。

从 1914 年 11 月到 1915 年 12 月，奥斯曼帝国在各个战场上的情况差异较大。有的战役中所经受的惨败和巴尔干战争差不多，有的战役则比恩维尔和同僚们期望的要好一些。总体情况表明，奥斯曼帝国军队现代化还是有成就的，青年土耳其党和德国顾问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奥斯曼帝国军队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战例之一，发生在加利波利（Gallipoli）。

1915 年初，俄国要求英国从奥斯曼帝国另一边进行夹击，以配合俄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11.

② 这两艘德国战舰一艘是“戈本”号（Goeben），另一艘是“布莱斯劳”号（Breslau），成为奥斯曼帝国舰队后分别改称“亚武斯·素丹塞利姆”号和“米迪利”号。在 1918 年 1 月的海战中，“米迪利”号被鱼雷击中沉没，“亚武斯·素丹塞利姆”号严重受损，后来被修复改建成土耳其新式旗舰，在土耳其共和国时代仍长期使用。详见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ank Cass, London, 1996, p. 127。

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战斗。经过一番讨论后，英国决定实施一项由丘吉尔提出的计划，即派一支海军远征队去轰炸并占领加利波利半岛（达达尼尔海峡的西海岸），其目标是攻占君士坦丁堡。一旦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可以迫使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争，挫败德国在东方战线的力量，也有助于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战斗，保卫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而且可以打通由黑海给俄国运送物资的通道。2 月 19 日，英国第一舰队前往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准备轻而易举地占领海峡并且直达伊斯坦布尔。但英国人没有想到，由冯·桑德斯（Von Sanders）指挥的奥斯曼军队在海峡中布下水雷，并且在山地四周布置重炮。英国军队进攻海峡受挫，损失了三艘战舰。原定 4 月 25 日从埃及派出英国军队登陆加利波里的作战计划不得不改变。在这期间，冯·桑德斯本人来到加利波利，并进一步加强了奥斯曼军队的防御措施。守卫加利波利的奥斯曼军队由杰出的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指挥。攻击奥斯曼军队的英国部队中有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组成的军团。这支部队受命在加利波利半岛西侧建立一个桥头堡。登陆半岛取得部分成功，但付出了重大代价。奥斯曼军队依旧占据要塞，一次次地击退英国军队的进攻。法国军队也在位于安纳托利亚一侧即海峡东边的库姆加莱（Kumkale）登陆，但战略意义不大，后来被召回去增援加利波利。①

当夏季到来时，加利波利战场基本上陷入僵局。英国的指挥官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得到增援，但英国无法增援。提出计划的丘吉尔此后被解除海军大臣的职务。英国政治家意识到他们陷得太深而难以脱身。到了年底，英国战时内阁决定放弃在这里的整个作战计划。英国军队 12 月 18 日到 19 日从海峡西岸撤离，1916 年 1 月 8 日到 9 日从加利波利半岛彻底撤离。占领加利波利的企图失败了。英国一方的伤亡人数为 21.398 万人，而奥斯曼军队伤亡人数则为 12 万人。② 奥斯曼帝国依然可以对抗俄国军队和在埃及的英国军队。保加利亚军队和德国军队受到鼓舞，发动对希腊的战役，而俄国军队仍无法得到英国的援助。

在 1915 年这一年，近东地区的埃及和巴勒斯坦，被德军和英国军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7.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7, p. 318.

队当作主战场，但没有激烈的战争，只有在苏伊士运河区发生争夺战。年初德国军官们就意识到，德国要能够有效地打击和压制英国，就必须在近东地区取得进展。而英国国内的那些所谓"东方通"，也认为英国必须在近东地区取得优势。于是埃及和巴勒斯坦成为双方要全力争夺的战场。德国军队高估了保卫埃及的英国军队人数，其实只有7万人。1月中旬，大约2万人的奥斯曼帝国第八军团进入埃及——他们从比尔谢巴出发，穿越西奈半岛袭击苏伊士运河。不过，第八军团指挥官对英方运河防御力量估计不准。当时德国领导人坚持认为，英国军队最有可能在中东地区遭受重创，奥斯曼军队和德国军队指挥官决定在运河区发起进攻。其实奥斯曼帝国第八军团的兵员严重不足，缺少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物资供给（尤其是淡水供给）不足，穿越整个西奈沙漠的物资运输也成问题。[①]

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胜负，还取决于当地阿拉伯人支持哪一方。战争一开始，奥斯曼帝国和英国人都想办法争取阿拉伯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奥斯曼帝国希望伊本·沙特率军队包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伊本·沙特表示，由于他和伊本·拉希德（Ibn Rashidhs）长期不和，如果他派出自己的军队去保护美索不达米亚，纳季德地区就会暴露在对手面前而受到攻击，所以没有答应。英国派人联络阿拉伯半岛的伊本·沙特、麦加谢里夫和科威特的谢赫，要求他们发动针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圣战。这些实力派人物表示要确保圣城的安全，同时要防卫红海沿岸及其港口。英国希望伊本·沙特站在英国一方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伊本·沙特也没有立即答应。[②] 德国上层担心阿拉伯人以圣战方式进入埃及，担心奥斯曼军队进攻运河失败。德国外交官奥本海默在维也纳拜访前埃及总督时，表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袭击运河失败可能造成的结果非常忧虑，甚至恐慌。他预测，英国军队很快会长驱直入叙利亚，向麦加和麦地那进兵。

由杰马尔帕夏指挥的奥斯曼帝国第八军团用两周时间穿越100英里的西奈沙漠，去攻击苏伊士运河时，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阿拉伯部落首领的

---

① Donald M. Mckale, *War by Revolution: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iddle Eas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8.

② Donald M. Mckale, *War by Revolution: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iddle Eas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9.

支持。由于战略设想的分歧，以及在对重要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德国军官克雷塞斯坦与杰马尔帕夏没有协作。奥斯曼土耳其人巡逻侦察时用骆驼，而英军在侦察时使用飞机。英国军队既能有效护卫开罗，又能提前掌握奥斯曼军队的动向，提高了运河区的防御能力。英国皇家空军还多次对奥斯曼军队和德国军队进行空袭。2 月 3 日上午，奥斯曼军队开始攻击运河区英军防线。英国皇家海军对行进中的奥斯曼军队进行炮击。当 40 名奥斯曼土耳其士兵通过浮桥到达运河西岸时，他们全部被打死。到了傍晚时分，英国军队赶走深入阵地的奥斯曼军队。战斗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士兵伤亡不少于 1500 人，而英军的伤亡不到 150 人。杰马尔帕夏下令剩余部队撤退，返回巴勒斯坦。克雷塞斯坦在沙漠中仍保有几个营的兵力及一个中队的骑兵。①

奥斯曼军队进攻运河区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但事后追究失败原因时，奥斯曼帝国和德国互相指责。奥斯曼土耳其人认为德国人没有提供足够的武器和后勤物资保障，而且，德国人利用埃及当地人对抗英国军队的愿望落空，是“自欺欺人”。德国人却认为，这次失败主要是奥斯曼帝国第八军团毫无用处。客观地说，奥斯曼土耳其人筹划和领导的这次远征准备不足，德国人对进攻运河行动的价值判断是正确的。当奥斯曼军队进攻运河时，英国急忙从加里波利战场上抽调兵力，确保埃及和运河安全，可见这里是英军统帅们放在首位来考虑的。

在东北战场，高加索战役的第一阶段（1914 年 12 月至 1916 年 2 月），俄国政府将亚美尼亚人从它们的边界撤出，为作战腾出地方，亚美尼亚人则心甘情愿地这样做，他们期待着，俄国人的胜利将不仅很快使他们回到家园，而且能越过边界占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地方。恩维尔也使奥斯曼帝国这边做好准备，迁移亚美尼亚人，防备俄国人入侵。1915 年 5 月中旬，奥斯曼政府要求凡城（Van）、比特里斯（Bitlis）和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亚美尼亚人撤离，并安排他们定居在摩苏尔和伊拉克北部的城镇或营地。那些居住在西利西亚（Cilician）农村以及叙利亚北部的亚美尼亚人，也以同样的理由被送到叙利亚中部。奥斯曼军队接到特殊命令，保护亚美尼亚

---

① Donald M. Mckale, *War by Revolution: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iddle Eas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 100.

人迁移，提供足够的食物和其他供给以满足移民需求。[①]

奥斯曼军队在伊拉克前线处于防守的地位。英国军队一部分驻扎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和基尔库克，保卫油田。英国作战部队来自印度，从波斯湾进入并在法奥港登陆，继续北上，奥斯曼军队奋起反击，英国军队进展缓慢。1915 年 9 月 29 日，英国军队到达巴士拉以北 400 公里处的库特（Kut），目的是向巴格达方向推进。奥斯曼军队严阵以待，12 月 22 日发生遭遇战，英国军队损失严重，被围困在库特。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冯·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派遣一支由哈里尔（Halil）帕夏率领的军队在通往波斯湾的路段设防，截击前来增援的英国部队。英国的增援部队始终未能成功救援。1916 年 4 月 6 日冯·德·戈尔茨病死于巴格达，哈里尔帕夏于 4 月 29 日成功地围攻库特并迫使英国军队投降。[②] 这是奥斯曼军队继加利波利战役后的又一次胜利。不过，奥斯曼军队要服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整体作战计划，只保留了很少的部队守卫巴格达。

尽管在库特等地取得了胜利，但奥斯曼军队要将英国人赶出伊拉克是没有希望的。相对于欧洲西部前线正在展开的惨烈战斗而言，1915 年的近东战事似乎只是小小风浪。实际上，协约国一方在近东地区的损失较大。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继续煽动穆斯林的反英斗争，英国除了在达达尼尔海峡遭受了严重的军事溃败，在两河流域的军事行动也受挫，相反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在东部战线对付俄国军队时的稳步推进，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取得了明显优势。[③]

1916 年年初，奥斯曼帝国军队不得不面对俄国在东安纳托利亚地区

---

① 协约国的宣传机构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宣称，在战争期间有超过 100 万亚美尼亚人死于大屠杀。但是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亚美尼亚人的数量大约有 250 万。实际上根据奥斯曼帝国的人口统计，在战前奥斯曼帝国中亚美尼亚人的总数最多有 130 万。其中大约有一半与城市居民一起留下。真正被转移的人数总共不超过 40 万。此外，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大约 50 万亚美尼亚人逃到了高加索和其他地区。自此之后大约有 10 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奥斯曼帝国，15 万到 20 万人移民到西欧地区和美国。于是有人估计，大约 20 万亚美尼亚人消失了，除了在转移的过程中死亡的人外，还有些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战争中死亡的。其实，同一时期约 200 万穆斯林死于战争。详见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15 - 316。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18 - 319.

③ Donald M. Mckale, *War by Revolution: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iddle Eas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7.

发动的进攻。俄国一支军队向南到达凡湖并靠近穆什，同时，北方另一支来自卡尔斯（Kars）的军队正在直接向埃尔祖鲁姆进军，很快包围了埃尔祖鲁姆，2月16日占领这座城市。随后出现严重的大屠杀，100万穆斯林农民和牧民被迫逃亡，在向埃尔津詹（Erzincan）逃亡的途中有数千人被杀害。恩维尔派前任陆军部长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率军队去增援，从加利波利战役中胜利归来的军队也派去组织反击。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夺回埃尔祖鲁姆的努力因补给不足而失败。多数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到叙利亚，或者逃到俄军战线的后方以躲避战火。俄国人以压倒性的优势占领了特拉布宗（1916年4月18日）和埃尔津詹（7月下旬），切断锡瓦斯到埃尔祖鲁姆之间的道路。[①] 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阻止了俄国向凡湖附近的进军。俄国军队得到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亚美尼亚人以为借助俄国力量就可能脱离奥斯曼帝国，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俄国人也想利用亚美尼亚人。虽然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俄国的占领之下，但俄国沙皇政权1917年被推翻，奥斯曼军队在东部战线的压力也随之减轻。

1917年的冬季，俄国停止攻势，而汉志地区阿拉伯人的反抗依然持续，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战场陷入危险中。恩维尔起初打算让德国人遵守许诺，在奥斯曼帝国领土被占或面临险境时派遣军队、提供资金给以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恩维尔决定尽其所能组建一支军队，首先去收复伊拉克领土，然后移师西进去抗击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恩维尔将这支军队命名为“闪电”（Yıldırım），音译“耶尔德讷姆”[②]。冯·法尔肯海因（Von Falkenhayn）将军以及65名德国军官被派去组建并指挥这支军队。此时俄国的新政权无暇顾及高加索战事，奥斯曼帝国从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挑选一些军队，连同在西线和德军并肩作战的5个师，充实新组建的这支军队。“耶尔德讷姆”即后来知名的第七军，拥有14个师，整装待发。这支军队中有奥斯曼帝国最优秀的指挥官，其中包括穆斯塔法·凯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22 - 323.

② 费希尔《中东史》中提到恩维尔进行了一次“闪电”行动，不是组建名为“闪电”的部队。

末尔。[①]

在叙利亚前线，英国的埃及远征军于1916年12月在阿奇博尔德·默里（Archibald Murray）爵士指挥下开始进攻叙利亚。而奥斯曼军队在此地的防御相对较弱。英国军队1917年3月在加沙遭受重大损失，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取代默里爵士担任统帅。英军的进军速度之慢，足以等待建造一条铁路来保证其供给。此时，费萨尔率领的阿拉伯军队穿越约旦河东部，于7月6日占领了亚喀巴，并以突袭和其他破坏方式打击奥斯曼军队。10月，英国军队再一次对奥斯曼帝国发起进攻，强大的攻势从地中海岸边的加沙到比尔塞比全线展开。在持续一周的战斗之后（从10月26日到11月1日），大片领土落入英阿联军手中。三天之后阿克城也被英阿联军包围。联军推进到广阔的阵地，并于11月中旬占领了拉姆拉和雅法。耶路撒冷守军多次打败英、阿联军的进攻，12月9日被迫放弃抵抗。

在美索不达米亚，英国增加军事力量，在弗里德里克·莫德（Frederick Maude）爵士指挥下，于1917年2月占领库特，3月11日占领巴格达。到9月，英国军队完全控制了伊拉克中部。莫德爵士本人染霍乱病死，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继任，率军队控制了除摩苏尔之外的整个伊拉克。

就在1917年2月3日，奥斯曼帝国内部发生政治变动，大维齐萨义德·哈利姆辞职。他对以恩维尔为首的阁员把奥斯曼帝国推入战争表示不满，试图与恩维尔抗衡不成功，便辞去大维齐职务。塔拉特帕夏被任命为大维齐，还兼任内政部长，能够操控政权。

此时，国内出现干旱，加上农民应征入伍使劳动力减少，影响了农业生产，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出现食物短缺。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兵营里出现流行性伤寒病，很快传染到其他地方。政府大规模增加税收，又镇压反对派，造成局势不稳。而德国在西线失败的消息传来，对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和民众产生消极影响。尽管有审查制度，有政治控制，但越来越多的民众还是公开质疑，为什么奥斯曼帝国要卷入这场持续很久且损失惨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23.

重的战争？[1]

奥斯曼帝国希望收复东部被占领的省份。恩维尔的想法是，阿拉伯行省已经丢了，若能把奥斯曼土耳其人生活的领土保得住，也是一种补偿。然而，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根据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高加索地区的民族群体如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努力寻求独立。而沙皇制解体后，俄国统治下的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可能性。[2] 到 1917 年 12 月，已经形成独立的外高加索共和国，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不久，格鲁吉亚从外高加索共和国分裂出来，在德国人的保证下于 1918 年 5 月 26 日建立独立国家。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后来也这么做了。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所倡导的原则，带给高加索地区的是混乱，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很不稳定。[3] 12 月 18 日，外高加索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埃尔津詹签署休战协定，但是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对南高加索和东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农民进行屠杀，这里的农民只剩下 60 万人（而战前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特拉布宗、凡城以及比特里斯等省的穆斯林农民人数为 200 多万人）。[4] 这显然违反休战协定，恩维尔的反应是向这些地区发动进攻。在 1918 年 2 月 14 日，奥斯曼军队夺取埃尔津詹，迫使数千名亚美尼亚人回到高加索。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传来签订条约的消息后，俄国人撤退，而奥斯曼军队占领卡尔斯、阿尔达罕（Ardahan）和巴统（Batum）等地。

不久，奥斯曼帝国与外高加索共和国在特拉布宗开始和平谈判。恩维尔提出，奥斯曼土耳其人放弃在高加索的要求，而作为交换，外高加索共和国应承认奥斯曼帝国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获得的东安纳托利亚行省。亚美尼亚人迫使外高加索共和国拒绝这一提议。战争重新开始。奥斯曼帝国军队乘胜东进。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撤退。他们期待着一场足以使他们在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建立新家园的胜利，如今他们被迫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24.

②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s. 137.

③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s. 137.

④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26.

逃离。1918 年 5 月 11 日，新的和平会议在巴统举行。恩维尔坚持奥斯曼帝国的商人应得到自由穿越高加索地区的权利，并且外高加索共和国应减少其武装力量，以防将来亚美尼亚人威胁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安全。但外高加索共和国代表团中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拖延谈判。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再次进军至俄国控制的亚美尼亚人地区——这些地区自 17 世纪以来就不在奥斯曼素丹控制范围。德国人也想从这一地区得到利益，因而对恩维尔帕夏施压，让他把军队留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以防英国军队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进犯，但不要朝外高加索方向挺进。当时同盟国军队急需遏制协约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攻势，而奥斯曼帝国抽走自己的军事力量，向外高加索发动强攻，是无视德国的“意愿”，与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期望相违背。

当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外交官为各自在外高加索等地区的利益出现不愉快时，战场上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从 1918 年 7 月起，西线的德国军队缓慢地后撤。9 月，在马其顿前线，协约国一次成功的进攻使保加利亚退出了战争，而奥斯曼军队在巴勒斯坦被艾伦比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击败，被迫撤退。塔拉特帕夏在德国的压力下屈服，于 9 月 23 日签署协定，承诺奥斯曼军队将从高加索撤离。恩维尔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击，切断巴库与北方地区的联系。不过，恩维尔在高加索地区的胜利是以其他战线受损为代价的。当他的军队前进到里海时，英国军队已经从南部推进到奥斯曼帝国的腹地。像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在 10 月初正式告知美国威尔逊总统打算实现和平。[①] 就在这个时候（10 月），奥斯曼内阁改组。大维齐塔拉特帕夏辞职，议会计划由几年前担任过大维齐的陶菲克帕夏组建内阁，但计划很快搁置，改由陆军部大臣阿赫迈德·伊泽特帕夏组阁。[②] 伊泽特帕夏领导的内阁掌控政府，其后很快开始停战谈判。

三 战场外的瓜分阴谋

战争进行时，协约国已经谋划在奥斯曼帝国失败后如何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从 1915 年到 1917 年，协约国签订过四个“秘密协定”。

---

①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ank Cass, London, 1996, p. 130.

② Necmeddin Sahir Sılan, *II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s. 66.

《伊斯坦布尔协定》是战时关于近东的第一个秘密协定，国际关系史的文献中也称之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秘密协定》。不过，称《伊斯坦布尔协定》仅仅是指俄国、英国和法国于1915年3月18日秘密签署的协议；称《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秘密协定》是指1915年3月至4月俄、英、法三国在外交上所做的“交易”的全部。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俄国占领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西岸地区；伊斯坦布尔作为一个自由港对所有协约国成员开放，俄国同意各国穿过海峡进行自由通商；安纳托利亚地区将成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穆斯林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以及阿拉伯行省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并置于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统治之下；英国和俄国之间确认和延续1907年达成的分割伊朗的协议，英国、俄国两国在伊朗划分的“缓冲区”（保持中立的地带）划给英国，而伊斯法罕和伊朗靠近阿富汗的地区划给俄国。[①] 之所以有这样对俄国非常有利的协定，是因为英国、法国两国需要换得俄国在东线与同盟国军队作战，他们不得不尽量满足俄国。

1915年4月26日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四国秘密签署的《伦敦条约》是针对近东的第二个协定。按照这个协定，意大利在战后占有巴尔干半岛西岸的特兰提诺、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大片土地，允许意大利得到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的主权。此外，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的一切权利归意大利所有。

1916年5月16日英、法两国秘密签署的《赛克斯—皮柯协定》，这是针对近东的第三个条约，也是战时协定中最重要的一个。对《赛克斯—皮柯协定》所涉及内容的磋商，始于这年4月英国外交官赛克斯与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皮柯及俄国代表的秘密会谈，5月协定签署，而《赛克斯—皮柯协定》中关于如何划分阿拉伯领土的条款最终在10月形成。根据这个《协定》，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被划分为几部分：大叙利亚（包含土耳其西南部、整个黎巴嫩地区、伊拉克北部）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阿拉伯半岛由英国控制，对巴勒斯坦实行国际共管。英国按照协定将得到伊拉克南部，包括从巴格达到波斯湾地区，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20.

还有海法港口和巴勒斯坦的阿克；法国计划得到叙利亚沿海省份[①]。协定许诺意大利得到安纳托利亚西部，俄国得到安纳托利亚东部，包括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凡城、比特里斯等地。[②]《赛克斯—皮柯协定》后来被修改，与原来签订时有很大不同，其中主要的变化，就是把俄国和意大利从"协定"中排除出去。《赛克斯—皮柯协定》中把叙利亚东部和摩苏尔省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协定中还规定：英、法两国在各自的直辖领地内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在势力范围将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根据协定所划的范围，英、法两国有权向新建的国家派遣顾问和公务人员。[③]《赛克斯—皮柯协定》明确了英、法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全部要求。这个协定一直被保密，是因为它与英国对阿拉伯人的许诺相冲突。协定专门讨论划分阿拉伯地区，但阿拉伯人并不知道。1917 年俄国发生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公开了这个协定，引起阿拉伯人的愤慨。[④]

1917 年 4 月 17 日英、法、俄、意等国在圣·让—德—莫里埃纳(St. Jean de Maurienne)秘密签订一个《圣·让—德—莫里埃纳协定》，这是第四个协定。该协定是英、法、俄为了换取意大利加入协约国而签订的。协定许诺把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包括伊兹密尔和科尼亚行省在内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从安纳托利亚西部至博斯普鲁斯海峡都划给意大利。这一协定被保密，是因为希腊也要求得到伊兹密尔和安纳托利亚西南地区。[⑤] 协定签署后，本是同盟国成员的意大利，向德、奥等同盟国宣战。

战时产生的肢解奥斯曼帝国的协定，有不少是自相矛盾的，但这些协定中的承诺起到了促进协约国战时合作的作用。俄国参与了战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定，但是 1917 年 11 月之后苏维埃政权宣布退出战争，原来的筹划和构想失去任何意义。在战时协定中获利最多的是英国和法国。

就在协约国秘密商定战后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同时，英国与阿

---

①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占领肥沃新月地带的主要是英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法国只控制黎巴嫩和叙利亚海岸的狭长地带。

② Mehran Kamrava,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40.

③ Elie Kedourie, *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San Francisco, 1987, p. 117.

④ David Kenneth Fieldhouse, *Kurds, Arabs and Britons, The Memoir of Wallace Lyon in Iraq, 1918—1944*, London, New York, 2002, p. 5.

⑤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21.

拉伯人和犹太人还有另一种许诺。1915—1916 年汉志地区的侯赛因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通信（形成《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英国承诺支持整个阿拉伯世界取得完全独立，英国将帮助阿拉伯领袖建立阿拉伯政府。阿拉伯国的范围东起波斯湾，南到阿拉伯半岛至红海一线，西边到达地中海，但不包括叙利亚沿岸的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黎巴嫩、巴勒斯坦——对于该地区的界定是模糊的。英国在 1917 年 11 月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之家”。《贝尔福宣言》与英国在战时对阿拉伯人的许诺相冲突。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的承诺只是空话，而《贝尔福宣言》导致的后果极为严重。英国和法国还于 1918 年 11 月抛出《英法宣言》，宣称协约国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彻底解放长期以来受土耳其压迫的阿拉伯人民，建立由当地人民自主选择并赋予权力的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①]这一宣言也是策略和幌子。

四　帝国的瓦解

1918 年 6 月 28 日，穆罕默德六世继承奥斯曼素丹，而奥斯曼政府受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操纵。此时，首都到处是饥民，食物短缺，传染病流行。协约国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并在所有战线上开始最后的进攻。在伊拉克，英国军队继续推进并占领了北部地区，与伊朗军队会合。基尔库克于 5 月 6 日失陷，奥斯曼帝国守军向北撤退 40 公里。英国的另一路军队，遭到奥斯曼军队顽强抵抗，最终还是占领摩苏尔。在叙利亚，冯·桑德斯指挥的奥斯曼军队（随后凯末尔军队也参战）抵抗较为强烈，至少守住了防线。9 月 20 日至 23 日，纳布卢斯、海法、阿克先后失陷。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公开地反叛，奥斯曼守军被迫于 10 月 1 日撤退。不久阿勒颇和霍姆斯未作抵抗就投降。法国舰队于 10 月 6 日占领贝鲁特，10 月 14 日占领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体形势看，1918 年 10 月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决战已见分晓。保加利亚前线全面崩溃，奥斯曼帝国的南部战线已溃败。在欧洲的主战场上，德国已无力抵抗，同盟各国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到了尾声。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政府中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以塔拉特帕夏为首的内阁，被迫于 10 月 13 日公开辞职；从 1914 年 1 月就

---

① S. H. Longrigg, *Iraq, 1900 to 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115.

担任陆军部长的恩维尔帕夏，也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①]

1918年10月30日，海军大臣劳夫帕夏率领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代表团在摩德洛斯港外的英国军舰上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宣告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协约国的军队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城市、港口和战略要地。奥斯曼军队被解除武装，除了一小部分警察部队之外，其余都被遣散。协约国的战犯被释放，德国、奥匈帝国部队要在两个月内离开奥斯曼帝国。胜利者占领了海峡，控制了所有的铁路和电报线路，并宣布有权介入以保护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②]。不久，英国同意把《圣·让—德—莫里埃讷协定》中划给意大利的伊兹密尔又让给希腊（希腊军队于1919年5月占领伊兹密尔）。

冯·桑德斯将他的指挥权交给穆斯塔法·凯末尔，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当"耶尔德勒姆"（Yıldırım）军队抵达阿达纳并向协约国投降之后，凯末尔也于11月13日回到首都。英国艾伦比率领的军队迅速占领叙利亚沿海地区，法国人也随之登陆并占领西里西亚等地。1919年3月9日，英军在萨姆松登陆，接着去占领梅尔济丰（Merzifon）。在西南地区，协约国的占领是一种共同的"事务"，因为意大利人根据战时协定提出领土要求，希腊人也寻机改变协定，以实现重建拜占庭帝国的旧梦。协约国的舰队占领伊兹密尔（11月7日）。不久，意大利军队占领马尔马里斯（Marmaris）、安塔利亚（Antalya）和布尔杜尔（Burdur），还想得到已被英国军队占领的科尼亚。其实，所有"战利品"中最大的成果是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两海峡。在俄国取消对海峡的要求后，就没有国家正式提出新的要求。11月13日，协约国的一支庞大舰队穿过海峡并在伊斯坦布尔登陆。伊斯坦布尔由协约国占领。协约国军队负责伊斯坦布尔的军事管制，全部行政管理权被交给舰队司令卡尔索普（Calthorpe）——他被任命为最高行政长官，由英、意、法三国成员组成最高委员会，负责伊斯坦布尔的管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起初由英国人单独占领，从11月15日

---

①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s. 161 - 162.

②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84.

起，海峡欧洲一侧由法国军队控制。[①]

协约国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后，宣传机构向民众宣称：奥斯曼土耳其人毫无理由地屠杀了数百万基督徒，已经丧失统治基督徒的权利。协约国军队进入一些主要城市时，受到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欢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挥舞着协约国的旗帜，亲吻和拥抱这些救星。在他们看来，协约国的占领就是他们求得解放的机会。确实如他们所愿，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在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中，基督徒取代了穆斯林。在公共场所，穆斯林受到歧视。公立学校重新开放，只有基督徒被允许入学，而穆斯林儿童流落街头。在许多被占领的地区，特别是在东色雷斯、安纳托利亚地区西南部和东部省份，当地政府机构特别是警察部门等都被控制于少数教派之手。奥斯曼土耳其退伍士兵和平民被屠杀，协约国军队没有努力去制止这些暴行。只有意大利军队为保护穆斯林做了一些努力。[②]

1919 年 1 月 1 日，素丹穆罕默德六世设立军事法庭，要处置恩维尔、塔拉特和其他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新素丹任命自己的妹夫达马德·费里德（Damad Ferid）帕夏为大维齐，接受停战条款，愿意与协约国签订和平协定。

与奥斯曼素丹的态度相反，安纳托利亚的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协约国的占领。1918 年冬天及 1919 年春，一场反抗运动在安纳托利亚形成。反抗运动起初缺少强有力的领导人，直到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的到来。1919 年 5 月 19 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在萨姆松的黑海码头登陆，要去阿马西亚（Amasya），并立即通过电报与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取得联系，特别是他与驻扎在埃尔祖鲁姆的第九军准将卡济姆（Kazim）帕夏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在与卡济姆帕夏的合作中，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与两个文官侯赛因·劳夫贝伊（Hüseyin Rauf Bey）和雷福德贝伊（Refet Bey）向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民族主义组织寄去了一封公开信，强调国家到了危急关头，要求于 7 月在埃尔祖鲁姆召开国民大会。会议召开前，奥斯曼素丹怀疑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活动，要召他回伊斯坦布尔。7 月 8 日奥斯曼素丹下令解除穆斯塔法·凯末尔

---

①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29.

②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30.

的指挥权。但卡济姆帕夏一直支持恢复凯末尔帕夏的职务。

埃尔祖鲁姆的国民大会于7月23日召开，持续到8月17日结束。代表们草拟了一份书面文件，即后人熟知的《国民盟约》。这份由六个篇章组成的简短文件，宣告土耳其民族将获得独立，不受外国托管或保护；放弃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仅保留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地方；在这个边界内，外国势力和公民没有额外领土权利，少数民族不再享有特权；新国家将接受来自任何没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国家的援助。① 国民大会1919年9月4—11日在锡瓦斯召开，代表们赞成并增补了《阿马西亚宣言》，宣告解除素丹的顾问特别是大维齐达马德·费里德的职务。代表们提出要武装反抗协约国的阴谋。1920年1月28日通过了《国民公约》，重申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大会的各项原则，特别指出，土耳其只有获得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主权独立和自由，才能保证整个民族国家的兴旺和繁荣，才能建立现代化的组织机构，这是整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份《国民公约》实际上也就是新土耳其国家的独立宣言，为一个新生国家的诞生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1920年8月，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色佛尔条约》。条约共433条，主要内容有：第一，委任统治问题。伊拉克、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划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第二，领土分割问题。奥斯曼帝国承认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成立“独立国”，由英国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属地东色雷斯和亚洲本土伊兹密尔及周围地区割让给希腊；叙利亚边境一个广阔地带割让给法国；摩苏尔产油区割让给英国。第三，海峡问题和军事制裁问题。海峡地区由国际共管，各国军舰和商船均可自由通航；协约国有权随时占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军队不得超过5万人，海军只保留6艘驱逐舰和7艘炮舰；禁止建立空军、炮兵和使用重型武器。第四，经济问题。土耳其的财政和关税必须接受英国、法国、意大利建立的财政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并恢复领事裁判权。②

协约国的政治家们还决定，在建立国际联盟后，按照委任统治制度，

---

①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86.

② 以上关于《色佛尔条约》的内容，引用常见的国际关系史资料，个别地方有词句的调整。

由美国接管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亚美尼亚人聚居的6个省，实行委任统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提案最后未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委任统治成为空话。[①]

1920年4月23日，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1921年1月20日，《基本组织法》得以通过。这部《基本组织法》实际上是新土耳其国家的临时宪法。大国民议会掌握和行使行政权与立法权。经过艰苦的民族解放战争，土耳其人赶走协约国的占领军，赢得了独立。

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奥斯曼素丹制自四年前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之日起即不存在。同时宣布，哈里发将从奥斯曼家族中选出，但新任哈里发只是精神领袖，不具有任何世俗权力。11月7日，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素丹穆罕默德六世乘坐英国救护车从王宫逃走，标志着长达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制从此成为历史。1923年10月13日，伊斯坦布尔这座古城也结束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使命（从1453年到1923年，长达470年）。

---

①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 84.

结　　论

晚期奥斯曼帝国100多年的历史，用“跌宕起伏”四字可以概括其表象，但不足以揭示其本质；用“内忧外患”四字可以概括当政者面临的困境，却不足以描述帝国臣民的感受和反应。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虽说无法回到“历史现场”，但通过各类资料展示的历史图景，能发现那一段历史的丰富多彩，能了解到奥斯曼帝国下层民众当时的生存状况，同时也能看到两条明显轨迹：奥斯曼帝国在衰败和分裂中艰难地维系着主权，奥斯曼帝国臣民一次次在绝境中燃起希望，又一次次失望。

对晚期奥斯曼帝国进行整体研究之后，如果要简要地概括出结论，那就是：第一，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危机是一种“综合征”；第二，导致奥斯曼帝国分裂和瓦解，既有民族因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第三，持续百年的西化改革和内部调整延缓了帝国的衰亡；第四，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衰亡，还由它自身的弱点所致。

一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危机综合征”

奥斯曼帝国从17世纪末期开始衰退到18世纪末出现第一次危机。俄国要侵吞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奥斯曼帝国没有军事力量与之对抗，大片土地被俄军占领；而国内政治腐败，朝廷权威下降，地方几乎形成割据之势。

19世纪20—30年代经历第二次危机。希腊人要争取独立，欧洲大国支持希腊，埃及行省的总督威胁奥斯曼素丹权威，奥斯曼政府军队与埃及军队打仗遭受失败。

到19世纪70—80年代，奥斯曼帝国经历第三次危机。巴尔干地区战火不熄，国内政权更迭，欧洲大国插手，几个巴尔干公国脱离奥斯曼帝

国，在北非也丧失了突尼斯和埃及。

20 世纪初期是第四次危机。国内发生革命，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两省被奥匈帝国吞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被意大利占领，巴尔干同盟国挑起战争。

这几次危机的表现形式或“症状”不一样，病因也不一样。

18 世纪末期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军事失败、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军事方面主要表现为：18 世纪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发生过 5 次大的战争，与奥地利发生至少 3 次战争，西与威尼斯作战、东与波斯作战，几乎是每战必败。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商业优势丧失，财政出现困境，农业和手工业衰退，蒂玛制遭到破坏，下层民众生活困苦。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是：最高统治者软弱、昏聩、任人唯亲，官场风气败坏，纲纪废弛，政令不行。帝国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大大削弱；米勒特制度逐渐变质，非穆斯林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症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紧密依存的，互为因果。由于大片土地丧失，给军人授以采邑已有困难，蒂玛制名存实亡。为了应付战争，必须购置武器、扩编军队、支付薪饷，持续的战争导致奥斯曼帝国出现严重的财政枯竭。要弥补财政亏空，政府就得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税收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一个多世纪的军事失败，挫伤了尚武的土耳其人的精神和斗志。政治腐败渗透到军队中，军事训练流于形式，战斗力逐渐丧失，军队非但不能抵御外敌，还变成动辄挟持将领，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力量。奥斯曼素丹政令不出宫门，实际权力弱化，有的行省总督和地方长官不服从奥斯曼帝国政府，甚至蔑视朝廷的权威；地方世袭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与中央政府对抗。这一切，使整个国家政权脆弱不堪，经不起风雨，而等待这个帝国的，恰恰是 19 世纪的大风、大浪、大震荡。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两次危机，主要表现是，经济并未出现复苏，政治依然腐败，军队依然不能打胜仗，而西方资本主义力量开始冲击奥斯曼帝国，欧洲大国开始干预帝国的行政事务，行省和属地开始寻求独立。19 世纪奥斯曼帝国面临很多问题：一是属地和行省的分离趋势。先是希腊起义，接着是两次埃土战争。奥斯曼帝国政府穷于应付，列强乘机插手，既点燃了巴尔干地区民族独立的火焰，又打垮了埃及，还削弱了奥斯曼帝国。二是俄国为夺取黑海出海口不惜一切代价，咄咄逼人，迫使奥斯

曼帝国把寻求帝国安全放在首位，为此不得不延缓改革步伐。三是巴尔干发生的危机，变成列强干预内政的演习场。四是奥斯曼帝国国库空虚，为维持皇室腐朽生活和官僚机构开支，为支付军费，政府举借的外债主要用于弥补亏空，不能用于发展生产，“富国”的计划成为泡影。

如果说第一次危机主要是奥斯曼帝国自身衰弱、败退、腐化的问题，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危机除了自身的问题，还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使得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几乎每一件大事上都不能“自己做主”。因为与欧洲先进国家为邻，奥斯曼帝国较早接触到西欧的技术和文化；正因为与欧洲为邻，奥斯曼帝国遭受欧洲强国的侵略和控制，被欧洲大国的利益所裹挟，成为大国争夺的目标。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发展和对外扩张席卷世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衰弱国家没有能力抵挡这一趋势。巴尔干地区诸国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本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但欧洲大国干涉和插手，把奥斯曼政府对内的施政行为摆到欧洲会议的桌面上讨论，使内政“国际化”，变成“外交事务”。奥斯曼帝国与大国打交道时，总会被绕到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地位问题上，欧洲大国暗中或公开支持属国的分裂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与“内政”交织在一起。公债管理处负责奥斯曼帝国的税收，等于是“外国人”当了奥斯曼政府的管家，内政到底是谁家的内政，很难分得清楚。

20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的危机，主要特点是奥斯曼素丹专制走向尽头，外国侵略行径变本加厉，奥斯曼帝国多民族大家庭迅速瓦解，少数当政者的错误决策把帝国推入战争的深渊。阿卜杜·哈米德二世30多年的专制使社会矛盾达到极点，宪政革命几乎是一种必然。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了奥斯曼素丹专制，建立了自己一个党派的专制，推行了改革，一度唤起民众的希望，但巴尔干地区属国纷纷脱离，北非最后一块领地丢失。就算1908年的“土耳其宪政革命”是历史的进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巴尔干战争、意土战争的失败不能全怪青年土耳其党人，但是，加入同盟国的举措，无论如何都不是正确的选择。恩维尔等个别领导人与德国结盟的决策，并没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如果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崩溃或亡国，但不至于那么迅速。

综合上述分析，尽管这四次危机的“症状”不同，病因也是不同的，但也有贯穿四次危机的共同的病因。其一，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末是弱

国，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仍是弱国，虽然不断为现代化努力，但没有达到国富民强的程度，弱国地位没有改变。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20世纪初期仍然是落后的。其二，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势力在18世纪时威胁奥斯曼素丹权威，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阿拉伯行省、巴尔干行省的离心力没有缩小，反而增大。其三，欧洲大国18世纪末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海峡、东地中海、波斯湾有利益争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争夺更加激烈。其四，奥斯曼帝国18世纪经济上的衰退，前提是生产技术停滞，价值观念落后，制度不健全，社会结构不合理，而19世纪到20世纪初由于引进西方科技使生产技术有所提高，但多数民众的价值观念仍然落后，制度有所改变但仍然不健全，社会机构依然不合理。因此，危机会反复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二　导致奥斯曼帝国分裂和瓦解的因素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国家衰弱、民族矛盾尖锐时，必然会出现民族分离倾向，导致社会失稳。一旦有外国势力的唆使和支持，民族、宗教矛盾会演化成内乱甚至战争，严重时会出现分裂以至国家瓦解。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几次出现分裂，由于统治者的努力，一次次勉强渡过难关，但闹独立的行省还是先后脱离了帝国。总体来看，分裂过程有两个层面：一是以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主动脱离奥斯曼帝国；二是接受欧洲大国安排，按照国际条约取得独立，或者直接被欧洲国家占领。实际上，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的独立是这些民族主动寻求独立，得到欧洲大国的支持最后脱离奥斯曼帝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是被大国占领，因而脱离帝国；埃及则是主动挑战奥斯曼素丹权威但没有成功（大国帮助奥斯曼素丹而打压埃及总督），处于半独立，最后被英国吞并。

首先，少数民族是晚期奥斯曼帝国社会变革和西化改革的受益者，但他们寻求提高政治地位，走上了抗争道路。比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基督教徒，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者和经营者建立联系，致力于新兴的商业和金融业，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土

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奥斯曼政府的西化改革倡导民族平等，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地位，打破了穆斯林主体民族与非穆斯林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关系，受到新政策鼓舞的基督教徒和少数民族寻求自治或独立的活动，构成分裂奥斯曼帝国的基本力量。欧洲大国的插手，加快了民族分离的步伐。到 19 世纪中后期，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可以说，先是奥斯曼帝国社会基础在 19 世纪逐步松动，而后是多民族奥斯曼帝国的外壳破裂，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奥斯曼帝国最后的一击。或者说，因战争而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的外壳，而特殊利益群体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内核。

其次，欧洲大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争夺，使奥斯曼帝国表面上始终维系着主权，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独立（没有沦为殖民地），但奥斯曼政府未能从实质上保持内部统一，疆域逐渐萎缩，统治范围已退出了东欧和北非。

由于欧洲大国支持，希腊成为巴尔干地区第一个主动反抗奥斯曼帝国并取得成功的国家。希腊独立战争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希腊独立是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干预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开端，在此后的苏伊士运河问题、近东危机、埃及奥拉比起义等事件中，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屡屡受到欧洲大国干涉。例如，“近东危机”以《柏林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算是对巴尔干问题有一个暂时的安排。但《柏林条约》不仅未能解决巴尔干的民族问题，反而激化了这一地区固有的矛盾，为几十年后更大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站在近东角度看，19 世纪欧洲大国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抵制俄国，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 20 世纪初期大国的插手无疑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再次，埃及的“半独立”对奥斯曼帝国乃至整个近东的历史有深远的影响。拿破仑 1798 年入侵埃及以失败告终，法国人的短期占领对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有限，只是给穆罕默德·阿里统一埃及提供了机会。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使埃及经济和军事得到发展，形成脱离奥斯曼帝国不可忽视的力量。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两次战争，既削弱了埃及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这是改变近东力量均衡的开端，为英、法等大国进入东地中海准备了条件。穆罕默德·阿里之后的统治者没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又不甘心成为俯首听命于奥斯曼素丹的行省总督，为对抗奥斯曼政府求得半

独立而依附于欧洲强国。苏伊士运河方便了殖民者而拖垮了埃及财政，欧洲人从“财政监督”到政治控制逐步深入，最后埃及被英国彻底占领，成为英国在近东的第一个直接控制的战略基地。埃及维持“半独立”近80年，欧洲殖民者得以轻易地在近东打开一个重要缺口，既使奥斯曼帝国受制于大国，又使得东西方运输和贸易的通道为西欧强国所控制，由此造成了近东格局的不可逆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和法国能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等阿拉伯行省，都与英国控制运河、占据埃及有直接的关系。

如何看待埃及的“半独立”，我们的世界近代史中存在着如何“评价”的困惑。近代历史就是亚非拉美等落后地区各民族获得独立、解放的历史，只要是反抗国内的统治阶级，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都是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穆罕默德·阿里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又抵制英法侵略者，属于埃及争取独立的行动，埃及的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家族，在统治埃及和占领叙利亚等地后推行剥削、压迫当地人民的政策，穷兵黩武，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如果要深一层说，穆罕默德·阿里闹独立威胁到奥斯曼帝国的存亡，却为欧洲列强提供了控制东地中海的机会。

穆罕默德·阿里结束了埃及的长期混乱，通过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埃及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为后来埃及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问题是，埃及从此“半独立”而不是彻底独立，对埃及的发展不利。倘若彻底独立，作为主权国家，既不受奥斯曼帝国控制，也可以开展独立外交，公开寻找国际上的盟国，绝不至于被英国和法国摆布。倘若穆罕默德·阿里没有挑战奥斯曼素丹，相反却与奥斯曼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欧洲强国也会有所忌惮。这样，埃及行省、奥斯曼帝国以及近东形势会是另外一种格局。

最后，奥斯曼帝国的开放伴随着“依附”。奥斯曼帝国处于西方优势支配下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面对西方大国的攻势，奥斯曼帝国寻求支持的对象不断转换，这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善于运用外交谋略，而是形势所迫。为了对付俄国和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最先依附普鲁士、瑞典，继而寻求法国、英国的支持；后来因看穿英国和法国近东外交的真实意图，不再信任英国和法国，崛起的德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盟友。奥斯曼素丹从德国获得了大量的援助，修筑了铁路，改善了军队装

备，在德国军官的帮助下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这是有益的。而且，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关系使它能应付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这种开放对奥斯曼帝国也有积极意义。但在外国资本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同时，帝国政府对外国尤其是德国的依赖增强。因此有的学者说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依附”关系对奥斯曼帝国具有“腐蚀性”也具有“毁灭性”，“腐蚀性”是指经济渗透，“毁灭性”是指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　奥斯曼帝国持续百余年的西化改革

从1792年的塞利姆三世改革，到1914年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斯曼帝国在衰败、分裂的过程中有一条明显的主线，那就是统治阶层的精英人物前仆后继的西化改革。改革起初只引进“器物”，不触及制度和观念，并认为只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就能富国强兵，赶上西方国家。塞利姆三世能洞察帝国的忧患，是富有政治远见的，其军事改革也有一定的成效，但改革并未进行到底。马哈茂德的改革成果较多，他彻底解除了旧军队；剥夺了威胁中央政府的地方贵族的权力，维护了素丹的权威；按欧洲模式设立行政机构；实现了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废除了蒂玛制，为后来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坦齐马特时代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的改革措施成效较大，使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虽然实行专制统治，但他并不放弃改革和西化，奥斯曼帝国总体上沿着坦齐马特时代开创的西化道路前进，对外开放的幅度加大。随着铁路和港口的修建，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地的联系加强了，与国外的交流畅通，奥斯曼帝国的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里建起了银行、电话局、报社，出现了新式学校、孤儿院、诊所和医院，社会上吹起文明之风。后来，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对奥斯曼社会进行了改革，如立法改革和教育改革，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各项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奥斯曼帝国持续百余年的改革，是近代东方和亚非拉国家救亡图存的样板，因为其他国家的改革都没有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早，也没有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持续时间长。在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上，坦齐马特时代是一个光芒四射的阶段，也是一个催人奋进的阶段。不过，一百多年改革的结果并未达到最初的目标，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思：

第一，容易改革的都改了，难以改革的还是没有改。比如引进西方的技术，利用外资修筑铁路港口，这些都有较大的成绩。又如社会习俗的改革，容易学的东西都学到了。西方人的消费方式在奥斯曼帝国的大城市流行，欧洲的礼仪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成为时尚，大礼服、西装领带，在各个城市渐次出现西欧风格的建筑在伊斯坦布尔随处可见。从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西方化了、文明了、现代化了。但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尝试多次，都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第二，改革在“集权”与“限权”的悖论中进行，无法取得真正的突破。西化中政治改革就是引进西方的制度，限制君主的权力，实行立宪政治，但立宪就要限制奥斯曼素丹的权力。奥斯曼素丹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相反，在改革过程中，各时期的素丹们想尽一切办法扩大自己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马哈茂德二世把削弱地方势力当作首要任务。客观地说，面对国内分裂局势，假如不能集权，国家安全和稳定都不能保证，哪有机会推行改革；即使改革，再好的改革法令也会变成一纸空文。假如加强权力，则与立宪政治的目标和原则相背离，与西化的道路南辕北辙。奥斯曼帝国不断发生叛乱、起义，而这些叛乱、起义都有“正当理由”——争取民族独立是合法的革命行动。假如听任各个属地的民族主义者实现独立愿望，奥斯曼帝国必然瓦解。奥斯曼帝国要维护国家稳定只有派军队镇压，镇压叛乱，奥斯曼素丹因此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暴君。从外部环境看，俄国要侵占奥斯曼帝国领土，时刻准备着肢解奥斯曼帝国，关键是俄国比奥斯曼帝国强大，俄国已实现工业化，有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有一支现代化的常备军。奥斯曼帝国要是不能集中国内一切资源，动员一切力量，就不能抵御外敌，也就没有机会开展改革。而要动员国内一切力量，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不加强中央权力是不行的。既要维护稳定，抵御外敌，又要推行改革，只能是“集权式改革”或者是“独裁式现代化”。

第三，持续的改革使奥斯曼帝国社会的许多领域发生了变化，但官场作风没有改变，官员的办事方式没有改变，等级和特权依然如故。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是因为遇到了危机，似乎多数阶层的人都希望改革；但一旦危机稍有缓解，支持改革的力量似乎又土崩瓦解；倘若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反对改革的力量似乎就从四面八方扑过来。几经折腾，想改变的未能改变，不期望改变的不知不觉就变了。比如奥斯曼素丹不希望臣民对

自己的忠诚发生改变，但已经改变了；改革者努力要打破特权，建立社会公正，但奋斗了百余年，到帝国瓦解时还没有达到目标，特权、垄断、不公正这些东西稳固如磐石，纹丝不动。

第四，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带有“急功近利”的特点。那些旨在改革的社会精英中，无论是渐进主义者，还是激进主义者，考虑问题的起点和终点，基本上停留于政治斗争的层面，而且，推行改革时也“成功心切”，把西方的经验当作灵丹妙药，期望短期奏效。即便是米德哈特帕夏、雷希德帕夏这样意志坚定的改革家，也缺少“登高望远”的气魄和胸怀，缺少“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从容心态和经纬韬略，缺少“润物无声”的细致铺垫和周密安排。因此，奥斯曼帝国百余年改革的道路“既阻且长”，曲折迂回。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是迫于形势而做出的反应，改革从上层开始启动。改革家的理想是使奥斯曼帝国像西方国家一样军事强大、社会进步，但奥斯曼帝国社会深层并没有发生像西欧那样的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变动。旧制度出现腐败，不适应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但旧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依然如故，奥斯曼帝国还是那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现代工业社会的一套规则和制度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既没有在穆斯林中产生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阶层，也没有产生新兴农业资本家阶层，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多，全面的西化改革到底是哪个阶层的要求？哪个阶层是改革的中坚力量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不能达到最初设想的目标，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如果不以成败论改革，就可以看出改革对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前进所起的推动作用。持续改革，就是不断地对传统社会进行强制性调整。改革可能激化了某些矛盾，但毕竟消除了一些阻碍国家机器运转的因素，使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缓慢转型，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无论改革遇到多大挫折，改革的努力是坚决的、强劲的。起初是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为本国的发展主动寻求西方帮助，后来是西方国家大规模的资本输入，这把奥斯曼帝国引向了经济依附的道路，但也阻止了这个帝国一路下滑的趋势。

四 奥斯曼帝国自身的弱点

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几次危机、奥斯曼帝国的持续改革、帝国的分裂和

瓦解，前面已做了具体的分析。直观的印象是，这个帝国的衰败、分裂和瓦解有不少“客观原因”，要是没有那么多不利因素，奥斯曼帝国似乎就不会分裂和瓦解；如果改革取得完全成功，奥斯曼帝国也就不会有那样的结局。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即使没有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变故，也会走向衰落甚至解体，因为它自身有不少弱点。有这些弱点存在，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第一个弱点：奥斯曼帝国是靠军事征服建立的，像一个摊大饼式的无限扩展的“巨无霸公司”，它始终没有细致地规划它的内部管理。惯于横刀立马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只知道财富是可以通过掠夺而获得的，不擅长“算计”、理财。奥斯曼帝国除了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和巴尔干地区东部的“腹地”之外，行省和属地几乎都是它的“边疆地区”。这样一个松散的政治实体，各个行省和属地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发展不平衡，给奥斯曼帝国埋下了分裂和瓦解的隐患。

第二个弱点：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被黑海、地中海、红海所分割，地理上不完整，经济上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是一个“大拼盘”，在广阔的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行省，传统农业、手工业与游牧业并存，而少数民族地区已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的任何一项经济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都要大打折扣，更不要说经济的整体发展。

第三个弱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构僵化，下层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在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中，维护中央权力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西方国家也维护中央权力，但差别在于，西方国家不同的阶层能分享政治权利，能用正常手段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奥斯曼帝国等级固化，统治者不能理顺各阶层的关系，下层不能表达正常诉求。在国家机器强大时，下层不敢反抗朝廷。一旦奥斯曼素丹的权威下降，国家的军事力量衰弱，反抗和分裂活动就必然发生。

第四个弱点：在奥斯曼帝国，人口数量较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要统治人数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和其他各民族，统治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历史上的多次叛乱和后来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合法性不时地受到挑战。

第五个弱点：奥斯曼土耳其人本来没有成熟的“外交”观念，后来与欧洲打交道才开始学习外交，但始终不得要领，多次吃亏。奥斯曼土耳

其人即使搞外交也是传统的方式，比如远交近攻、册封藩属，或者与对方讲友情。西方国家则是现代理念的外交，只讲利害，或者只抓外交关系的本质，计算成本，不做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外交理念上和手段上与西方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

奥斯曼帝国自身有这么多弱点，而且，这些弱点靠一两道改革法令是不能被纠正或补足的。再赶上最后一个多世纪的狂风大浪，其衰弱、分裂、瓦解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一）土耳其文资料

Enver Ziya Karal, *Osmanlı Tarihi*, Vol. Ⅴ—Ⅷ, Türk Tarih Kurumu Basimevi—Ankara, 1995.

Yaşar Yücel, Ali Sevim, *Türkiye Tarihi*, Vol. Ⅲ—Vol. Ⅴ, Türk Tarih Kurumu Basimevi—Ankara, 1992.

Mehmet Maksudoğlu, *Osmanlı Tarihi, 1289—1922*, Ensar Neşriyat Kitap, İstanbul, 2009.

Robert Mantran,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arihi*, (Vol. Ⅰ - Ⅱ), Çeviren: Server Tanilli,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Bilal Eryılmaz, *Tanzimat ve Yönetimmde Modernleşme*, işaret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6.

Halide Aslan, *Tanzimat Döneminde Din Değiştirme Hareketleri, 1839—1876*, Türkiye Diyanet vakfı yayınlar, Ankara, 2010.

Yurdagül Mehmedoğlu, *Tanzimat Sonrasında Okullard Din Eğitimi, 1838—1920*, Vakfı yayınler, İstanbul, 2001.

Halil Inalcık, Mehmet Seyitdanlıoğlu, *Tanzimat: Değişim Sürecinde Osmanlı İmparatorluğu*, Türkiye İş Bankasi,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Fevzi Demir, *Osmanlı Devleti' nde II Meşrutiyet Dönemi Meclis-i Mebusan Seçimleri, 1908—1914*, İmge Kitabevi Yayınları, Ankara, 2007.

Ali Haydar Midhat, *Osmanlı' dan Cumhuriyet' e Hatıralarım, 1872—1946*, Bengi Kitap Yayınları, İstanbul, 2008.

Ömer Seyfettin, *Balkan Harbı Hatıraları*, Hazırlayan Tahsin Yıldırım, İstan-

bul, 2011.

Mustafa Çolak, *Enver Paşa: Osmanlı-Almanac İttifakı*, Yeditep Yayınlar, İstanbul, 2008.

Hayredin Nedim Göçen, *Osmanlı ve Avrupa*, Selis kitaplar, İstanbul, 2008.

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ıratım, Hareket Yayınları, İstanbul, 1974.

Necmeddin Sahir Sılan, *II Meşrutiyet ve Sonrası Hatıralarım*, Hazırtayan: İsmail Dervişoğlu, İstanbul, 2010.

Şebnem Pişkin, *Sevgili Abdülhamit Han*, İstanbul, 2011.

Galip Vardar (Anlatan), Samih Nafiz Tansu (Yazan), *İttihad ve Terakki içinde Dönenler*, Inkilap Kitabevi, İstanbul, Ankara, 1960.

Oral Sander, Kurthan Fişek, *Türk-ABD Silah Ticaretinin İlk Yüzyılı*, İmge Kitabevi yayınler, Ankara, 2007.

(二) 西文文献资料和工具书

Suraiya Faroqhi, *Approaching Ottoman History: an Induction to the Sour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 C. 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1) 1535—1914; (2) 1914—1956.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56.

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 Vol. Ⅰ, 1535—1914, Vol. 2, 1914—1945,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Vol. Ⅰ); 1979 (Vol. 2).

The Suez Canal: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Suez Canal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Suez Canal Company, November, 30, 1854—July, 26, 1956, London, 1956.

Joel H. Wiener, *Great Britai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pan of Empire, 1689—1971: a Documentary History*, Mcgraw Hill Book Co.,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1972.

Gábor Ágoston, Bruce Nasters,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 Facts on File, New York, 2009.

Selçuk Akşin Somel,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Lanham, Maryland and Oxford, 2003.

Philip Mattar, Philip Mattar,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nd edit.*), Vol. 1 – 3, Macmillan Reference, U. S. A., 2004.

Trevor Mostyn,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New York, Sydney, 1988.

Fikret Adanir, Suraiya Faroqhi, *The Ottomans and the Balkans, a Discussion of Historiography*, Bill, Leiden, Boston, Kŏln, 2002.

Frank W. Thackeray, *Event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hn E. Findling, Westport, Connecitict, 1996.

Edwin Pears, *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The Anchor Press, Ltd., Tiptree Essex, England, 1915.

Edwin Pears, *Life of Abdul Hamid*, London, 1917.

Cyrus Hamlin, *My Life and Times*, Boston, The Pilgrim Press, Chicago, 1893.

The Balkan War Drama,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J. M. Wagstaff, *Greece: Ethnicity and Severeignty, 1820—1994, Atlas and Documents*, Archive Editions, London, 2002.

(三) 专著(民族与社会类)

Gabriel Baer, *Fellah and Townsmen in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 Social History*,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1982.

Benjamin Braude and Bernard Lewi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Function of a Plural Societ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2.

H. A. R. Gibb, H.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Parts. 1, 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57.

Molly Greene, *A Shared World: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ruce Alan Master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Justin Mc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Donald Quataert, *Workers, Peasant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Ottoman Empire: 1730—1914*, Istanbul, 1994.

Irvin C. Schick, *Turkey in Transition*: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rtin Sicker, *The Islamic World in Decline*: *from the Treaty of Karlowitz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ttoman*, 2001.

Stanford J. Shaw, *The 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1.

Bill Williams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Change in Egypt and Turkey*, *a Stud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87.

（四）专著（经济类）

Karen Barkey,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fred Bonne, *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 Routledge, London, 1998.

Kenneth M. Cuno, *The Pasha's Peasants—Land*, *Society*, *and Economy in Lower Egypt*, *1740—1858*, Cario, Egypt, 1994.

Donald C. Blaisdell, *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 *a Study of the Establishment*, *Activiti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Ottoman Public Debt*, New York, 1929

Halil Inalcık & Donald Quataer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rles Issawi, *The Middle East Economy*: *Decline and Recove*r, Princeton, 1995.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5.

Re Sat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M. Riad EL-Ghonemy, *Affluence and Pover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 New York, 1978.

Alan B. Mountjoy,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1982.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1981.

Şevket Pamuk,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 1820—1913: Trade,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H. A. B. Rivlin, *Agricultural Policy of Muhammad Ali in Egyp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五) 专著(政治与国际关系类)

Alan Palmer,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2.

Andrew Rossos, *Russia and the Balkans: Inter-Balkan Rivalrie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908—1914*,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1981.

Angelia Michelli Fleming and John Maxwell Hamilton, *The Crimean Wa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Baton Rouge, 2009.

Benno Avram, *The Evolution of the Suez Canal Status, from 1869 to 1956, a Historic-Juridical Study*, Librairie E. Droz, Geneva, 1958.

Bernald Lewis, *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3.

Charles W. Hallberg, *The Suez Canal: its History and Diplomatic Importan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1.

E. M. Earle, *Turke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dad Railway*, New York, 1923.

Eugene L.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0—1921,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9.

Joseph Heller,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4*, London, 1983.

Hale Willia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1774—2000*, London,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0.

Iran Fletcher and Natalia Ishchenko, *The Crimean War, a clash of empires*, Spellmount, Staplehurst, 2004.

John Marlowe,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6*, Archon Books, Hamden, Connecticut, 1965.

Jeannine Verdès-Leroux, *Les Français d'Algérie, de* 1830 *à aujourd'hui*,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1.

M. C. Aulas, . Besançon, *L' Egypte D' Aujourd' hui, Permanence et Changements, 1805—1976*,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77.

Weismann Itzchak, Fruma Zachs, *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 B. Tauris; St. Martins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5.

E. Kedourie, *England and Middle Ea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21*, London: Bowes, 1956.

Marian Kent,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ank Cass, London, 1996.

Bernard Lewis,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 , New York, 1964.

M. E.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gm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7.

M. S. Aderson. ,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Macmillan London, 1966.

Donald M. Mckale, *War by Revolution: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the Middle East*,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98.

Jonathan McMurray, S. *Distant Ties: Germany, the Ottoman Empire*,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Patrice Bret, *L' Egypte au temps de l' expédition de Bonaparte, 1798—1801*, Hachette Littératures, Paris, 1998.

Raphaël Delpard, *L' Histoire des Pieds-Noirs D' Algérie, 1830—1962*, Editions Michel Lafon, Neuilly-sur-Seine Cedex, 2002.

Suraiya Faroqhi,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2004.

Stephen PierceHayden Duggan, *Eastern Question: a Study in Diplom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1902.

The Balkan War Drama, a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rew Melrose, 1913.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Pearson Longman, Harlow, London, the U. K. , 2007.

Wayne S. Vucinich, *The Ottoman Empire, 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1965.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英] 艾瑞克·霍布斯邦：《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

[英]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英]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的系列政论文章《土耳其问题》、《土耳其宣言》、《克里木战争》、《塞瓦斯托波尔骗局》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1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六）通史及断代史

David Kenneth Fieldhouse, *Kurds, Arabs and Britons, the Memoir of Wallace Lyon in Iraq, 1918—1944*, London, New York, 2002.

Douglas A. Howard, *The History of Turkey*,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2001.

M. W. Dale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20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versley, Lord, *The Turkish Empire, from 1288 to 1914*. Howard Fertig, New York, 1969.

A. Harry Gailey, *History of Africa, from 1800 to Present*,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New York, 1972.

Albert Hourani,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981.

Albert Hourani, Philips Khoury and Mary C. Wilso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Reader*, London, New York, 1993.

John Mavrogordato, *Modern Greece, A Chronicle and a Survey, 1800—1931*,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1931.

John S. Koliopoulos, *Modern Greece, a History Since* 1821, Wiley-Blackwell, Oxford, 2010.

William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M. Şükrü Hanioğl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r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8.

Mehran Kamrava, *The Modern Middle East : 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Nicholas Doumanis, *A History of Greece*, Pla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10.

P. J. Vatikiotis,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Weidenfeld, London, 1969.

Richard Clogg,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86.

Stanford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1)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uraiya Faroqhi,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 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raiya Faroqhi,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I. B. Tauris, Londond, New York, 2004.

S. H. Longrigg, *Iraq, 1900 to 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Thomas W. Gallant, *Modern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 York, 2001.

Sina Akşin, Dexter H. Mursaloğlu, *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00.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0.

William Yale, *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1) (2),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yflower, London, 1959.

Erik Jan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 B. Tauris, London, New York, 1993.

[英]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美] 戴维森（Roderic H. Davison）：《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Turkey），张增建译，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

[美] 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美] 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上卷的中译本),许序雅等译,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七) 论文

E. Attila Aytekin, "Agrarian Relations, Property and Law: an Analysis of the Land Code of 1858 in the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6, November 2009, pp. 935 - 951.

Yasemin Avci, "The Application of *Tanzimat* in the Desert: the Bedouins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Town in Southern Palestine (1860—1914)",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6, November 2009, pp. 969 - 983.

Charles Morawitz, "The Public Debt of Turkey", See: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75, No. 549 (August, 1902), pp. 275 - 288.

Hakan Kirimli, "Emigrations from the Crimea to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4, No. 5, September 2008, pp. 751 - 773.

Oded Peri, "Ottoman Symbolism in British-Occupied Egypt, 1882—1909",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1, No. 1, January, 2005, pp. 103 - 120.

Selim Deringil, "The Ottoman Response to the Egyptian Crisis of 1881—82", *Middle Eastern Studies* , Vol. 24, No. 1, January, 1988. pp. 3 - 24.

Baki Tezcan, "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5, No. 3, May 2009, pp. 477 - 505.

Ş. Tufan Uzpinar, "The Repercussions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on Syria, 1882—83",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1, January, 2000, pp. 82 - 91.

附录

晚期奥斯曼帝国(1792—1918年)重大历史事件

1792年，塞利姆三世开始改革。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行省。

1808年，马哈茂德二世即位。

1809年，马哈茂德二世开始改革。

1821年，希腊人起义引发战争。

1826年，解散旧军队，建立新式军队。

1828—1829年，俄土战争。

1830年，希腊宣布独立。

1830年，法国吞并阿尔及利亚。

1831年，第一次埃土战争爆发（1833年5月结束）。

1839年，第二次埃土战争（1839年4—7月）。

1839年，坦齐马特开始。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956年2月战争结束）。

1859—1869年，开凿苏伊士运河。

1875年，巴尔干民族起义。

1876年，制宪会议，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产生。

1877年4月，俄土战争爆发。

1878年1月，签订《圣斯蒂法诺和约》。

1878年6月，柏林会议召开。

1878年7月，签订《柏林条约》。

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

1902 年，奥斯曼政府与德国签订巴格达铁路合同。

1908 年，恢复宪政。

1911 年，意土战争爆发，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

1912—1913 年，两次巴尔干战争。

1914 年，向协约国宣战。

1916 年，阿拉伯人大起义。

1918 年，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占领，帝国瓦解。

(1922 年穆罕默德六世被废黜，帝制结束。)

晚期奥斯曼帝国在位素丹年表

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

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IV，1807—1808）

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

阿卜杜·麦吉德（Abdül Mecid，1839—1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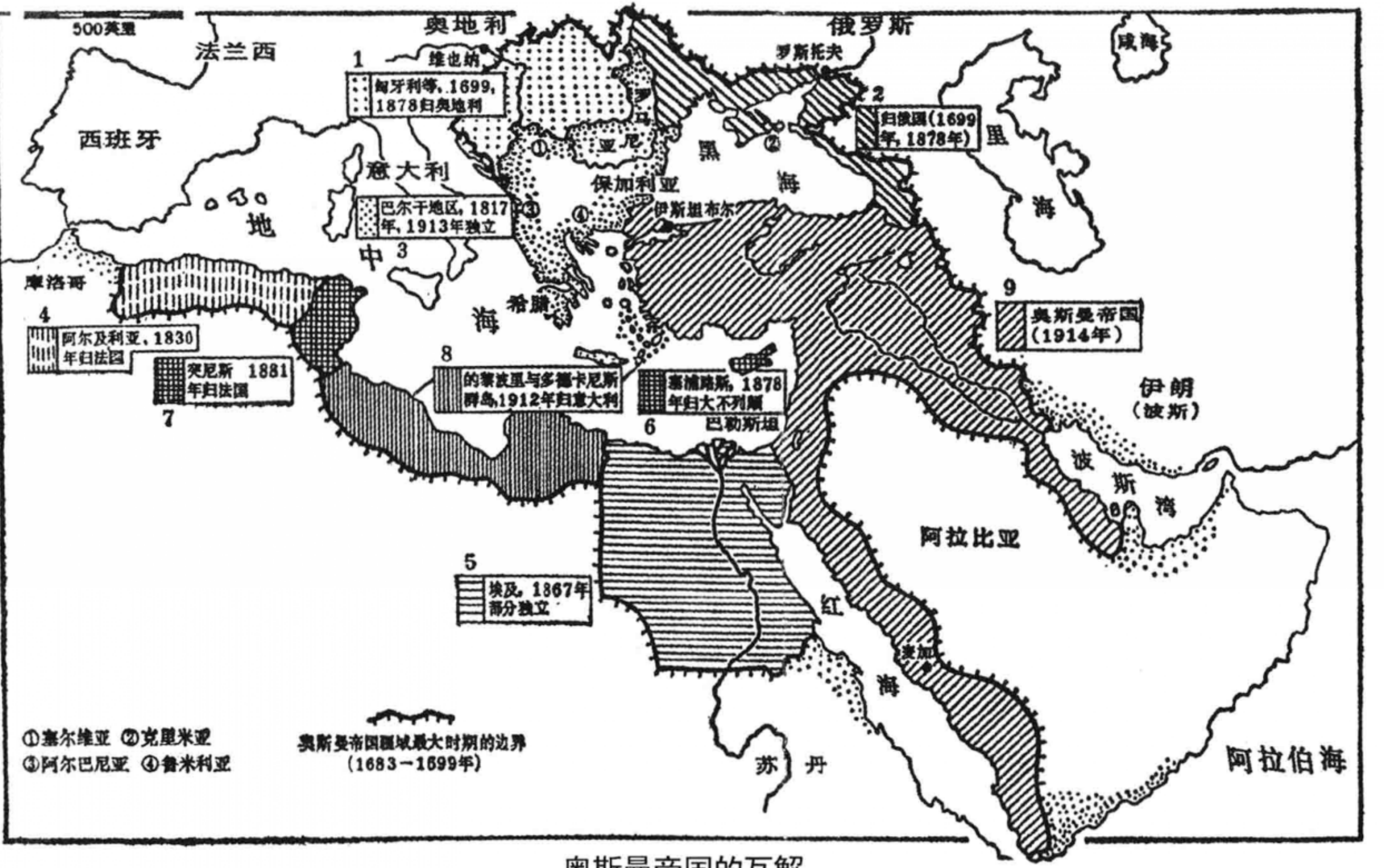
阿卜杜·阿齐兹（Abdül Aziz，1861—1876）

穆拉德五世（Murat V，1876）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d II，1876—1909）

穆罕默德五世（Mehmet V，1909—1918）

穆罕默德六世（Mehmet VI，1918—1922）


500英里
奥地利
法兰西
俄罗斯
罗斯托夫
里
海
西班牙
维也纳
1
匈牙利等，1699，
1878归奥地利
2
归俄国(1699
年，1878年)
罗马尼亚
黑
海
意大利
保加利亚
伊斯坦布尔
巴尔干地区，1817
年，1913年独立
3
地
中
海
希腊
摩洛哥
4
阿尔及利亚，1830
年归法国
突尼斯 1881
年归法国
7
8
的黎波里与多德卡尼斯
群岛，1912年归意大利
塞浦路斯，1878
年归大不列颠
6
巴勒斯坦
9
奥斯曼帝国
(1914年)
伊朗
(波斯)
波
斯
湾
阿拉比亚
5
埃及，1867年
部分独立
红
海
麦加
苏
丹
阿拉伯海
①塞尔维亚 ②克里米亚
③阿尔巴尼亚 ④鲁米利亚
奥斯曼帝国疆域最大时期的边界
(1683－1699年)

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后　记

很早就打算研究晚期奥斯曼帝国，也有零零散散的论文发表，真正深入下去，觉得困难重重。一度想放弃研究奥斯曼帝国，写信给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田文林博士，他当时在巴基斯坦访学，来信鼓励我继续做下去。后来扩大选题范围，2009 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埋头于资料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琢磨，研究工作持续了三年半。从结项到出版，又是两年。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研究，我得到过黄民兴老师、张晓华编审、陈晓律老师的指点。2010 年后半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访学，李春放研究员给我很多建议。土耳其资料的使用，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刘钊先生给予鼓励和帮助，尤其是刘钊先生，多次帮我修改校对人名地名的译音，我非常感激。2011 年，经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教授推荐，英国考文垂大学阿兰·亨特教授邀我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我才有机会到伊斯坦布尔搜集资料，参观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皇宫、清真寺、使馆、民宅，亲眼看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文物。

我搜集到的法文资料，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黄艳红博士协助翻译，才变成可用的资料，补充了课题中涉及法国入侵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问题的资料。我的研究生马一笑除了翻译部分资料，查找核对书目，还做了不少校对工作，王京晶帮助校对了部分章节。在此一并致谢。

王三义

2015 年 1 月